

近代藏書三十家

蘇精著

(增訂本)

余昔年收得舊鈔本近光集為謙牧堂
舊藏後入海源閣者曾以閱本對勘凡訂
正謬誤五百餘字補佚詩五首又殘詩四首
曾撰跋文刊於國圖周刊今見勞季言校
本取余藏本參證乃一一符合知勞氏所
據惠氏本正同出一源也安得有好事者取
而刊傳之耶奇書難得覽者幸毋失之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藏书三十家/苏精著. —增订本.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4 (2009. 6 重印)

ISBN 978-7-101-06548-0

I. 近… II. 苏… III. 藏书家—列传—中国—近代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19957 号

书 名 近代藏书三十家(增订本)

著 者 苏 精

责任编辑 王 楠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9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6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8 $\frac{3}{4}$ 插页 2 字数 240 千字

印 数 4001—7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6548-0

定 价 38.00 元

新 序

自己将近三十年前的这部旧作，竟然还有修订再版的机会，实在是完全想不到，因此在写这篇新序时，未下笔而心中先已有些百感交集，这不仅因为三十年毕竟是人生中相当长的历程，更在于时代环境与个人际遇在此期间都已有了绝大的变化。

本书各篇自一九七九年起陆续出版，而于一九八三年结集印行后，来自台湾与大陆素昧平生的多位书评作者的厚爱、一些藏书家后人的联系致意，以及不少藏书史同道的引用与指教，都使我大受鼓舞，我的职务也因本书而获得擢升。照理说我应一本初衷，继续努力于藏书史的探索，以期能有较本书更多更好的成绩，结果我却在不到十年后改变意向，放弃了原有的读书和写作领域，甚至也放弃了赖以谋生的工作。

事实在本书出版后不几年，我已感受到大陆改革开放反映在藏书史的现象，包括史料络绎不绝“出土”、关注与研究持续增加、相关论著大幅增长等等。面临此种新情势，我不免时而反省自己身处海隅应如何为宜的问题。但是，后来促成我决定改变的关键因素，却是缘于工作上的困境，在一名颐指气使的新长官随时否定与羞辱部属的领导作风下，我挣扎、考虑并准备了大约三、四年后，终于辞职离开原以为可安身立命终老的图书馆，也放弃了再过两年多即可达到的退休资格，而以将近半百之年远赴英国进修，并因盘缠不足而变卖勉可居栖的小屋，于是从一九九二年起成为无家可归的异域过河卒子，还为此不得不将藏书全抛了，更何况藏书史。

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是关于十九世纪西方印刷术传入中国的研究,虽然不能说这与藏书史搭不上丝毫的关系,但是一九九六年底我总算完成学业拼得老命回到台湾后,接连任教于三所大学的不同系所,以致随时都处在准备新课教学的紧张状态,加上自己的研究也从印刷史逐渐倾向十九世纪基督教在华传教史,并先后出版了我在新领域的三部专书,因此实在无暇也无余力顾及其它。

从八〇年代末预备出国留学至今,我荒废藏书史竟已二十年了。因此,当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底接到中华书局编辑王楠女士来函,希望能印行《近代藏书三十家》的简体字版时,我真是意外惊讶。尽管已长期未耕耘藏书史的领域,我仍约略知道这个领域已有长足的进展,研究者阵容越发壮大而史料日趋丰富,研究范围也越加宽广而研究工夫越深入细密,所得成果则更为丰硕可观。相形之下,本书自然显得陈旧过时,因此我很快地婉谢了重印的建议;但王楠女士继续邀约,结果说动我决定与其藏拙,不如予以修订再版,以就教于广大的简体字读者。于是从二〇〇八年元旦开始,我放下手边的十九世纪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专心修订本书。

当年撰写本书的宗旨,是就卒于民国元年以后的藏书家,撰介其家世生平、藏书聚散经过、所藏内容特点、编印校勘或著述,及与藏书有关的行实等项。事实由于每位藏书家存世可得的史料多寡完缺一,因此撰写时不能不迁就史料,无法求其形式的完整与篇幅的一致。此次修订依然如此,并不影响原书各篇的结构与风格为原则,实际上修订包含文字与内容两方面。在文字方面,因为我自己将全书约十五万字重新逐字键入计算机,因此随录随改,遍及所有三十家。在内容方面,则除梁鼎芬与梁启超两家没有变动以外,其他二十八家的内容都有所修订,包含增加、删除、修改及正误四种情形,每家修订程度不一,少者或许不满百字,多者约有七八百字;同时在本来的三十家以外,又新增原书出版后撰写的《周叔弢自庄严龕》一篇(刊登于一九八六年五月《传记文学》第四十八卷第五期),但书名仍旧不变。

此次修订的主要依据,是一九八三年原书出版迄今个人所见的一些新

史料(含研究论著),以及我知悉的各方批评指教原书内容的高见,因此我要特别感谢这些新史料的发掘者、研究者、出版者、批评者及提供者等,如果修订版内容还能有所寸进的话,实应归之于他们,我并在参考书目中特别列出新增的部分,以资醒目并志谢忱。

虽然我一时没有重拾藏书史的计划,而且此次修订也只费了一个月工夫而已,不过这段期间我确实是心无旁骛,每日自晨至昏专一于此,最多时在一天内完成《郑振铎玄览堂》一篇九千余字的打字与修订工作。惭愧的是自己学殖荒落,又已多年脱离此道,以致有心把握难得机会善加修订,却无力挥洒如椽之笔去芜生新,因此修订的范围和深度相当有限,虽然缴卷,心虚汗颜不已。但无论如何,拙书因本次机缘而意外获得新的生命,多少也弥补了我钻研藏书史初衷半途而废的遗憾,这要感谢中华书局王楠编辑,以及协助我寻找资料的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张蓉斌与台北“中央研究院”赖芊卉两位小姐,也感谢出版原书的传记文学出版社慨允修订再版。

苏 精 二〇〇八年四月十八日撰于台北斯为福斋

又:此次修订本所有新增图片,均系王楠编辑费心多方蒐罗商借选用,谨此声明;而原藏诸家慨允借用,隆情高谊,并此致谢。二〇〇九年元月三日校后补记。

旧序

一九七六年，我进入“中央图书馆”服务，得以在工作余暇浏览馆藏善本古籍，每见书中历代藏家钤印累累，或朱墨圈点题跋，心中既仰慕先贤爱书读书之勤，又时时感叹自来藏书不易、聚散无常；稍久以后便兴起搜集藏书家资料，并加以整理介绍的念头。同时，我注意到近代关于藏书家故实的撰述，从最著名的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以后，几乎都以叙述至清末为断，事实上数十年来由于战祸连结，中华典籍的浩劫更甚于从前，加上社会变迁导致私人藏书事业急遽式微，都使得近代藏书及藏书家的文献亡佚极多，再不及时搜罗保存，以后将更难着手。于是我决定以卒于民国元年（1912）以后的藏书家为对象，撰介其家世生平、藏书聚散经过、所藏内容特点、编印校勘或著述，及与藏书有关的行实等项，每家并列举参考书目。

搜集资料的工作，除在我服务的“中央图书馆”及台湾分馆进行外，曾利用过的国内资源还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馆、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台湾大学图书馆及其文学院分馆、《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等处，而以史语所的傅斯年图书馆赐我最多。此外，我直接利用过或申请影印资料的包括：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香港中山图书馆、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及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两处东洋学文献中心、美国加州史丹福大学图书馆、胡佛研究所图书馆、密西根大学东亚图书馆等，其中以得自冯平山图书馆为多。

几年中，我总算陆续搜集到一些藏书家的资料。可惜的是并非每家都

详尽足征,有的家世背景不详,有的生卒时间不明,有的藏书事迹过于简略等等,如要等候资料齐全才着手整理,说不定都白头难待了,于是决定一面搜集,一面就其中资料较多的先行整理撰写。到一九七九年初,我在图书馆的工作,增加本馆旧档的保管一项,这些旧档的时间从民国二十二年(1933)在南京创馆,到三十七年(1948)迁台为止。在清理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些尘封已久的档案里,有部分是当年购买古书的记录,意外惊喜之余,便以此为骨干并参照其他数据,写成《抗战时期秘密搜购沦陷区古籍始末》一文,承《传记文学》杂志登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号上,成为我从事藏书家撰介工作以来,最先发表的文章。以后陆续撰成的藏书家,大约半数以上都登在《传记文学》上,此外《明报月刊》、《中央图书馆馆刊》、《中国图书馆学会会报》,也各采用了一篇。这些文章发表以后,收到包括藏书家后人的一些读者意见,我自己又新增加若干资料,据以修订后连同不曾发表过的部分,汇印成这本书。

遗憾的是有些藏书家的资料,明知目前仍然存世,实际却无法获得,例如大陆所藏盛宣怀的《愚斋图书馆藏书目录》十八卷、徐乃昌的《积学斋藏书记》四卷、吴梅的《瞿安书目》稿本等等;从本书后面所附的各家参考书目,可以看出这些资料上的缺失,也因此我对每位藏书家的介绍,虽然预定包括前述的家世生平等五项,但事实上却没有完全做到,对此我是难辞率尔之讥的。此外,由于个人的浅陋,各家内容错误的地方,也期待读者的指正。同时,民国以来的藏书家,当然不会只是本书收录的这些而已,有待记述扬摧的正多,希望有人做更深入的研究介绍。

感谢所有在我搜集、整理、撰写期间,指点和协助我的先生女士,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黎树添馆长和吴荣子女士、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田仲一诚教授、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尾崎雄一郎教授、密西根大学东亚图书馆万惟英馆长、台湾大学叶达雄先生和王民信先生、“中央图书馆”胡欧兰女士,以及海内外图书馆界许多热诚的同道。谢谢同事卢锦堂先生为我审阅原稿一过并多所指正,更谢谢《传记文学》社刘绍唐社长予我刊登和汇印出

版的机会。还要一提正在国中求学的小女苏茜,她在这些岁月里,体念我父兼母职的心情和公私的忙碌,总在晚上相聚的时候,人各一灯,读书相伴,并给我最大的亲情支柱。

又本书书名墨迹系集自傅增湘亲笔所书《双鉴楼藏书续记》序文,附此注明。

苏 精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目次

新序	1
旧序	1
盛宣怀愚斋	1
叶昌炽治廡室	8
卢靖知止楼	19
李盛铎木犀轩	25
梁鼎芬葵霜阁	31
叶德辉观古堂	37
章钰四当斋	45
宗舜年咫园	51
张元济涉园	55
董康诵芬室	64
邓邦述群碧楼	72
徐乃昌积学斋	80
丁祖荫湘素楼	86
陶湘涉园	91
傅增湘双鉴楼	98
梁启超饮冰室	108

王克敏知悔斋	118
丁福保诂林精舍	122
叶景葵卷龠	129
伦明续书楼	137
张寿镛约园	146
莫伯骥五十万卷楼	155
朱希祖邨亭	160
吴梅奢摩他室	167
陈群泽存书库	174
周叔弢自庄严龕	179
郑振铎玄览堂	188
潘承厚潘承弼宝山楼	202
藏书之乡 藏书之家	212
张钧衡适园	212
蒋汝藻传书堂	219
刘承幹嘉业堂	225
结 语	233
附录	
抗战时期秘密搜购沦陷区古籍始末	234
参考书目	247
后 记	275
索 引	277

盛宣怀愚斋

生平简历

盛宣怀，字杏荪，一字幼勋，号次沂，又号补楼，别号愚斋，晚年署止叟，江苏武进人，生于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九月二十四日。他的祖父盛隆，嘉庆十五年（1810）举人，官至浙江海宁知州；父亲盛康，道光二十四年（1844）进士，官至湖北盐法道、武昌道，署浙江按察使。盛氏虽是读书世家，宣怀在科举上却不如意，自二十三岁补县学生员后，十年中三应乡试都告失利，只好绝意于此，专心求事功上的发展。

同治九年（1870），李鸿章在陕西剿回，盛宣怀经人荐入幕中，担任内文案兼营务处会办，以后便因受知李鸿章而起家。从同治十二年（1873）起，接连总管所谓轮电路矿四政的招商局、电报局、铁路总公司、汉冶萍公司，再加上织造、商务、外交、教育等事业，盛宣怀掌握的实在不只一人一地



盛宣怀像

的经济命脉而已,他的理财正有如翁同龢所说的“今之卜式桑羊也”^①。而盛宣怀青云直上,由淮军幕客人官,而关道,而京卿,而侍郎,而尚书,不论他后来如何成为武进乡人众矢之的,但确是人才辈出的武进自嘉道以来第一位尚书侍郎^②。宣统中,盛宣怀以铁路风潮为资政院参奏,奉旨革职永不叙用;辛亥革命时,一度避至日本;民国后继续掌理招商局与汉冶萍公司,直到民国五年(1916)三月二十五日卒于上海,享年七十三岁。

愚斋藏书

盛宣怀不以藏书著名,一般人也不知愚斋中藏书极富。事实上盛宣怀在治事余暇,颇寄情于图书金石书画,尤其光绪三十年(1904)以后,他的宦途起伏不定,以及宣统元年(1909)遭丧子之痛时,亟以此道遣怀。以他聚费之富和门下之众,收藏图书自是轻而易举,例如王存善(子展)、陶湘(兰泉)、宗舜年(子戴)等人,都精于版本目录,可助宣怀一臂之力。他又托人四处打听收购^③,因此数年中大有收获,所藏已达十余万卷,包含苏州江标“灵鹫阁”、湖南巴陵方功惠“小玲珑馆”等旧藏不少^④。光绪三十四年(1908)八月,盛宣怀赴日治病,在就医之外,或亲自选购,或命人物色,而日本各书肆听说这位中国达官贵人兼书林豪客到来,也纷纷望门送书,冀得青睐。盛宣怀采取随阅随购的方式,而且新旧和汉不拘,先后购买了一千五百部以上^⑤。

盛宣怀对于图书倒看得开。光绪三十二年(1906),他和两江总督端方相约,各出所藏在上海合建一所“淞滨金石图书馆”,公诸天下后世,他还先刻就一方“贻之子孙不如公诸同好”的印章^⑥。以后端方或因有所不

① 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② 程沧波,《影印武阳县志序》,页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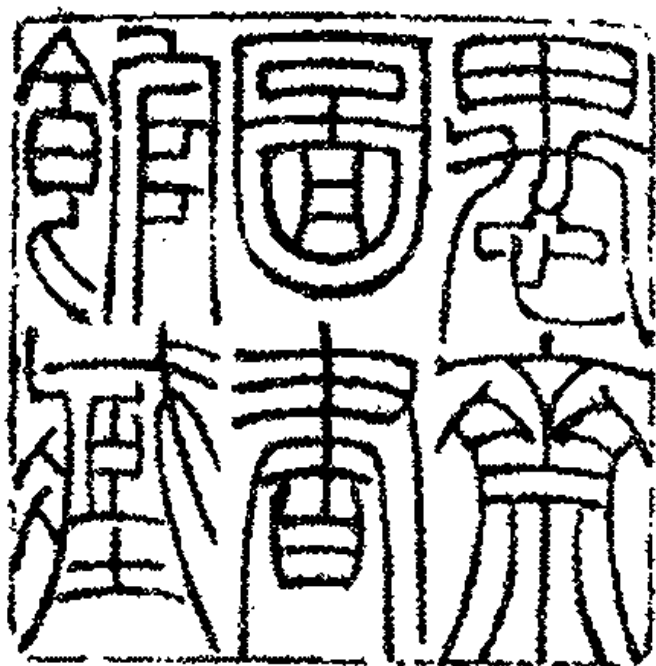
③ 盛宣怀,《盛宣怀未刊信函》,页210,《寄吕尚书函》,宣统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④ 缪荃孙等编,《愚斋图书馆藏书书目》,《叙》,叶1。

⑤ 盛宣怀,《愚斋存稿附东游日记》,叶37、72。

⑥ 同注③,页204,《致前南北洋大臣端午帅函》,宣统元年十二月十日。

舍,对于盛宣怀的几度催促践约都没有下文,他无奈只好自行其志。在东游日本的行程中,包括考察规模最大的帝国图书馆、经营方式最新的私立大桥图书馆等,准备借镜之用。盛宣怀回国以后,即在上海的寓所旁拨地十余亩,构建一所“愚斋图书馆”;他并亲营规划、布置庭园,到宣统二年(1910)九月落成,获皇帝颁赐“惠周多士”匾额^⑦。又延请缪荃孙编纂书目,却多年没能成事,直到民国二十年(1931)前后盛氏义庄准备变卖,愚斋图书馆也遭波及,于是以五个月时间匆促编成《愚斋图书馆藏书书目》印行,收录经史子集四部共六千六百六十六种、六万六千六百零七册,加上当时还未分类的书,总计多达八千三百八十种、八万一千八百五十五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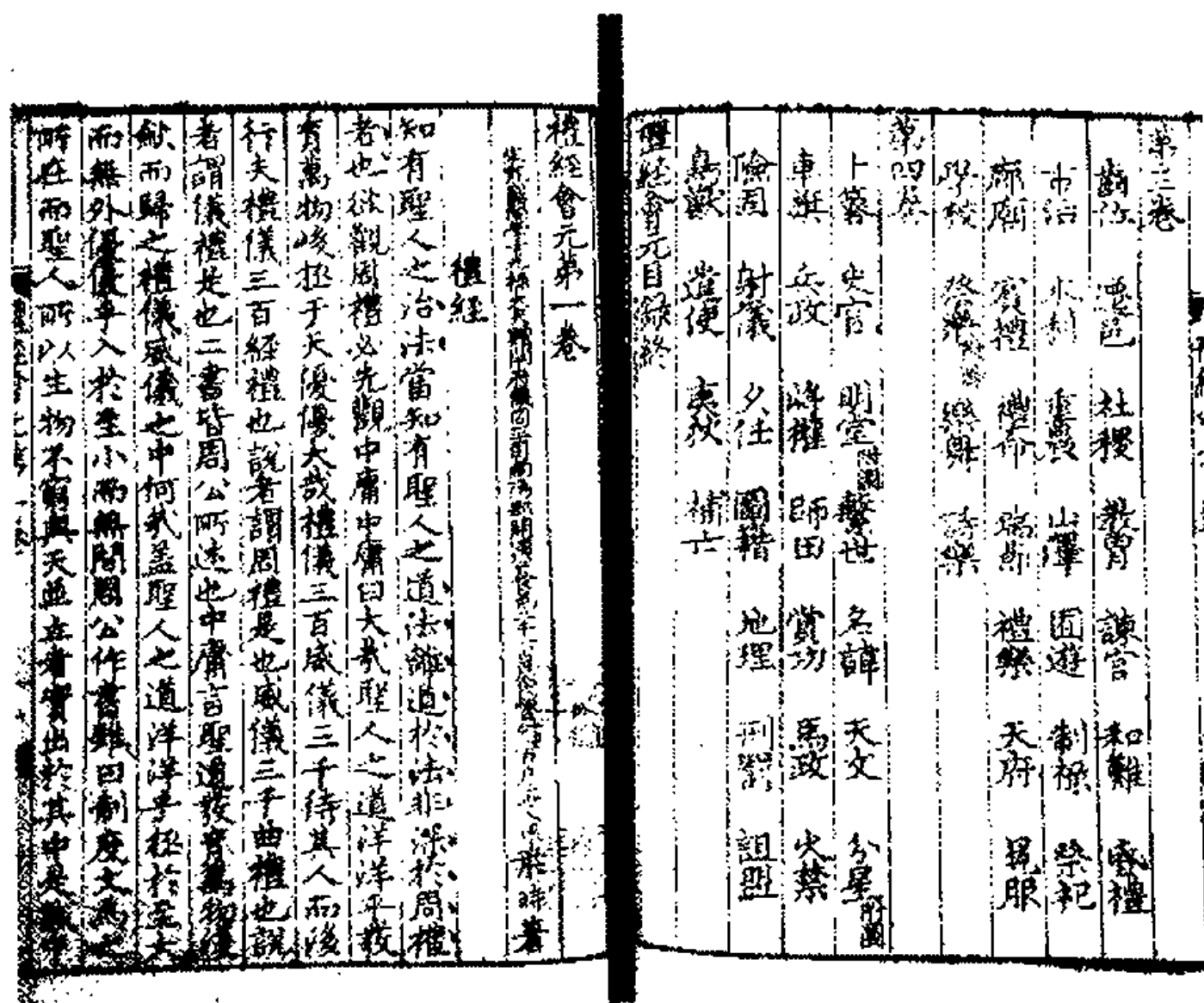
愚斋图书馆藏书印及
图书分类编号卡

愚斋书目好不容易才告问世,盛宣怀费许多心血建立的愚斋藏书却很快地保存不住,聚散之速不亚于其财富事业。其中的精善本已在抗战中流出,由上海的中国书店整批购下数十箱后再行转售^⑧,甚至流落海外,由日本天理图书馆整批收购达二百三十六部^⑨。至于数量庞大的普通本,盛氏家属早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分别捐赠圣约翰大学、山西铭贤学校,以及由南洋公学改成的交通大学。圣约翰所得最多,即愚斋书目中分类编就的六万六

⑦ 《大清宣统政纪》,卷四二,叶21,宣统二年八月壬子。

⑧ 郑振铎,《劫中得书记续记》八、《席刻唐诗百家》,九、《唐诗类苑》。

⑨ 吴平,《盛宣怀与愚斋藏书》,页57。据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藏书目录所载,如明版《程氏墨苑》、《新刻全像达摩出身传灯传》等书,都钤有“愚斋图书馆”藏印。



愚斋藏书(钤“愚斋鉴定印”)

千余册,包含明刊本近五百部、日本刊本五百部、方志六百多部(七部为孤本)、医书三百多部(三十二部为孤本);圣约翰所得在一九五一年又调拨给华东师范大学^⑩。其次,交通大学获得六百多部、一万六千余册,其中经该馆列为善本者三百八十五部,约五分之一为日本刻本^⑪,交大所得在一九五六年调拨给安徽师范大学。至于铭贤学校,一九四九年以后接连改称山西农学院与农业大学,所得愚斋旧藏据悉已在文化大革命中荡然无存^⑫。

藏书以外,盛宣怀藏金石书画也多,他曾收购以研究明史著名的王颂蔚旧藏明人尺牍数百札,也计划在愚斋图书馆落成后,再建一所艺术馆,自他的藏书散尽以后,金石书画不知下落如何?

⑩ 同上注。周子美,《周子美学述》,页 28-29。

⑪ 《国立交通大学图书馆图书目录》,第一辑,《善本书目》,页 6-34,“愚斋藏书”。

⑫ 郑麦,《盛宣怀与愚斋图书馆》,页 67。

刊刻与著述

藏书以外，盛宣怀也刻书，刻的且是乡贤遗著及卫生丛书。其实从盛宣怀的父亲时已从事刊刻，同治十二年（1873）盛康由于王文韶与翁同龢的怂恿，刻了一部《资治通鉴补》二百九十四卷、八十册，当时还年轻多暇的宣怀，奉父命详加勘订，全部工作到光绪二年（1876）才完成。光绪十六年（1890），高龄近八十的盛康又手辑道咸同光四朝文章，历时七载刊成《皇朝经世文续编》一百二十卷。原来贺长龄的《皇朝经世文编》成书于道光年间，到光绪中同时有多家纂辑续编，以完成时间先后而言，盛氏居于第三，与名列第二的葛士浚所编书名卷数相同，但因葛书内容多出当时热门的洋务二十卷，其风行程度也因而凌驾盛书之上。

光绪二十年（1894），盛宣怀延请缪荃孙主持《常州先哲遗书》的刊印事宜，预计分为三集，共九十五种，除向亲友好借印外，又托人抄校杭州文澜阁的善本；缪荃孙并特地远赴湖北，请来有天下第一好手令誉的陶子麟刻字。三年后初集问世，包括四十种、六十四册，绝大部分是明人以前的撰著。初集完成以后，进度缓慢下来，辛亥革命后，盛宣怀嘱缪荃孙作一结束^⑬，又得三十种、四十册，即做为续集。清末刊印郡邑丛书的风气很盛，但精滥高下悬殊，《常州先哲遗书》既有盛宣怀不惜巨费，又得缪荃孙主持，因此成为其中的佼佼者，甚至对盛宣怀苛责至再，谓“祸天下者此人”的叶昌炽^⑭，也不能不称道他此种留心乡邦文献的举动^⑮；叶德辉更认为这部丛书抉择严谨、刻工精良，足为以后刻书者师法^⑯。或者有人会说，盛宣怀的刻书是聚敛之余沽名钓誉，但不知在闻其名即掩鼻却走的常州士大夫中，有无其先人的撰

⑬ 缪荃孙，《艺风堂文漫存》，乙丁稿，卷三，叶18-19，《常州先哲遗书正续集缘起》。

⑭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抄》，记一四，叶37，宣统三年九月七日。

⑮ 同上注，记七，叶16，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四日。

⑯ 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九，《刻乡先哲之书》。

著竟赖宣怀此举才得以传世的？

至于较特殊的“卫生丛书”，则是日无暇晷而苦于疾病缠身的盛宣怀，晚年深深体验“大丈夫有精神方能有事业”的道理^①，而于宣统民国之际着手刊印的。事实盛宣怀注重养生也反映在自己收藏的图书上，《愚斋图书馆藏书书目》显示收藏医书达二百九十六种，比儒家类的二百二十三种种多出甚多，并冠于子部各类书^②。

盛宣怀又重视译书，他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创立南洋公学时，除列有译书课程外，并附设“译书院”，延聘张元济为院长。三年后盛宣怀奏报译印成果，包括政教财法及兵学各类图书二十八种。再过两年，南洋公学呈请上海道台袁树勋立案保护版权的书目中，增加到五十四种^③。盛宣怀从日本治病考察回国后，曾在上海创立“东文译书会”，由丁福保、刘成志主持，雇用日文学生八人，分章翻译他从日本携回的《明治财政史》；又亲函驻日公使胡惟德，托购各类参考书籍，预备翻译一套财政丛书，可惜这个计划随着他的黜免与避赴日本作罢，《明治财政史》虽译成但未刊行。

大人閣下頃日片俄復幸王厚約十三晚宴
不致再擾
昨厨夫頃以市電刺川滿漢械關傷漢人多
名江凌斯及同知均受傷現而未靜等語想早
有稟報夫黃陂路之在恐其開亦以日在堪
中痛如杜視初日區上刊板告示至請
蓋印二頁作者乞速區下看明手收
知在 宣懷謹啟 十一月廿七

盛宣怀书札（孟宪钧先生提供）

① 同注③，页159，《致外务部尚书那琴轩函稿》，宣统元年二月五日。

② 同注④，子部总目。

③ 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书影，页30，《满清政府保护版权布告实例》。

盛宣怀本人以文案幕僚起家,笔下自然不凡,张之洞曾推许为幕府人才之最^②,他在官居高位以后,只要是施政大计仍亲自起稿。民国以后,盛氏家人在旧日僚属的协助下,陆续纂辑奏议二十三卷、电报七十七卷,刊成《盛尚书愚斋存稿初刊》一百卷。由于他与近代中国历史的密切关系,这部初刊一再重印,至今不衰,恐怕以盛宣怀洞见精能的才识,也难以预料自己的遗稿在数十年后仍如此洛阳纸贵吧!

^② 同注②。

叶昌炽治廨室

越人吴籍

叶昌炽，字鞠常，晚年慕庄子“缘督以为经”的中和自然之道，自号缘督庐主人，生于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九月十五日，卒于民国六年（1917）九月二十二日，享年六十九岁。

叶昌炽的先世原是浙江绍兴人，在他的高祖时迁到苏州经商，并入籍长洲。他的祖父叶秀荃因家中生意失败，很早便辍学贩卖油豉糊口，后来改行经营布业并因而起家，叶昌炽在日记、文章、题跋中一再提到的“花桥老屋”，便是他祖父在道光年间盖的^①。据说营建时颇受邻居一位进士出身、当过知县的在籍绅士横加阻挠，因此临终前谆谆交代儿子叶震荣，务必让下一代读书博取科第争



叶昌炽像

^① 花桥在苏州城中稍近齐门处，因唐朝白居易卸任苏州刺史后，回忆当地有诗“扬州驿里梦苏州，梦到花桥水阁头”而闻名。

一口气^②。叶震荣继承先业不久，遭逢太平天国之役，以致家境又告中落，当光绪七年（1881）及十二年（1886）叶昌炽的父母先后去世时，他竟需要变卖所藏的部分图书才能料理丧事。

校邠弟子

叶昌炽少年时就读正谊书院，是冯桂芬的入室弟子。正谊书院原以制艺帖括为主，自同治初年李鸿章改建后，改以经解古学为专课，取诸生十名住宿其中肄业。叶昌炽的同门后来成名的，有担任斋长的陆润庠（凤石），以及管礼耕（申季）、王颂蔚（芾卿）等人。

叶昌炽从二十而冠以后的五十年中，有两个较不为俗事羁绊的愉快时期：一是同治八、九年（1869、1870）起与修《苏州府志》到光绪二年（1876）乡试中举，一是光绪十五年（1889）会试题名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丧子之痛以前。前一个时期他正当二十几岁的青年，后一个时期则已步入中年。除了这两段各约八年的时光以外，从叶昌炽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经常是为科第和生活所困，或是为了国事或家事而忧。

苏州府志局开设于同治八年，冯桂芬出任总纂，校邠庐的一些师友担任分纂校核，叶昌炽负责公署、学校、坛庙、寺观、释道五门，以后再加上职官门。他经常住宿志局内工作，或偕友下乡采访考证，他从这时候开始写的日记，主要记的即是关于修志的种种。也由于实地采访的缘故，叶昌炽几乎踏遍苏州境内各山，叩僧茗谈，摩碑读记，到处都有他的少年游踪。

修志之外，叶昌炽三次赴金陵应乡试，结果在光绪二年（1876）二十八岁那年中式举人。可是接下来足有十二年之久，他陆续遭遇一些不如意的事：四次会试或铩羽而归，或因家庭变故未赴考，家人中父歿母亡、子夭弟卒，他为了生活不得不开馆以谋束脩，一度远赴广东就幕又抑郁而返。直到光绪

^② 叶昌炽，《奇觚廌文集》，卷下，叶50-52，《先祖竹斋公事略》。

十五年(1889)己丑科会试才高中第八名,殿试二甲二十名,朝考降为二等五十四名,本应分部任主事,由于此时他的学问已是有识共赏,得以改为庶吉士。这年他四十一岁,一些少年同游如陆润庠、王颂蔚、孔广钟、吴郁生,甚至曾经他指点过读书门径的孔昭乾等,都早已通籍,只有他这个仅存的硕果,迟至与学生江标同榜及第。

此后数年是叶昌炽第二度过得较惬意的时光,他先衣锦还乡了一趟,一年后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又兼国史馆、会典馆两职,移家京师,朝夕与友好阅厂购肆、访书论碑;光绪十七年(1891)底还曾到台湾做一月之游,然后转往广州襄校广雅书局的刻书,第二次重履羊城,他心情之愉快比起五六年前作幕时的快快离去,真有天渊之别。

国事家事

叶昌炽在宦途上并不得意,在翰林院淹滞了十多年,以编修提调国史馆也有四年,一直没有脱颖而出的机会。当义和团事件演变成不可收拾时,他以史馆为国家三百年文献所系,抱着“诸臣可去史臣不可去”的信念^③,既不奔往随驾,也无南归之意,直到联军入京的前一天,才携眷避往离京七十里的昌平,一个半月后又遄返城中蛰居。他为此撰刻有庚子纪事诗两百余首,化名“葛稚川”所作,先题《辛白籀诗史》,以后改称《辛白籀诗讠》^④。其实在庚子辛丑两年的日记中,叶昌炽对整个事件有详尽的记载,他对于前此的甲午之役、戊戌之变,及以后的辛亥革命,也都有类似的见闻录,因此有人认为《缘督庐日记》最可贵的部分,便是这些耳闻目见“可补史阙”的记载^⑤。此外,令人警惕的是他对不少国事朝政所发的慨叹,例如甲午大败的同时,居然还有御史参奏朝考某一试卷书法的拙劣,他只有长叹“京朝士大夫酣梦几

^③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抄》,记九,叶12,光绪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④ 本书1923年刻本撰者题名为“今日烂柯叟,当年鬻鬻生”。

^⑤ 费海玘,《缘督庐日记的史料价值》,《书目季刊》第一卷第二期,1966年12月,页47-52。

时醒乎？”^⑥再如两江总督端方强欲将瞿氏铁琴铜剑楼收归公有，叶昌炽便批评“巧偷豪夺出于岩岩具瞻之臣，尚言立宪哉？”^⑦

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月，叶昌炽简授甘肃学政，这是他宦途上仅有的独当一面的职务。当年五月在兰州接印任事，直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下诏停止科举、裁撤学政为止，四年中他周历各府州县按试诸生、甄核教官，并将每天工作内容、道里行程、山川形势、风土人情详加记录，在现存的《缘督庐日记抄》中，这四年所记的篇幅，约占全部四十九年的五分之一，远出其他各时期之上。由于各省学政是翰林院人员以原衔品级出任，因此当他在光绪三十年(1904)升补国子监司业名义，算是由七品晋为六品，交卸学政后又升授五品的翰林院侍讲，这时他已无意官场，不但未入京供职，而且不久便告请开缺回籍。

门祚衰绝是叶昌炽一生最大的挫折，也是他早自官场退隐的主要原因。他有同胞五人而居长，仅有的一弟早卒无子；他自己婚后三子一女，次子幼子都殇，长子生于同治十三年(1874)，入县学后改名恭彝，叶昌炽因仅存此子，珍爱有加，移居京师后为觅师受业、携游厂肆、护送陪考、迎娶媳妇等，不料尚未得孙先告丧子，恭彝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竟一病不起，叶昌炽心中的悲痛可想而知。光绪二十九年(1903)他在甘肃任上，又接到唯一的女儿难产不治的噩耗，这时他心中进退维谷，“流浪名场固为痴绝，还我初服亦复何有好怀？”“安得人间千日醉”^⑧，因此不久后的裁撤学政，正促成他的急流勇退，再顾不得究竟有何好坏了。当三子皆亡时，他已自署“惺居士”，表示茕独一人，从甘肃回家后又自称“歇后翁”。

叶昌炽家居一年，江苏巡抚陈启泰在苏州新设存古学堂，聘他为史学总教习。早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管学大臣孙家鼐亲自登门延请他担任京

⑥ 同注③，记七，叶16，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四日。

⑦ 同注③，记一三，叶56，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⑧ 同注③，记一一，叶48，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十七日。

师大学堂教习,他都辞谢不就,此时更具“岂有提学使不为而为校长”的理由^⑨,后来勉强应允,并为学生编纂《史学讲义》,以指引读史之法为宗旨,有别于刘知几《史通》的作史之法。

宣统二年(1910)底,叶昌炽辞去存古教席,蛰居不出;辛亥革命后更一心校书,绝不与闻民国事。赵尔巽以清史馆馆长聘他为名誉总纂,他覆书不就。江苏省长韩国钧新设省立苏州图书馆,屡次请他担任馆长,他绝不为所动。民国三年(1914),上海续修县志,聘叶昌炽为总纂主持,他明知这只是文字之役,而且是继续其师冯桂芬的同治《上海县志》而作,意义更有不同,结果却仍以聘书是民国的上海县长署名而作罢。从这些事例可以知道叶昌炽是如何自好而拘执!

藏书校书

叶昌炽搜集历代藏书家故事,撰成一部《藏书纪事诗》巨著,事实上他自己就是一名藏书家,虽然由于经济能力的限制,他的治廡室所藏古籍只有向杨守敬购得的北宋本《广韵》、南宋本《竹友集》等寥寥数种,叶昌炽却很有自知之明地以苏州先哲遗书为收藏重点,治廡室总共大约一千部藏书中,苏州人的著作大约有三百五十余部(不包括散在各丛书中的部分),其中明代文集又占了半数以上,有一次他将韩桂舫一家三代的文集都搜全后,自己都不禁叹道用力之勤,远过韩氏孝子贤孙^⑩;又有几次他梦见和数百年前的古人藏书家函札往来,或是梦见有人持书求售,醒后连书中何人题跋都记得一清二楚,诸如此类,叶昌炽是可算书痴了。

治廡室藏书除购自书肆外,不少是师友所赠或自家抄录的,师友馈赠的当然大都是新刊新印本,而他自家抄录的则必是罕见难得之本。他曾从铁琴铜剑楼借得十多部方志回家,自抄之不及,又辗转雇人代抄,数十年中叶

^⑨ 同注③,记一三,叶33,光绪三十四年正月二十三日。

^⑩ 同注③,记八,叶70,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日。

昌炽一直就是抄写不倦的。光绪十四年(1888),陆润庠请他代撰《士礼居分题咸宜女郎诗册汇编》书跋,他在应命之外,又自作一跋,欲罢不能,竟穷一日之力将诗册五千多字全抄录在日记中。叶昌炽六十五岁那年,以半年时间抄成四百多页的范氏《洽园诗稿》三十卷;甚至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还奋笔抄录全书十卷的《中兴纲目》;最后一个月中,他的身体已极为孱弱,在病榻上每日勉强写数十字,抄完第九卷后自称已是强弩之末,日记中也没有完成最后一卷的记载。

叶昌炽生前并未编有藏书目录,宣统二年(1910)他曾整理一过并重新插架,也只概略地说新旧共三十三箱、精本一架、不全本三架、拓片九箱,“二十年塾师、二十年宦游,十束之脰、五斗之俸,尽于此矣!”^①他曾自作藏书偈:“无水火兵灾,无蟬蚁鼠劫,永离一切苦,如我佛所说。”^②准备将偈文刻印,另外再刻一无量寿佛像,将每部藏书都钤此二印,说是要为书忏悔,可是叶昌炽身后也和他《藏书纪事诗》中的千百藏书家一样,无法避免有聚必有散的命运,治庸室所藏归于叶氏经商的女婿,在对日抗战稍前已有部分散出,抗战胜利后女婿家业中落,编成《治庸室善本书目》一册求售,有人在当时的《中央日报》上呼吁收归公藏^③,似无下

顧君字河之潤翁先生之子也校讎目錄
皆能傳其家學與雷深之清壺侯兩
公文最契庚申之初客死滬上遺書星
散此冊歸豐順 丁中丞師光緒丙申
并正世兄至都出以見示世所傳律連
畫苑兩刊亥豕迷且不逮此本遠甚可
不復諸

昌熾



叶昌炽题跋墨迹
（“中央图书馆”藏）

① 同注③,记一四,叶10,宣统二年九月九日。

② 同注③,记四,叶1,光绪十二年正月七日。

③ 谢孝苹,《记叶氏治庸室藏书》,《中央日报》,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八日,第十一版。

文,结果治廡室藏书经书肆散售而尽^⑭。

叶昌炽自藏之外,先后协助过几个大藏家,如书钞阁蒋氏、滂喜斋潘氏、铁琴铜剑楼瞿氏、嘉业堂刘氏等等:

书钞阁是蒋凤藻(香生)的藏书楼名,他和叶昌炽虽是同乡,但只慕名而不相识。光绪八年(1882)蒋氏任福建福宁知府,在任所刻《铁华馆》与《心矩斋》两部丛书,函聘叶昌炽为其校勘,两人但以信札往来,四年后蒋氏自闽返里才初次相见。蒋氏少时不矜细节,未曾用心读书,捐班后竟嗜书成癖,

跻于大藏家之列,又知刻书传世,因此颇为叶昌炽称道,《藏书纪事诗》初刻的六卷本,即以蒋氏为殿后。

潘氏是清代中叶以后苏州最显赫的门第,达官贵人辈出,其中潘祖荫滂喜斋图书金石之富冠于一时。光绪九年(1883)潘祖荫丁忧在籍,延聘昌炽教读其弟祖年,并校勘所刻《功顺堂丛书》,叶昌炽又就潘氏所藏宋元古本一百三十五种,撰成《滂喜斋读书记》二卷。潘氏既是昌炽居停,又是其会试座师,关系自更不同,卒后昌炽为编年谱而托名于潘祖年,后来昌炽的《奇觚廌文集》、《诗集》、《寒山寺志》等,都由潘祖年为他刊行^⑮。

洪聖洲善傳本絕稀惟此古毛氏有宋字全於此 四庫
著錄存也此本從蔣子宣本傳後錄其跋子宣名
章光号阜為其郡人與其族弟子道皆好藏書先
隆中開四庫館子宣已歿其子曾崇道秘書百
種得 旨賜佩文韻府一部是以郡中亦稱賜
書接蔣氏年嘗見可藏宋刻續通鑑 補寫詞學
精雅絕倫不減毛惜吾錢述古諸家也建報同研游身
甫弱裝印得是書為余案定名誌以誌以海之奇
光緒丙戌十月十八日同家潮州試院 葉昌熾

《盤洲文集》旧钞本,叶昌炽题跋
（“中央图书馆”藏）

⑭ 潘景郑,《著砚楼读书记》,页332-333,《跋蒋香生致叶鞠常手札》。

⑮ 关于苏州潘氏,参阅本书“潘承厚潘承弼宝山楼”部分。

叶昌炽几次造访铁琴铜剑楼^{①⑥},或停留半月,或一宿即返,除为瞿氏校正书日外,也借回不少珍籍传抄。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两江总督端方欲将铁琴铜剑楼图书收归公藏,因为叶昌炽和端方及瞿氏都是旧识,于是一方托向瞿氏游说,一方托向端方解围,他身处其间,比喻双方“求者如小儿索乳,拒者如执玉奉盈,兢兢不敢失坠”^{①⑦}。显然他对索乳者的无赖很不以为然,结果总算因端方调任直隶总督而不了了之。

叶昌炽与嘉业堂刘承幹在民国二年(1913)才因缪荃孙介绍认识^{①⑧},刘氏先为他刊行《邠州石室录》一书,民国四年(1915)刘氏计划刊刻《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等四史,又聘他主持校勘。叶昌炽先开列海内可以借校的四史藏本目录,长达十页之多,准备校刻成历来最好的版本。从民国五年(1916)在上海着手,期以三年成事,这是叶昌炽最后专注的大事,因此时时往返上海苏州之间,成为京沪铁路的常客,可惜壮志未酬便在第二年去世了。

搜碑藏碑

叶昌炽藏碑晚于藏书,大约从光绪九年(1883)起,他才真正对碑拓发生兴趣,此后数年中,由于就馆潘祖荫,作幕汪鸣銮,以及获识吴大澂的缘故,分别见识了滂喜斋、万宜楼、窻斋的山海之藏,得以在目录学之外,又对金石深具心得。

他开始注意收藏碑拓之后,获得师友的协助较图书更多,除上述潘祖荫三人外,黄再同、王颂蔚、费妃怀、江标等等,都经常有所贻赠;加上他自己购自碑估,以及在甘肃椎拓所得,叶昌炽“五百经幢馆”藏碑的质量,竟后来居上超出他的治庸室藏书,所藏八千通碑拓较之缪荃孙“云自在龕”的一万两千通虽有不及,其间却有一段插曲:光绪二十二年(1896)一名藏碑的苏州同

^{①⑥} 叶昌炽在《藏书纪事诗》瞿氏条下,提到三次造访铁琴铜剑楼,但日记中则记有四次,分别是光绪元年十一月四日、二年四月十五日、二年九月十四日,及九年二月六日。

^{①⑦} 同注^③,记一三,叶58,宣统元年正月初七日。

^{①⑧} 关于刘承幹嘉业堂,参阅本书“藏书之乡藏书之家”的刘氏部分。

乡沈韵初死后,所有五千通拓本除沈家自留一千、另售出一千外,其余运京求售,当时叶昌炽甫告丧子,绝嗣之痛正深,不暇问津,结果三千通全数为缪荃孙卖田买碑,购归“云自在龕”,缪氏因而独占藏碑鳌头,事后叶昌炽颇为懊悔。光绪三十二年(1906),另一同乡张炳翔欲再续撰王昶的一百六十卷巨著《金石萃编》一书,叶昌炽知道后说:“有艺风在,更有不佞在,似别寻门径之为得也。”^①当仁不让,也可见他对此道的自信!

叶昌炽在藏书方面最服膺黄丕烈(尧圃),碑拓方面则是翁方纲(覃溪),凡遇两人事迹或题跋,长短不论,必详记于日记。光绪十三年(1887),他在广州廉价获得翁手书《金刚般若经》五千余字,大家都认为贗品,只有他以钻研之深,确信翁氏真迹无疑,以后再有借观者,干脆一律谢绝,说是不使翁氏横遭白眼也!

叶昌炽藏碑处,除称为“五百经幢馆”外,还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堂”及“双云阁”之名,前两者都在他开始藏碑不久即取为室名,双云阁则是晚至辛亥那年,因为连得宋拓本《李思训碑》及金拓本《李秀碑》两者而来,这二李在唐朝都官居云麾将军,这两碑也都是唐朝李邕所书,由于这些巧合,叶昌炽即以双云名阁,并请金石名家祝心渊刻了一方石印。

叶昌炽以门祚既绝,付托无人,在民国三年(1914)决意出售所藏碑拓,其中五百经幢为刘承幹“嘉业堂”所得,其余全部为刘世珩(葱石)购归其“聚学轩”,到二十六年(1937)抗战发生后,继承聚学轩的刘公鲁(世珩子)为日军所杀,其碑拓流出市面,辗转为潘承弼(景郑)收得,一九四九年以后潘承弼又连同叶昌炽旧藏在内的全部收藏,全数捐赠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②。

名山事业

叶昌炽一生撰述极多,其中以《藏书纪事诗》、《语石》,以及卒后刊行的

^① 同注③,记二三,叶49,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十八日。

^② 潘景郑,《著砚楼书跋》,页158-159,《五百经幢馆碑目稿本》;页159-160,《铁如意室金石目录稿本》。

《缘督庐日记抄》三部为最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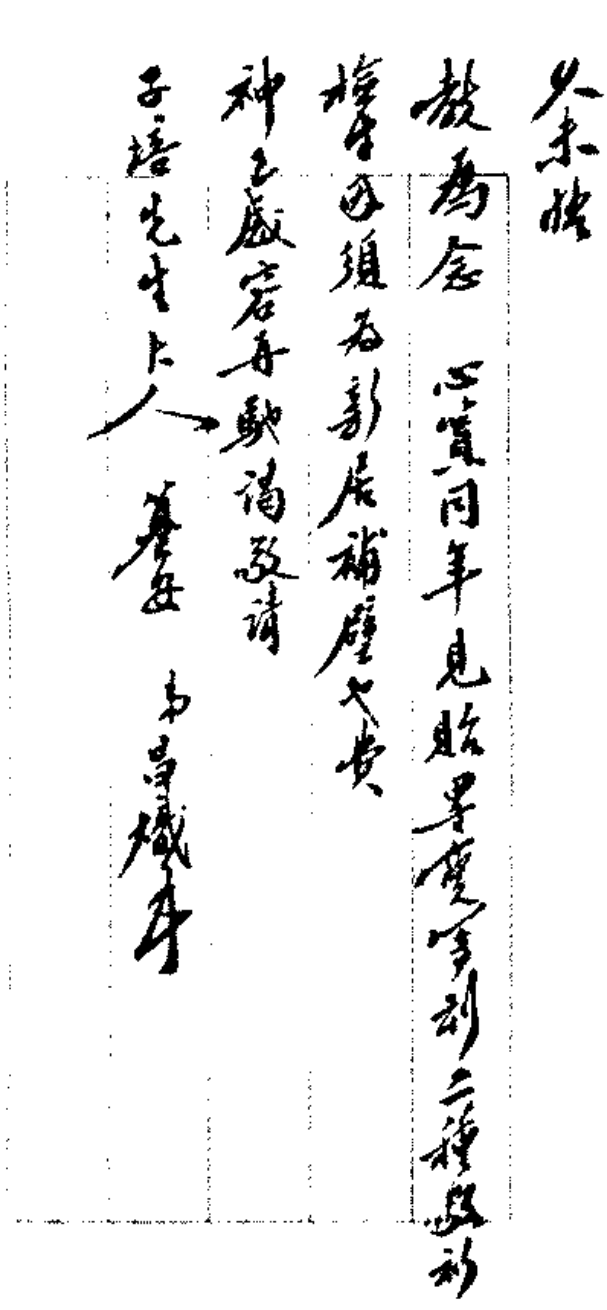
《藏书纪事诗》创稿于光绪十年(1884),那时他在潘祖荫家中为西席,既见识滂喜斋藏书之富,又嗟叹天下和自己一样贫而好书的人不知多少,便兴起为古来藏书家立传的念头。由于这个心愿极难实现,他先条举各藏书家故实,再加按语说明,并且每家各附一诗。当光绪十五年(1889)叶昌炽中进士后第二度馆于潘家时,已写成初稿六卷,潘祖荫欲刻未成而先卒;光绪二十三年(1897),叶昌炽的学生江标在湖南学政任上,刊成《灵鹫阁丛书》之一;宣统元年(1909),叶昌炽再重行修订增删刻成七卷问世。他为藏书家立传的初衷虽然没能达成,而且据他自己的说法,由于《藏书纪事诗》的部分内容得罪了巨室显要,与他在宦途上的不如意大有关系^①;但在后人看来,仅此一部份内容都是空前的巨著,叶昌炽已足以立言不朽了。国人素重典籍,但凡读书之家莫不有些藏书,因此从《藏书纪事诗》刊行后,数十年来类似的撰述接踵而出:或续辑晚近藏书故实,如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或以地方郡邑为限,如徐信符《广东藏书纪事诗》,或为之索引,如蔡金重《藏书纪事诗索引》,甚至别辟蹊径如叶德辉《书林清话》等等,虽然内容体例各有所别,却都是效法叶昌炽而作的,中国历代藏书文献也因之大备,追源溯流,早在光绪十三年(1887)他仍在搜集并撰写初稿时,便很有自信地说过:“自谓发隐阐幽,足为羽陵委婉之功臣也!”^②

《语石》一书初作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翌年辛丑条约成后,此书也告脱稿,分为十卷,收录碑拓四百八十六通。本书既不是他的“五百经幢馆”所藏精目,也不是一般的序跋考释之类,而是别开生面的着重于碑拓的访求、收藏、鉴别,他在脱稿后未及付梓便奉命前往甘肃,后来又根据在陇期间的见闻加以修订,于宣统元年(1909)刊行。

叶昌炽从同治七年(1868)二十岁时开始写日记,到民国六年(1917)六十九岁生日那天停笔,过七天后去世,共记了四十九年、四十三册。他自述

^① 同注③,记八,叶13,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② 同注③,记四,叶71,光绪十三年九月五日。



叶昌炽致沈曾植(子培)书札
(孟宪钧先生提供)

开始时劣不成字,也无文理;三十岁以后发愤治古学,才稍有可记;再到四十通籍后见闻渐广,内容也渐丰富。由于日记中有些臧否时人、规诲亲故之辞,因此他在临终前嘱咐勿以全稿示人,以免有伤忠厚。民国二十年(1931),他的几个晚辈王季烈、潘承厚、潘承弼、王立勋等,就其原稿删节后合力印行,题为《缘督庐日记抄》,内容则记书、记碑、在陇、国事,及其他等,大约各占五分之一。据负责取舍的王季烈表示,约得原稿全部篇幅的十之四^②,但担任校勘的潘承弼则说,实际仅得十之二五而已^③。即使如此,由于这部日记抄的内容有大量读书题记、知人论世、所见所闻的近代史料价值,与先出的《翁文恭公日记》、《湘绮楼日记》、《越縵堂日记》三者各有所长,为人等量齐观,还有人认为《缘督庐日记》足与《曾文正公日记》并传^④,如此推崇恐怕是叶昌炽自己也始料不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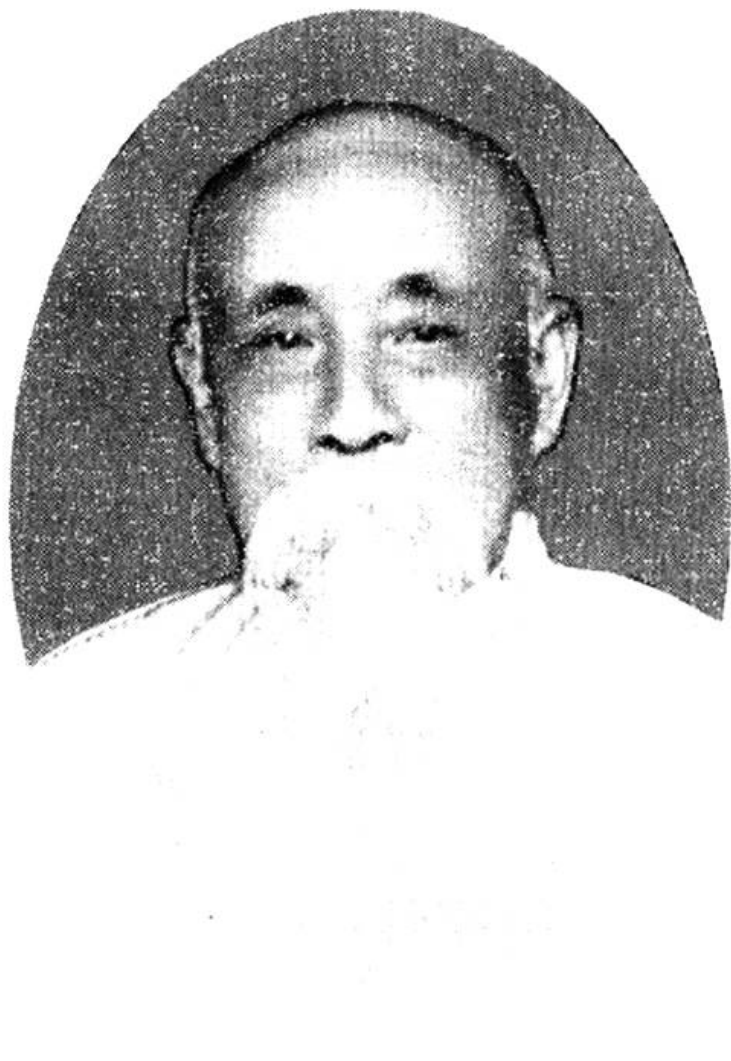
叶昌炽上述三部名著,《藏书纪事诗》和《语石》的手稿残本为潘承弼所得,捐入合众图书馆,再改归上海图书馆收藏;而《缘督庐日记》稿也由潘承弼收买后捐藏苏州图书馆^⑤。

② 王季烈,《缘督庐日记抄序》。
 ③ 同注②,页301,《奇觚闻文集稿本》。
 ④ 金梁,《近世人物志》,《叙》。
 ⑤ 同注④,页332-333,《跋蒋香生致叶鞠常手札》。

卢靖知止楼

生平简历

卢靖，字勉之，号木斋，湖北沔阳人，生于清咸丰六年（1856）二月二十五日。他的前几代先人都是塾师为业，他少年时好治算学而不屑帖括，以致耽误举业，直到光绪九年（1883）二十九岁时才入县学，第二年以天文算学乡试中举，经湖北学政高钊中以朴学异才上荐，特旨以知县交直隶总督李鸿章差遣委用，历知赞皇、南宫、定兴等县。义和团期间，卢靖在丰润知县任内，因为保境安民有功，未受拳民及联军蹂躏，保升多伦厅同知。继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颇为器重他，派充北洋武备学堂算学总教习，光绪三十一年（1905）又派他前往日本考察学务半年，返国后最重要的一项献议，是促成袁世凯奏请停废科举、推广学堂^①。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各省学政裁撤，改设提学使，卢靖由袁世凯荐派为



卢靖像

^① 甘鹏云，《潜庐续稿》，卷二，叶20-22，《木斋老人八十寿序》。

直隶提学使,三十四年(1908)九月调奉天提学使,因与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不洽,赵于宣统三年(1911)十月径奏以邵章取而代之,卢靖只好挂冠而去,不旋踵东三省宣布光复。

卢靖为学主张致用,以西法西学辅助中国之不足,认为国家自强根本在于人才,而人才培养端赖教育。他自己身体力行研究算学和兵器,历官所至并以兴办新式学堂为急务,由于他是讲求实际的干才,善于经营生产,熟谙土木营建,因此得以到处为公创设各类学堂,而不虞经费的匮乏。民国以后,卢靖脱离官场,在天津、北京等地经营房地产与投资工商实业,再以盈余办理学校,捐建图书馆,广刻新旧图书与湖北乡贤文献。他在对日抗战期间隐居北平,直到民国三十七年(1948)九月三日辞世,享年九十三岁。

知止楼藏书

卢靖早年家境窘迫无藏书,到汉阳应府试时,见有书贾贩卖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一书,索价三千文,他因行囊中也仅有此数,在爱书与应试不可得兼的情况下,每日借口讨价还价而趁机阅读,多日后遭到书贾识破与奚落,他最后还是四处告贷买下此书,数十年后他虽已富足,却始终珍藏这部得来不易的《经世文编》,以纪念艰困的少年往日。

卢靖既好学,又主张学以致用,因此他以后的知止楼藏书虽达十余万卷,都是求其有用而已,并不汲汲于古本秘籍。他在丰润知县任内厉禁拳民时,环境险恶,随时可能发生意外,因此致书友人交待:“他无置念者,为藏书数十簏,请代赠本县学校;吾子孙幸存者,畀以应读之书数百卷足矣。”^②可见他对藏书读书的态度一斑。其弟卢弼则恰好相反,卢弼字慎之,生于光绪四年(1878),肄业湖北经心、两湖书院,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民国后曾任国务院秘书长。卢氏昆仲由于早年境遇不同,年龄又相差二十岁,卢

^② 《木斋图书馆季刊》第一期,1937年5月,页69-70,贾恩绂,《补祝卢木斋先生八十晋一寿序》。

靖事业有成时,卢弼方在求学,因此少年不识穷滋味,非精抄善本不藏,先后也积储有十万卷,而且沉浸于版本目录中。卢弼说过兄弟两人藏书各有所求的轶事:“弼从政余暇,浏览载籍,博涉旁探,日毋宁晷。家兄诫之曰:‘世变方殷,不务远者大者,惟考订簿录,校讎讹夺,支离琐碎,奚不惮烦?’弼徐应之曰:‘兄曩治算术,设梅、罗、徐、戴诸家著述,得精刊精校之本,事半功倍,当不让李壬叔独步一时矣!’相与狂笑者久之。”^③其实,卢靖的算学造诣颇高,著有《割圆术辑要》三卷、《万象一原演式》十卷、《叠微分补草》一卷、《代数术补草》四卷、《微积溯源补草》四卷、《代微积拾级补草》四卷等,其他著述还有《火器真诀图例》二卷、《合声易字》三卷、《古辞令学》二卷等。

木斋图书馆

民国以后,卢靖以捐建南开大学图书馆及北平木斋图书馆闻名。其实他早在清末已创建多所图书馆: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在丰润当地的书院中附设两所图书馆;在直隶、奉天学使任内,又创设三所图书馆,其中的保定省城图书馆还是他捐廉俸五千两银建造的^④。卢靖与南开大学的渊源,也可溯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他创办天津图书馆时,获得严修(范孙)捐赠其“蟬香馆”五万卷藏书,而卢靖则从直隶学款中拨银一万两协助南开建校,再每月拨一百两补助,直到他调往奉天为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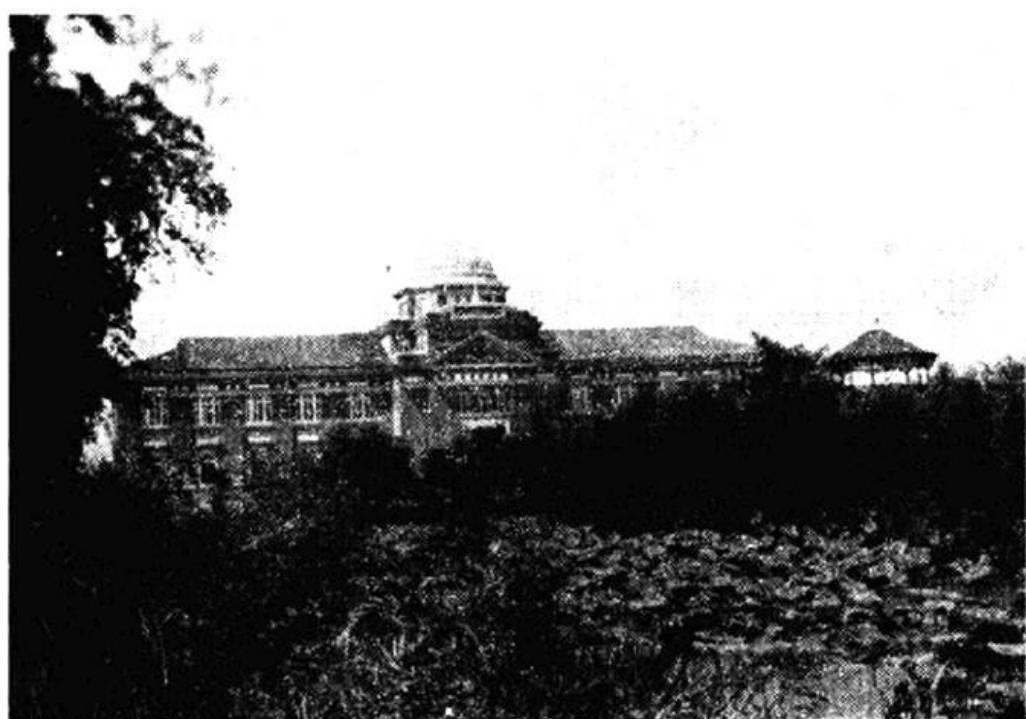
民国十六年(1927),卢靖捐十万元兴建南开大学图书馆,并曾在工程进行中以七十三岁高龄亲往督工。这幢新式图书馆占地九百二十平方公尺,可容纳读者三百人、藏书二十万卷,他率先捐出知止楼中的六万卷作为基础。民国十七年(1928)十月十七日,南开大学庆祝二十四周年校庆,同时举行图书馆落成仪式,观礼来宾有严修、颜惠庆等四百余人,卢靖亲自出席致

^③ 卢弼,《湖北先正遗书》,《序》。

^④ 《政治官报》第1054号(宣统二年九月二日),折奏类,页18,《直隶总督陈夔龙奏前署提学使卢靖捐建图书馆请奖折》。

词,并将馆钥授予校长张伯苓,而南开大学为纪念他嘉惠学子的义行,将图书馆命名为“木斋图书馆”,国民政府又于十八年(1929)十一月底明令表扬他兴学的义举^⑤。

七七事变后,同月二十九日下午,日机轰炸南开大学,落成仅只九年的木斋图书馆,以及秀山堂、芝琴楼等校舍相继中弹燃烧,第二天余烬未熄,日军又派人四处纵火。南开是抗战开始后第一所遭日人摧毁的学府,木斋图书馆也是首先牺牲的图书馆,卢靖的一番心血竟成暴敌劫灰。



木斋图书馆(外观)



木斋图书馆(内部)

当南开木斋图书馆落成不久,卢靖又成立“木斋教育基金会”,先在天津办理两所自幼儿园至中学一贯的木斋学校,随后到北平创办一所供社会大众利用的“木斋图书馆”。从民国二十三年(1934)筹备,二十五年(1936)十月十八日揭幕,馆址在北平西单牌楼旧刑部街二十号。这所图书馆一开始便藏有线装书二十余万卷、新书四千五百册、杂志一百多种,阅览室可容纳读者两百人。每月从基金中拨款六百元作为购书、人事等费用。馆务由卢靖聘请董事组成董事

^⑤ 《国民政府公报》第335号(民国十八年十二月三日),《国民政府令》,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会监督,馆长由董事之一的胡钧担任。胡钧字千之,为卢靖的沔阳同乡,留学德国柏林大学,当时是北京大学教授及《晨报》社总理。

北平木斋图书馆成立后力争上游,与国立北平图书馆及北平市立图书馆等合作,办理国内图书馆首创的图书巡回展览,又编印《木斋图书馆季刊》,报导馆务动态,登载湖北文献与图书馆学论著。不幸的是开幕未及一年而抗日战争爆发,图书馆不得不关闭;胜利后卢靖年事已高而身体病弱,图书馆未能恢复开放。等到卢靖逝世后,家属将全部图书举赠清华大学,却因局势不靖,在搬运前遭受破坏打劫损失严重,经清华大学点收者仅存一千六百零七部、一千八百六十八种、二万三千四百零五册^⑥。

刊刻丛书

卢靖鉴于自己早年读书得书艰难,为了协助有志向学的寒士,一面捐建图书馆,荟萃天下图书于一处,便于学子阅读;同时刊印图书,使一书能化身千万,普遍流传人间。他和卢弼两人所刻除零星单种外,计有三部丛书:《慎始基斋丛书》、《湖北先正遗书》、《沔阳丛书》。最早的《慎始基斋丛书》,从光绪二十三年(1897)起卢靖在丰润知县任内开雕,内容都是指导治学门径如《书目答问》之类,刻成十余种后因义和团事变停工;到民国十二年(1923),卢弼收集散佚的板片重新修补后,在天津重印,并加入他自己早先在湖北刻的两种,仍名为《慎始基斋丛书》,预计全部包括五十种,但自十二年印行的十一种问世后,未见续刻。

清末道咸以来,辑刊丛书成为风气,其中各省地方人士搜罗其乡贤著述刊成的“郡邑丛书”越来越多,部头也越来越大,其佼佼者如《畿辅丛书》、《云南丛书》等,都在一百余种、四百余册以上;甚至地方性的如《金华丛书》、《吴兴丛书》等,声势浩大不亚于全省性丛书。相形之下,光绪十七年

^⑥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页124,刘行宜,《卢木斋、卢慎之兄弟》。

(1891)赵尚辅辑印的一部《湖北丛书》，仅只收录三十一一种，可说是瞠乎其后。卢靖虽然离鄂日久，却是乡土情深，为表彰先贤并让世人了解鄂中文华荟萃不让他省，他发下宏愿每年以三万元经费刊布《湖北先正遗书》^⑦。

这部规模空前的丛书计划分为三辑：第一辑是《四库全书》著录的九十一一种，第二辑是四库中存目的二百零一种，第三辑则是四库以外数量不定的乡贤著作。单是一、二两辑合计，已超出当时所有各省丛书之上。卢靖兄弟并先撰成《四库湖北先正遗书提要》四卷、《存目》四卷、《札记》一卷，做为付印前的准备工作。

《湖北先正遗书》从民国七年(1918)创议，五年后第一辑问世，计七十五种、七百二十卷，由于已入赵氏《湖北丛书》者不再重收，因此少于原订的九十一一种。所收各书都选择善本，曾向张元济、傅增湘、刘承幹等著名藏书家借得善本为助，其次才以文津阁《四库全书》本付印。为留存善本真迹，节省校对之繁，并缩短出版时程，全部以影印方式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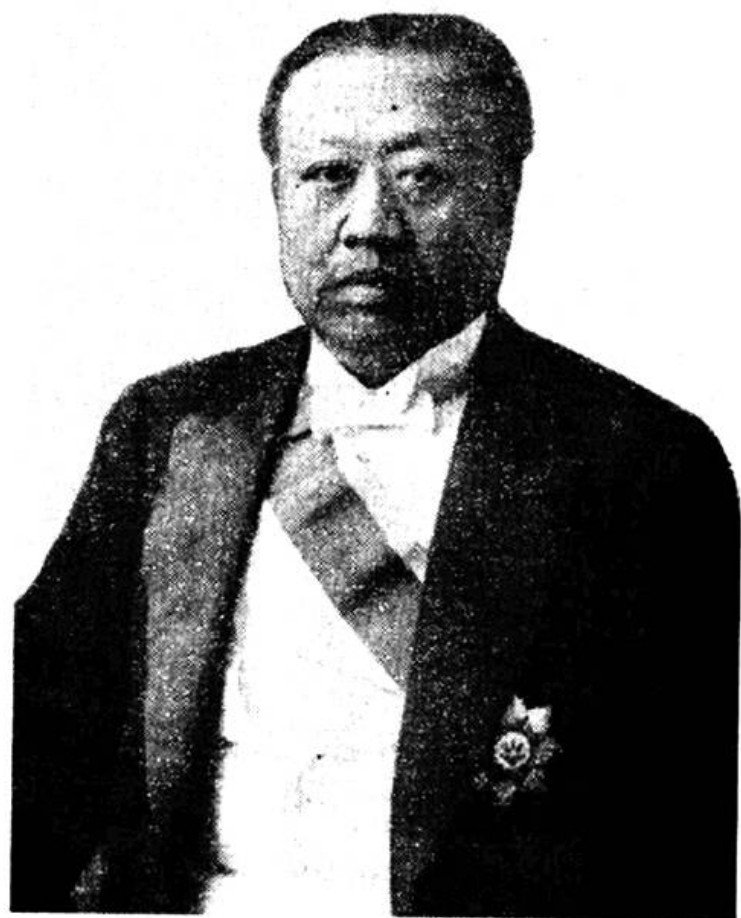
意外的是卢靖没有继续第二、三辑的出版计划，中辍的原因迄未得知，也许与当时旅京湖北人士也在刊刻乡贤遗著有关，但绝非经济上的困难，因为在以后的数年中，卢靖又刊成一部《沔阳丛书》(十二种九十卷、民国二十年[1931]序刊)，以及如前所述捐建两所木斋图书馆。不论如何，《湖北先正遗书》的停顿令人惋惜，因为卢靖完成的第一辑，都是四库原已著录或人间另有善本，而未印的第二、三辑却是较为罕见，甚至别无传抄的稿本，这些先贤心血的结晶失去传诸后世的机会，极可能就在接下来数十年的动荡中亡佚了；果真如此，不但是湖北文献之厄，无疑也是整个中华文化的损失。

^⑦ 同注①，卷一二，叶4-5，《致黄笃友》。

李盛铎木犀轩

家世生平

李盛铎，字椒微，号木斋，江西德化人，生于清咸丰八年（1858）。李家在盛铎的曾祖父（名恕，字卉园）时，已是德化当地的富户；他的祖父（名文湜，字耀庭）长年督漕船在外，岁暮始归，而积聚更富，李家这两代在德化都有善士之名。到了盛铎的上一辈由商人仕，他的伯父李明坝，字叶和，道光二十六年（1846）举人，翌年连捷成进士，以知县分发湖北，适逢江汉大水，被派赴灾区勘查，办理赈务，李家并捐巨贖助赈，不幸明坝途遇暴风死难，由弟明墀袭



李盛铎像

荫知县。明墀字玉阶，即盛铎父亲。此后三十年中，明墀由京官员外郎、郎中，外放湖南辰州知府、督粮道，调湖北汉黄道，光绪二年（1876）升福建按察使、布政使署理巡抚，光绪五年升任湖南巡抚。两年后被人参奏任用私人，大遭物议，奉旨彻查，结果李明墀奉命入京另候简用而罢官^①。

^① 《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一三三，叶3，光绪七年闰七月乙未；卷一三四，叶13，光绪七年八月壬申。

李盛铎是光绪十五年(1889)己丑科一甲二名的进士,授职翰林院编修。甲午之役在督办军务处担任文案,战后为江南道监察御史,数度奏请改革教育及明订赏罚,京师大学堂开办后派为总办。戊戌政变前夕因出使日本大臣黄遵宪未赴任,由李盛铎代理,旋于政变后真除,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任满回国。光绪三十一年(1905)以顺天府丞改出使比利时,并加入出洋考察宪政一行,在英国接受牛津及剑桥两大学名誉学位^②。宣统元年(1909),李盛铎自欧洲返国,三年(1911)二月出任山西提法使,十一月晋布政使,次月署理巡抚,仅仅十日后清朝即告覆亡。

民国元年(1912)三月中旬,袁世凯任命阎锡山与李盛铎分为山西都督与民政长,盛铎旋辞。由于他曾出使日本,又曾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招股成立江西铁路公司,向日方借款五百万元兴筑南浔铁路,因此袁世凯在民国二年六月派他与孙宝琦同为特使,赴日进行经济外交活动。三年,先后担任约法会议会员及参议院参政。六年(1917)六月,李经羲组阁时延盛铎为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溥仪复辟时命为农商部尚书,均未就。七年,当选为有安福国会之称的新参议院议员,先任全院委员会委员长,继于同年底梁士诒辞职后被选为议长,这是他三十年服官从政生涯的颠峰。民国九年(1920)直皖战后,北京政府决定解散安福国会,他从此退隐不问政事。民国二十六年(1937)二月四日卒于天津秋山街寓所,享年八十岁。

木犀轩藏书

木犀轩名称始于盛铎的曾祖父李恕。道光初年,李恕在德化乡间庐山群峰之一的莲花峰下,宋代大儒周敦颐(濂溪)墓侧,筑造一座藏书楼,命名为“木犀轩”,据说积储有十万卷之多,毁于太平天国时期。乱后李家重新再辑,到李盛铎时已是四世藏书,也是在他手里才经营成名重海内的巨

^② Tung-li Yuan(袁同礼), *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 1905-1960*, p. 227.

藏,光绪时李盛铎的木犀轩已富盛誉,民初以后持盈保泰并不断增益,到抗战开始前,平津一带能与相颉颃的藏书家,只有“藏园”傅增湘一人。在李盛铎经营五十余年中,首先是光绪初年得自湘潭袁氏“卧雪楼”的珍籍,奠定“木犀轩”最重要的基础;其次在他出使日本期间,及民国十八年(1929)聊城杨氏“海源阁”散出后,都曾收购不少旧书。

袁芳瑛,字漱六,湖南湘潭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嗜好藏书,尤好同部书多藏版本,所藏明代以前《史记》版本多达三十余部,宋元本《汉书》也有十来部,藏书处名为“卧雪楼”。咸丰六年(1856),袁氏在江苏松江知府任上,正当太平军兴,战火所及地区的故家藏书纷纷流散,他的俸禄皆用于搜购,如孙星衍“平津馆”等江南典籍的精华,袁氏所得甚多。他死后,儿子榆生售书,当时李盛铎正随父宦游长沙,又尽得“卧雪楼”中的精华,宋刊如《周礼注疏》八卷本、《尚书孔传》大字本、《后汉书》黄善夫本等等,都是版刻史上特具价值的杰作,不徒其古而已,李盛铎就因获得这批书而跃登大藏家之林^③。光绪十五年(1889),叶昌炽因与李盛铎会试同年相识,屡次到木犀轩鉴赏这些卧雪楼善本,记下“为之心醉”的感受^④;四年后李盛铎在扬州的寓所失火,焚毁两百余箱图书,其中很多是人间罕见的明代文集,叶昌炽至叹为江左文献之厄^⑤!

出使日本期间,李盛铎购藏的书可分两种:流传到日本的宋元刊本或抄本,以医书为多,如《太平圣惠方》、《医说》、《杨氏家藏方》等;一是日本与高丽当地的古刻本,很多是相当明代的刊本,如《山谷诗集注》、《新雕皇宋事实类苑》等书。至于杨氏海源阁散出为李盛铎所得者,如宋刊本《史记》原是杨氏著名的“四经四史斋”秘笈之一,再加上《孟东野集》、《孟浩然集》、《山谷大全集》等,都使得木犀轩的声势更盛。李盛铎一生藏书九千多部、五万八

^③ 黄浚在《花随人圣俞摭忆》中,详叙李盛铎得卧雪楼藏书的曲折经过,见许晏骈、苏同炳合编黄书全编,页1097-1098,《袁漱六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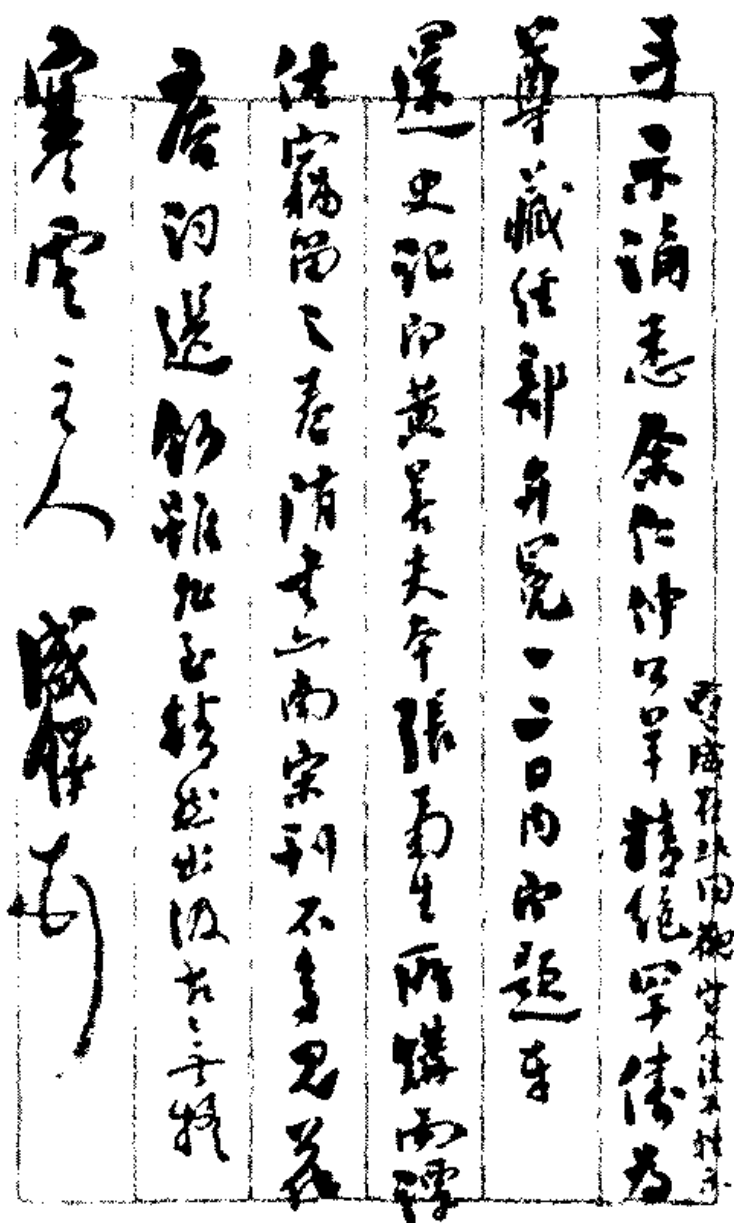
^④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抄》,记六,叶25,光绪十七年正月二十一日。

^⑤ 同上注,记六,叶65,光绪十九年十一月二日。

千多册,其中宋元古本约三百部、明刊本二千余部、抄本与稿本二千余部,合计这些通称的善本约占木犀轩全部的半数。这对一般藏书家而言,岂仅琳琅满目,简直就是天文数字了,难怪伦明要称他是“今日吾国唯一大藏家”^⑥!

民国二十四、五年(1935、1936)间,木犀轩所藏已陆续有些散出,或质于个人,或押于银行。等到李盛铎病逝不久,日人欲以重金收购木犀轩,教育部得悉后,为防国宝外流,计划以三十万元归公,并派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接洽。李家开价六十万元,袁同礼邀请傅增湘、胡适等赴天津洽谈,李家

减为五十万,教育部则增为四十万,胡适又允参加庐山会谈之便,代向蒋委员长请求再增二万元^⑦。不久抗战爆发,事情就搁浅下来。后来李盛铎十子李少微(名滂,以字行,北平民国大学教授)出任天津伪官,旧事重提,结果二十八年(1939)底由伪临时政府以四十万元整批收购^⑧,交北大文学院典藏。又经过十年后,才在赵万里主持下展开整理和编目的工作,而于一九五六年出版《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氏书目》三册,收录九千零八十七部、五万八千三百八十五册,凡经李盛铎校跋过的书都一一注明,由于数量很多,可知李盛铎不是只藏不读的;北大图书馆李氏书目也明言,木



李盛铎致袁克文(寒云)书札(国家图书馆藏)

⑥ 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4),《正风》半月刊第二十四期,页9。
 ⑦ 《文澜学报》第三卷第二期,书林,页14-15,《李木斋全部藏书,政府正接洽收买》。
 ⑧ 刘哲民、陈政文编,《抢救祖国文献的珍贵记录——郑振铎先生书信集》,页12,《致张寿镛》,民国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五日;页14,《致张寿镛》,民国二十九年三月一日。

犀轩旧藏是“北京大学藏书中最有学术参考价值的专藏之一”^⑨。木犀轩所藏除转入北大外，抗战前后又将数百卷敦煌写经等物出售殆尽，传闻连李盛铎的印记都流落在北平旧书店中，店主凡遇旧本便钤上他的印记以抬高书价^⑩。

藏书之外，李盛铎一度收藏有价值难计的清代内阁大库档案，这些包含明清两代极重要的史料，一再遭到毁损^⑪，若非先后遇到罗振玉、李盛铎、傅斯年三人，则不是做了重造纸料而消失，便很可能流落到东瀛异域去了。

当宣统元年(1909)及民国十一年(1922)，罗振玉两度挽救这些档案后，一方面就部分整理的结果，印行《史料丛刊初编》，一方面拟筑“库书楼”储藏，以与他原有的“宸翰楼”、“大云书库”鼎足而三。到民国十三年(1924)前后，楼尚未盖成而有外国以重金向罗氏求让。李盛铎知道后以一万六千元向罗振玉购得，租屋分藏在北京、天津两地，因为数量太多，单以重量计约达十二万斤，而储存空间狭窄，以致未曾整理。民国十七年(1928)，傅斯年就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不久，计划收购这些外人亟想染指的史料，经蔡元培同意和马衡介绍，终向李盛铎以一万八千元(即原价加房租费)收归公有，由史语所陆续整理并排印出版《明清史料》十编。这批庞大的内阁档案，在近数十年中，屡经易主和辗转播迁，目前与故宫博物院的军机处档案，形成台湾地区最重要的明清史料。当年王国维为罗振玉预先写成的《库书楼记》中，认为这些史料得以保存，实是人事加上天意的结果^⑫。就李盛铎个人而言，则诚如史语所最早主持整理的徐中舒所说：“这些内阁档案当时未曾流出国外，李氏保存的功绩，也不可埋没的。”^⑬

⑨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氏书目》，《引言》，页1。

⑩ 恽如莘编，《书林掌故续编》，页182-187，一知，《古书作伪种种》。关于李盛铎所藏敦煌写卷真伪的讨论，参见荣新江，《李盛铎写卷的真与伪》，《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2期，页1-18。

⑪ 关于内阁档案遭遇种种，参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首本，徐中舒，《内阁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李光涛，《明清史论集》，下册，页499-526，《记内阁大库残余档案》。

⑫ 王国维，《王观堂先生全集》，册三，页1164-1168，《观堂集林》，卷二三，《库书楼记》。

⑬ 同注⑪，徐中舒，《内阁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页2。



李盛鐸題跋墨迹(国家图书馆藏)

刊印图书

光绪十三年(1887),李盛鐸向国外订购十余部石印机器,在上海开设“蜚英馆”印书局,准备以当时才自西洋引进不久的石印法,精印各类书籍。蜚英馆房舍数十幢,分印样房、校书房、裱装房等部门,规模极大^⑭,但经营情形不详,出版的图书除正续《资治通鉴》、《三希堂法帖》、段氏《说文》等外,据说实际是以印售科举考试专用的所谓“兔园册子”为主^⑮。

此外,李盛鐸以传统木刻印过两部丛书:《木犀轩丛书》二十六种,光绪九年(1883)至十五年(1889)刊行,以经史两部占绝大部分,除一种外全是清代的著述;另一部称为《木犀轩丛书续刻》六种,其中却有早自光绪八年(1882)刊印的。

^⑭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数据》,第一辑,页1006-1007。

^⑮ 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页361-372,王汉章,《刊印总述》。

梁鼎芬葵霜阁

辛亥革命后,一些抱着亡国之痛的清朝遗老,或群居上海,或避地天津,也有少数人继续为北京城里的小朝廷驰驱效劳。其中,梁鼎芬是个锋头颇健而备受批评的人物,有人形容他是不明大义而自以为深明大义^①,同时也有人说他是自完其节^②。从另一方面看,梁鼎芬不仅是一位私人藏书家,而且在清末民初提倡图书馆,到处捐书不遗余力,这却是极为难得的。



梁鼎芬像

生平简历

梁鼎芬,谱名福承,字伯烈,一字星海,号节庵,又号藏山,广东番禺人,生于清咸丰九年(1859)六月初六日。祖父梁国瑞,字希丰,号祝年,道光二年(1822)举人;本生祖梁国瑛,道光二十六年(1846)举人,化州儒学训导;父

① 陶菊隐,《督军团传》,页3。

② 徐信符,《广东藏书纪事诗》,《梁鼎芬葵霜阁》。

亲梁葆谦，字遇恭，号吉士，县学生员，捐候选同知，同治九年（1870）分发湖南不久即死，当时梁鼎芬年仅十二岁。光绪二年（1876），他以国子监生中式顺天乡试举人后，从大儒陈澧（东塾）读书，到光绪六年（1880）中庚辰科进士，授翰林院编修。

光绪十年（1884）中法越南之役，梁鼎芬疏劾李鸿章六可杀之罪，结果自己却以诬谤大臣之名，遭到谪降五级调用而归里，为两广总督张之洞聘为惠州丰湖、肇庆端溪，及广州广雅等书院院长。光绪十五年（1889）李瀚章继任粤督，他避往镇江焦山读书。十八年（1892）再应张之洞约往湖广总督幕中，担任两湖书院院长并参赞湖北学务。中日甲午战役，他一度随张之洞赴江宁，主讲于钟山书院。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之乱以后，他又首倡各省进呈方物于西安行在，又于太后召见时奏请废大阿哥，并经张之洞、端方等交相保荐，得以复入仕途，擢补湖北汉阳、武昌等地知府，张之洞又派兼湖北学务、营务两处提调。光绪三十一年（1905），梁鼎芬调升安襄郢荆道，旋署理湖北按察使、布政使等职；翌年因请罢庆亲王奕劻及奏劾直隶总督袁世凯，遭旨申斥而引疾开缺回粤。辛亥革命时奉旨为广东宣慰使，未及抵粤而清朝已亡。

民国以后，梁鼎芬仍为逊清效命，经理光绪崇陵种树事宜前后三年之久。民国五年（1916）溥仪命在毓庆宫行走授读，翌年又参与复辟之役。到民国八年（1919）十一月十四日病卒，年六十一岁，由溥仪谥为文忠。

葵霜阁藏书

梁鼎芬的祖父原有“玉山草堂”藏书，散佚后他的父亲重新搜集，到他手中又继续其志。但梁鼎芬藏书不同于一般重视宋元古本，而以收藏丛书、方志及清人文集为多，他在湖北长达二十年之久，故搜得当地方志不少；清人文集则绝对不收袁枚和龚自珍两人著述，认为一个是素行无耻，一个是心术

至坏,都是他深恶痛绝的,还告诫学生对两人的书都摒而弃之^③。

他对于藏书处的命名,因时因地而异。最初是中进士前后,居住京师米市胡同时的“栖凤楼”,以隋朝勤于读书解经的何妥(字栖凤)自比。后来由他的一位东塾同门陈树镛为他撰文“毋暇斋”三字,也是表示他的读书之勤。他在武昌的时候则称为“食鱼斋”^④。等到劾奕劻、袁世凯不成后,称为“精卫庵”,表示“花可傲霜看晚节,鸟思填海有愚忠”的惘惘之意^⑤。民国后,因溥仪颁赏一方岁寒贞松匾,他又改为“寒松馆”;最后是在他完成光绪陵园的种树任务时,表明“为刈恶草护忠葵”的耿耿此心^⑥,便题为“葵霜阁”。梁鼎芬随时随地以室名明志,说得上是用心良苦了^⑦。

梁鼎芬的师友交游中,颇多藏书著名的人物,例如陈澧的“东塾书楼”、张之洞的“抱冰堂”、盛昱的“郁华阁”、缪荃孙的“艺风堂”,以及他的两位表兄弟:石德芬的“石室”和龙凤鏊的“知服斋”等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因此梁鼎芬诗集中很多与他们唱和记事、题咏古籍之作。可是他对自己藏书的处理,却和上述各人有所不同,他将数百箱书分成三部分:一捐入镇江“焦山书藏”,一存广州“梁祠图书馆”,其余的留在北京寓所供自己阅读。后者在他死后为仆人陆续窃售,继而其子梁思孝又全售于同乡伦明开设的“通学斋”书店,再转而由日人网罗东去^⑧。

提倡公共藏书

梁鼎芬除了不藏宋元古本,他和一般嗜书如命的藏书家最大的不同,是

③ 同注②。

④ “食鱼斋”典故待考。

⑤ 梁鼎芬,《节庵先生诗》,卷五,页45,《乙酉九月罢归,与伯愚别于栖凤楼,自此日后今始再见,时庚戌九月》。

⑥ 同上注,卷六,页19,《蔬园绝句七首和放翁寄黄孝廉》。

⑦ 梁鼎芬的别署与斋名极多,据杨敬安辑《节庵先生遗稿》,页148,《节庵先生斋名别名表》,达八十九个。

⑧ 同注②。

极力提倡书院藏书和公共图书馆,不但到处捐书,甚至自家成立图书馆供人借阅。

光绪十一年(1885)岁杪,梁鼎芬谪归广东,先后掌教丰湖、端溪、广雅三所书院,任内分别创建丰湖书藏、端溪书库,并扩充广雅书院中藏书的冠冕楼,使这三所书院成为广东各书院藏书最丰富的前三名^⑨。其中梁鼎芬最费心的当属丰湖书藏,他先前到过镇江焦山,非常仰慕阮元在嘉庆年间创立的焦山书藏,并觉得自己与阮元“似有因缘”^⑩,于是仿照其规模在惠州建立类似的书藏,供学生阅览,其中以集部与方志两类为当时广东各书院收藏之冠,梁鼎芬在其弟协助下,手编书目八卷,又订立作为管理规则的《丰湖书藏四约》——借书约、守书约、藏书约、捐书约^⑪。



梁鼎芬像

数年后梁鼎芬为避李瀚章督粤,再度到焦山时,见阮元先建的书藏中还有四座空榭,不但将自己的一部分书捐入,并劝说杭州“八千卷楼”的丁丙等人,共捐书四百五十一部、一千册,全由梁鼎芬亲手加以整理编目,他有两诗记其事:“焦山书藏今始见,千卷签函余再题。他日丰湖悦相较,有人访古过桥西。”“金山杰阁委飞尘,灵隐高台闪碧磷。此屋巍然不受劫,今朝应有检书人。”^⑫

梁鼎芬关心学子读书,还不仅止于他得意的丰湖与焦山等处而已。宣统二年(1910),他在参观过京师的广东学

⑨ 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页362-363。

⑩ 梁鼎芬,《节庵先生诗》,《补辑》,页5,《海西庵三忆诗并序》。

⑪ 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页364-372。

⑫ 同注⑤,卷三,页11,《检理焦山书藏讫事,口占二首示庵主佛如》。

堂后,为使旅京游子能有书读,便发愿捐书,向朋友劝捐将近万卷,自己又以已故的亲友之名,捐赠了一万多卷,并在捐书目之下一一追溯自己与这些亲友之间的书缘种种。宣统三年(1911),梁鼎芬更毅然在广州自宅成立“梁祠图书馆”,将自己的藏书开放给当地各学堂的学生利用,自四月一日开馆。他手定章程二十三条及观书、抄书、借书、读书与捐书五约,并声明将来广州设立大书藏时,愿将此部分书捐入作为倡导;他逝世后,儿子梁思孝果然将梁祠图书馆六百余箱书,连同他

宣統六年梁鼎芬家
上書種如清風區嶺謝樹田此記愧不能學也鼎芬拜識

鄭所南先生文集
我家清風樓記

有以嚴陵清風閣記示吾者正恨不能飛上富春山頂
臨觀千尺釣臺焉吾變然而言曰未能遂其超邁之志深
愧於古人吾當自作清風樓記非東坡所記之清風閣
非越山赴宮齋之清風樓曰清風樓者頗多皆非吾清
風樓吾無家焉有樓：固無風則有首乾坤一索風雷
生再索日月出三索山洋共先天之乾初爻始動曰
巽六子首出莫先於風乾天初以陽剛變為陰柔散一
氣拱手萬物

梁鼎芬题跋墨迹(“中央图书馆”藏)

原藏于光绪陵园署名“敝牛斋”藏书的十余箱书,一并都捐给广东省立图书馆^⑬。凡此作为,都说明梁鼎芬在其他方面虽因自信其是而颇受人讥评,但至少藏书的化私为公方面,不能不令人称道他有别于一般藏书家的特立独行!遗憾的是民国以后惠州屡次兵燹,丰湖书藏遭到波及而四散,广东省立图书馆也在抗战中荡然无存^⑭,而焦山书藏虽经江苏士绅组成委员会管理,并印有书目六卷,书目前冠有梁鼎芬遗像,但书藏所在的海西庵,却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日军攻陷镇江时,为炮火一毁无遗^⑮。于是梁鼎芬数十年心力所在的公私藏书,竟尔都成了山河泡影。

⑬ 吴天任,《梁节庵先生年谱序例》,页10、368。

⑭ 同注②。

⑮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第二十卷第五、六期合刊,国内消息,页15,《镇江焦山书藏全部被毁》。

刊书与著述

光绪十三年(1887),梁鼎芬掌教端溪书院时,刻有《端溪丛书》四集,分经史子集四部共收入二十种。此外,他曾拟刻《广东丛书》与《湖北先正遗书》,各开列有第一集目录,但都未成事。他在著述方面,文集有门人杨敬安辑《节庵先生遗稿》三卷、《贻稿》一卷;诗集则他所作极多,但生前仅于光绪十九年(1893)选刊一部分,而且流传不广,死后经余绍宋、叶恭绰等陆续辑印,由汪宗衍综辑成《节庵先生遗诗》,收录达一千四百余首;词集则有叶恭绰所辑《款红楼词》。

叶德辉观古堂

家世生平

叶德辉，谱名裸辉，字奂彬，号直山，别号郎园，湖南湘潭人，生于清同治三年（1864）元月十四日。叶家先世为江苏吴县籍，他的祖父叶世业，字颐泉，号肯堂，道光末年避乱才移居湖南，因此叶德辉好称自己是吴人，还主持修纂过一部《吴中叶氏族谱》。他的父亲叶浚兰，字涤贤，捐官候补知州，有子四人，叶德辉居长。他幼年读书不佳，甚至以为“天下至苦之事莫读书若矣”^①，一度改学商业，十七岁时入长沙岳麓书院就读，光绪十年（1884）二十一岁补湘潭县学附生，次年中式乡试举人，光绪十八年（1892）壬辰科成进士，和张元济、李希圣等同年，三人都分部主事，叶德辉到吏部不久便请假回乡里。

叶德辉在湖南以提倡经学自任，与岳麓书院院长王先谦（前国子监祭



叶德辉像

^① 叶德辉，《郎园六十自叙》。

酒)交往密切,当光绪二十三、四年(1897、1898)湖南推行新政各项措施时,叶、王两人极力反对,为湖南当地守旧人士的领袖,新旧交哄到戊戌政变为止。光绪二十六年(1900)唐才常起义事件后,叶德辉撰《觉迷要录》以辟革命之说。宣统二年(1910)长江各省米荒,长沙发生饥民暴动及罢市事件,叶德辉和王先谦都受到牵连,王降五级调用,叶则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辛亥革命时,叶德辉暂避于山中,事定后曾因嘲谑民国,一度为湖南当局逮捕,经王闿运等人营救,转赴上海停留半年才回湘。以后叶德辉经常四处游历,或滞居吴县。民国四年(1915)他被推举为湖南省教育会会长,又因叶家自光绪中以贩运安化红茶销往俄国致富,进而被推任长沙总商会会长。民国十六年(1927)四月间,共产党在湖南引发农民运动,以打倒地主及土豪劣绅为口号,叶德辉于四月初八日遭到逮捕并公审,十一日处决,年六十四岁。

观古堂藏书

叶德辉的先世已经有些藏书,他自己就读岳麓书院时也常以课卷膏奖购书,但注意收藏则从光绪十二年(1886)入京会试时每日到厂肆选购开始。此后不论是在湖南乡居或游览京师各地,都随时搜罗,先后获得湘潭同县袁芳瑛“卧雪庐”、商丘宋至“纬萧草堂”、曲阜孔继涵“红桐书屋”等家旧藏不少,到宣统三年(1911)时,他的观古堂藏书已经多达四千余部、二十万卷左右。入民国以后仍继续增加,他的儿子叶启倬描述:“家君每岁归来,必有新刻旧本书多榭,充斥廊庑间,检之弥月不能罄;平生好书之癖,虽流离颠沛,固不易其常度也。”^②估计在他死前可能已超过三十万卷的巨藏。

依他自己的说法,观古堂中的古本以《韦苏州集》为最。他认为这部书

^② 叶启倬,《观古堂藏书目录跋》。

是北宋胶泥活字印本,并可能是以名家制墨印于著名的“澄心堂纸”上。由于在此以前各藏书家都没有这种版本的记载,因此叶德辉颇沾沾自喜,认为“非止北宋本中第一,亦海内藏书第一也”^③。同时郑重嘱咐此为“吾家之宝,鬻及借人为不孝,子孙其永保之”。《韦苏州集》以外,观古堂中的古本还有宋孝宗隆兴元年刊本《南岳总胜集》、宋宁宗嘉定刊本《玉台新咏》、金刻本《埤雅》等书,《南岳总胜集》为端方在湖南巡抚任内赠送给他,又由继端方抚湘的庞鸿书出资助他影摩刊行,据说维妙维肖的程度,竟使精于版本的杨守敬误以为真宋本而不惜高价购买,留下一桩叶德辉称之为“老娘倒绷”的轶事^④。

观古堂虽有一些宋元本,而且叶德辉也力足以致之,但他从未刻意专好于此,并曾一再批评藏书家“薄今爱古”的偏弊^⑤,他自己注重一书版本内容的好坏,远过于讲求版本的新旧,因此他颇为推崇张之洞《书目答问》以清代刊本为主,而不列宋元旧刻的作法。但是,张氏在许多书名下只注称“通行本”,而未确指究竟是哪一种版本,叶德辉认为犹不免含混草率,依目购书的学子仍无法从众多好坏不一的通行本中,辨别出真正的善本^⑥。

就藏书类别而言,叶德辉治学以经学、小学为主,因此观古堂中很多这两类图书,他尤其重视清朝人的经义著述,除了合刻的《经解》正续编各种版本是当然必藏,又不断访求各家单行的初刻本和各家全集的原书,早在光绪十二年(1886)叶德辉第一次到京会试,在厂肆购书时便以此为重点,经二十余年的努力,到宣统三年(1911)获得金榜《礼笺》和民国元年(1912)获得张惠言《仪礼图》两部初刻本,总算各书齐全,他高兴地认为此后观古堂中治学

^③ 叶德辉,《郎园读书志》,卷七,叶17-18,《韦苏州集》。后来获得此书的周越然认定是明初活字本,并明确地说叶氏“定此为宋本,误也”。(周越然,《书书书》,页30;周越然,《言言斋藏书目》,页498-501,《韦苏州集》。)

^④ 同上注,卷四,叶12-13,《南岳总胜集》。

^⑤ 同注^③,卷一,叶57-58,《仪礼图》。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一〇,《近人藏书侈宋刻之陋》、《藏书偏好宋元刻之癖》。

^⑥ 潘承弼,《著砚楼书跋》,页135,《叶郎园手校书目答问》,称叶氏致力于此书,纠正内容颇多,“增益至数十百条”,“非数十年见闻之广无此博洽”。

明張美和元史節要三卷洪武丁未建安書堂刻本板式字體猶承元刻之舊
 而傳本頗少嘉慶時黃堯圃以家藏書四種換書估王徵麟知非堂抄本中
 有以一種載價值十三洋可知彼時舊書之貴而此書價亦不廉云堯圃誠書
 皆有手跋光緒甲申吳縣潘文勤從藏書家搜輯刻士禮居題跋記此事載卷六知
 非堂稿六卷下光緒丁未四月初上該燈下題記麗慶主人葉德輝



叶德輝題跋墨迹

当可“从心所欲矣！”^⑦

叶德辉之所以重视清代各家初刻本，是由于他认为康雍乾嘉四朝承平，士大夫优游岁月，既勇于著述，又精于刊刻，而且单行的初刻本若非著者家刻，便是朋好为刻，因此校勘精审，远非后来合刻的大部头经解丛书可比，叶德辉甚至可以视咸丰二年（1852）刻的桂馥《说文解字义证》为镇库之宝^⑧，这足以说明他绝不佞宋尚元的独特看法。

清人经学著述外，叶德辉又搜集乾嘉诗文集，因为他很欣赏舒位《乾嘉诗坛点将录》一书，有意继起汇辑一部《乾嘉诗坛点将录诗征》，先后获得一百多家，他逐一检读并撰提要，记述作者生平事迹、诗源派别异同等等。叶德辉如此留意清朝人的各类著述，难怪他在手编《观古堂藏书目录》之后，自信其目不但可以补正《书目答问》的缺误，而且足备《清史·艺文志》的史材^⑨。

民国十六年（1927）叶德辉被处决，观古堂藏书也被攘夺一部分，不久他的两个儿子之一突然沉迷赌博，竟将叶德辉四十年心血所寄的藏书押注而光。前述的《南岳总胜集》辗转北平、广州，为莫伯骥收入“五十万卷楼”中^⑩；叶德辉矜夸为天下第一并要求子孙不得出售或借人的《韦苏州集》，则为周越然《言言斋》所得^⑪。叶德辉子侄中，较年长的六七人，从小受他的指导和影响，都爱

⑦ 同注③，卷一，叶57-58，《仪礼图》。

⑧ 同注③，卷二，叶47-49，《说文解字义证》。

⑨ 同注②。

⑩ 莫伯骥，《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史三，页182-211，《南岳总胜集》。

⑪ 周越然，《书书书》，页30；周越然，《言言斋藏书目》，页498-501，《韦苏州集》。

好藏书并精于版本目录,尤以叶启勋为最著。启勋字定侯,号更生,为叶德辉三弟德炯次子,生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启勋自己的“拾经楼”藏书也多达十万卷,著名的何绍基“东洲草堂”珍藏在民国十五年(1926)左右散出时,约有十分之三四为启勋所得,宋刊本如《韵补》、《宣和书谱》、《古史》、《梦溪笔谈》等。叶启勋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印行《拾经楼细书录》三卷,收录历年所撰藏书题跋一百零九篇,傅增湘称誉启勋克绍家风,有如明代“天一阁”范钦之有范大澈、清代“爱日精庐”张海鹏之有张金吾^⑫。

著述和刊书

叶德辉著述极多,目录版本方面印行的有《观古堂藏书目录》、《藏书十约》、《书林清话》、《余话》、《郎园读书志》,未刊的有《宋元版本考》、《四库全书版本考》等。

《藏书目录》四卷初编于光绪二十七、八年(1901、1902)间,辛亥革命他避居山中时重编,陆续修订后于民国四年(1915)付刻。《藏书十约》也是在山中继书目而作,讨论关于藏书的购置、鉴别、装潢、陈列、抄补、传录、校勘、题跋、收藏、印记等十项,这十约其实就是叶德辉以数十年累积的经验,为有志入门者所撰的藏书指南。

《书林清话》的撰述,是他鉴于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一书,内容专以人为主,于是叶德辉另辟蹊径,撰辑历代版刻源流及校勘故实,以补《藏书纪事诗》的缺略。《书林清话》在宣统三年(1911)底完稿,编成十卷,于民国八年(1919)印行;以后他又陆续撰成《余话》二卷,在身后由儿子叶启倬印行。叶德辉这书林二话和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各是近代关于版刻及藏书的巨作,民初以来受他们影响而产生的类似撰述极多。

至于《郎园读书志》十六卷,是叶德辉身后子侄汇集其生平读书题跋,民

^⑫ 傅增湘,《长沙叶氏细书录序》。



叶德辉画像(原载《郎园全书》卷首)

国十七年(1928)排印于上海。从一九六一年以后,台湾地区重印、影印古今各家书目或书志的风气很盛,同一家书目书志甚至有数种印本流传的情形,独有叶德辉的《观古堂藏书目录》、《郎园读书志》两部,一直无人青睐给予重印。以他对版本目录的造诣,虽然有时和他的言行一样过于强悍而不免遭人批评^⑬,但这两部书目和书志的价值,绝不逊于坊间重印参差不一的同类述作,以中国共产党之对待叶德

辉,大陆上还重新排印他的《书林清话》和《藏书十约》,是则台湾地区除了注意他在思想和生活上的“异端”,也应当多介绍他在学术上的成就。

叶德辉相当注意图书的流通传布,《书林清话》开卷便是《总论刻书之益》,认为积金不如积书,积书不如积阴德,而刻书兼可积书与积阴德,又与积金无异^⑭,等于是三者兼备的好处。他自己身体力行刻印不少图书传世,除了自己的著述外,包含丛书如下:

一、《观古堂汇刻书》初、二集,十三种,光绪二十八年(1902)刊行,《初集》是经学,《二集》为诗文集。

二、《观古堂所刊书》,十八种,光绪中刊行,年份不悉,与前书有九种重复,另外包括有明《南雍经籍考》等七种书目。

三、《丽廬丛书》,九种,光绪三十二、三年(1906、1907)刊行,以游艺图书为主,也包括《南岳总胜集》在内。

^⑬ 在版本目录方面批评叶德辉者,可以傅增湘、伦明二人为例。傅氏《双鉴楼藏书续记》卷二,页22-27,“明弘治刊本《盐铁论》”跋语,谓张元济刊行《四部丛刊》时,拟收入此书,导致傅与叶德辉两人为此书版本的一场争论,傅谓叶氏“悍然武断,徒以空言取胜”。至伦明则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8)(《正风》半月刊第二卷第五期,页374),批评叶氏见识不广,版本目录非其所长云云。

^⑭ 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一,《总论刻书之益》。



明史藝文志載楊慎丹鉛總錄二十七卷續錄十二卷餘錄十七卷新錄七卷因錄九卷四庫全書總目因惟無新錄因錄而有摘錄十二卷其書為浙江范懋柱家藏本即天一閣書目所載明刻各本也此本題丹鉛錄二十七卷前有嘉靖三十三年滇南門人梁佐校刻序云先生著丹鉛餘錄摘錄流有刻本藝林珍之惜不多見戊申秋佐自司馬部奉使歸省先生乃盡以三錄四錄別錄附錄因錄諸稿授之佐乃削同校異析之以類合而名之曰總錄捐俸以梓據此則總錄實包括諸錄刪并異同而為之諸錄皆贅刻也余向藏陸弼刻本六止二十七卷取校以本絕無異同然終不如此本之最舊最善若世行李氏南海本則存十卷則不足道矣升庵先生博洽多聞在明時可與王弇州對壘近世漢學家動以疏陋微明人如楊王二公世後有幾士恨不學身若戴東原動誇中秘顧千里專事校勘而下筆輒輕呵在人豈公道哉

乙卯端午後二日葉德輝記



四、《双梅景闇丛书》，十六种，光宣之间刊行，包括舒位的《乾嘉诗坛点将录》。

五、《观古堂书目丛刻》，十五种，民国七年（1918）刊行，包括上述《观古堂所刊书》的七种书目和新收入的八种。

民国十六年（1927）叶德辉死后，门生刘肇隅编成《郎园四部书录》，为他一生所著所刊各书解题叙录；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叶德辉子侄就其生前所刊、所著书的板片尚存者，汇辑成《郎园全书》一百二十九种、二百册，以“中国古书刊行社”名义印行。

章钰四当斋

南宋时江苏的大藏书家尤袤(字延之),形容自己的书癖足可“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①。七百年后的清末民初,尤袤的一位同乡后辈,也是藏书家的章钰,题称自己的居室为“四当斋”,以示仰慕先贤之意。

生平简历

章钰,字式之,一字坚孟,又字茗理,别署甚多,如蛰存、充隐、鸥边等等,晚年自号霜根老人,生于清同治四年(1865)五月二十一日。他的先世是浙江诸暨人,从曾祖父起经商至苏州,落籍长洲县,民国后长洲又并入吴县。他父亲章瑞徵(字兰舟)那一代正逢太平天国之役,举家奔避江浙各地,事平后返苏州,产业已荡然无存,赁屋开设一家“存诚



章钰像

^① 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一,《尤文简表》。

堂”药铺,获取微利糊口。章瑞徵很重视子女教育,节衣缩食购买《日知录》、《困学纪闻》供章钰读书,这两部书是他一生治学的开始,并且一直珍重保藏,到老不失^②。

章钰十七岁时入苏州府学,并在紫阳书院、学古堂肄业。他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二十五岁时中式乡试举人,连上京师会试落第,直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科才名登二甲进士,分发刑部主事,不久请假南归,经江苏巡抚端方奏请留苏,延入学务处协办教育,历任参议、高等小学堂堂长、师范学堂监督等职。他曾因同乡前辈工部尚书陆润庠保荐,参加经济特科考试。光绪三十三年(1907),章钰再入两江总督端方幕,移家江宁;宣统元年(1909)端方改调直隶,章钰随节北上,不久入京供职吏部,再调外务部一等秘书、庶务司帮主稿,兼京师图书馆纂修。

辛亥革命后,章钰退居天津,“吾生元宰已无望,珍重新镌几卷书”^③,从此专注校书事业。民国三年(1914)应清史馆聘为纂修,负责乾隆朝《大臣传》、《忠义传》、《艺文志》等撰述,又应聘在严修所办“崇化学会”讲学十余年。晚年移住北平,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五月九日卒,享年七十三岁。

四当斋藏书

章钰早年家境困苦,他的藏书大约是中式举人、家境好转之后开始的。这时他的父亲已死,家庭的担子落在他肩上,幸而他以举人在学古堂担任斋长的膏火、自行授徒的束修,以及为人代笔的笔润等等,都较前大为增加,而他的弟弟章鉴(字亮之)在外经营古董生意也颇顺利,可以分担家计,因此章钰不但结婚成家,而且养有余力则以藏书了。

章钰深知自己所藏来之不易,所以当积到十二篋的时候,即在篋面标以

^② 章钰,《四当斋集》,卷七,页8-10,《先考朝议府君事略》。这两部书在章钰身后一并捐给燕京大学图书馆,见《章氏四当斋藏书目》,卷上之三,子部,页13。

^③ 章钰,《四当斋集》,卷一二,叶3-4,《寿内》。

“得此书，费辛苦，后之人，其鉴我”^④。正好每篋一字。这十二字原是嘉庆中有名的浙江藏书家向山阁陈鱣（字仲鱼）的藏书印文，陈鱣的藏书印记有十多方，但凡是我最喜爱的善本，必钤以其中两个：一个上刻他自己的图像，另一个是上述这十二字的长方白文印，可见他的爱书如命和用心良苦。只是陈鱣身后，向山阁珍藏仍不能长保，大半为后人售于海宁同邑的马氏吟香仙馆^⑤；而章钰虽以这十二字题于篋面，他的四当斋藏书却与向山阁有完全不同的归宿。

章钰藏书将近五十年，四当斋中共收藏三千三百六十八部、七万二千七百八十七卷。就数量而言，与梁启超的饮冰室大致相埒；就内容而言，则因章钰精于金石目录与掌故之学，故所藏以史部与集部为多。其中他手抄手校的有五百六十九部，近一万五千卷，精刻批校及名家手稿等三百八十部，约近一万卷，此外的两千四百多部都是普通版本。如此规模固然只能算是小藏家，但以一个寒素的读书人而言，这些已是很不容易的数目。四当斋中的宋本寥寥，只有《晋书》、《周书》、《南齐书》，以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四部而

此書藏書家目錄皆屬鈔本無言刊本者未竹垞諸人列入劉刻唐宋本書目蓋宗以後從考從刻本審其此本為小堂趙氏所鈔不言所自出殊年校補不知何人推凡涉及宗字則一律空括應疑字或注朋諱或注御名括名不括注賜地
名先著名字許撰
 始不為無誤一類 其從宋本傳錄確然無疑據字注御名括字二注御
 名刻書成於嘉慶刊行則在慶元以後之證也以先諸山邦活字本
 什勘活字本誠多脫誤亦有此本脫為活字本仍在者脫在數十
 字外者二萬四千三百八十八行異同處則文義每不可通活字
 本不詳所自出疑本而本也從摩治校信讀過四十五日之力
 全收入活字本附書所先盾諸正金
 壬子七月
 杭州華北同祥館
 門

章钰题跋墨迹（“中央图书馆”藏）

④ 同上注，俞陛云，《霜根翁四当斋集序》。

⑤ 蒋光煦，《东湖丛记》，卷四，叶23，《马二槎藏书》。

已,并且都是残本或是经过元明两朝的修补本;元刊本也只是一部仅存卷一的《唐贤三体诗法》。章钰对于古刊本力有不逮,却有不少名家抄校本或稿本,最多的是刘履芬(泃生)手写本三十余部,其次陈如升(同叔)的写本也不少,章钰说过:“藏书一事,旧刻为贵,名人手迹尤可贵,兼斯二者,可贵为何如,或以碎金断璧目之,不足与于此道者也。”^⑥

更难得的是他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逝世后,遗孀章王丹芬女士即将四当斋藏书全部寄赠燕京大学,当年十月双方协议后开始点交,由燕大图书馆专辟纪念室庋藏,并为纪念章钰终生苦读,同时陈列他生前所用的文具书桌等。第二年燕大图书馆又由顾廷龙负责,编成《章氏四当斋藏书目》三卷出版,以他手抄手校本为上卷,精刻及名家抄本为中卷,普通刊本为下卷,附录他的题跋或过录他人的题记,其中有些抄本、校本之下记着“崇礼堂”、“茗理簃”、“不鬥斋”、“算鹤量鲸室”等等,都是四当斋以外,章钰历年所署的室名。到一九五二年,因为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的缘故,章钰的儿子章元善将四当斋旧藏中的精华,即章钰手抄手校本、精刻本及名家抄本,从原来寄赠的燕大图书馆转而捐给北京图书馆,而普通刊本则转入北京大学图书馆^⑦。

校勘群书

清朝洪亮吉在《北江诗话》一书中,分藏书家为考订家、校雠家、收藏家、赏鉴家、掠贩家五种^⑧。章钰当然不会是兼营书肆的掠贩家,以他的家境和财力而言,也不足以多购宋元古本跻于赏鉴家之列,而他毕生收藏三千多部、七万余卷,更无法与动辄数十万卷的大藏家相颉颃;但是,若以他每日丹黄不倦校勘之勤,以及欲留古书真种在人间之志,应可当之校雠家无愧,特别是他在辛亥以后发愤遍校群书,被同乡叶昌炽称许为“此亦荆棘丛中安身

^⑥ 同注^③,卷二,叶9,《元槩茅山志跋》。

^⑦ 胡海帆,《章氏四当斋李氏太华楼旧藏与燕京大学图书馆》(上),页62。

^⑧ 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三,叶1-2。

之一法也”^⑨。

单只民国元年(1912)之中,章钰手校的书已有六百余卷;到民国十年(1921)左右,积至四、五千卷;他一生手校连手抄合计,将近一万五千卷之多。民国以来校书最多者,当推藏园居士傅增湘的近两万卷,相形之下章钰虽有不足,但傅氏生活条件的优越舒适,远非章钰能望其项背,而且傅增湘多寿五年,也多校了不少书。

章钰校书用力最深最久的是“胡注《资治通鉴》”与《读书敏求记》两部。《读书敏求记》四卷是清初常熟藏书家钱曾(遵王)的著作,他的“也是园”与“述古堂”藏书冠绝一时,他也就其中精善本的授受源流、版刻异同撰成《读书敏求记》,成为版本目录学入门必读之一。章钰自光绪三十四年(1908)借得宗舜年所藏此书的精校本开始,只要遇到别本,便随时抄补各家校语,先后共依据二十八种抄、校、刊本(其中十六种借自邓邦述),又就各朝史志和公私藏目加以考订,到民国十五年(1926)完成《读书敏求记校证》刊行,共达二十四万余言,补遗不计在内,篇幅为钱氏原书的四倍,纠误补漏、增益考订,“此本一出,旧本可废”^⑩,洵非过夸。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是我国最著名的编年通史,宋末元初曾经胡三省考注。本书卷帙既繁,历来刊本又多,不免互有出入。从民国五年(1916)起,章钰用清覆刻元本的胡注《通鉴》作底本进行

此本為吳克床先生手錄朱詒齋校語而陸續添
注者著錄於拜經樓藏書題跋管世湘氏彙校
本根據此本而遺漏者多此本管例草讀書敏求
記校證一書已得第一稿得見此本遺益宏多
並類道先通似之志至可佩也

長洲章鈺記



章钰题跋墨迹
（“中央图书馆”藏）

⑨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抄》,记一四,叶72,民国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⑩ 章钰,《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校证》,《后记》,叶2。

校读,他先后用校的有傅增湘包括七种宋刊在内的百衲本、涵芬楼《四部丛刊》影宋本、京师图书馆所藏北宋残本,以及一部明代孔氏刊本,另外又参考几种前人的校记。到民国十七年(1928)完成校事,在将近三百卷的巨帙中,校出“脱、误、衍、倒”四种情形共七千多处、一万字以上,其中关系史实重大的有五千二百余字。第二年章钰编成《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三十卷、《附录》三卷印行问世。虽然他以头白汗青而没能鼓起余勇进一步考订,但他的成就已足以附于《通鉴》而不朽了。

章钰的著述还有他手订的《四当斋集》十四卷,包括文九卷、诗四卷、词一卷,在他故世后由章元善等印行。章钰对于大清朝颇为拘执,虽然自己对于“国变”只能感叹而无可奈何,但从他临终遗命葬以故国衣冠,可知其心意。然而,他并未如许多人一样争着当遗老,在和答罗振玉的一首诗中,章钰写道:“怜我难寻彭泽菊,感君真啮首山薇。”^①这是很耐人寻味的。他在这样的心境中,能够移情奋志于读书校勘,“独向穷愁开境界,蠹鱼身世读书堆”^②。“以教书谋食,以校书遣生。”^③这种升华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尤其“四当斋”名称所从来的尤袤,藏书之多曾获宋宁宗御笔亲书“遂初堂”匾额,但尤氏生前既扁密自珍,不以借人,身后复遭火焚之厄^④;而章钰所藏却能化私为公,惠及天下学子无数,令人真要为四当斋藏书庆得其所!

① 同注③,卷一二,页9,《和叔言山斋书感韵寄旅顺》。

② 同注③,卷一一,页3,《绍延妻兄有诗见怀借韵自悼存二》。

③ 顾廷龙编,《章氏四当斋藏书目》,卷上之二,页28。

④ 同注①。

宗舜年咫园

家世简历

宗舜年，字子戴，号耿吾，江苏上元人（民国后上元并入江宁县），生于清同治四年（1865）。他的父亲宗源瀚，字湘文，监生出身，历官浙江衢州、湖州、嘉兴、严州各地知府，升署温处道、杭嘉湖道，所至以兴利除弊为务，因此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歿后，获得将生平政绩宣付国史列入《循吏传》^①。宗源瀚撰有《颐情馆闻过集》、《颐情馆诗钞》，纂修《湖州府志》、《浙江全省舆图并水路道里记》、《国朝严州诗录》等。

宗舜年为源瀚独子，光绪十四年（1888）顺天乡试举人，郎中衔内阁中书，分发浙江补用知府，署金华知府，保升补用道，光绪二十九年（1903）曾应经济特科考试。此后数年宗舜年都在端方幕中，专司与盛宣怀联络往来事宜^②，并担任江苏筹办地方自治总局的四名局长之一。民国以后，宗舜年退居常熟及吴县，民国二十二年（1933）因胃癌病卒，年六十九岁。子宗惟恭，字礼白，浙江法政专门学校毕业，担任上海复旦大学、中国公学教授，并执业律师，为民法专家。

① 《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六〇，叶8，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庚子。

② 盛、宗两氏为儿女亲家，盛宣怀的长子盛昌颐娶宗源瀚的女儿。

咫园藏书

宗源瀚在临民之暇，收购不少图书金石书画，并撰有题跋，只是他的“颐情馆”数万卷藏书大都是普通版本，明刊本已经少见，宋元刊本则是到宗舜年的“咫园”才开始收藏。已知的咫园宋本中，最珍贵的是《通鉴纪事本末》与《湘山野录》两部人间孤本。前者是他在民国十七年（1928）收藏，成为咫园第一部宋刊秘笈。三年后“双鉴楼”傅增湘闻风而至，再三请求宗舜年出让，因为傅增湘以宋元两部《资治通鉴》名楼，独缺一部《通鉴纪事本末》，眼

界极高的傅氏在二十年中虽看过不少此书的残缺本、抄补本、后印本等等，却只钟情于咫园这部独一无二完整的小字初印本；一年后，宗舜年终于慨然割爱，以二千二百元加上要求傅氏赠以两部抄本的代价^③，让傅氏完成拥有“三鉴”的心愿，后来傅氏在此书题跋中说：“凡历三百六十余日，此七百五十九年前之古刻，二千八百九十余叶之巨编，乃入吾宝藏中，屹然与兴文、盐官鼎列而三，为书林增一佳话。”^④傅氏如此不惮其烦地一一列举相关的数字，清楚地显露出此书的珍贵与自己溢于言表的兴奋之情。

至于宋僧文莹记北宋事的《湘山野录》，一般只见明代刊本，而宗舜年此部

震川集家有是書若世美書福之名則承學之士知之者鮮矣刻本以幸歸梅圃所刊大全集為最備殊夫英侯為梅圃後元孫銳意補輯震川遺文介余請於正盒校此本歸以校大全集得未刻文八十篇先是太倉王紫翔處未刻稿亦得假錄兩本同者四十一篇王本所無者卅九篇豈惟梅圃先生所不知即崇史校定遺集時恐亦未見真秘笈矣英侯將各兩鈔本及佚文之見於他書者宗輯為大全集補遺刊行之正盒之仿紙不吝與英侯之善承先志皆晚近所難也



宗舜年題跋墨迹
（“中央圖書館”藏）

^③ 关于此书的让售经过，参见张元济、傅增湘，《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页266、273-277，其中宗舜年同意让售此书的原函内容，见页274。

^④ 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初集》，卷二，叶4-10，《宋淳熙看小字本通鉴纪事本末跋》。

半为宋刊原书,半为元人抄补本,藏过此书的黄丕烈在《百宋一廛赋》中,说这部书可以校正明刊本的错误不下数十百处;缪荃孙也赞叹这部宋本“为此书第一佳帙”^⑤;宗舜年本人则将书斋又命名“野录轩”作为纪念,并把这部秘籍借给张钧衡影刻,收在《择是居丛书》中传世。等到舜年死后,宗惟恭将《湘山野录》让售给蒋祖诒(谷孙),后来又和上述的《通鉴纪事本末》都归于北京图书馆,在数十年中不断地辗转易主与分合,书也可叹,人也可叹!

一般藏书家总喜欢钤上自己的印记,书愈珍秘则钤印愈多,不外是希图自己名藉书传。宗氏父子对于藏书却难得如此,这固然显示他们较为豁达的心胸,却使后人难以追踪他们所藏的内容和聚散来去。以致舜年的好友如潘承弼等人,在他死后偶而见到有“颐情馆”或“咫园”藏印的图书,都会如获珍宝般收购^⑥。宗舜年临终前嘱咐惟恭,将咫园所藏约千部左右的图书,出售其中的精善本,得款后以剩下的普通本为基础,成立一所图书馆公诸于世。不料因宗惟恭另有所好于泉币,以致咫园藏书逐批变卖换成他自己“癖泉书室”的古泉,即使书上有其父读书校跋的手泽也不稍惜。宋刊本在抗战前已经散售无存,战事爆发后,常熟故居所存的普通本也遭遇火焚,只剩下惟恭携在上海行篋仅只两百六十部左右的元明刊本及抄校本,大约是宗舜年咫园原藏善本的十之二三而已^⑦。残存的咫园藏书终于在民国二十八年(1939)全部出售,转手后再由中央图书馆收入^⑧,大部分是金石书目,如元刊本《考古图》、《博古图录》等等,这时距他父亲去世才不过七年而已。惟恭精于法律又知版本目录,而且能读能校,却仍不保父祖两代楹书,使得父执辈的叶景葵无限感慨:“子弟不喜书,易将藏书散失,乃有喜书之子弟,亦复不能保存,其亡也忽焉,于是叹私家藏书之不易,而创立公共图书馆之

⑤ 缪荃孙,《艺风堂文漫存》,乙丁稿,卷四,叶19-22,《湘山野录跋》。

⑥ 潘承弼,《著砚楼书跋》,页257,《旧抄本蜕庵诗》;页137-138,《手写咫园宗氏藏书残目》。

⑦ 同上注,页137-138,《手写咫园宗氏藏书残目》。

⑧ 刘哲民、陈政文编,《抢救祖国文献的珍贵记录——郑振铎先生书信集》,页26,《致张寿镛》,民国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七日;页31-32,二十九年四月二日;页105,二十九年六月六日;页110,二十九年六月二十四日;页113,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不可不努力也。”^⑨

当清末光宣之际,两江总督端方先收购杭州丁氏八千卷楼,成立江南图书馆,又想网罗常熟瞿氏的铁琴铜剑楼,作为京师图书馆的基础,并派幕下的宗舜年和曾朴两人到常熟游说其事^⑩。后来因为端方调职而不了了之,没想到三十年后铁琴铜剑楼仍然屹立无恙,咫园却先散尽了。

著述校勘

宗源瀚纂述很多,宗舜年则仅知有《尔雅注》未刊残稿,流落在上海的旧书肆中,民国二十八年(1939)由潘承弼无意中发现,在字里行间见到舜年自署的名字,才确定是故人遗著而不惜重价收藏,并跋称:“斯注汇订前儒之说而折衷之,旁征曲引,务使会通其义,而又不埋没前说,集解之业,允当无愧。”^⑪宗惟恭撰有《癖泉书室所藏泉币书目》,收录他自己的收藏,分图像、文字、题跋、杂著四门,连同附录的外国著述共一百一十九种,民国二十三年(1934)印行。宗舜年曾辑印《咫园丛书》,收录乡贤遗书,但付刻三种后病卒,惟恭续刻两种,因对日抗战爆发未及印行,民国三十七年(1948)上海合众图书馆获其板片,为之印行传世^⑫,近年来大陆又再度翻印。

^⑨ 叶景葵,《卷龠书跋》,页87-88,《愧郑录》。

^⑩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抄》,记一三,叶55,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⑪ 同注⑥,页17-18,《宗子岱先生尔雅注残稿》。

^⑫ 端木艺,《古籍丛书整理三则》,《南通师专学报》,第十一卷第四期(1995年12月),页102-103。

张元济涉园

生平简历

张元济，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生于清同治五年（1866）九月二十八日。他的父亲张森玉，字云仙，号德斋，县学生，捐官历任广东会同、陵水二县知县。张元济幼年随宦在外，十四岁才回海盐，光绪十年（1884）入县学为生员，十八年（1892）中壬辰科二甲进士，同榜有蔡元培、叶德辉等人。张元济选授庶吉士，二十年散馆后改分刑部主事，翌年考充总理衙门章京。这时他的思想转变维新，与陈昭常、张荫棠等在京开办“通艺学堂”，教授英文数学，又协助《时务报》在京的发行工作。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诏定国是后，张元济由德宗召对一次，他面奏请实行新政，另上折建议新政总纲五条、细目四十条，并奉命搜集新学图书进呈德宗阅读；八月慈禧太后政变，张元济奉旨革职永不叙用，即南下上海，应南洋公学聘请管理该校译书院。



张元济像

光绪二十八年（1902），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并筹设编译所，介绍蔡元培担任所长，不久蔡氏离职由张元济自任，主持中小学堂各种教科书的编

辑。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二月,诏旨开复张元济原官;三十二年(1906)八月,又经学部派往国外考察学制,三十三年(1907)七月,朝旨授他邮传部左参议而不就,同年十一月浙江教育会推举他为会长;宣统二年(1910)五月,学部在京师召开中央教育会议,奏派张謇为会长、张元济与傅增湘为副会长。会议结束时他发起组织全国性教育团体,定名“中国教育会”,以谋全国教育之发达与改良为宗旨,他并被推为会长,张謇与伍光建为副会长。宣统三年(1911)袁世凯内阁成立,十一月初任命他为学部副大臣,仍辞不就职。

民国以后,张元济专一经营商务印书馆,担任经理职务,曾于民国四年(1915)赴欧美各国考察及联络出版事业。九年,他因和创办人之一的高凤池不合,二人先后辞职改任督导性质的监理,商务也由各部门经理制改行总经理制。十九年(1930)商务召开董事会,张元济当选董事长,以后蝉联至病卒为止。他参与、主持和督导商务印书馆将近六十年,使商务从草创初期的印刷业,蜕变成编译、印刷、发行一贯的出版事业,以协助教育、传播文化为经营宗旨,从而奠定中国最大规模出版机构的基础,与清末民初教育和学术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民国三十七年(1948)三月,中央研究院首次选举院士,张元济因为“主持商务印书馆数十年,辑印《四部丛刊》等书,校印古本史籍,于学术上有重大贡献”的原因而当选,在当年九月举行的第一次院士会议揭幕典礼上,他当众发表反对内战、主张和平以从事学术研究的演说^①。

一九四九年九月,张元济自上海前往北京参加中央政治协商会议,十二月初获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并曾任上海第一、二届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上海市文史馆馆长、第一届全国人代会代表等职。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他在商务印书馆工会成立大会上不幸中风,最后的十年都卧病在床,直到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四日逝世,年九十三岁。

^① 《大公报》,民国三十七年九月二十四日,第二版。张元济,《张元济诗文》,页226-228,《在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会开幕式上致词》(1948年9月23日)。

涉园藏书

张元济出身于读书和藏书世家，“涉园”一名起自明末他的十世祖张奇龄（字符九、号大白，万历举人）的书斋命名^②；九世祖张惟赤（字君常、号螺浮）是清顺治朝进士，继承父志将涉园辟建成海盐当地的林泉胜地，并开始着意搜藏图书。绵延数代之后，到乾嘉之际元济的六世祖张宗松（字楚良、号青在，监生）一辈时，藏书之富达到颠峰，除家族公有的涉园旧藏外，兄弟九人中至少有六人以藏书著名，以张宗松自己的“清绮斋”为例，其书目所载共一千五百五十九部、一万余册，其中宋元刊本五十部、抄本二百九十部。张宗松和当时江南著名的藏书家黄丕烈、吴騫、鲍廷博等往来借书校勘，还曾刊刻《王荆公诗注》等四部书^③。

张氏一门在道光朝后较为中落，公有的涉园藏书先售于苏州书肆，各房所有的清绮斋、芷斋、研古楼、坚斋等藏书，也先后相继散亡，连《清绮斋书日》都沦落到僧院的破纸篓中；接着太平天国之役，涉园名胜毁于兵燹而告荒废，园中所存刻书板片也荡然无存，数世盛业就此化为云烟，以致光绪末年叶昌炽为历代藏书家撰写《藏书纪事诗》时，虽根据一些零星资料录有张氏涉园一首，却因不详其人而列入无考者之列，到宣统中经张元济函告家世后才重新补撰。叶昌炽为张氏写的纪事诗如下：“盐官城畔螺浮宅，月落乌啼唤奈何。欲续清河书画舫，图书松下已无多。”^④

从上述可知，张元济虽承继了涉园之名，却没能承继涉园之书。他后来收藏的每部书，都是自己一手获得的；不但如此，张元济又努力收回先人旧

^② 顾廷龙为祝贺张元济九十生辰，于1956年辑印《涉园序跋集录》一书，台湾商务印书馆于1979年照本翻印，抽去顾廷龙后记而加进王云五跋文，王氏或不知涉园之名远承自明末张氏先祖，于跋文中但凭己意揣测张元济命名之意。

^③ 这四部书为：《王荆公诗注》、《带经堂诗话》、《词林纪事》、《初白庵诗评》等，见《涉园序跋集录》，页149。

^④ 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四，《张惟赤等》。

藏,只要得知书市中出现钤有涉园印记的书,便不惜高价购回,各地好书的朋友如傅增湘也经常在北平代他留意,日积月累的结果,竟也陆续收回五十二部之多,包括辗转落入于右任手中再售出的《荀子》、《庄子》两部宋刊本^⑤。这些重返涉园的书,最早可溯至他的八世祖张皓(字雪渠、号皜亭,康熙举人)旧藏。

张元济因爱家而爱乡,数十年中搜罗海盐及嘉兴府地方文献极多,抗战时他和叶景葵等人在上海创办合众图书馆,为率先提倡,即将这些家乡文献全部捐入图书馆,包括三部分:嘉兴先贤遗著四百七十六部、海盐先贤遗著三百五十五部、涉园先世著述刊印及旧藏一百零四部,共是九百三十五部、三千七百九十三册。合众图书馆编成《海盐张氏涉园藏书目录》,叶景葵在序文中认为这等于是一部嘉兴艺文志了,又说如果人人效法张元济从自家做起,用心搜罗乡里文献,联家而乡,联乡而县而省,则积小成大,化零为整,全国图书文献何患不备?

地方文献之外,张元济收藏的古本秘籍不少,尤其嗜好宋本,原因是“固重其去古不远,亦爱其制作之精善,每一展玩,心旷神怡”^⑥。张元济曾为专收藏宋本的潘明训(宗周)代撰一部《宝礼堂宋本书录》,书录前他的一篇长序至今还是讨论宋本版刻印刷的圭臬,但他却不曾为自己涉园中的宋本汇编目录,因此除了收入《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等的部分外,难以确知他究竟收藏多少部宋本书。目前台湾所藏已知曾经张元济旧藏的宋本,是“中央图书馆”的写本《宋太宗实录》、黄庭坚的《山谷琴趣》、欧阳修的《醉翁琴趣》、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权德舆的《权载之文集》等几部,数目虽不多,却每部都是连城般珍贵。

^⑤ 张元济,《涉园序跋集录》,页162,《荀子》。

^⑥ 同上注,页150-156,《宝礼堂宋本书录序》。

涵芬楼藏书

民国二十年(1931)以前,商务印书馆附设的东方图书馆,是全国规模最大的一所私立图书馆,前身为张元济自光绪三十年(1904)手创的“涵芬楼”,以善本古籍与方志享誉学术界;到民国十四年(1925)时经王云五建议,与商务编译所的其他中外新书并成一处,改称“东方图书馆”,以藏书之多与公开阅览闻名全国,但不久在二十一年(1932)初毁于日本发动的淞沪事变中。

张元济最初加入商务后,提出筹设藏书楼供编译所同仁参考,以期提升出版水平的建议,计划以八万元收购著名的陆氏“皕宋楼”藏书^⑦,不料日本岩崎财阀开出更高价的十万元,使中国四大藏书家之一的皕宋楼,变成东瀛汉学重镇的“静嘉堂文库”。张元济继续努力,经同年好友蔡元培的介绍,收购蔡的绍兴同乡徐氏“镕经铸史斋”五十余橱藏书^⑧,成立涵芬楼;接着吴县蒋氏“秦汉十印斋”、太仓顾氏



商务印书馆之东方图书馆

“腴闻斋”散出的书,也大都由张元济网罗入涵芬楼。民国初年因为获得几个重要的大藏家:盛昱“意园”、端方“匋斋”、丁日昌“持静斋”、缪荃孙“艺风

^⑦ 张元济,《张元济诗文》,页240,《东方图书馆概况缘起》(1926年)。

^⑧ 蔡元培与徐氏、张元济及商务三方面都有交谊渊源。他从光绪十二年(1886)起在徐家读书校书,长达五年之久;光绪十六年(1890)入京会试,十八年(1892)补行殿试,成为张元济的同年,又同选庶吉士,散馆后蔡点翰林,张改分部主事;戊戌政变后张被黜出京,蔡也请假返绍兴,任徐氏所办中西学堂监督;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两人成为上海南洋公学同事;张元济加入商务后,推荐蔡元培任编译所所长。

堂”的善本不少,加上张元济屡次从北京书肆购回及在上海陆续收得的书,于是涵芬楼在商务的雄厚财力和张元济的主持擘画下,崛起为上海有数的藏书楼。

张元济自己有涉园藏书,又为商务印书馆经营涵芬楼,其间分际必须不相混淆,才不致遭人物议,这可举一部《宋诗钞初集》为例说明他的态度。当初他为涵芬楼购入第一批徐氏镕经铸史斋藏书时,已发现其中有这部曾经涉园先祖旧藏的书在内,上面还有他六世祖不少的手泽,张元济当然极渴望收回,但因书属商务公有而罢;事隔多年后,他偶然在书肆中又发现一部同样的书,而且还是自前一部抄录的,当即买下并向商务同仁商换其先祖旧藏。这件事始于公私分明而终于情理兼顾,他感叹地说:“吾家旧物,先人手泽,经百数十年流传于外,而复能为其子孙所有,岂非冥冥中有呵护之灵耶!”^⑨

涵芬楼并入东方图书馆以后,仍继续不断地收藏善本。民国十五年(1926),上海富商兼大藏书家蒋汝藻(字梦莘,吴兴人)因为事业失败,其“传书堂”(密韵楼)典押于浙江兴业银行的藏书,辗转流入涵芬楼,这批曾由王国维费数年之力编撰书志及校勘过的珍籍^⑩,成为涵芬楼历来最重要的收藏之一。到民国二十年(1931)时,涵芬楼(即东方图书馆的善本部)共藏三千七百四十五部、三万五千零八十三册善本,其中宋版一百二十九部、元版一百七十九部;此外,还有二千六百四十一部、二万五千六百八十二册的方志,在当时仅次于北平图书馆,高踞全国第二位。以上并不包括涵芬楼最后整批收入的江阴何氏“悔余庵”四万册,因这批书才于民国二十年(1931)由张元济亲赴扬州购得并押运返沪,尚未全部整理。翌年初淞沪事变爆发,炮弹炸毁商务印书馆与东方图书馆的五十余万册图书,也炸毁了张元济多年心血经营的涵芬楼,“战事至烈之际,飞灰漫天,残纸堕地,无一非吾商务

^⑨ 同注^⑤,页264-265,《宋诗钞初集》。

^⑩ 王国维自民国八年(1919)至十二年(1923),应蒋汝藻之聘为编藏书志,详情参见王德毅,《王国维年谱》,及本书“蒋汝藻传书堂”部分。

印书馆之书。”^①张元济寥寥数语，道尽近代图书文献的一大灾厄。

事变发生前，张元济已觉得环境的不安，为保护得来不易的图书，自民国十六年（1927）起，已陆续将珍本移藏公共租界的金城银行保险库中，但也只五百四十七部、五千三百余册而已，其中有宋版九十三部、元版八十九部。涵芬楼被毁不久，张元济即就这部分存书编写《涵芬楼烬余书录》四卷，但迟至一九五〇年才整理旧稿而于次年出版，书录中五百多部珍本也在一九五一年让售于北京图书馆，其中《永乐大典》二十一册算是捐献。

淞沪事变第二年，商务组织“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计划每年从盈余提拨的公积金内，以三分之一专做恢复图书馆的准备。这个委员会由张元济担任主席，他个人并捐出一万元^②，可是迄今东方图书馆的复兴始终没能实现。

校印古书

张元济的两大贡献，一是主编学校教科书，供给清末兴办新教育的亟需；一是校印善本古籍，协助民国以来的学术研究。教科书有其时代性，学术用书则可历久不朽。他校印传布古书的三项目的是：一、抢救文化遗产，以免亡佚；二、解决学者求书之难，满足阅读需要；三、汇集善本，弥补清代朴学家未成之业^③。张元济辑校印行的成套古书，先后有《涵芬楼秘籍》十集、《四部丛刊》三编、《续古逸丛书》、《道藏》、《续藏经》，以及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其中尤以《四部丛刊》和《二十四史》的印行，是张元济最杰出的成就。

《四部丛刊》从民国八年（1919）起，以涵芬楼藏书为基础，纠合借印二十五位著名公私收藏家的善本，就经史子集四部中切合实用的书，选择最精良

^① 同注⑤，页131-132，《大清一统志》。

^② 王云五，《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页474。

^③ 顾廷龙，《顾廷龙文集》，页552，《回忆张菊生先生二三事》。

的版本,以影印存真的方式广为流传,并藉以保存古书。张元济在托傅增湘转向李盛铎借书影印时说:“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致因时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能使古书多流传一部,即于保存上多一分效力,吾辈秉烛余光能有几时,不能不努力为之也。”^⑭《四部丛刊》初编在民国十一年(1922)出版,收书三百二十三种,装成二千一百册;《续编》和《三编》相继在民国二十三、四年(1934、1935)出版,共收书一百五十四种,装成一千册;《四编》虽已辑成,却因抗战缘故只印行两种。

《四部丛刊》与《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同被认为是明代以后六百年来纂辑文献的四大书^⑮。但《四部丛刊》除了规模庞大之外,张元济用于辨析版本、校勘异同、考证真伪的精神更多,这需要精湛博通的学养功夫。许多书后都附有他的跋文或校勘记,同时在编印过程或再版重印时,如发现一书有更好的版本,即予增补或调换,需要毁弃原版重制也在所不惜,因此这部丛刊颇受读者欢迎,初编计划发行的一千五百部,在出版前已经预约至只剩数十部,以后除再版外,在台湾又经影印,但内容和版式都已更易。

百衲本《二十四史》原来计划包含在《四部丛刊》内,后来单独刊行。因为是集合各种不同版本的历代正史,而每一史往往又以两种以上版本配成,所以称为“百衲本”。这些版本也由张元济向国内及日本的公私藏家商借,其中有十五种宋本、六种元本,“遵古影制”的气势似乎不可一世^⑯。其实有的古本漫漶垢蔽,不堪卒读,尤其是自《宋书》至《周书》的所谓宋蜀本“眉山七史”为甚,影摄后的底版非经过繁复费事的描润手续不可,张元济订下严格精密的程序,毫不放松地要求工作人员照办^⑰,因此从民国十九年(1930)

^⑭ 张元济、傅增湘,《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页145。

^⑮ 郑鹤生、郑鹤春,《中国文献学概要》,页204-205。

^⑯ 十四史中,除《旧五代史》用辑《永乐大典》本、《元史》用明刊本外,前二十二史所据底本非宋即元。《旧五代史》一书,张元济曾登报征求金刻本,虽有线索而终无所获,详见《涉园序跋集录》,页91-94。

^⑰ 同注⑦,页247-250,《记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描润始末》(1933年)。张元济,《张元济书札》,页211-212,220-222,233,242,245,《致丁英桂》(第26,60,63,114,157,171函)。

开始从事,直到二十六年(1937)才完成出版,装订成八百二十册。读者见到的是描润后字迹清朗的影印本,但如和原本两相对照,任谁都会惊诧于不能兼容的存真与描润两者,竟能达到“矛盾统一”的地步,这也只有张元济的热忱和他主持下的商务印书馆才能如此,出版界是再没有像他这般对人对己的了。

学术成就当然不是单凭热忱便可获致的。张元济在辑印的同时,就每一史的版本异同写有要旨跋文,并逐页逐行读校和笔记,先后完成多达一百余册的校勘记,民国二十七年(1938)印行的《校史随笔》,其实还不到全部校勘记原稿的十分之一。傅增湘推崇他的成就,足与清代著名的两位史学家:撰著《十七史商榷》的王鸣盛和《廿二史考异》的

钱大昕先后辉映,张元济的校印工作正如王鸣盛自为期许的:“予任其劳,而使人受其逸;予居其难,而使人乐其易。”^⑬而任劳任怨的张元济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其实也就是学术界对他的贡献的肯定!

宋遼陽坊刻史余所見有潤芬植之史
記德化李氏之前後漢書及晉書日本
圖書寮之三国志常熟瞿氏之清書北
史新唐書吳興陸氏之史江蘇傅氏之
代史元華法行款皆与此同惟南史未見耳
瞿氏清書亦殘闕此世初印可寶也

壬申古夏海鹽張元濟識

张元济题跋墨迹

(“中央图书馆”藏)

^⑬ 傅增湘,《校史随笔》,《序》。

董康诵芬室

生平简历

董康，字授经，号诵芬室主人，生于清同治六年（1867）三月二十二日。祖父董本仁，山东观城知县，随僧格林沁剿捻有功，保升知州；父亲董介贵是县学生员，但在董康未满周岁时去世。董康二十岁入县学，二十二岁中式乡试举人，二十三岁（光绪十五年〔1889〕）己丑科会试连捷，未应朝考殿试，翌年补考成进士，授职刑部主事。

光绪十八年（1892），董康丁母忧回里，服满后入湖北布政使同乡恽祖翼（崧云）幕中，不久恽调往浙江，董康则转赴上海，进入《时务报》与梁启超共事；光绪二十三年（1897），又与赵元益（静涵）等共创“译书公会”，以翻译东西洋实用书籍为宗旨。戊戌政变后董康入京复职，庚子拳乱时，他留在京师办理协巡公所维持治安，并晋升员外郎、郎中。光绪二十八年（1902），董康经沈家本奏调为法律馆纂修兼京师法律学堂教务提调，派赴日本调查司法，延



董康像（董申宝先生提供）

聘日籍教授。光绪三十三年(1907),他再度经沈家本奏调为大理院推事,宣统三年(1911)十一月晋升刑庭推丞。

清室退位后,董康避往日本京都。民国二年(1913)返华,不久开始活跃于北京政坛,先应司法总长梁启超邀请,担任司法编查会副会长,继而就任大理院院长。从民国三年(1914)起的十年中,他四度回任大理院院长,其间又历任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委员长、修订法律馆总裁、司法总长、财政总长等职务,以查办前任财长张弧发行公债舞弊案轰动一时,旋即辞职赴欧美考察。返国后在上海执业律师,民国十五年(1926)被推聘为上海法科大学校长,二十一年(1932)应聘担任司法行政部法官训练所所长,二十四年(1935)起担任北京大学教授。



董康与家人合影(董申宝先生提供)

抗战爆发后,华北伪政权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底成立,董康不顾千秋大义,出任临时政府委员、司法委员会委员长、最高法院院长等职务。二十九年(1940)三月底由国民政府下令通缉。抗战胜利后被捕,因病保外就医,民国三十七年(1948)五月四日病死北平家中,年八十二岁^①。

诵芬室藏书

董康在官场、法庭、杏坛以外的书堆生涯,大致可分为清末光宣时期的

^① 1948年5月5日上海《新闻报》引中央社电讯,谓董康死于四日;同日天津《大公报》谓死于三日;同日天津《益世报》亦谓死于四日。

收书藏书与民国以后的刻书印书。董康自早年任官刑部后,经常流连厂肆搜访旧书,曾以仅只八元的廉价,获得法式善(梧门)手抄的《宋元人小集》八十册,被叶昌炽羨叹为“书痴有此奇遇,不觉令人生妒心!”^②董康搜书以宋元及明嘉靖以前的古本为主,辛亥革命期间,他买到恭王府及定王府流出的一些宋版书,让傅增湘大为欣羨,赶忙自天津入京寻访,还说:“书肆久无人过问,自绶金(董康)得利,皆勃然而起。”^③到民国五年(1916),董康又发现一部数百年来未见的宋代周密《草窗韵语》六卷,但这部秘籍二千元的高价,让书痴没有再度的奇遇,结果辗转为上海的富人藏书家蒋汝藻所得,蒋氏得

到这部被沈曾植等人惊叹为“尤物”、“妖书”的宝贝^④,大喜之余,又将其“传书堂”重新命名为“密韵楼”。

诵芬室藏书的另一着眼,是一向被学者君子摒于大雅堂之外的民间戏曲小说,自从晚清民初的董康、王国维、吴梅等人,开风气之先注意及此以后,各类民间文学逐渐为人重视,再由适逢其会的白话文学运动推波助澜,这些“小道”的研究形成普遍的现象。如今,单从台北中央图书馆的善本藏书中,至少可见到十部以上曾经董康诵芬室旧藏的戏曲,如李卓吾批评《幽闺记》、《浣纱记》、《孔夫子周游大成麒麟记》、丽句亭评点《花筵赚乐府》等等,都是董康于民国二十年(1931)时让售给北平图书馆,在抗战中

宋時通俗小說盛行請陸務觀夕陽古道一絕可想見其風尚顧世所傳者一為士禮居本之宣和遺事一為藝風老人所刊之殘本通俗小說是否錄自宋槧待考也此五代平話清內閣大庫物微有殘缺曾在元和曹君直處見之借以覆梓久已馳名藝苑今為穀孫世兄所得雖似宋元間麻沙坊刻而筆力樸茂其為宋槧無疑近數十年傳奇小說珍秘過於四部則是書之值可知矣丙子夏日昆陵董康識



董康题跋墨迹
（“中央图书馆”藏）

②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抄》,记九,叶22,光绪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③ 张元济、傅增湘,《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页1-2。

④ 同注②,记一六,页66-67,民国六年四月十五日。

随大批善本古籍运藏美国,而在一九六五年运回台湾,由台北中央图书馆保管^⑤。辗转万里,睹书思人,有如胡适所说:“董先生是近几十年来搜罗民间文学最有功的人。”^⑥

辛亥革命后,董康避往日本时,诵芬室历年藏书也随身携往。他和罗振玉、王国维都客居京都,罗振玉得天独厚,优游自在,王国维也得其荫助,董康却没有他们两人的境遇,在食指嗷嗷下,本拟开设书肆营生,不知何故没有实现,只好将部分藏书让售给日本巨富大仓氏以维持生活。民国二年(1913)底,董康将剩余的精本载返上海,又让售给几个新崛起的藏书家,如宋刊本《吴郡志》经缪荃孙介绍,以八百元让给刘承幹的“嘉业堂”,宋刊本《东都事略》也让给张钧衡的“适园”等等,可想见董康以书易米时的怅惘。此后他之所以由藏书转而偏重刻书,“以影印异书为唯一职志”^⑦,期能广为流传,嘉惠天下寒士,应当与他在民国成立前后售书解窘的遭遇有关。

刻书与著述

诵芬室藏书不及刻书印书著名。光绪三十年(1904)以前,董康已陆续有些刊刻,而使他一“刻”惊人的书,则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日本汉学家岛田翰撰的《皕宋楼藏书源流考》,这书是岛田在促成“皕宋楼”售给岩崎氏后,写好从日本寄请董康刊行的,结果震惊全国学术文化界,无不痛悼名列海内四大藏书家的“皕宋楼”一去不返。董康自己也长叹古籍流落异域,反不如自来虽遭无数水火兵灾,至少其魂魄还能长守故土^⑧!

董康既致力于刻书,便在北京烂漫胡同法源寺的寓所内,以每月收入的三分之一,长期雇养一批“手民”,三十年中先后刻成《诵芬室丛刊》等三十

^⑤ 这些戏曲及自美运回的前北平图书馆善本,已于1984年由“教育部”下令转交台北“故宫博物院”接收。

^⑥ 胡适,《书舶庸谭序》。

^⑦ 董康,《书舶庸谭》,卷一上,民国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⑧ 董康,《皕宋楼藏书源流考题识》。

孟宪钧

武進涉園陶
氏鑑藏明板

書目

董康題



董康亲笔题签
(孟宪钧先生提供)

余种,并有余力为吴昌绶“双照楼”、陶湘“涉园”、蒋汝藻“密韵楼”等家代刻。在传统木刻之外,董康也从事新兴的影印和活字排印,影印的书他大都寄到日本,由小林忠次郎制版。董康与小林的这段异国友情却交非泛泛,不只生意来往而已,民初董康只身由日返国时,留在京都的眷属便托小林照顾,以后两家往返音问的亲密情况,可以从董康在《书舶庸谭》一书中的描写得其梗概,他形容自己与小林的感情为“文字因缘固有胜于骨肉亲知万万者”^⑨。

至于铅版活字,民国以后大行其道,传统的雕版木刻无论在时间或费用上都无法相与竞争,因而逐渐式微。董康眼见大势所趋,虽

难忘情刊刻,却也只有“舍弃诵芬室雕板故业,而从事仿宋活字之新生活”^⑩。事实证明董康对于这项新生活适应得快又独到,在收藏方面,他不惜以傅增湘叹为“奇昂”的三千元重价^⑪,购藏一部明代无锡华燧所印《会通馆校正宋诸臣奏议》,这是已知中国最早的铜活字印本。在印刷方面,董康更独特的为求讲究宋体字的真面目,不愿采用市面一般毫无古意的铅字,竟不惜将所藏的《龙龕手鑑》与《广韵》两部字书拆散,做为铅字的字范,毁书为印书,不知他人也有这么做的没有?

董康一生精研理智性的法律与情感性的文学,他的著作也都在此两端。法律方面编撰有《秋审制度》、《集成刑事证据法》、《中国法治史讲演录》、《民法亲属继承两编修正案》等。董康在伪司法委员会发行的《司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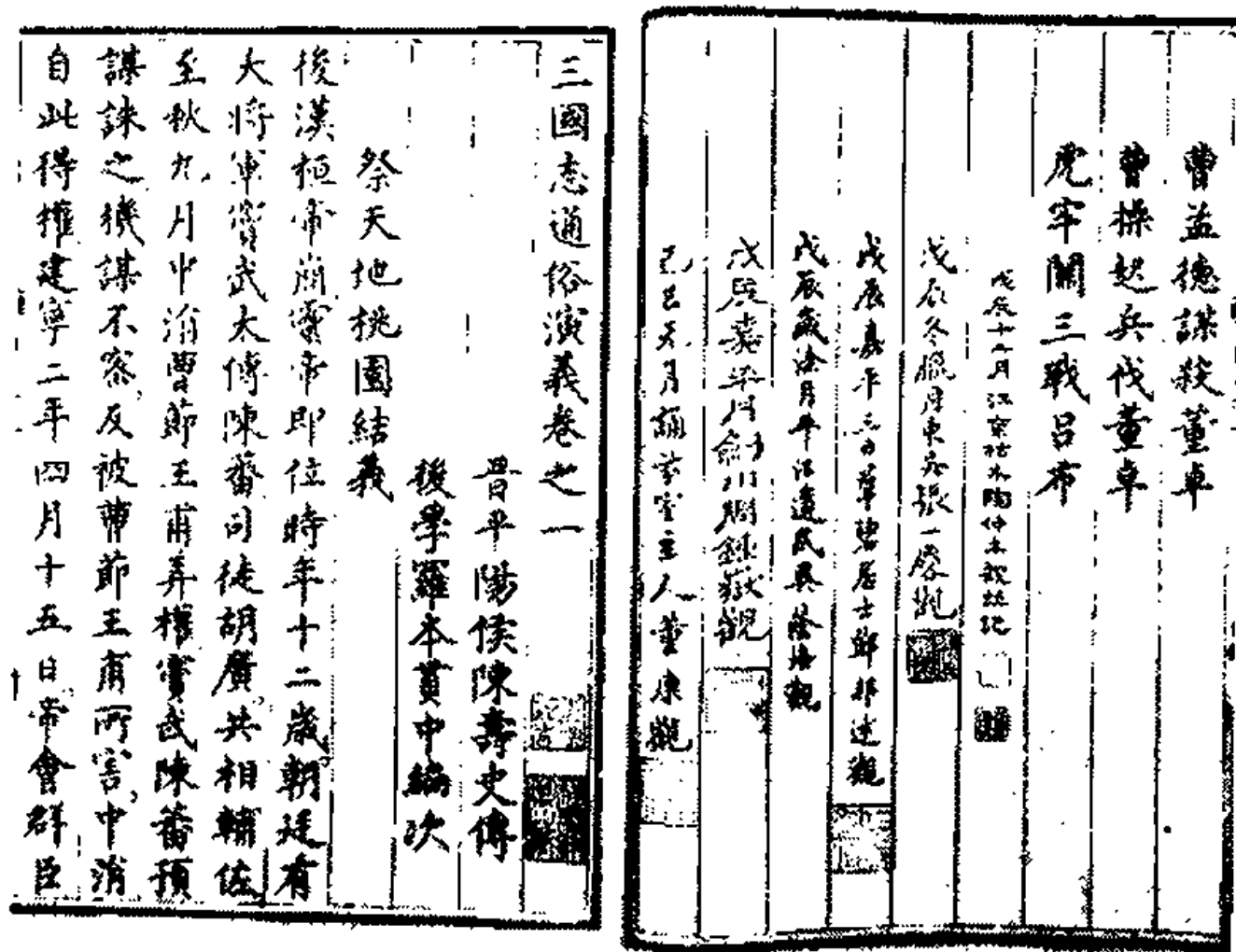
⑨ 同注⑦。

⑩ 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补编》,页286-287,董康,《创制仿宋活字序》。

⑪ 同注③,页367。

公报》上,几乎每期都有论著发表,《司法公报》从二十七年(1938)元月至二十八年底,每月一期,内容除法规、命令等外,还有译丛与名著两栏,董康在发刊词中,说明这样的宗旨是“为学术之借镜,薪法治之日新”,立意极佳,却是一般公报少见的体例,尤其每年一期的《司法公报特刊》,分为纪事、选论、游艺三门,还有北京书肆刊登的广告,简直就是司法杂志了。这似乎可为董康自剖“鄙人之研究法律属于强制性,惟于文学一端确系自然性”一节,下一适切的脚注^⑫。

文学方面,除散见的诗词题跋,董康曾与吴梅、王国维等校订《曲海总目提要》,也曾为刘承幹编撰《嘉业堂藏书提要》稿本十九册,中央研究院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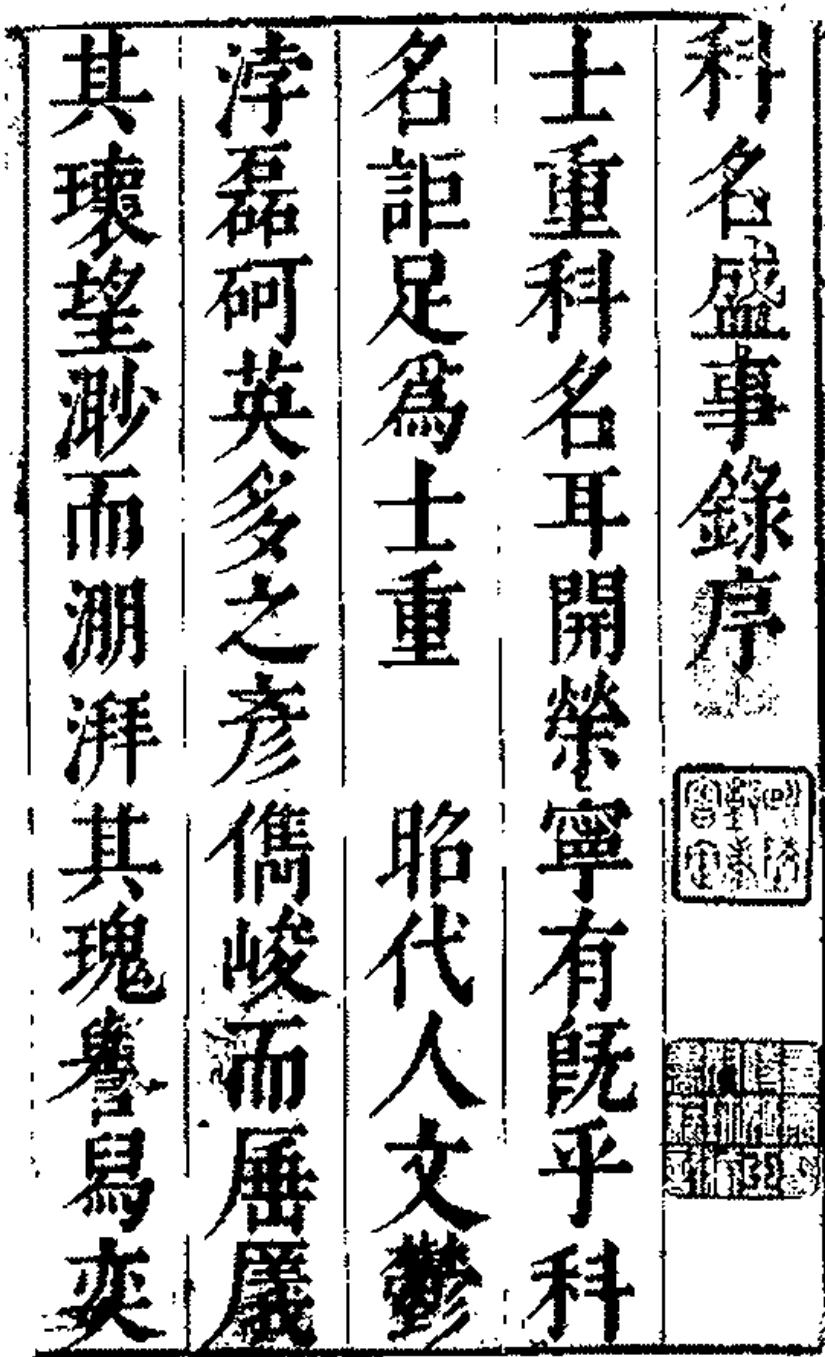
董康观款

^⑫ 同注^⑦,卷六,《晚翠軒答词》,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此系董康应日本外务省东方文化局局长邀宴答词,此处所引两句原文之间,尚有“不敢于松元博士前以法家自诩也”句。

语言研究所藏有其中明人别集部分的抄本，著录三百零八部，董康一一为之钩玄提要，考订源流，可以略窥他在版本目录的造诣一斑，董康另有《课花盒词》一卷，附在他汇刻的董氏先人词集《广川词录》之末。

董康最著名的著作为纪录他四次扶桑行的《书舶庸谭》。他先后到日本七次，最早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法律馆任内，其次是辛亥革命前后避居，第三次为民国十二年(1923)出国考察，然后便是《庸谭》一书所记，从民国十五年(1926)起十年间的第四至第七次。

第四次东渡，董康本人只隐约说是受政潮所累，其实是北伐进行中的一次插曲。原来当民国十五年革命军势如破竹时，渐感不支的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暗中勾结北方奉、鲁二张派兵南下，江苏京沪一带战云密布之际，忽然出现由江苏名绅唐文治署名欢迎北军的通电，立即又有董康等人质问唐文治的通电，以及在北京的苏籍名流庄蕴宽等为苏民请命的又一通电。唐、董二人旋即声明是他人冒名利用，但心虚的孙传芳恼羞成怒，于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下令通缉蔡元培、董康等十一人，董康不得已赶在年底前匆匆赴日避祸。这时却真是冒他人之名方得安全上船，到第二年事过境迁才回国。孙传芳绝对始料不及，他的一纸通缉令，



董康藏明刊本《科名盛事录》藏印
“毗陵董康审定”、
“董康暨侍姬玉奴珍藏书籍记”
（“中央图书馆”藏）

竟造就出一部海外访求古籍小说的《书舶庸谭》，而且每当董康再度赴日，便增加一次篇幅，由四卷增至九卷之多，且与杨守敬的《日本访书志》先后成为目录学上别树一帜的文献。

董康于服官从政外，既致力藏书刻书，又能在似不相侔的法律与文学两端，同臻精深的造诣，确足以令人佩服，可惜晚年政坛失足成恨，为他的人生败笔。不知在胜利后的狱中，每当多情的“董圣人”^⑬，忆起早年胡适为《书舶庸谭》写的序文，最末所题的小诗时，心中会如何感想？胡适的小诗如下：

一死不足惜，技拙乃可耻。

要堂堂的生，要堂堂的死。

^⑬ Howard L. Boorman, e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vol. 3, p. 341, “Tung Kang (董康)”.

邓邦述群碧楼

家世生平

邓邦述，字孝先，号正闾，江苏江宁人，生于清同治七年（1868）。他的曾祖父邓廷桢，字维周，号嶰筠，道光中任两广总督，与林则徐一同执行禁烟政策，中英战争期间调闽浙总督，战后两人获罪同戍伊犁，数年后赦还又擢至



端方(前中左)与出洋考察随员
(左二头上有箭头者为邓邦述)

陕甘总督。祖父邓尔咸,字子京,安徽候补知县。父亲邓嘉缜,字季垂,优贡生,光绪元年(1875)乡试举人,历知贵州贵筑、台湾嘉义等县,甲午战后入湖北巡抚于荫霖幕下,擢署襄阳知府,经盛京将军赵尔巽奏调东北,任锦州、奉天知府,光绪三十三年(1907)升署巡警道,光绪元年裁缺后家居,著有《晴花暖玉馆词》。

邓邦述是光绪十七年(1891)乡试举人,二十四年(1898)戊戌科进士,与傅增湘同年,也都选庶吉士,授职翰林院编修。光绪二十七年(1901)邓邦述入湖北巡抚端方幕,三十一年(1905)端方奉派为考察宪政大臣之一,邓邦述也随往周历欧美各国,翌年六月返国,参与新官制厘定工作。光绪三十三年(1907)七月,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奏调邓邦述前往东北,折中称他“品学纯粹,才识优良,于中西法政诸学洞见本原,实属经世之才”^①。这时他已从翰林京官改为分省补用道的外官。同年十一月,徐世昌又奏保他署理吉林省交涉司使,仍称他“器识闳通,才猷练达,考察各国政治极有心得”^②。宣统元年(1909)闰二月实授交涉使,二年五月晋吉林民政司使,直到宣统三年十一月六日解职为止。邓邦述与父亲同官东北数年,不论是正三品的交涉使或从二品的民政使,都高于父亲从四品的知府与正四品的巡警道,可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民国元年(1912),财政部派员周历各省考察财政事宜,邓邦述负责东三省部分。同年十二月又派为奉天盐运使,二年(1913)十一月担任海关九江关监督,兼办九江通商交涉事宜,仅数月即于三年(1914)三月辞职,改应赵尔巽聘为清史馆纂修,与金兆蕃同撰太祖至世宗五朝本纪。民国七年(1918),邓邦述被选为代表江苏的参议员,参加安福国会。民国十年(1921)以后居家吴县,景况较为困窘,曾赴南昌与南京谋事。抗战初避兵于吴县近郊邓尉山中,民国二

^① 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二十四辑,页699,《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奏附邓邦述请调东省差委片》,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十六日。

^② 同上注,第二十五辑,页125-126,《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奏陈派员试署司道各缺折》,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十八年(1939)六月逝世,享年七十二岁。

群碧楼藏书

光绪二十七年(1901)邓邦述入端方幕以后,见识“匋斋”中收藏极富的金石图籍,启发他效法的意愿。光绪三十年(1904),邓邦述在寄寓的吴县开始大量收藏,三十二年(1906)他刚从欧美返国,路经上海获得宋刊本《李群玉集》、《碧云集》两部唐人诗集,这是他收藏宋本的开始。这两部书都是黄丕烈“士礼居”旧藏,黄氏曾在《百宋一廛赋》中吟咏题珍,甚至刻有一方“碧云群玉之居”的印章。因此邓邦述得书后大为欣喜,自号藏书处为“群碧楼”。

随后一年内,邓邦述趁兴在京师搜购达一万多卷图书,一时竟成书林的新豪客,“广肆书贾,云集响应,昕夕候于门者常十数人,遇善本往往出善价而不吝,每用以自豪”^③。即使在服官东北的数年中,专程出关送书上门的书贾还是大有人在,同时只要他回到京师,“酬接之余,辄延书友,户外屦满,床上书连,乐莫甚焉”^④!可见这段期间邓邦述意气风发如何了。他开始收藏两三年后,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手编《双沔居藏书目初编》,合计五百五十九部,其中宋元本十二部、明本一百二十部,但大多数(三百六十二部)还是清刻本^⑤;又过五年后的宣统三年(1911)六月,邓邦述再度编印《群碧楼书目初编》时,为数已多到摒除清代版本不列,所收宋本八百一十六卷、元本二千七百四十三卷、抄本五千三百三十八卷、明本一万五千四百八十八卷、批校本八百四十九卷,合计约两万五千卷^⑥,这些就是他在将近十年间费银七、八万两大收图籍的成绩。

③ 邓邦述,《群碧楼书目初编》,《叙》,页1。

④ 邓邦述,《寒瘦山房鬻存善本书目》,卷四,页47,《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⑤ 潘景郑,《著砚楼书跋》,页135-136,《双沔居藏书目初编稿本》。

⑥ 同注③。

以四部言，邓邦述收藏较多的是史、集两部；以版本而言，群碧楼的两大重点是宋元古本和明代嘉靖刊本：

宋元古本：邓邦述和一般藏书家同样，都重视宋元本，他还自嘲有骨董家习气^⑦。依据他前后几次编的目录，群碧楼收藏的宋元本约各五十部左右^⑧。最珍重的除《李群玉集》和《碧云集》外，民国初年又经傅增湘撮合，辗转自张元济手中获得一部杨守敬自日本带回的“唐李推官《披沙集》”，这三部书都是唐人小集，也同是南宋临安府陈宅书籍铺刊印的所谓“书棚本”，而且三位作者都姓李，由于这些巧合，邓邦述又将藏书处命名“三李龕”，并且刻了一方“披玉云斋”的印章，隐然有突过黄丕烈的意味。这三部书目前都在南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图书馆中，开卷可见满篇历代藏家的各式印记和题跋观款等等。

嘉靖刊本：明人刻书往往不能忠于原著，因此一向有刻书而书亡的说法。比较起来，明代各朝以嘉靖间的刻工还算有规矩法度，所以在宋元古本罕见难得的情况下，藏书家对于明本便以嘉靖为重，如近代的陶湘、吴梅、邓邦述三人，不约而同都以搜藏百部嘉靖刊本为目标，陶、吴两人都有“百嘉”的室名，邓

宋槧隋書禮儀志卷五一冊書中佳處公魯已詳加
考訂無待推尋此卷闌外皆紀篇目凡書有耳者亦宗
刊之碼證不特便於緝覽即版片存度亦易檢尋後人
眩事苟簡略而不刊元明錢版偶有用耳者蓋出於摹古
之心亦漸失真意矣此書將印以餉世公魯屬為題識大
兩初齋溽暑炎蒸展卷古香歎溢愜我素懷遂有北
窓偃卧養皇土人理想
辛未六月羣碧居士 邦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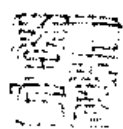


邓邦述题跋墨迹
（“中央图书馆”藏）

⑦ 邓邦述，《群碧楼善本书录》，卷一，页14，《梦溪笔谈》。

⑧ 邓邦述对宋元本的鉴定前后并不一致，例如《纂图互注荀子》、《扬子法言》、《梦溪笔谈》三书，在其宣统三年（1911）的《群碧楼书目初编》中列为元本，但在民国十八年（1929）的《群碧楼善本书录》中又改列为宋本。

宋刻梅堯翁跋印之棚本沈氏所藏我門校本^是八唐
 人集中之一余曾見之^{不查}所稱宋本以^{不查}棚本者^{不查}柳大中
 家之宋本又有至室本則不知是宋刻是明刻也此刻字
 序跋但其字體古質存墨極舊沈氏謂為洪武時刻本
 亦想像之詞然不誣也篇中批課百出証詞卷後校知
 堯翁謄為不課亦多與至室本合者知所據仍是舊
 刻惟竄易篇次不加詳校乃所人銅習自明初已後
 人更不負責耳余舊藏弘治本東野集茲得是編在
 是鄭寒島瘦之觀乃備存堯翁才矣偶一展讀
 為之狂喜不已固不必索繫名鈔然後發余慈津也
 丙寅三月友人孫伯淵為余設此於雲天山因題卷前
 四月六日小窗明淨延年碧居士記



邓邦述题跋(“中央图书馆”藏)

邦述的则称为“百靖斋”；三人各自努力以赴，结果陶湘拔得头筹，所藏超出两百以上，其次邓邦述也多达一百五十部，吴梅则似乎未偿宿愿^⑨，邓邦述在自己的书目中特别辟有嘉靖刊本专卷，以示郑重。

辛亥“国变”，阻断了邓邦述原本青云在望的宦途，连带而来的生活问题，也大有影响于他开展中的藏书事业。民国元年(1912)春，他从东北移家天津，在一时措手不及的窘况中，只好将七、八部宋刊本让售给袁克文。从这时以后，邓邦述逐步领略到他自己说过“昔者借债以买书，今且将鬻书以偿债”的滋味^⑩。一开始各家书肆还不知他的“底细”，不久也就门前冷落车马稀了。民国十年(1921)，他跋一部宋刊残本《苏文忠公文集》说：“十年以

⑨ 参见本书“吴梅奢摩他室”部分。

⑩ 同注③。

来,余为鲜民,穷且益甚,虽再有饷余古书者,固将掉头不顾,然亦竟无来饷者。”^①事实邓邦述在民国以后还是继续有所收购,只是盛况不再,也没有上门送书、移樽就教的书贾而已。例如他原藏有明弘治刊本的孟郊《孟东野诗集》,民国十五年(1926)又获得明初刊本的贾岛《贾浪仙长江集》,这时他已经“不必宋槧名钞,然后足饜欲望”了,于是便取“郊寒岛瘦”的典故,又将藏书处名为“寒瘦山房”,并题五首绝句留念。

民国十六年(1927),邓邦述为生活所迫,终于将大部分的精本求售疗贫,由蔡元培为中央研究院以五万元收购,其中包含邓邦述曾答应傅增湘“吾将抱此以没世”的《披》、《玉》、《云》三集在内。事后邓邦述就出售的图书编印成《群碧楼善本书录》六卷,存余的部分精本则另编成《寒瘦山房鬻存善本书目》七卷。大约在抗战前,寒瘦山房的书又被杭州“九峰旧庐”主人王体仁购去一批^②,剩下的在邓邦述故世后,由家属连同清刻本全部于二十九年(1940)初出售,辗转为中央图书馆在上海以五万五千元收购,总共约一千一百余部、一万五六千册之多,其中善本包含寒、瘦两集在内^③,约三百部、三千一百册左右,经手的郑振铎称为“佳本缤纷,应接不暇”^④,而这时的邓邦述正如伦明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咏他:“半生仕宦为书穷,可奈书随债俱空。”^⑤

虽然邓邦述三十余年的辛苦搜罗及身而去,还算幸运的是其中精善本并无太多的离散零落,绝大部分由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与“中央图书馆”继续珍藏,在史语所者以古刊本为主,该所约八十部宋元本中,将近六十部是群碧楼的旧藏;在“中央图书馆”的部分则以抄校本为贵,例如钱谦益、季振宜两人相继抄辑的《全唐诗》七百一十六卷,孔继涵抄校的《旧五代史》一百五十卷等等。邓

① 同注④,卷一,页9,《苏文忠公文集》。

② 叶景葵,《卷盒书跋》,页60-62,《群碧楼善本书目》、《寒瘦山房鬻存善本书目》。

③ “中央图书馆”藏有邓氏旧藏《贾浪仙长江集》及纸黯漫漶的《孟东野集》,但无《寒目》卷二、页29所称纸墨甚新、亦未漫漶的《孟集》,可能是1949年时未自南京携台。

④ 刘哲民、陈政文编,《抢救祖国文献的珍贵记录——郑振铎先生书信集》,页12,《致张寿镛》,民国二十九年四月十一日。

⑤ 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五),《正风》半月刊第二卷第一期,页17。

邦述旧藏除普通本在一九四九年时不及运台以外,以善本而言,他算是台湾地区保存较完整的少数近代藏书家之一。

校勘跋记

邓邦述在台湾地区善本中的另一特色,是经他校跋题记过的书最多,据《台湾公藏善本书目人名索引》所载,计有一百八十八部^①。由于他颇服膺黄丕烈,因此跋记的内容与黄跋近似,大都是记版本的优劣、得书经过与价格与书贾的往来等。至于校勘方面,邓邦述用力较多的是钱曾《读书敏求记》,他从光绪三十一年(1905)得到此书的一部抄本开始,到民国二年(1913)为

懋伊仍似舊時僧擬入修門謗已騰羞喜憐才韓
 吏部相連驢背作詩朋 分體應嫌失部居吉香
 猶幸挹蟬餘系張校萃流傳久信是人間未見書
 摩碧當年第一梅漫為題字是千秋藏家海內
 尊堯固不教吾人記敏求 近人以藏此書堯固題跋者為重不
 知此書向來堯固題跋亦多也余所藏本堯固
 題跋在後 野錄軒中割一函癡頑兩字未為讓祇憐集語
 爭洪亦當鼎何能便解鏡 此本通藏於虞山二乘衡益鈞千
 兩宗余友宗社名聞亦許自和余
 酷嗜遂與中一讓余而愛不贊余內兄趨末割 東野述編檢舊藏荒
 若祇仙洲口是真癡子然真知余者宗社也
 齋寒瘦一吋兼臨見初解暮秦篆小印權紅卷 鈐全舊
 藏
 東野述亦為善本僅與年六初學作
 因今錄其序一書一鈐
 前述之竟越日復心石能由記之亦備者摩碧居士

邓邦述题跋墨迹(“中央图书馆”藏)

^① “中央图书馆”编,《台湾公藏善本书目人名索引》,页962-969。

止,先后或借或购得各家版本,过录黄丕烈、劳权等人的校语,直到自己的底本“书眉纸缝,朱墨殆遍”^⑰。他的好友章钰同时也在从事《读书敏求记》的校证补辑工作,而且成就在邓邦述之上,不过章钰还是曾向他借录一部分资料才能大功告成^⑱。

邓邦述的功力都用于藏书的跋记之上,这些跋记也随着群碧楼前后几次的目录传世。其他的著述则有《群碧楼诗钞》四卷(民国十九年[1930]刊本)、《浣梦词》四卷(民国二十二年[1933]刊本),以及编辑的《六一消夏词》十八卷(民国十八年[1929]石印本),这是他与吴梅等友好合组“六一词社”的作品。另外,他每次收到善本,常有付刊流传的念头,到民国二年(1913)决定刊刻一部丛书,第一部着手的《棠湖诗稿》刻样完成后,书中黄丕烈的原跋竟然不翼而飞,邓邦述懊恨之余,事情就此中辍^⑲;以后除民国九年(1920)至十一年(1922)刻印的《群碧楼丛刻》,他似乎不再有刻书之举,这部丛刻包括邓廷桢的《诗双声叠韵谱》等五种,及邓嘉纯、邓嘉缜的词集各一种。

^⑰ 同注④,卷七,页54,《读书敏求记》。

^⑱ 章钰向他借录的如劳权校补严修能的校语,而劳校又是邓邦述于民国二年(1913)在天津抄录自李盛铎藏本者,见章钰,《四当斋集》,卷六,页4,《读书敏求记校证补辑类记又后记》。

^⑲ 同注④,卷一,页13,《棠湖诗稿》。

徐乃昌积学斋

生平简历

徐乃昌，字积余，号随庵，安徽南陵人，生于清同治七年（1869）十二月十一日^①。徐乃昌的父亲徐文选以军功官河南知县，乃昌少年时期依伯父徐文达生活^②，文达字仁山，曾提调李鸿章淮军后路粮台，办理仪征淮盐总栈，授官两淮盐运使、淮扬海道，护理漕运总督，光绪十五年（1889）晋福建按察使，入京觐见途中卒于扬州。徐乃昌监生出身，光绪十九年（1893）癸巳恩科举人，江苏候补知府，奉派办理江宁、南通厘务，署淮安知府，丁忧服阙后升候补道。光绪二十六年（1900）经外务部侍郎徐寿朋奏保人才，奉旨交军



徐乃昌像

^① 杨成凯，《南陵徐乃昌的墓表和墓志铭》，《文献》2006年第3期，页127-132。李弘毅，《稿本徐乃昌日记的文献价值》，引《南陵县文史资料》第七辑，页22-29，《江南名士徐乃昌》。

^② 王学雷，《姚孟起与南陵徐氏交游史料考》，页90。

机处存记。三十年(1904)江南遣送学生留日学习陆军、实业、师范等近百人,总督端方派徐乃昌率领赴日,并顺道考察学务。光绪三十二年(1906),徐乃昌又办理其叔父曾经手的仪征淮盐总栈,因缉私裕官有功,颇受端方器重,一年后获得端方再度奏保人才,奉旨仍交存记,至宣统三年(1911)元月始授官江南盐法道兼金陵关监督。民国成立后迁居上海,至民国三十二年(1943)三月四日病卒^③,享年七十六岁。

积学斋藏书

徐乃昌很早已开始藏书,二十岁时与缪荃孙相遇于北京琉璃厂,以弱冠而能谈书论艺为缪氏订交^④。徐乃昌积学斋藏书不分古今版本,以清人文集而言,缪荃孙自称艺风堂中虽有千种之多,但比起积学斋只是小巫而已,当民国六年(1917)徐乃昌编藏书志时,即使是清初及乾嘉时期的文集,仍因年代较近而被摒于藏书志之外;缪荃孙又详细描述徐乃昌藏书志的体例,凡宋元本如何如何。由于缪氏说自己曾尽窥此志全豹,因此颇令后人向往积学斋所藏古槧善本的美富。不过,积学斋藏书志似未刊行,而二〇〇五年影印传世的写本《积学斋书目》^⑤,有徐乃昌亲笔增补校改极多,但目录中含各丛书子目在内,总数约有七、八千部之多,却无宋元本,连明刊本也仅约一百余部而已。

徐乃昌收书五十年,积学斋也曾著称一时,但至迟于抗战期间,藏书开始流散,当时为政府在上海收购抢救古籍的郑振铎,民国二十九年(1940)几度提到积学斋售书,一次说是正洽购其批校本数十箱^⑥,另一次是徐乃昌

^③ 杨成凯,《徐乃昌卒年补说》,页16;陈福康,《徐乃昌卒年再补说》,页228。

^④ 缪荃孙,《艺风堂文漫存》,乙丁稿,卷三,叶19-21,《积学斋藏书志续》。

^⑤ 林夕编,《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近代卷,第二十五—二十六册,《积学斋书目》。此目为北京图书馆所藏;此外,尚有几部积学斋书目存世,如北京图书馆编印《西谛书目》,卷一,页50,有《积学斋藏书记》四卷,抄本三册;再据梁子涵撰,《中国历代书目总录》,页415,著录两部徐乃昌的书目,一是南开大学图书馆藏《积学斋书目》一卷,一是丁福保藏《随庵徐氏藏书志》抄本。

^⑥ 刘哲民、陈政文编,《抢救祖国文献的珍贵记录——郑振铎先生书信集》,页8-9。

欲售安徽志书百余种,包含不少孤本在内,索价一万元以上,郑振铎还以九千,结果未成交^⑦;又一次郑振铎提到徐氏所藏清人文集被北平书贾捆载而去^⑧,清人词集也被人购藏等等,几年中积学斋已片纸无存。台湾地区在台北“中央图书馆”内,偶尔可以看到积学斋的一鳞半爪,例如《闺秀词钞》三十七家、十册,是他当年刻《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百家的一部分清稿,其中有些笔迹看来还是他手抄的。再如明覆刻元版《战国策》十卷、十二册,乃昌以篆书封面并题记,书中遍钤藏印,计有积学斋、南陵徐氏、乃昌校读、积学斋镇库、徐乃昌曝书记、积学斋徐乃昌藏书、南陵徐乃昌校勘经籍记、南陵徐乃昌审定善本、积余秘籍识者宝之等九个之多。还有如宋代《宝祐四年登科录》、《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抄本《崆峒志》、《平江纪事》等约十许部,也都是

北宋官塾残本隋书一卷

是亦半葉一行十九字左邊外化漏目恒字缺避蓋真宗時官
本也吳興陸氏常熟翟氏所藏有殘本行略郡同前有天聖二
年勅遺敬慎自恒恒構等字皆缺避當是南宋遺本此為有宗第
一册未見著錄而楊墨稱絕觸手如新雖云殘缺實至寶也
公魯烟也屬題 戊辰六月南陵徐乃昌



徐乃昌题跋墨迹
（“中央图书馆”藏）

是曾经积学斋旧藏书,百不存一,既可贵又可叹!

徐乃昌绘有《随庵勘书图》,遍请知交好友题赠,如王国维题诗:“漫乙卢黄甲戴钱,北江戏语费衡铨。世间尽有洪崖骨,不遇金丹不得仙。朝访残碑夕勘书,君家故事有新图。衣冠全盛江南日,儒吏风流总不如。前有随轩后随庵,二徐焜耀天东南。海滨投老得至乐,石墨琅书共一龛。”^⑨

⑦ 同注⑥,页 250-257。

⑧ 郑振铎,《纫秋山馆行篋书目跋》,页 40-42。

⑨ 王国维,《王观堂先生全集》,册四,页 1440,《观堂别集》,《随庵勘书图》。

编纂与刊刻

徐乃昌开始藏书不久,也进行刻书,一共刻成包括一百八十五种书在内的九部丛书:

一、《积学斋丛书》二十种:光绪十九年(1893)完成,收录清代未刻著作,包含他自己的《南陵县建置沿革表》一卷。

二、《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百家:光绪二十二年(1896)完成,收清朝女子词集,分十集、每集十种,卷帙过少者另汇成词钞十六种。这是一部较特殊的丛书,他为此绘有《小檀栾室勘词图》手卷留念。

三、《鄮斋丛书》二十一种:光绪二十六年(1900)完成,收的仍是清代著述或辑佚,包括徐乃昌的《续方言又补》二卷、《后汉儒林传补逸续增》一卷、《焦里堂先生轶文》一卷等。

四、《随庵徐氏丛书》十种:光绪三十四年(1908)完成,收录宋元本。

五、《怀幽杂俎》十二种:宣统三年(1911)刻成,以他的师友诗词稿为主,包括文廷式的《云起轩词钞》等。当时徐乃昌正担任江南盐法道,道署中有“怀幽园”,即以为书名。

六、《随庵所著书》四种:民国四年(1915)汇印,包括《鄮斋丛书》中他辑撰的三种,加上新辑的《皖词纪胜》一卷。

七、《随庵丛书续编》十种:民国五年(1916)刻成,收录的十种全是他从瞿氏铁琴铜剑楼借到的宋元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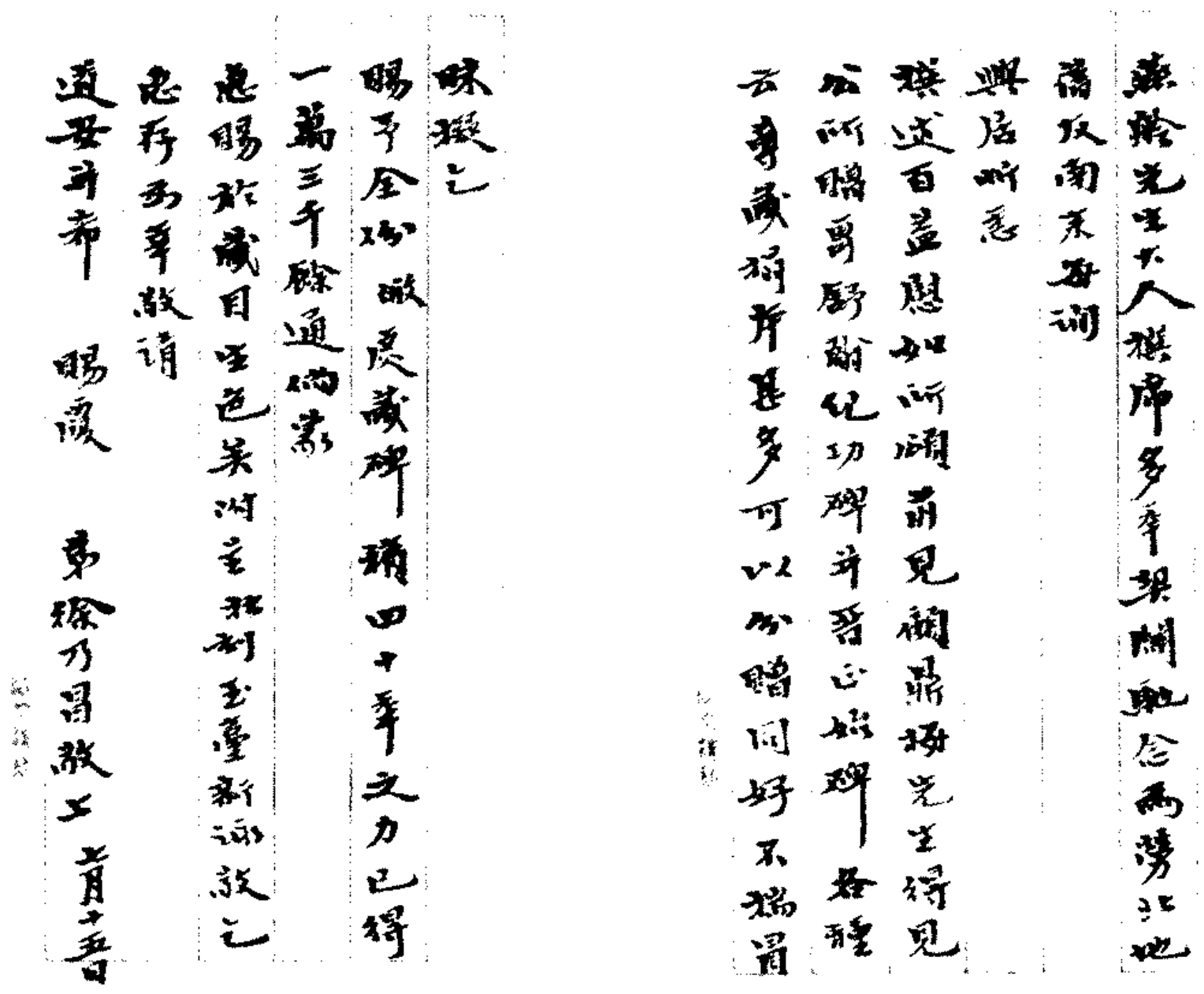
八、《宋元科举三录》:民国十二年(1923)刻成,收录积学斋所藏宋《宝祐四年登科录》、《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元代《元统元年进士录》三种,以影刻方式刊行。

九、《南陵先哲遗书》五种:民国二十三年(1934)完成,根据清代南陵乡贤著述刊本影刻。

以上九部丛书,加上他另外单刊的《玉台新咏》、《徐公文集》等十余种,

总数超过两百种，徐乃昌可算是近代以一己之力刊刻图书最多的人之一。

徐乃昌除编撰《积学斋藏书志》以外，也为他收藏的金石古器物编有《随庵吉金图录》、《小檀栾室镜影》六卷、《镜影楼钩影》一卷，以及《至圣林庙碑目》六卷、《积余斋集拓古钱谱》、《积余斋金石拓片目录》等，王国维颇推荐



徐乃昌致柯昌泗书札之二

徐乃昌致柯昌泗书札之一

(孟宪钧先生提供)

徐乃昌以图录传古的功劳^⑩。其实徐乃昌收藏图书与金石两者齐名，也普遍为人称道，因此朋好在他过世后的悼念诗文中都是两者并举，例如张寿鏞的挽诗：“拥书百万拟王侯，尔雅文章第一流。白鹤朱霞标妙格，桓碑彝器久旁搜。丹铅岁月郡斋晷，雠校功夫中垒刘。盐荚江南何足道，长悬镜

⑩ 同注⑨，册三，页1138-1141，《观堂集林》，《缀林》一，《随庵吉金图序》。

影照高楼。”^①

民国三年(1914),南陵县长余氏进行修志,徐乃昌应邀主持全局,到民国十三年(1924)完成《南陵县志》五十卷刊行。他和叶昌炽自从光绪十九年(1893)在北京相识后,缔交二十余年^②,辛亥革命以后叶氏誓不食周粟,就在乃昌出而主修县志的同时,上海县也决定修志,叶氏本有意应聘为总纂,却以聘书系民国县长署名而作罢。就目录学的个人造诣而言,叶氏一代宗师,乃昌自有不及;但如就传存文献千古事而言,徐乃昌的心胸和作为,却较叶氏宽广而积极多了!民国十九年(1930),徐乃昌又应聘为《安徽通志》总纂,并撰写《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十七卷、影版一卷。民国二十年(1931),徐乃昌与安徽同乡在上海组成“安徽丛书编审会”,编印乡邦文献传世,五年中影印出版《安徽丛书》六期,三十种。

^① 张寿镛,《约园杂著三编》,卷八,叶8,《挽徐积余》。徐乃昌所藏金石拓片一万余张,据说在1949年后辗转归于上海华东师大图书馆,见周退密、宋路霞,《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页14。

^② 据叶昌炽日记所载,他和徐乃昌相识于光绪十九年(1893)三月十四日的江标宴会之上(《缘督庐日记抄》,记六,癸巳,叶59)。以后两人迭有来往,民国二年(1913)五月十一日,他们还在上海一同参加缪荃孙主持的黄尧圃一百五十岁生辰聚会,欣赏各与会者所藏的黄氏旧籍(《缘督庐日记抄》,记一五,癸丑,叶11)。

丁祖荫湘素楼

生平简历

丁祖荫，字芝孙，号初我，江苏常熟人，生于清同治十年（1871）。丁祖荫是县学生员，少年就读江阴南菁书院，光绪二十年（1894）以后，联合同志在乡里提倡新学，设立“中西学社”，主编《女子世界》，又独立创办丁氏小学。宣统中被选为江苏咨议局议员，民国后当选江苏临时省议会议员。

辛亥革命时，丁祖荫居丧上海，经乡人公推为常熟民政长，返乡就职。民国二年（1913）调长吴县，以安定地方、兴办教育、修浚水利为施政重点，并捐献薪俸从事公共建设之用，政绩为江苏全省之冠，民国三年（1914）经江苏民政长韩国钧荐以“勤求治理、舆论翕然”，获嘉禾奖章并保荐道尹，但丁祖荫无意仕途，不久便辞职回常熟故里。民国六年（1917），常熟人士发起重修县志，设修志征访处，推丁祖荫任总纂主持其事，至十三年（1924）完成《重修常昭合志》稿二十二卷。民国十五年（1926）应聘担任常熟地方款产处主任，经营一年多时间，盈余银元达十余万。民国十八年（1929）丁祖荫迁居吴县，十九年（1930）七月二十二日病卒，年六十岁。张一麀称丁祖荫是文学通乎政事的经济人才^①。

^① 张一麀，《新太平室文集》，卷三，叶17-19，《常熟丁芝孙先生墓志铭》。

湘素楼藏书

丁祖荫精于校雠目录学，而且家境富裕，因此不拘宋元旧本，但见好书必尽量收购，藏之自己的湘素楼。他获得较多的如常熟同乡赵宗建的“旧山楼”、独山莫棠的“铜井文房”等旧藏，前者他在清末购人，包括赫赫有名的《古今杂剧》；后者在民国十六年（1927）左右一举收购数十部精抄名刻，如钱大昕校抄本《康成遗书》、汲古阁刊本《忠烈实录》等。

已知的湘素楼藏书中，最重要的是包含六十四册、二百四十二种的《古今杂剧》。这部书原是明代的常熟乡贤赵琦美“脉望馆”所有，而且大半还是琦美的手抄本。以后归于钱谦益的“绛云楼”，绛云楼毁于大火时，这些杂剧幸而劫余仅存，钱谦益转赠给族孙钱曾的“也是园”；以后再接续递藏于季振宜、何煌“承筐书塾”、黄丕烈“士礼居”、汪士钟“艺芸精舍”、赵宗建“旧山楼”，以至为丁祖荫湘素楼所得为止，三百年间始终不出常熟、吴县两地。只是卷帙渐次递减，在也是园时不计重复还有三百四十种，到士礼居中已剩下二百六十六种，再到丁祖荫手中时，更减为二百四十二种。不过，民初时杂剧存目的虽多至近千，实际存书却不及两百种，而丁祖荫这部《古今杂剧》竟已超过两百种，其中所含民初时人所未见的多达一百四十四种，价值珍贵可知。

題清常道人鈔校古今雜劇後

容臺脈望小神仙清常詩曰容臺小車官場丹黃待漏前
 此本係清常官刊印時所校點出戲明新樂府神宗皇帝太
 春尼時有四鼓待漏板完語
 平年 武康山下鬼聲哀也是園中歷劫來何事連
 珠遺百一轉入士禮居藏甚精舍不隨滄海月虹回明 未
 諧音律老羌翁黃姓甲乙分題蓋行中 種日於冊首印今上
 虞羅氏所刊本序云手述蓋此是清常編定本縱然異曲亦
 同工羅州序云不 詞山曲海壽塵沙散入黃汪又趙家
 莫向春風笑燕于有人重唱後庭花乙卯得此書道
 國愛四年矣

甲子歲朝春之季夏校錄曲目畢
 記於密娛小閣中初園



丁祖荫题跋墨迹(孟宪钧先生提供)

遗憾的是丁祖荫的藏书一向秘不示人,连知己友好都不得窥其堂奥,因此世人并不知他拥有这部杂剧宝库。民国十八年(1929),丁祖荫发表《黄蕘圃题跋续记》一文,在这部书的黄跋语之后,他特意故布疑阵加上自己的按语:“初我曾见我虞赵氏旧山楼藏有此书,假归亟三昼夜之力展阅一遍,录存跋语两则,卷首尚有[…],时促不及详录,匆匆归赵,曾题四绝句以志眼福。云烟一过,今不知流落何所矣,掷笔为之叹息不置。”^②此文发表时,已在他收藏此书大约二十年后,犹如此故做神秘,真是藏书家中少见的。

丁祖荫病卒时,仅存的一子尚就读上海的大学,因此将分藏常熟、苏州两地的湘素楼遗书都加以封存。结果苏州的部分被留守看管的僮仆窃卖,到抗战后已全部散尽,连丁祖荫手写的藏书目录两册都流落在市廛^③;其子将仅存五百余种、三千余册移运上海,后来售与上海图书馆^④。《古今杂剧》在抗战之初散出,颇引起前后方学界的瞩目,由于书已分成两半,经过郑振铎的居间奔走,教育部拨款九千元收购全璧,交北平图书馆典藏^⑤,并由商务印书馆影印流传,名为《孤本元明杂剧》;后来郑振铎再度全部影印,收在《古本戏曲丛刊》第四集,于是丁祖荫扃闭三十年的秘籍,好不容易终于成为人人可得的公物。

尽管丁祖荫对湘素楼珍本极为隐密,却也相当重视公共藏书。早在清末戊戌变法期间,丁氏提倡西学,发起仿效西方学会办法,组织“常昭中西学社”,宗旨在“讲求时务,预储有用之才,以为学堂根本”。招收会员定期讲习

② 丁祖荫,《黄蕘圃题跋续记》,《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第三卷第四期,页479-488。丁祖荫所题四绝句如下:“容台脉望小神仙(清常诗集名《容台小草》,藏书目名《脉望馆》),炳筑丹黄待漏前(此本系清常官刑部侍郎时所校,卷尾常有四鼓待漏校完之语,兼及时事)。点出盛明新乐府,神宗皇帝太平年。”“武康山下鬼声哀,也是园中历劫来。何事明珠遗百一,不随沧海明月回(转人士礼居、艺芸精舍时递佚曲百一种矣)。”“未谙音律老蕘翁(黄跋云然),甲乙分题篋衍中(蕘圃手录元刊本《古今杂剧》卅种目于册首,案即今上虞罗氏所刊本,序云手题篋面曰乙编,则此必为甲编也)。此是清常编定本,纵然异曲亦同工(罗刊卅种序云不知编者名姓)。”“词山曲海等尘沙,散入黄汪又赵家。莫向春风笺燕子,更谁解唱《后庭花》。”

③ 潘承弼,《著砚楼书跋》,页136-137,《丁氏书目稿本》。

④ 曹培根,《常熟小藏家》,《藏书家》第五辑(2005年6月),页69。

⑤ 关于收购《古今杂剧》的经过,参见郑振铎,《劫中得书记》、《续记》,《附录》:《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潘承弼,《著砚楼书跋》,页339-340,《丁芝孙古今杂剧校语》。

新知,延聘算学教习,丁氏并解私囊捐助教习修金。学社附设会员缴费制图书馆,所藏以“经世之书为多,而格致、制造等书亦靡不备”。丁祖荫撰有《常昭中西学社叙》一文,刊登于《万国公报》,阐论学社缘起、章程与藏书管理办法^⑥。民国初年,丁祖荫在乡里倡设公共图书馆,率先捐书数百种,并为编《常熟图书馆藏书目录》(民国六年[1917])、《常熟图书馆馆藏目录近人译著》(稿本)^⑦。

撰述刊刻

丁祖荫的著述,已知刊行的有《一行小集》、《常熟金石志》、《常熟艺文志》,后两者是《重修常昭合志稿》金石、艺文两部分的单行本^⑧。民国初年他卸任常熟民政长时,编撰《常熟民政署报告》一书,由商务印书馆排印出版^⑨。民国十一年(1922),同里的“铁琴铜剑楼”瞿氏影印所藏宋金元本书影时,由丁祖荫代撰各书识语。另外,他曾就所藏历代常熟志书辑成《常熟旧志列传目稿》,以及从各家文集辑出《河东君轶事》等,都未及刊刻而在身后零落于市面^⑩;至于他生前的多年日记,

虞山集六卷向藏若里瞿氏为志室後裔編輯之原素
紙墨古雅世間蓋無傳本據道光禁本志室集勅之出入乃
適半遠錄竟為一校記於書眉并立勅禁本東日堂詩稿其
同亦登見其圖佚者別為附錄記之是集稍備矣遠時涉
痕所及故家校屬斷簡中復時有所獲幸錄不敢書即以
殿為嗚呼虞山正氣常存天地間而此孤本流傳得以不泯
他日身并忠室故素今是書本出氣里同付剞劂前此刻本固相
得而益彰而先生危疑之氣即與後裔編輯之誠心不亦庸
此而永切替平素函小者日初園謹書後

丁祖荫题跋墨迹

⑥ 丁祖荫,《常昭中西学社叙》。

⑦ 曹培根,《论丁祖荫及其重修常昭合志艺文志》,页121。

⑧ 关于《常熟艺文志》,参见曹培根,《论丁祖荫及其重修常昭合志艺文志》,页121-124。

⑨ 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编,《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页186-195。

⑩ 同注③,页88,《常熟旧志列传目稿》;页80-81,《丁初园手辑河东君轶事》。

据悉大部分由江苏省博物馆收藏,少数则归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①。

民国初年,丁祖荫刊行《虞山丛刻》和《虞阳说苑》两部丛书,前者包括三集、十四种,都是常熟前贤如毛晋、钱谦益等人的撰述;后者分为两编、三十二种,都是有关常熟的乡邦文献、遗闻轶事。这两部丛书收录的除他自己的初园所藏外,并向铁琴铜剑楼借到不少抄本参校。民国十年(1921)前后,丁祖荫还曾为韩国钧(止叟)校刊《海陵丛书》。

^① 同注^⑨,页196。

陶湘涉园

生平简历

陶湘，字兰泉，号涉园，江苏武进人，生于清同治九年（1870）七月十七日。他的祖父陶世绵，太平军之役参加团练死难，入祀昭忠祠；父亲陶恩泽，浙江慈溪、德清等县典史、光绪中官浙江淳安知县，卒于任上，当地百姓奉为“神君”^①。陶湘十岁出继伯父山东恩县知县陶铨生。他在光绪十五年（1889）二十岁补大兴县学生员后，保送鸿胪寺序班，捐同知分省试用，投效山东河工，积功以知府分省补用，光绪二十三年（1897）分发浙江候补知府，再保升直隶候补道。光绪二十八年（1902）经盛宣怀奏调参与芦（京）汉铁路行车、机器厂等事；三十三年（1907）奉派为查办江西、安徽铁路委员。宣统元年（1909）以后，陶湘由盛宣怀派在上海办理纱厂实业，并兼税关公款清理处及城壕放丈局两处会办。陶湘与盛宣怀的关系密切，光绪三十年（1904）以后在北京为



陶湘像（居中者）

^① 汪东，《故河南政务厅长武进陶君家传》。

盛宣怀探报政情,宣统元年(1909)盛氏与孙宝琦(慕韩)联姻,陶湘是媒人之一,他的孪生兄弟陶瑑(字宝如、号鉴泉)也被盛宣怀延揽为记室,专事鉴定“思补楼”所藏书画。

民国成立,陶湘转入商场,先后担任招商局、轮船局、汉冶萍公司董事;又投身金融界,民国三年(1914)底任职中国银行驻沪监理官及天津分行经理,续任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代理北京总行经理,山东峰县中兴煤矿、天津裕元纱厂、山东鲁丰纱厂等处经理等。民国十八年(1929)应聘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专门委员,这是近似客卿的专家职位,凡馆内有关学术事项都由专门委员决定,同时应聘的有陈垣、张允亮、朱希祖、卢弼、余嘉锡、洪有丰、赵万里、刘国钧、朱师辙共十人,陶湘是其中唯一来自商场俗世的雅人。自民国二十一年(1932)起陶湘辞卸工商各职,居家上海,至民国二十九年(1940)旧历十二月二十九日逝世^②,年七十岁。

涉园藏书

陶湘大半生从事实业,争逐利场,却又雅好藏书,自三十岁前后开始致力此道,四十岁时收藏已富。他为人乐道的书癖:第一不重宋元古本,而以明本及清初精刊本为搜求大宗;第二嗜好毛氏汲古阁刊本、闵氏套印本、武英殿本、开花纸本等,所藏都是海内之冠;第三藏书讲究完美无缺,尤其重视装潢的美观。

陶湘的涉园藏书,据傅增湘形容多达三十万卷^③,此数已可跻登大藏家之林,但陶湘别辟蹊径以明本为重点,与一般佞宋尚元的大藏家有所不同。傅增湘早先与陶湘初识时,曾表示陶湘如能搜得明代嘉靖刊本一百部,他愿

^② 据《张元济诗文》,页21,《挽陶兰泉》诗,编者注谓张氏此诗作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而诗内张氏自注谓陶湘卒于旧历大除夕。

^③ 傅增湘,《故宫殿本书库存目题词》,页1。

题“百嘉斋”匾额相赠^④，不料后来涉园中的明版书多至一千零二十八部，单是嘉靖本便超出两百部以上，傅氏应为陶湘题“百嘉斋”才是了。

明末清初的常熟毛氏“汲古阁”藏书极富，苏常一带甚至有“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的谚语^⑤，同时毛氏刻书之多与流传之广也前所未见，或因此而毛刻书不为当时好古的藏书家所重，等到百余年后新书渐古，尤其自清道光中有人编撰毛刻书目后^⑥，即目求书的藏书家颇不乏人，都希望自己能首先将毛刻书搜全，陶湘是其中之一。他费三十余年之力，搜罗五百四十种，虽然距毛刻全部的六百种还差六十种，但陶湘去毛氏二百余年，还能得其十分之九，实在不易，他不仅成为收藏汲古阁刻本之冠，并编成《明毛氏汲古阁刻书目录》一卷，可说是毛氏的千古知己。

陶湘另外独步一时的藏书，是明代闵氏的套印本。数百年前套印的发明，是中国印刷史上傲视世界的技术，而套印的流行是明代中叶以后的事，其中以吴兴闵氏为此业巨擘。从最普遍的朱墨两色，以至于再加蓝紫黄五色俱备，套印多半施于前贤名家批评圈点的书，目的在于便于初学者分别途径，段落分明；但也因此为学士雅人不屑收藏，所以只能流行一时，少有人珍惜保藏；而闵氏当年所印既无总目，后人一般也只说在一百三、四十部之间，并无确数。陶湘由于缪荃孙的怂恿，对此特加留意，到民国二十二年（1933）时，共搜得一百一十部、一百三十七种，其中五色套印《文心雕龙》一部，四色者《南华经》、《世说新语》、《战国策》、《国语》等四部。民国以来收藏套印本次多者为任职商务印书馆的周越然，但他的“言言斋”所有五十八种，只及陶湘的半数，其中为陶湘所无的也只有朱蓝两色的《约述》一部而已。言言斋所藏后来毁于上海一·二八事变的日军炮火，涉园所藏则售与伪满洲银行总裁荣厚，荣氏辟“萃闵室”收储，后来转让于溥仪，抗战胜利后又转入东北图书馆（今

④ 傅增湘，《涉园藏书第一编序》。

⑤ 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三，《毛晋》。

⑥ 顾沅辑，《小石山房丛书》，第九册，郑德懋辑，《汲古阁校刻书目》一卷、《补遗》一卷、《刻板存亡考》一卷。

辽宁省图书馆)收藏^⑦。

我国历来印书用纸种类繁多,如棉纸、竹纸、高丽纸等等,而且江山代有新“纸”出,每一朝代各有其擅美的纸。清初浙江开化产制一种纸洁如玉、墨凝如漆的纸,俗称“开花纸”,色白光滑而坚韧细密,康熙乾三朝内府多用以印书,如《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每部多达五千余册,册册赏心悦目。陶湘既有书淫之癖,对此自然不会轻易放过,只要是开化纸所印书,不论何类照收,并因此赢得“陶开花”的雅号,民国以来的书林中,几无人不知这一名称,藏书史上不仅陶湘将人以纸传,开花纸也将纸以人名了。在陶湘收藏的开花纸本中,最珍贵之一是汲古阁所印《十七史》初印本、一千六百十卷,为海内外仅见。

陶湘讲究赏鉴艺术,涉园中每部藏书都求形式的尽善尽美,凡有缺页断烂,陶湘必购求旧纸,雇用巧匠,照原书笔法摹写补足。由于书贾经常割裂挖补、造伪获利,因此陶湘对于自己收藏的书,如发现有更好的板本,不惜一易再易,务求其美观大方、序跋无缺、封面完整而后已。一书如有重新装裱的必要时,他更不惜重金讲究,傅增湘描述所谓的“陶装”如下:“被以磁青之笈,裹以靛布之函,包角用宣州之绫,订册用双丝之线,务为整齐华焕,新若未触。有时装订之钱,或过于购求之费而毫不知吝,故持书入市,一望而识为陶装者。”^⑧

可惜陶湘晚年环境不佳,涉园珍藏逐渐散去。殿本及开花纸本售于北平的文求、直隶两家书店;丛书则为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前身之一)囊括而去,共五百七十四种、两万七千册,包括宋刊本《百川学海》与明抄本《儒学警悟》,这两部都是中国丛书的鼻祖;民国二十四年(1935)陶湘之弟陶洙(心如)陪同董康赴日,特地到京都代陶湘重温一番书香旧梦^⑨。

^⑦ 雷梦水,《书林琐记》,页101-102;王清原,《武进陶氏藏闽凌刻套板书源流考》,页299-300。

^⑧ 同注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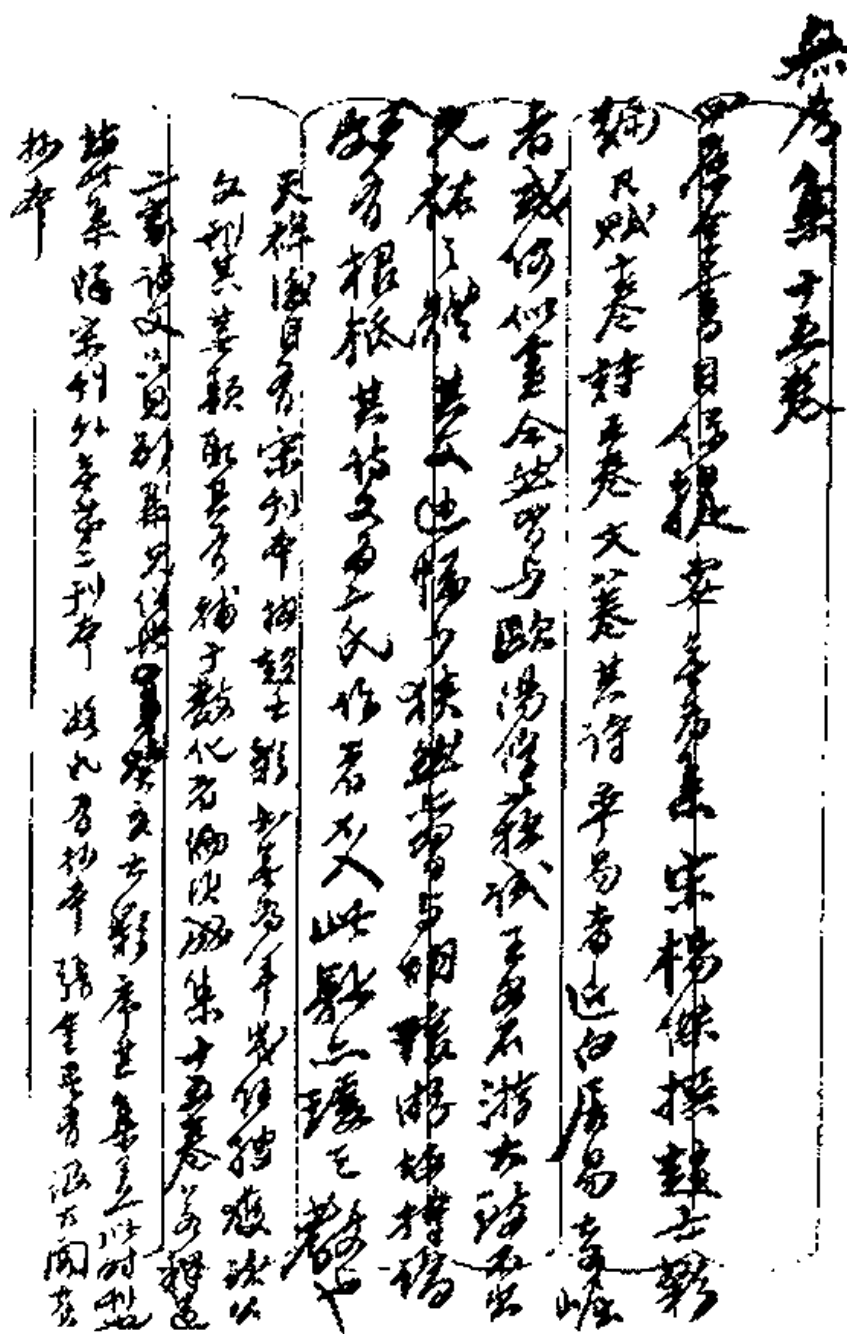
^⑨ 董康,《书舶庸谭》,卷八下,叶17,民国二十四年五月十三日。

陶湘迁居上海后,继续售书解窘^⑩。一些艺术方面的珍籍,如《程氏墨苑》、《方氏墨谱》、《十竹斋笺谱》、《印存》、《瑞世良英》等,在抗战初期已转入他人篋中^⑪。最后一批押在盐业银行的八十余种明版书,在他身后为中央图书馆收得,这批以明人文集为多的古籍,是已知台湾地区唯一较大宗曾经涉园旧藏的善本。四十年书福墨缘从此尽,徒留掌故在人间^⑫,是真可叹!

刻书与著述

陶湘“涉园”刻书与武进同乡董康“诵芬室”齐名,但两家所刻各有异同。以时间而言,董康自光绪二十三年(1897)直刻到民国三十年(1941),前后长达四十年之久;而陶湘虽自宣统中开始刻书,但直到民国十年(1921)以后才大举从事,在民国二十年(1931)后又不多见。以内容而言,两人都以集部为主,董康所好在戏曲,陶湘则又加上美术工艺及丛书。

从民国十一年至二十年(1922—1931)之间,陶湘刻书印书的数量极为惊人,其中部头较大者依时间先后



陶湘题跋墨迹

(“中央图书馆”藏)

^⑩ 例如民国十八年(1929)陶湘将部分藏书让售于张寿镛,而张氏自认此次所得是历年收善本“最足满意者”之一,见张寿镛,《约园杂著三编》,卷三,页22,《编制书目汇志》。

^⑪ 例如《程氏墨苑》归于郑振铎等等。

^⑫ 民国十九年(1930)陶湘六十岁生日,章钰作诗为贺,其中有“书福与墨缘,从此到鬻。传人即传己,早得长生诀”。见章钰,《四当斋集》,卷十二,页9。按,陶湘在藏书外,又收藏碑志,据其《武进陶氏藏石录》所载,自魏至唐共四十六品,绝大多数购自董康与罗振玉原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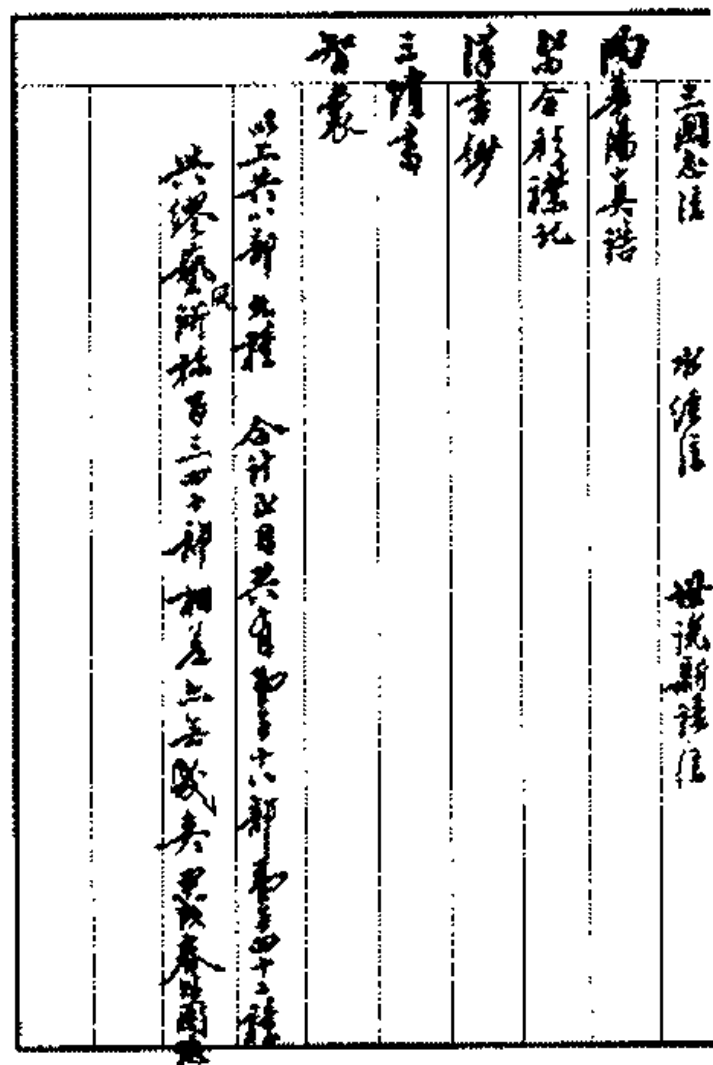
如下：

(一)《儒学警悟》六种、(二)《宋金元明本词》四十种、(三)《程雪楼集》、(四)《喜咏轩丛书》三十九种、(五)《百川学海》一百种、(六)《营造法式》、(七)《涉园墨萃》十二种、(八)《百川书屋丛书》十二种、(九)《拓跋廛丛书》十二种、(十)《陶氏书目丛刊》十五种。

此外如《昭代名人尺牍续集》、《八经白文》、《涉园藏石录》，以及最后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刊印的《涉园所见宋版书影》两辑等等，总计约在二百五十种左右，陶湘与罗振玉、徐乃昌、刘承幹等人，都是民国以来刊布古籍最多的藏书家。可贵陶湘刊书质量都好，从最早的宣统二年(1910)《昭代名人尺牍续集》到最后的《涉园所见宋版书影》，无一不是校订精良，讲究纸墨、行款、装订，

令人见其所刻书即向往涉园藏书的美善，甚至他在民国十五年(1926)为军阀张宗昌校刻的《十三经》，除了书前由他人写好而张氏照描的序文，以及书上斗大的“陆军上将义威上将军”朱印两者，看来有些滑稽外，同样是纸墨印刷俱臻上乘，堪称为善本。

陶湘以商贾名列书林雅士，又讲究形制上的美观，以致常被误为只知欣赏的古董收藏家。其实并非如此，当民国十一年(1922)陶湘完成《宋金元明本词》的刊印后，亲自撰写序录一卷^⑬。民国十五年(1926)傅增湘担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又聘他主持故宫殿本图书的编



陶湘手迹
(孟宪钧先生提供)

^⑬ 《宋金元明本词》原是吴昌绶(伯宛)就其“双照楼”所藏毛氏汲古阁影钞《宋元词集》中，未经毛氏付梓者选刻十七家。民国十七年(1928)，昌绶将《词集》让归陶湘，陶湘接踵再影印二十三家，并吴刻行世。

订工作,前后历时七年,完成《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三卷,收录一千二百九十部;他另考订有《清代殿板书目》、《武英殿聚珍板书目》、《武英殿袖珍板书目》,并撰成《清代殿本书始末记》一文,凡此都是数十年锲而不舍、点滴聚成的结果。陶湘收藏殿本既多,又得置身天家故宫目睹手订,因此钻研功力之深,一时无出其右,例如他对自来说法纷纭的《武英殿聚珍板丛书》与《大清一统志》两者所做的考证^①,无不一言九鼎,这岂是古董家轻易可及的?从陶湘藏书、刻书、著述种种而言,可知他并非只是附庸风雅的商人而已!

^① 《武英殿聚珍板丛书》种数与《大清一统志》卷数向有数说,陶湘详为考证,认为前者应有一百三十八种,后者应为四百二十四卷。

傅增湘双鉴楼

教育界先进

傅增湘，字沅叔，或署书潜，四川江安人。生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九月八日。他的祖父傅诚，字励生，自同治初年起先后在曾、左、李三杰幕下，官北河通判；父亲傅世榕，字申甫，早年游幕江浙及天津，光绪末年历任直隶藁城、怀安知县，世榕生子五人，前三子都是进士出身，长傅增涓，字雨农，光绪十八年（1892）壬辰科，授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次傅增浚，字仲宣，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科，分吏部主事，调邮传部不久病死；三子即傅增湘，少年时与兄弟同受教于祖父，十七岁即以监生中式顺天乡试举人，为该科最年少的一位，再与增浚同赴保定从大儒吴汝纶问学，中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科二甲六名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



傅增湘像

傅增湘是我国女子教育的先进，自光绪二十七年（1901）以翰林由袁

世凯调至北洋工作,六年中在天津创办三所女学、八所女子小学。他担任监督的三所女学:北洋女子公学(光绪三十年[1904]成立,总教习吕碧城)、北洋高等女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成立,教务长张相文)、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光绪三十二年成立,教务长吴鼎昌)。由于傅增湘办学的成效,光绪三十四年(1908)六月学部遵照慈禧兴办女学的旨意,开设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时,奏派他为总理;同年九月又简授为直隶提学使,仍兼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总理,到宣统二年(1910)四月才因学务繁忙辞去兼职。宣统三年(1911)五月,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议,张謇担任会长,傅增湘与张元济同任副会长。不久辛亥革命爆发,他以代表四川省身份,随同北方总代表唐绍仪在上海参加南北议和,同年十一月十七日,他主动电请清廷解除提学使职务^①。

民国三年(1914)三月,傅增湘当选四川选出的约法会议议员,八月获任肃政厅肃政使,至五年(1916)六月肃政厅裁撤为止。民国六年(1917)十二月,傅增湘出任教育总长,至民国八年(1919)五月四日,北京学生发起爱国运动,次日事件扩大,内阁中有解散北京大学之议,傅增湘即行辞职表示反对,并不到部办公,至五月十五日获准。民国十年(1921)三月,教育界因政府拖欠经费过久,发生北大等八校教职员联合罢课请愿风潮,经傅增湘与范源濂等出面调停,至七月底政府应允筹拨二百万元做为北京学款基金,才告解决复课。

民国十一年(1922)五月底,傅增湘经总统特派办理财政清理处,整顿内外债事宜。十六年(1927)十月,傅增湘出任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委员,兼图书馆馆长,至十八年(1929)三月卸任,赴日本访书并游览。十九年(1930),讲授版本目录学于清华研究院。此后数年纵情山水,游踪所至华山、衡山、庐山、黄山等地,并为天津《国闻周报》撰稿。抗战起后仍居住北

^① 《大清宣统政纪》,卷六八,页2,宣统三年十一月庚辰。

平,以校书遣日,并主持重修《绥远通志》^②。二十七年(1938)八月“东亚文化协议会”在北平成立,日人曾委以副会长名义^③。傅增湘于一九四四年中风偏瘫,抗战胜利后隐居不出,卒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日,享年七十八岁。

双鉴楼藏书

傅增湘的藏书处名“双鉴楼”,因为他藏有两部珍贵的《资治通鉴》,一是他祖父傅诚传下的元刊本,另一部是他自己所得端方旧藏的百衲本,以六种宋刊残本配成全书。民国七年(1918),傅增湘在北京新建的宅第落成,取苏东坡诗句“万人如海一身藏”之意,命名为“藏园”,园内书斋有长春室、食字斋、池北书堂、龙龕精舍、莱娱室、抱素书屋等名。

傅增湘从父祖辈继承一些藏书,不过除上述《资治通鉴》外,都是较普通版本。他真正有志于此道,是辛亥革命以后的事,当时他参加南北议和,在上海滞留半年期间,与杨守敬、缪荃孙、沈曾植等人交游,从此开始四十年的书堆生涯^④。当时他从苏州获得生平第一部宋刊本《新刊诸儒批点古文集成》,又从杭州一家书坊网罗数百册旧书,甚至在议和完成北还的当日,登上新铭轮后又下船看书,等他与仆人抱了十几部书回转来,早已不见船影,他一开始藏书便留下“买书失舟”的轶事^⑤。

回到天津后,傅增湘不时赴北京访书,民国二年(1913)以后索性定居这个执书市牛耳的文化故都,而当时正逢民初新旧鼎革之际,不少满洲故家藏

^② 《绥远通志》始修于民国二十年(1931),至二十五年(1936)成稿,傅增湘于是年应绥远省主席傅作义聘为重修总纂,抗战开始后仍由傅氏在北平藏园中继续进行,至二十七年(1938)底完成,计一百一十六卷(张元济、傅增湘,《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页366、369)。傅氏撰有《绥远通志序附重纂凡例》(《藏园老人遗稿》卷三,页30-40),向未印行,但据张万仁《绥远通志稿简介》一文(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F7,1981年8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资料社印,原载《内蒙古日报》1981年1月13日第三版),则傅氏重修志稿似已于1970年付印。

^③ 傅增湘,《藏园居士七十自述》。

^④ 傅增湘,《藏园居士六十自述》,叶13。

^⑤ 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初集》,卷五,叶25-26,《明钞云台编跋》。

书散出,如盛昱“郁华阁”、景廉“半亩园”、端方“匋斋”,以及曾任礼部尚书的穆彰阿、广州将军凤山等人旧藏,转入双鉴楼中的不在少数,加上陆续自杨守敬、缪荃孙获得一些珍本,都奠定双鉴楼的基础。大约从民国十年(1921)以后,傅增湘已是京津首屈一指的大藏家。以下的事例可以说明他在北方书林中的地位,民国十二年(1923)秋间,他以二千四百元获得张之洞旧藏宋刊本《白氏六帖事类集》,使得王国维连声嗟叹:“现有傅在厂中,万不能购得此类书矣!”^⑥“此间无书,有则必为沅叔所得,虽书肆不能与之争。”^⑦这与他在民国元年(1912)还得缪荃孙的介绍,才得获见叶昌炽的情形^⑧,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双鉴楼最突出的收藏是为数颇多的宋本。民国十八年(1929)编印的《双鉴楼善本书目》中,宋本书多达一百八十余部,比当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还多^⑨,而平均每年新收十部宋本,近代藏书家中没有第二人能像他这样,在前后不到二十年之内积聚如此多的宋本书;同一期间,藏园也自继承父祖不及一万卷的藏书,成长为拥有宋辽金本三千八百卷、元本二千五百卷、明刊钞校三万余卷、清刻通行本十万余卷的大观^⑩。民国十八年(1929)以后,傅增湘继续如他在《六十自述》中说的“狂搜冥索”,终于“规模大具”,在令人目不暇给的双鉴楼宝藏中,如果勉强以书价衡量其镇库之宝,则民国二十三年(1934)他以一万三千元收购宋刊《周易本义》十四卷,是历来古书的空前高价,傅增湘自己也承认,即使如明代王世贞(元美)卖一田庄、买一汉书的故事,都难与他此次的豪举相比^⑪。

到书肆买书,再勤快也往往是可遇不可求,傅增湘求书却另有门径,就

⑥ 王国维,《观堂遗墨》,卷下,《致蒋孟莘札》,民国十二年(1923)农历九月二十六日。此部《白氏六帖事类集》现归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收藏,并列其国家保护重要文化财之一。

⑦ 同上注,《致蒋谷孙札》。

⑧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抄》,记一四,页70,民国元年十一月一日。

⑨ 据教育部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1934),丙编,页794,国立北平图书馆藏宋刊本一百二十九部、宋写本二部,合计一百三十一部。

⑩ 同注④,叶14。

⑪ 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续集》,卷一,叶1-4,《宋监本周易正义跋》。

是与其他藏家以书易书。他和叶德辉、缪荃孙、周叔弢、宗舜年等人都有过“交易”，例如傅增湘为了一部足与原有双鉴鼎峙而三的宋刊小字本《通鉴记事本末》先后寻觅了十余年，历经曲折之后，才以千金代价加上两部抄本为礼，再加上人情请托，终获得珍藏此书的宗舜年同意交换^⑫，真是有傅增湘这种求书的精神，才有双鉴楼与众不同的收藏。

一部古书流传数百年后，难免会散落不全，藏书家对此也无可奈何。一般而言，即使散落的部分尚在人间，完璧复合的机会也是微乎其微。特殊的是到了傅增湘手里的残本，往往就在双鉴楼中一家重逢，这种奇遇至少有宋本《论语纂疏》、《苏老泉文集》等七部之多，主要的原因当然是他穷搜博访的工夫，提高了复合的机率所致，他自己却宁可归诸“神助”，因为每年岁暮除夕之前，他照例要在藏园中举行祭书之典，并邀请三五同好以书会友，出示一年所得珍本共相赏析题咏，几个著名的藏书家如邓邦述、吴昌绶、朱文钧等，都是与祭的常客。

傅增湘很仰慕他的四川先贤苏东坡，不但取他的诗为藏园命名，而且刻意收藏宋版的《苏东坡诗集》。宋版苏诗向来有所谓“赵注本”、“施顾注本”、“王状元集注本”三种^⑬。赵注本从清末以来仅存一部藏于铁琴铜剑楼的四卷残本，施顾注本存卷较多的也只有两部，王状元集注本宋刊传世的虽有四、五种，藏书家有其一已是珍若拱璧，而傅增湘多年搜访，竟能独得其三，他兴奋得在东坡生日当天，特地邀约四川同乡在藏园举行祭苏盛典。

民国三十六年(1947)七月，傅增湘以藏园群书中的三百七十三部、约四千三百册，捐赠给国立北平图书馆，估计价值在三亿元以上。政府则拨发四千万元作为象征性的奖金^⑭。翌年又让售明刊本与钞校本七十九部于北平

^⑫ 同注⑤，卷二，叶2-10，《宋淳熙刊小字本通鉴纪事本末跋》。张元济、傅增湘，《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页266,273-277。

^⑬ 参见郑骞，《宋刊施顾注苏东坡诗提要》。

^⑭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第二十一卷第三、四期合刊(1948年8月)，页6-7，《会员消息》。

图书馆^⑮。在此之前,傅增湘原和其他藏书家一样,总希望自己一生心血所寄,多少能由子孙后代世守下去,因此他经常在各书的跋记中,谆谆嘱咐儿辈得书的辛苦不易。可是傅增湘自己或捐或售于前^⑯,等到一九四九年他逝世后,长子傅忠谟(晋生)又将藏园遗书中的四百八十部、约三千五百册,及他生前所用文具二十八件,无条件地再捐给由北平图书馆改名的北京图书馆。这批书中虽只有三部宋本,其余却绝大部分经过傅增湘亲笔校跋,少部分则由他转录前人的校跋,因此这些书的珍贵不在宋元古本之下。直到一九五六年为止,傅忠谟数度续捐藏园遗书,善本尽归于北京图书馆,普通本则入四川图书馆,因此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傅家被抄时,傅增湘数十年心血所聚得免于劫难^⑰。

校勘与跋记

双鉴楼宋元本的美富,固然睥睨一时,而傅增湘校读的精勤,也是一代之冠。他是民国以后校勘古书最多的人,“余之藏书,手校者十居八九,传播者十居四五。[…]有得即校,日竟一二卷,悬为课程,神惬意酣,渐成癖嗜。[…]舟车行役,林壑幽寻,辄载以相伴,数十年来,曾无经旬之辍”^⑱。他平生所校书在一千部以上,单是傅忠谟捐给北京图书馆的书中,注明傅增湘校过的已有三百六十部、一万四千卷左右,已超过早年立志“欲校书一万卷以贻后人”的目标^⑲。他校书最早始于民国二年(1913),从天津造赴京师图书馆,住馆一百零六日,校书三百四十二卷,因该馆停闭才告一

^⑮ 傅熹年,《记先祖藏园老人与北京图书馆的渊源》,页51。另据说傅忠谟于1947年秋出售一批藏书,由来薰阁等四家书肆合资金圆券一千四百余万元购下(雷梦水,《书林琐记》,页108-109)。

^⑯ 早在1933年时,傅增湘已为偿债而出售部分藏书予杭州王体仁“九峰旧庐”,见《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页289-312。

^⑰ 傅熹年,《记先祖藏园老人与北京图书馆的渊源》,页52。

^⑱ 同注④,叶15。

^⑲ 张元济、傅增湘,《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页250。

段落,后来他撰有《西涯校书记》一文回忆这段经过^①。傅增湘对于校勘有两点特别的看法:

第一是重视而不迷信古本。通常书越古越存真可信,同一部书每经重刻一次,总不免有些无意的鲁鱼亥豕,或有意的臆造窜改,因此傅增湘认为:“读书不得旧本,慎勿轻言校勘。”^②他曾以影宋钞本《北梦琐言》,校出同书明代刊本的数百处讹误,其中甚至有一整卷竟无一字正确,这当然是刊刻者故意欺蒙后人,否则不致如此,而古本之可贵也由此可见;但傅增湘并未因而过分依赖古本,所以他又认为:“宋本虽古,未必可尽信;明刻虽晚,亦不无可取,是要在善校善读者而已。”^③

第二是重视而不迷信前人。一般对名家前辈校过的书总比较信服,傅增湘却以为学海无涯,个人所见难免有时而穷,所以他劝人校书且勿笃信前贤无疑,例如清代著名的顾千里(广圻)手校后刊行的一部《华阳国志》,傅增湘就又校出四百多个错误^④;再如清朝许增根据宋本在内的九种版本,费了五年时间校订的《唐文粹》一百卷,应当是精确无讹了,却又由傅增湘校出一千个以上的错字^⑤,其他可想而知,因此他鼓励人力求后来居上,切莫划地自限。

傅增湘校过的千余部芸芸众书中,他用力最多、费时最久的是《文苑英华》,全书多至一千卷,但宋刊本传到清末民初时只剩一百四十卷而已,其次的明代刻本则讹误满篇,不堪卒读。傅增湘从民初开始搜罗此书的各种版本,作为校勘的准备;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九月,他下定决心摒除俗务专意于此,直到二十八年(1939)七月大功告成,前后将及三年,当时正逢战乱,而且他已年近七十,卒能成此巨著,实在不易。他叙述校勘的情形:

^① 傅增湘,《藏园老人遗稿》,杂著,页42-44。

^② 同注^⑤,卷四,叶12-14,《校北梦琐言跋》。

^③ 同注^{①①},卷三,叶38-39,《明刊孙樵集跋》。

^④ 同注^{①①},卷一,叶38-42,《校明刘大昌刻本华阳国志跋》。

^⑤ 同注^⑤,卷七,叶37-39,《校本唐文粹跋》。

近岁以来,意兴虽减而精力尚强。铎右雒书,研朱细读;每日率竟千行,细楷动逾数百。连宵彻旦,习以为常。严寒则十指如椎,辉暑则双睛为瞽。强自支厉,不敢告疲。家人讽以自休,曾不之恤,即默念何以自苦如此,而亦无以自解。誉我者谓为不朽之盛事,笑我者斥为冷淡之生涯。吾惟力行以践吾言,独乐而忘其苦耳,遑论其它哉!⑤

当傅增湘在北平的藏园孜孜矻矻地进行校勘时,上海的好友张元济也正计划为商务印书馆影印《文苑英华》一书,于是嘱咐他就校勘所得写成校记,准备附在书后同时出版传世。傅增湘估计若将他直接写在书上的四、五万个校字,连同讹误的原文再加誊录整理,篇幅恐将扩充至十倍以上,一则

自己已无此精力,再则他宁可暂时搁置篋中,期待有朝一日战乱过去,国家昇平文治时才公诸于世,这是有其深意的。可惜这个愿望在他有生之年未能实现,后来由傅忠谟将他写校的三部《文苑英华》,一并献给了北京图书馆。

藏园中有美富的秘籍古本,难得傅增湘也颇能达到役书而不役于书的境地,他既可以和其他藏书家以书易书,也能不稍迟疑地卖去宋

此明初奉新縣刻本浪仙集字畫古雅當在
洪永之間至為罕觀舊藏八十卷楊今為
秉衡先生所得葉氏之校黃氏之跋皆足為
此書增重顧黃跋云自茲協律以下無校字
今卷中朱校固已終卷細審再四始知波朱
筆者為葉氏原校濃朱筆者即張訥庵
借黃氏景宗本所補校訥庵字迹余能識
之其補校亦由黃跋啓之也余藏有何校此
集與此頗不同異日當借此本重勘之
先生其許我乎 沅林傅增湘記 乙卯九月

傅增湘題跋墨迹(“中央图书馆”藏)

⑤ 同注⑤,卷八,叶1-12,《校本文苑英华跋》。

版、买来宋版,结果不但他经眼的书越来越多,而且经藏的书也越来越繁富,结果藏书家中的藏书家便是如此产生的。连他以一万多元高价得到的孤本《周易正义》,也在收藏五年后即行让售偿债,还达观地写道:“幸获善价,夙累为之一清。”^⑥傅增湘甚至还和友人合伙经营一家名为“蟠青”的书肆,自民国十六、七年(1927、1928)左右开设于北京北海一带,不过五六年后即因营业不佳歇业^⑦。

傅增湘乐于刊布自己获得的好书,最突出的如上述的《周易正义》,他获得后即影印公开流传,以印行百部、每部百元的售价计算,他个人的耗费其实并不太多,而裨益学人却难以胜计,若再比起原来秘藏此书,连至交好友都不得一见的徐坊(梧生),两人心胸的高下更有如云泥之别。傅增湘印行的藏书,还有宋本《方言》、《刘宾客文集》、元本《困学纪闻》及明本《永乐大典》两卷。此外,朋好中以张元济编印《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时,向他借印最多,二十四史中的《南齐书》、《五代史记》,用的是藏园中的宋刊全本,而《魏书》和《南史》也配补了藏园宋本的一部分。

傅增湘在民国十八年(1929)编印《双鉴楼善本书目》,翌年又出版《双鉴楼藏书续记》,并陆续撰写《藏园群书题记》,主要发表在天津的《国闻周报》上,达六年之久,先后由报社汇印成四集,民国二十七年(1938)傅增湘又自行出版《群书题记》的续集。一九八三年,傅氏之孙傅熹年根据他生前在各公私收藏所见书的笔记《藏园瞥录》,整理而成的《藏园群书经眼录》出版,收录善本达四千五百种左右。

傅增湘逝世十余年后,门生韩敏修搜集其遗稿五十三篇成《藏园老人遗稿》三卷,于一九六二年以誊写油印行世。他在《国闻周报》撰写的众多文章,除群书题记外,还有到日本访书之行的《东游别录》四卷,记游国内各处山水的《秦游日录》、《衡庐日录》、《涑易游记》等等连载,以及二十二年(1933)刊登的《清代殿试考略》长文。傅增湘藏有一百一十卷清代历科殿试卷,都是民国七

^⑥ 同注①,页378。

^⑦ 同注①,页296-298,302-303。

年(1918)在教育总长任内所得,其中大部分为乾嘉学者及四川乡贤的卷子,他自己的一卷原不知何时流落市面,民国三年(1914)为友人获得而赠还藏园。

上述著述以外,傅增湘以长达十六年时间,在民国三十二年(1943)辑印成《宋代蜀文辑存》一百卷,包括四百五十位四川乡贤、二千六百余篇文章,实现他时常念兹在兹生为蜀人宜对故乡有所建树的心愿。其实傅增湘幼年离川后,久居北方京津一带,只在中进士后回乡扫墓一次,然而他的怀土之思,老而弥挚,勤于搜罗故乡文献和乡贤著述,先后刊成《蜀贤丛书》十二种,又在战乱中独力用心于七百年至一千年前的乡贤文献,汇萃一编,表而出之,如他在序文中说的:“发两宋沈晦之文章,以存千百辈蜀贤之志事。”这种精神实在令人敬佩。

余昔年收得舊鈔本近光集為謙牧堂
 舊藏後入海源閣者曾以閱本對勘凡訂
 正謬誤五百餘字補佚詩五首又殘詩四首
 曾撰跋文刊於國朝周刊今見勞季言校
 本取余藏本參證乃一一符合知勞氏所
 據惠氏本正同出一源也安得有好事者取
 而刊傳之耶奇書難得覽者幸毋失之反特

傅增湘題跋墨迹
 (“中央图书馆”藏)

梁启超饮冰室

梁启超，字卓如，一字任甫，别署饮冰室主人，一般称其任公，广东新会人，生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正月二十六日，卒于民国十八年（1929）正月十九日，年五十七岁。关于梁启超的家世背景和生平经历，丁文江所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极为详尽^①，本文着重于他的饮冰室藏书以及他和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关系。



梁启超像

饮冰室藏书

梁启超生平以言论为国，著述等身，但他早年的环境不裕，家藏的图书还不及他后来的著作数量之多，他在十二岁入县学那年，家中除蒙学读本外，只有《史记》、《纲鉴易知录》各一部，加上父执馈赠的《汉书》、《古文辞类纂》两书而已^②。直到十五岁时，算是任公购书藏书的开始，那年他进入广州

^①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世界书局，1958。

^② 同上注，上册，页10，光绪十年（1884）引《三十自述》。

的学海堂读书,每月的膏火奖赏都用于购书,年假时再捆载回家。据他的弟弟梁启勋后来回忆,那几年中梁启超带回的书有《正续皇清经解》、《四库提要》、《百子全书》、《粤雅堂丛书》、《知不足斋丛书》等^③。

光绪十六年(1890)对梁启超一生的学术与事功而言,是极重要的关键。在这一年中,他先是入京会试落第,返程时在上海见到不少西书译本,这是他首次接触到世界新知,虽因行囊不丰只买了一部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却从此而知世界之大非仅中国^④。接着回广州后又拜在康有为门下,接受万木草堂中大海潮音的熏陶。康氏是岭南藏书世家,从康有为的祖父辈起,已有澹如楼、二万卷楼等珍藏,他自己在广州也有“万木草堂”和“云衢书屋”两处藏书,难得的是这些藏书都开放给门下弟子自由阅览,甚至由学生们自行管理。这种作法不但是从来深秘自珍的藏书家百不一见的例外,在私人讲学中也很罕见,因此对梁启超的影响很大,在此后数年中,梁启超和几位知己友好共捐出一万卷图书,成立一个纪念性的“万木草堂书藏”,供贫而好学的士子借阅。不过,民国以后的康梁师徒,在藏书上也如同在政治上一样的各异其途,梁启超是但求有用之书,康有为则专好古槧秘籍,收藏宋元刊本二十二部,明刊本也有二百余部^⑤。

梁启超于学问之道嗜好至广,中西新旧兼备,而且他是因好学而好书,与一般藏书家专一于鉴赏古本不同,他曾感慨地说,世间之专爱宋元版者,直古董家之流^⑥。因此饮冰室中藏书虽达十余万卷,大部分是清咸同光宣甚至民初的通行本,明刊本已不多见,宋元本则未有人藏。饮冰室藏书的另一项特点,是史部和子部佛典繁多,前者是因为他史学上的成就有以致之,后者则他对于佛学的精通,在近代学者中罕见,因此所藏佛家著述之多,几占子部所有之半,此外在三百多部日文书中,佛教类也有百余部。

③ 同注①,上册,页12,光绪十三年(1887)引梁仲策《曼殊室戊辰笔记》。

④ 同注①,上册,页15,光绪十六年(1890)引《三十自述》。

⑤ 蒋贵麟编,《万木草堂外编》,上册,页225-239,《康南海先生所藏宋元明板书目》。

⑥ 北平图书馆编,《梁氏饮冰室藏书目录》,余绍宋,《序》,页1。

梁启超读书往往题跋作记,例如《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与《昭代丛书》两套大部头,任公读于民国七年(1918)七、八月间,当时他正忙于撰写《中国通史》一书,每天必写成二千余言,却还要抽空读书作跋,甚至累出肋膜炎连带肺炎后,虽停笔而仍不释卷。结果通史没写成,这两部丛书却读完了,正如他在病中消遣自己说:“半生惟鹜多闻,今兹灵府尚为此结习所据,乃至病中一离书卷,遽如猢猻失树,自审障深矣。”^⑦

民国十八年(1929)梁启超逝世前,口头遗嘱将藏书全部捐赠国立北平图书馆。翌年二月,家属委托律师与图书馆办理移交点书,共是三千七百四十部、四万一千八百一十九册,以及金石墨拓、生前手稿与信札等。民国二十年(1931),北平图书馆新厦落成,辟有纪念文库专庋饮冰室藏书,这座新厦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拨款一百万元兴建,并特聘任公主持擘划,而他虽不及亲见宏伟的馆舍落成,但他毕生学术所由来的饮冰室藏书,却得以留在馆中继续让后人钻研不息,民国二十二年(1933)北平图书馆还编印《梁氏饮冰室藏书目录》。

梁启超不是首开捐赠图书馆的藏书家,但是以他赫赫之名而为之的捐书之举,却有极大的影响,逐渐在全国形成捐书的风气,单以北平图书馆而言,此后数年中陆续获得瞿氏(宣颖)“补书堂”、朱氏(启铃)“存素堂”、王氏(孝箴)“洗心精舍”等家闻风景从的捐赠。

梁启超与图书馆事业

在梁启超一生中,有两度与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关系密切:先是清光绪十六至二十四年(1890—1898),他在接受中西文化及变法维新时期的鼓吹图书馆思想;其次是民国九至十八年(1920—1929)他从事教育学术时期的倡导图书馆事业与目录学。在前一个时期中,梁启超与其他维新人物欲藉

^⑦ 同注①,下册,页546,民国七年(1918)引《九月廿三日致宰平居士书》。

图书馆、学校、报纸等途径,达到变法的目的;在后一个时期中,梁氏与图书馆的密切关系,除了源自他本人的兴趣,更是图书馆界欲借重他的号召力谋求更大的发展。

一、鼓吹图书馆思想

梁启超的思想言行曾经数变,自早年的举业转从康有为治学,继而广读西学译本,从事政治活动,失败后实行革命,入民国则治理财政,最后讲学以终。在这些变迁过程中,如上所述以光绪十六年(1890)为转换的起点,由于康有为的影响,他和同志设立万木草堂书藏,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时,书藏已积增至一万卷,为了配合广东人士成立“粤学会”,梁启超撰写一篇《万木草堂书藏征捐图书启》^⑧,广征中西学新旧图书,凡捐助者回报以梁氏自己所著书。此次征捐的结果和书藏以后的命运,由于他在戊戌政变后避居日本而无从考知,但不论如何,梁氏早年所办这个实际上是图书馆的书藏,可认为是他与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关系的开始。

光绪二十一年(1895),梁启超第四度入京会试,结果与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同年七月复创设强学会于京师,为达到开国人风气的目的,学会最初着手的事业是图书馆与报馆^⑨。因为得到各省督抚大员的捐款,得以向上海购置图书仪器,英美公使与北京书肆也愿捐助图书,于是成立“强学书局”供人阅览,数月后强学会因朝廷的疑忌遭禁,书藏仪器也被没收而夭折。

光绪二十二年(1896)七月一日,《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梁启超主持笔政,仍不忘鼓吹当时他称之为“藏书楼”的图书馆,陆续撰登著名的《变法通义》及《西学书目表》等文,特别是在《变法通义》的《学校总论》中,一再强调藏书与藏书楼的重要,并引述他所知的各国藏书楼情况。在《西学书目表》的序言,他也举伦敦藏书楼(大英博物院)的八万种藏书,来与当时中国已译

^⑧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册,页24-27。

^⑨ 梁启超,《饮冰室全集》,第四十七册,页24-28,《敝人对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

仅有的三百种做相对的比较^⑩。

在当时主张或同意维新的人物,大致都认为学校、报纸和图书馆是教育人才的三要项,因此任公并不是唯一的、更不是最早提倡图书馆的先知先觉,事实上他对西方图书馆的认识,也是借着别人的译述而获得的。不过,以他“言论界的骄子”^⑪地位所做的鼓吹,随着销数多达万余份的《时务报》遍及各地,产生的影响洵属举足轻重。

其实,梁启超一直到戊戌政变流亡海外,才亲眼目睹他鼓吹多年的近代图书馆制度,在《新大陆游记》书中,他对美国的公共图书馆、钢铁大王卡内基的大量捐助图书馆,以及大学图书馆的开架阅览方式等等都表示赞叹^⑫。

二、倡导图书馆事业

民初返国积极从政的梁启超,在民国六年(1917)受排挤后暂时退出政坛,并作长达年余的欧洲之行。此行转变了他此后十年间致力的方向,直到逝世前都以教育学术工作为主,期望自培育与联络人才入手,养成志同道合之士,有朝一日卷土重上政坛,因此陆续倡办共学社、中国公学,又应聘在南开、清华等校授课,并在全国各大学演讲,结果对文化事业日增兴趣的梁启超,逐渐放弃以之作为政治资本的初衷而乐此不疲,于是梁启超与图书馆有了较前一时期更为密切的关系。

(一) 松坡图书馆

梁启超于民国九年(1920)自欧返国后,立即成立“共学社”,举办一些学术文化活动,其中一项是以在欧所购的一万多册图书,办理“图书俱乐部”供人阅读,由蒋百里主持。

民国十一年(1922),梁启超决定结束上海的“松社”,在北京建立永久性的松坡图书馆。松社是民国五年(1916)蔡松坡逝世后,他在上海发起以建

^⑩ 同注^⑧,文集第一册,页123。

^⑪ 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页254。

^⑫ 同注^⑧,专集第五册,《新大陆游记节录》。

立图书馆纪念蔡氏而定名,但当时他正热中政治活动,并无余暇过问此事,以致松社虽然搜藏了一些图书,却因乏人主持而始终未曾开放。

梁氏既决定设图书馆,除图书俱乐部与松社两个基础外,另请徐世昌总统将政府购得的杨守敬“观海堂”藏书,拨给半数约一万多册。徐世昌卸职后,又商请继任的总统黎元洪拨给位于北海的快雪堂作为馆址。于是松坡图书馆在民国十二年(1923)十一月四日成立,梁启超自任馆长,以专存中文图书的快雪堂为第一馆,另以专存外文图书的石虎胡同七号为第二馆。松坡图书馆新旧兼备,成为当时颇具规模的图书馆之一,连中华图书馆协会初成立时的总事务所也设在馆中。

梁氏对松馆非常关心,起初几年馆中经费主要是来自他卖文的收入,但这却不是很正常的情况,以致松馆在梁氏过世后便无法有进一步的开展。

(二) 中华图书馆协会

民国十四年(1925)四月,全国图书馆员成立中华图书馆协会的组织,领导阶层包括董事部与执行部。梁启超一开始便加入为会员,并被公推为董事部部长。同年六月,协会在北京补行成立仪式,梁氏即以领导人身份发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词》^⑬,提出他对图书馆发展方向的看法,以及对协会本身的建议。这篇演说词显示了梁氏对整体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观点:

在发展方向上,梁启超反对当时代表美国图书馆协会在华考察的鲍士伟(Arthur E. Bostwick)关于中国应仿效美国式公共图书馆制度的建议。梁氏认为普及公共图书馆诚为将来之鹄的,却非中国的当务之急;中国既处于过渡时期,亟需有大量的菁英人才来领导人民,因此不应发展群众性的公共图书馆,而是以造就人才为目的的学术性图书馆。梁启超自清末变法维新时期提倡具有图书馆功能的学会,即是以教育人才为宗旨。他这种观点一直没有改变,创办共学社与图书俱乐部的目的在此,这篇演说词揭橥的也是

^⑬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第一卷第一期(1925年6月),页10-15。

同样的理念。

至于中华图书馆协会的会务,梁启超提出两点建议:建立中国的图书馆学与培养图书馆人才。他并主张具体作法应是集中力量先办一个大规模的示范图书馆,馆内附设一所图书馆专门学校,以期理论与实务的配合。这些建议和他以后数年的工作都大有关系,可知他对图书馆事业的热忱,不只是在名义上领导这个全国性图书馆团体而已,也因此在此协会第二届的改选中,他不仅以悬殊的最高票在董事部蝉联,同时也在执行部领先群伦^⑭,足见众望所归,不做第二人想,但是会章规定一人不得兼任两部,方由得票次多的袁同礼担任执行部部长。

(三) 京师图书馆与北京图书馆

梁启超在图书馆协会演说的三个月后,教育部与管理美国庚款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签约,成立共同委员会,接办以藏有《四库全书》、敦煌写卷、宋元善本闻名的京师图书馆,计划以该馆丰富的珍藏为基础,由基金会拨款建筑一所大规模的新图书馆,这是以后国立北平图书馆的缘起。此举虽未必是梁启超在演说中建议设立示范图书馆的直接结果,但从委员会聘请他出任新的京师图书馆馆长一职,显然是他的演说产生了作用。

民国十四年(1925)底,梁氏就任馆长,李四光为副馆长,袁同礼为图书部长。可是由于北京政局混乱,教育部无力履行合约,梁启超当了几个月有名无实的馆长。翌年春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决定单独另办北京图书馆,仍聘梁氏为馆长。这时他以教育部签约而不履行,事关政府信用,且可能影响其他国家对于退还庚款的态度^⑮,因此多方奔走,终在十五年(1926)年底正式接收京师图书馆,但是为了等候新馆厦建筑完成后再行合并,于是他兼任京师、北京两馆馆长,如果再算上他自办的松坡图书馆,一身兼三长创下

^⑭ 同注^⑬,第二卷第三期(1926年8月),页13。此次改选在收回的董事选票一百二十八张中,梁启超得一百一十票,次为袁同礼八十二票;在收回的执行部部长选票一百三十一张中,梁氏得四十七票,次为袁同礼三十七票。

^⑮ 同注^①,下册,页702-704,民国十五年(1926)引《七月二十日与仲揆、守和两兄书》及《八月廿日与志清、石青足下书》。

我国图书馆界的纪录。

梁氏促成教育部依约移交京师图书馆,在政局变换极速的当时是桩不容易的事,接收后还由他个人垫款维持^{①⑥},既维护了政府的信誉,又奠定以后北平图书馆的基础,这是梁启超对图书馆事业的一大贡献。当时在华提倡图书馆事业,并促成美国同意将庚款用于建设中国图书馆的韦棣华(Mary E. Wood),向耶鲁大学推荐授予名誉学位^{①⑦},经耶大三度电请梁氏前往亲领,他始终因病未能成行。

三、探讨中国图书馆学

梁启超为学无所不窥,对于图书馆学也有他独到的见识,这在渊博的他只是一齑之尝,但他对清末民初新旧文化之交中国图书馆学的见解,以及他着手于中国历代典籍总整理的工作,都足以令人叹服。

(一) 中国的图书馆学

梁启超在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成立演说词,及在协会刊物《图书馆学季刊》的发刊词中,都呼吁建立“中国的图书馆学”,即以现代西方图书馆学的理论施于中国传统目录学的改造,换言之,就是目录学的科学化。

传统的目录学自汉代刘向以来源远流长,但清末西学大量输入后学术门类的增广与分科的细密,使得千百年来万变不离其宗的四部分类已不能适应,若勉强使用西方的分类又不免扞格不通,因此一种真能兼顾中外学术而又适合图书馆实用的分类法,乃成为清末民初图书馆界梦寐以求的理想。梁启超建议由中华图书馆协会集合全国图书馆员的智能,继续不断地讨论,达成建立于科学理论架构上的新目录学,他称之为中国的图书馆学。

其实,梁启超精于图书分类的理论与经验。早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撰成《西学书目表》四卷,分学、政、教三大类,著录同光两朝所译西书,虽然仅收三百种,梁氏所订序例却多达十三条,详述分类原理与著录体例,在

^{①⑥} 同注①,下册,页711,民国十五年引《十月十五日与东荪足下书》。

^{①⑦} 同注①,下册,页697-698,民国十五年引《四月十八日与守和吾兄书》。

《书目表》的后序中更阐论他对中学西学体用问题的观点,这已远出单纯编制书目的范畴层次之上了。

梁启超似曾研究过风行世界的杜威(M. Dewey)十进分类法。民国十三年(1924)他要求松坡图书馆的杂志以此法编目整理^⑧,但在翌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演说中,他已认为杜威法不适于中国图书馆之用,等到出长京师图书馆后,又立即请袁同礼着手研究中国的十进分类法^⑨。

民国十四年(1925),梁氏以十来天工夫撰成《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一文^⑩,论述元代以前经录之分类、组织、体例,及与一般书目优劣的比较。佛经目录一向被摒于中国正统目录学的门外,梁启超为其发幽抉隐,功不可没。

上述这些成绩,实应归于他学识的赅博与个人藏书的丰富,才能从对于学术源流的了然无疑,轻易地兼治图书分类,他自称是“图书馆学的门外汉”^⑪,也只是谦辞而已。梁氏所撰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与《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两文,都曾风靡无数的青年学子。他曾准备撰写《图书馆小史》一书,可惜未成而歿^⑫。

(二)《中国图书大辞典》

梁启超逝世前有几个已着手而未完成的计划,《中国图书大辞典》的编制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项。他自述计划的大要为:“将中国数千年来曾有书籍若干种,现存若干种,悉数网罗,分别说明,以近世最精密简要之表示,做古今典册总汇之簿录。”^⑬这个相当于古今图书总志的计划,可说就是他自己对于“中国的图书馆学”的实践。

民国十六年(1927)初,梁启超亲自撰拟这个别名为“群籍考”的计划时,

^⑧ 同注①,下册,页660-661,民国十三年(1924)引《六月二十四日由汤山与季常足下书》。

^⑨ 同注①,下册,页690,民国十四年引《十二月二十日致仲揆、守和两兄书》。

^⑩ 《图书馆学季刊》,第一卷第一期(1926年1月),页3-29。

^⑪ 同注①,下册,页690,民国十四年引《十二月十五日与守和吾兄书》。

^⑫ 同注①,下册,页702,民国十五年引《七月十二日与守和吾兄书》。

^⑬ 同注①,第二卷第六期(1927年6月),页14。

准备分编两部书：《中国图书大辞典》与《中国图书索引》，后来合并为一。他在正式向北京图书馆委员会提出计划前，曾于清华研究院率领学生试行编纂，北京图书馆同意补助经费后，他又以自己的饮冰室藏书实验，作为开工前的准备，由此可以见得他对此事的慎重。

《大辞典》正附两编，附编是各种统计图表，如《历代存亡书籍之比较》、《经史子集四部书籍之比较》、《历代著作多少之比较》等等。整体计划内容的庞大不仅空前，在体例及方法上也前所未有，他的目的是想为目录学开新纪元，因此在他逝世的前一年半内，在健康极差，经常出入医院的情况下，仍“兴致勃勃”、“津津有味”^④的一人总揽全部繁重的编纂事宜。直到民国十七年（1928）八月底，不得不因病辞去这项工作，次月即入院治疗，翌年一月逝世，这个为中国历代图书算总账的计划遂成绝响。

尾 语

在梁启超对近代中国的各方面影响中，图书馆事业虽然不是很重要的一面，但诚如张朋园所说：“梁氏的思想对近代中国影响的深远，几无出其右者，舍他不谈，都将残缺不全。”^⑤就图书馆事业而言正是如此，特别是他晚年对目录学——中国图书馆学的研究、对全国图书馆界的领导、对历代图书的总整理等，都可见得他对公藏图书的热忱与贡献。以藏书家而言，这是绝无仅有的，只是这些都被他在其他方面的光彩掩盖了，不过，无可否认的是他临终前嘱咐将饮冰室藏书归公的决定，确是他一生留给自己国人的最后遗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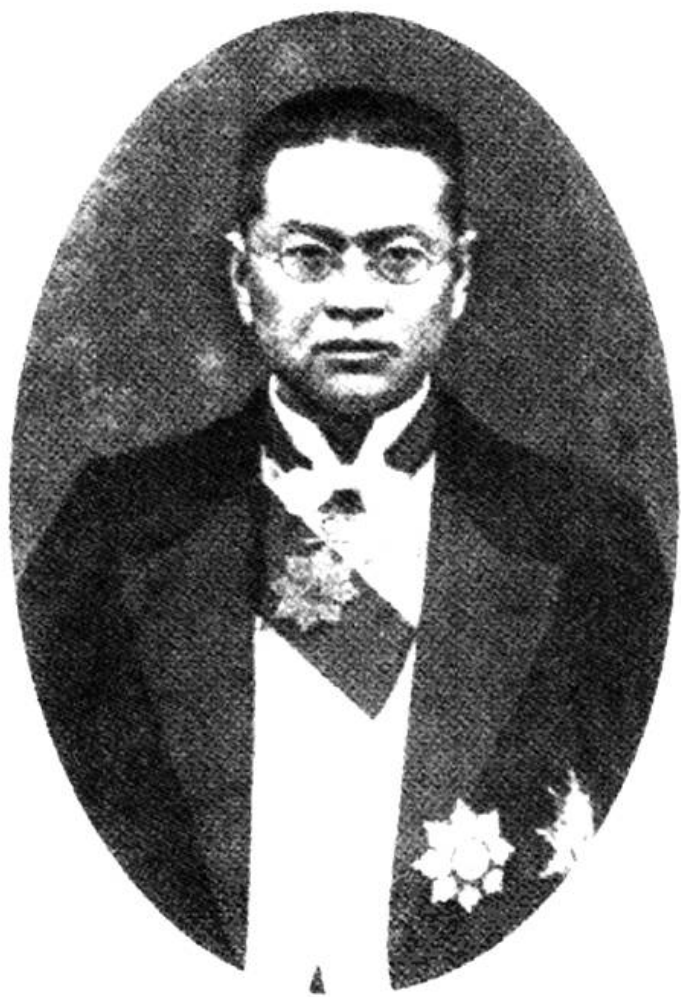
^④ 同注①，下册，页721，民国十六年（1927）引《一月廿六日给孩子们书》。

^⑤ 同注①，页1。

王克敏知悔斋

生平简历

王克敏，字叔鲁，浙江杭州人，生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他的祖父王斯恩，字虎生，钱塘优贡生，捐班官广东从化知县；父亲王存善，字子展，生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随父宦粤，光绪初经两广总督张之洞派在厘务总局担任坐办，此后曾署理南海知县、虎门同知，并与梁鼎芬、杨锐等人交往密切^①。光绪二十四年（1898）前后经办九龙租界勘界事宜，官至候补道。但光绪二十五年（1899）间屡被参劾盘踞厘局、中饱私囊等种种不法^②，奉旨查办后交部严加议处^③，不得



王克敏像

^① 梁鼎芬与王存善交往密切，《节庵先生遗诗》中有几首与王存善赠和之作，补辑，页8，《得王子展书报诗二首》，描述王存善生活与经历相当写实：“君状自瑰伟，身长过八尺。能知三统术，算经动解释。胡为领簿案，疑谤难摈斥。一朝冠带还，来去皆少惜。”“家中多美酒，每饮辄一石。既醉不欲醒，余香恋胸膈。酒醒良独难，千龄本一昔。递兹畴昔素，援琴坐凉夕。”

^② 《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四六，叶12；卷四四七，叶9。

^③ 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十三册，页258-269；《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五二，叶9。

不离粤居上海。此后存善因长于理财,颇得盛宣怀信任,主持招商局务并担任汉冶萍公司董事,为盛在公司之代言人,两人关系极为亲密。王存善卒于民国五年(1916),年六十八岁。

王克敏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中式丁酉科乡试举人,二十六年(1900)赴日任浙江留学生监督,翌年改任驻日使馆参赞。光绪三十二年(1906),学部奏订管理游学日本学生章程,设总监督一人,由出使大臣兼任,副总监督一人,即以王克敏派充^④,至三十三年(1907)十一月因病辞差回国。宣统元年(1909)王克敏担任北洋洋务局会办,二年七月署理新设之直隶交涉使,三年五月实授。民国元年(1912)王克敏赴法,二年返国后活跃于北京财、政两界十余年,先任新成立之中法实业银行经理,六年(1917)七月转任中国银行总裁,同年十二月出长王士珍内阁财政部;段祺瑞继任总理后去职,改派为上海南北会议北方代表之一。九年(1920)回中法实业银行任总裁,又创办天津保商银行,再回任中国银行总裁;自十二年(1923)七月至十三年底,历任高凌霨等内阁财政总长,并协助曹锟贿选总统。

民国十六年(1927)全国统一后,王克敏走依张学良,十年间相继担任东北政务委员会、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冀察政务委员会等委员。二十四年(1935)派任天津市长,旋因代理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而未赴天津。二十六年(1937)抗战发生,王克敏于同年底组织“临时政府”于北平,自任行政委员会委员长;二十七年临时政府与南京“维新政府”合组联合委员会,王克敏担任主任委员;二十九年(1940)汪精卫政权成立,王改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至抗战末期因病于三十四年初辞职。胜利后在北平被捕入狱,三十四年(1945)十二月二十五日死于狱中,年七十三岁。

知悔斋藏书

王氏“知悔斋”藏书至克敏已历四世,从他的曾祖父王兆杏算起,已有百

^④ 《清光绪朝交涉史料》,卷七十,叶5,《学部请派王克敏管理游学日本学生副总监督片》。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四月王克敏敬題



友聲

留日同學會青島分會會誌

王克敏手迹

年之久。兆杏字第花，乡试举人，道光中任浙江德清教谕，因家道清贫，所藏都是应读的普通本，编有《知悔斋总目》；传于王斯恩后，知悔斋藏书在太平军攻陷杭州时损失不少，劫后运抵广东只有二十四箱，斯恩重加整理编成《燹余存书总目》，再付予克敏的父亲王存善。

知悔斋藏书至王存善而告大成，宣统三年(1911)他再编《知悔斋存书总目》时，数量已远超过先人留传二十四箱的十倍以上。辛亥革命期间，故家藏书流出市面者不少，存善拥货在沪购买，三四年内又得明本、殿本、钞校本数百种，民国三年(1914)存善新编《知悔

斋检书续目》，总计达二十余万卷之多，这已将跻于大藏家之林，其中较珍贵的如宋刊明印本《圣宋文集》、卢抱经校本《宝刻丛编》、钱警石《苏子美集》等，都是知悔斋的镇库书。

知悔斋中还有与藏书美富相埒的金石碑版，如宋拓本《道因法师碑》及《怀仁圣教碑》，后者并藏达四本，《昭陵碑》有三本，其他如隋《龙藏寺碑》、唐北海《李思训碑》等等，都曾让以碑版之学自负的叶昌炽看得“心目皆炫”^⑤。

民国六年(1917)以后，王克敏继承知悔斋大批藏书，少数携在北方京津寓所，大部分仍封藏于杭州故居。他在征逐财界官场之余，也偶尔发兴购书，曾以八千元购下贵阳陈氏的旧藏，可惜王克敏在翻云覆雨之际，实在无心及此，恰巧他和傅增湘的藏园比邻而居，倒让傅氏不少方便，十几年中向他借校借读了一些书。民国十七年(1928)全国统一，王克敏离开北京，不得

^⑤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抄》，记一六，页20，民国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不将行笈所有的一百箱藏书,以五万元代价售给邓君翔,不料一、二年后邓君翔因商业失败也出售藏书,知悔斋的这部分旧藏终于散落人间^⑥,傅增湘也收得一些,包括他曾向王克敏借过的宋刊本《后汉书》、明抄本《邵氏闻见录》、校宋本《李长吉诗集》,以及傅增湘准备作为校勘底本用的《文苑英华》等等,与这些“故”书重逢,真让傅增湘有无限感慨。

至于王克敏封藏在杭州的部分,也在北伐期间为革命军所获,拨交浙江省立图书馆保管,民国十九年(1930)改交筹办中的西湖博物馆备用,二十二年(1933)又由浙江图书馆索回,皮藏于该馆的孤山分馆,计共四百三十二箱、五万六百一十五册^⑦,数量之巨,相当惊人。据说其中的精善本在辗转易手中颇有些损失^⑧。民国二十六年(1937)浙江图书馆举办浙江文献展览会,曾展出王存善所校《南朝诗精语》、《缉雅堂诗话》两书。

知悔斋藏书的大部分被充公,比起一些亡佚净尽的藏书家算是略胜一筹,但是王克敏未能因此而知悔,仍继续步向政坛歧途,终至失足成为国家民族的罪人,可说是王氏的不孝子弟。

撰述刊刻

王兆杏在道光初年纂有《昌化县志》二十卷,王存善则辑刊有《寄青霞馆奕选》八卷、《续编》八卷,光绪二十一年(1895)家刻本;又编印《二徐书目合刻》,二徐是清初著名的昆仲藏书家:徐乾学“传是楼”和徐秉义“培林堂”。

⑥ 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初集》,卷五,叶22,《题何义门校宋本李长吉诗集》。

⑦ 《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第二卷第四期,页2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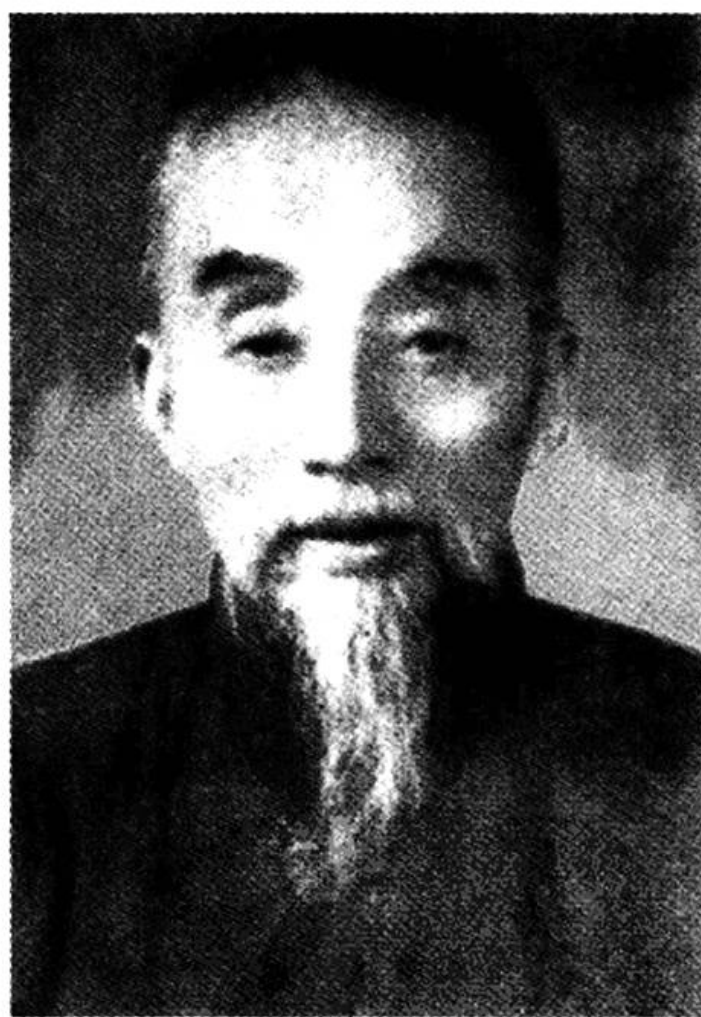
⑧ 《文澜学报》,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页277。

丁福保诂林精舍

生平简历

丁福保，字仲祐，号畴隐，又号济阳破衲，江苏无锡人，生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六月二十二日。丁福保少时肄业江阴南菁书院，光绪二十二年（1896）补县学生员，二十四年（1898）再入南菁就读，从算学家华蘅芳（若汀）专攻算学，同时担任埃实学堂的算学教习，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辞职就读苏州东吴大学堂，不久因病辍学，往上海从赵元益（静涵）学医，并在盛宣怀所办东文学堂习日文。光绪二十九年（1903）应译学馆聘往京师，担任算学及生理卫生学教习，两年后返上海，加入其兄丁宝书等人所设文明书局，编译算学及医学教科书，又与董康、赵元益等人共同创办译书公会。

宣统元年（1909），丁福保考取内科医师证书，奉两江总督端方之命，派为考察日本医学专员，又经盛宣怀加派为调查日本保育专员。回国后丁福保在上海创立“中西医学研究会”、出版《中西医学报》、开设“医学书局”。



丁福保像

民国以后,丁福保长居上海行医,又兼纂述刊书,并参与地方公益及慈善事业,至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病卒,年七十九岁。

藏书捐书

丁福保在学术上兴趣广泛。他早年有志以算学终身,所以号为畴隐,但后来文学、医学、佛学、小学艺术等等,都涉猎有成。这除了他本身的慧根才具以外,也颇得自己的藏书之助。丁福保仰慕就读的南菁书院藏书丰富,曾手抄院中书目一册,并发愿照目购藏。但是他在清末时的藏书,只是一般的石印本或普通坊刻之类,等到民国以后,他的医业和产业日盛,书癖和泉癖也同时俱增,购书时凡普通本必须是版式美观大方的初印本,才能入其眼中,而且也开始搜罗宋元古本。丁福保自述早年若要购买百元以上的书,“往往质产鬻田,奔走数十日而始克购成”^①。当他抄南菁书目时,估计全部照购约需数千元,可是后来单只民国四年(1915)的一年中,他用于购书的花费已逾万元以上^②。民国十三年(1924),丁福保在《题五十岁小影》诗中,称自己是“藏书十万又三千,笑侯傲王别有天”^③。再五年后,他新筑的“诂林精舍”落成时,藏书又增加到了十五万卷之多。

丁福保编有《无锡丁氏藏书志》四十卷^④,但台湾无从一见,只能从其他点滴中知道一些他所藏的善本。在丁福保的《自订年谱》中,提到袁克文(寒云)和缪荃孙、王秉恩(雪澄)等人向他借款以善本书质押的事^⑤,袁克文两度押书济急,典押给丁氏的宋本如:《唐女郎鱼玄机诗》、《周易注疏》、《两汉书》,毛抄本《酒边词》、黄抄本《皇元通雅集》等,其中著名的《唐女郎鱼玄机诗》一卷,后来又由袁克文赎回,转卖给潘宗周的“宝礼堂”,以后又转入北京图书馆中。一

① 丁福保,《畴隐居士自订年谱》,页59。

② 同上注,页65。

③ 丁福保,《畴隐居士自传》,页17。

④ 梁子涵,《中国历代书目总录》,页415-416。

⑤ 同注①,页86,96-98。丁福保,《古钱大辞典》,附录,《古泉集散记》,页34-35。



唐女郎魚玄機詩集
卷之四



唐女郎魚玄機詩集
卷之四

送着羅衣洗香塵
潛淡花間感舊春
解得有情勝無價
不知隣女是何人
不怕吹簫弄玉
未請交却
有貌更無愁
容華而國誰相並
最是東鄰姊妹
丁年甲帳白爭
情美後南華第二篇
如此憐中
卿相烏絲小字
寄金荃
庭有苦香
辟瘴魚洪書
善本更何如
多情誰是黃公望
肯教前漢
終久書
道光元年正月
頭進居士陳
去遠題於吳門寓館

夫人之代...
...



羅敷香香四
紅粧
月爭誇白玉簪
小有洞中
松露瀟灑
上柳煙含
但能為爾心
長在不怕
阿母
真猶斷
若觀紅顏
死亦甘
恨望佳人
何處在
行雲
歸北又蘇南

唐女郎魚玄機詩集
卷之四

...

臨安府...
...

朱承勳



唐女郎魚玄機詩(国家图书馆藏)

九五〇年,丁福保捐献六部古籍及汉以后石刻拓本一千余种给北京图书馆,包含宋本《忘忧清乐集》、《东家杂记》、《芦川词》三部,都是该馆所藏这三书中仅有的宋刊本,而且书上都有黄丕烈的题跋,至于元本也有《说文解字韵谱》、《集千家注杜工部诗文集》、《朝野新声太平乐府》等书^⑥。

丁氏藏书不如捐书闻名。从民国七年(1918)起,他经常捐赠大量图书给故乡无锡和上海两地的学校与图书馆。无锡方面包括县立图书馆、第一高等小学,和他执教过的蒺实学堂。丁福保捐书无锡图书馆,是因为他于民国五年(1916)回故里时,见到图书馆“气象雄壮为上海之所无,为之欣喜者数日”^⑦。至于第一高小,丁福保于民国九年(1920)倡议重建该校图书馆,又大量捐书,结果图书馆所藏二万三千册图书,竟有十分之七以上来自他的捐赠,因此该馆又称“丁氏图书馆”^⑧。在上海方面,他捐书的对象包括市立图书馆、福幼院及震旦大学。上海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筹建市立图书馆,丁福保闻讯率先捐出一万五千卷藏书共襄盛举,民国三十六年(1947)他再度捐书给这个图书馆。

丁福保捐书最多的一次,是民国二十七年(1938)捐给震旦大学二万余册、五万多卷古今刊本,这些原是他准备开办一所“丁氏图书馆”的书,改赠震旦后,定名《丁氏文库》,其中元刊本不少,如《伊川程先生周易经传》、《朱子说书纲领》、《新入诸儒议论杜氏通典详节》、《稽古录》等等。丁福保此次赠书,诂林精舍所藏除了佛典和他亲手批校的书以外,全部尽于此了。民国以来的藏书家,在身后捐书的很多,但生前即能将他们视如第二生命的藏书捐出者并不多见,特别是连元刊本都肯撒手公诸于世,更是凤毛麟角,震旦大学为感谢丁福保的义举,特地设置丁氏奖学金两名。

⑥ 以上六书见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经部小学类页37、史部传记类页48、子部艺术类页46、集部唐五代别集类页13、诗余类页68、曲类页93。

⑦ 同注①,页66。

⑧ 同注①,页88。

纂述刊书

丁福保捐书的善名，又不如他著书刊书的盛名。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撰刊《算学书目提要》、《卫生学问答》两书开始，一直到民国三十年（1941）之间，丁福保撰述、编辑、译注，并且由他创办的医学书局出版的图书，先后多达三百多种。这些图书内容广泛，主要包括医学、文学、佛学、道藏、小学、古钱等类，最多的是一百三、四十种的医书，虽然由于科学的日新月

异，几年之后连他自己都有明日黄花之感，但这些丁氏医学丛书确曾在清末民初风行一时，还曾出洋到欧洲参加两次世界卫生博览会^⑨。不过，丁氏一生最负盛名的纂述，还当推《佛学大辞典》、《说文解字诂林》、《古钱大辞典》三种。直到如今，坊间仍屡屡可见重印刊行这三部巨著。

民国五年（1916）底，丁氏一次大病之后皈依佛门，研究并出版大量的佛经，三年后又捐基金一万元开印《佛学大辞典》，以日人织田的《佛教大辞典》为本，参择

丁福保藏书
 天寒目昏阅书地书喜正用心殊难消
 遣偶情自幼至今所歷境遇如昨日而
 難於握管因口授表秩逐年批纂名曰
 身標錄喜一生閱歷既備且詳而一生心
 力亦由此起見為我後者一展覽問者終
 畢始而深思理然為奮勉以求夫進德隆
 業實有厚望焉
 康熙五十年壬辰十二月二十九日卯時舍生石堅

丁福保藏书
（鈐“丁福保读书记”印）

^⑨ 同注①，页62-63。

其他资料而成，并编制通检(索引)以便利使用者，于民国十年(1921)出版。接着又选印《道藏精华录》十集一百种，也在次年告竣。

从民国十二年(1923)起，丁福保全力贯注于《说文解字诂林》的编纂工作，在门生十余人协助下，采辑历代关于《说文解字》的各家著述一百八十二种，以每字为一条，每条之下胪列各家关于此一字的说法。由于他所采辑各书原来的版式长短不一，只好截长补短，一律裁贴成同一版式后付之影印。这种别出心“裁”的编辑方式极为费时费事，直到民国十七年(1928)才大功告竣，订成六十六册、七千六百余页。只要一编在手，不知节省多少人多少

日前在古書攤以毫銀四枚
 二卷閱一日而畢知著者姓徐名堅號友
 竹吳縣人善畫山水以黃公望筆意上隸
 書善篆刻扶術遊公卿間無不倒履下
 之著有德園詩鈔西京職官印譜湖海
 詩傳曰友竹襟情高曠所居先福里岳梅
 花最盛雷工隸書善篆刻尤長山水幾入
 麓臺之室此印友竹先生自著之年譜
 也歷序一生遭際頗詳讀之令人忘
 倦書中塗改處甚多則沈景韓先生
 筆也細玩改筆可悟修詞之法民國十
 三年四月一號無錫丁福保識

丁福保題跋墨迹

查检之劳,无怪此书最受学界重视,推崇为独步古今的惠人之作^⑩。次年丁福保的上海住所翻新落成,即命名“诂林精舍”以为纪念。他犹不以为足,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将陆续搜补所得的说文著作,辑成《说文解字诂林补遗》一书问世。

古钱为丁氏在图书之外另一收藏嗜好,先后数十年从坊肆及名家旧藏,如袁克文、金锡鬯等人,收得约二万枚之多。在《说文诂林》告成后,丁氏再接再厉又有编纂《古钱大辞典》之役,一面将古今有关铸钱文献,仿照《诂林》的裁贴影印方式,一面将古钱照原式大小制版留真,最特殊的是一一注明各枚古钱的时价,供交易双方估价参考。可是,他自己数十年辛勤所得的二万枚,却在民国二十七、八年(1938、1939)《古钱大辞典》及《拾遗》相继出版后,分成二十份捐存上海市博物馆、同济大学、光华大学等二十个机构,做为公开展览与教学研究之用,同时将《古钱大辞典》所用的一千八百面铜版,捐给他和同好发起创办的上海泉币学社。

^⑩ 丁福保,《畴隐居士六十自述》,页7-9,引胡朴安、于右任、吴稚晖各家语。本书自民国十七年(1928)出版后,除丁氏医学书局于1932年新版外,已知其他版本有:《说文解字诂林》附《后编》、《补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说文解字诂林》(台北:商务印书馆,1959及以后历年重印本);《说文解字诂林》(台北:国民出版社,1960);《说文解字诂林正补合编》(台北:鼎文书局,1977);《说文解字诂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说文解字诂林补编》(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叶景葵卷盒

理财的能手

叶景葵，字揆初，号卷盒，别署存晦居士，浙江仁和人，民国以后仁和并入杭县，但景葵长住上海。他生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七月十八日。祖父叶尔安，字贞甫，廪贡生，咸丰中以训导留河南差委，同治中任商水、滑县等知县，署知许州；父亲叶济，字作舟，号既卿，光绪二年（1876）浙江乡试举人，历知河南安阳、太康等县，升知邓州、郑州，民国二年（1913）底任豫南观察使、汝阳道尹，三年（1914）底任开封道尹，至民国十年（1921）仍在任^①。



叶景葵像

景葵自少随宦河南，十六岁入县学为生员，二十一岁中甲午科举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入京会试时，受维新运动影响，思想转变求新，进张元济所办“通艺学堂”学习英文、数学，至八月政变后回河南，继续研求新知，致力

^① 关于叶济在河南宦绩，参见周秉彝纂、刘瑞璘等修，《郑县志》（1931年刊本），卷七，叶15；杜鸿宾修、刘盼遂纂，《太康县志》（1932年印本），卷七，叶27。

探究改革富强之道。三十岁中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科二甲进士,经湖南巡抚赵尔巽奏调,叶景葵放弃人人梦想的翰林之选,赴长沙入赵幕下,担任学务处兼矿务局提调,宁愿从事实务历练。

光绪三十一年(1905),赵尔巽调升盛京将军,景葵随至沈阳担任文案总办,协助整顿奉天财政,裁撤原有盛京五部及骈枝机关,改设财政总局,他将督办名义让给史念祖(绳之),自居会办而实际负责,努力重振日俄战后凋蔽的东北民生,因功保升道员。光绪三十三年(1907)东三省改制,首任总督徐世昌不满史念祖、叶景葵等人未经交代即先离职而不满,藉另案奏准革职^②。叶景葵南下上海,加入浙江铁路公司为股东,旋被赵尔巽奏调赴湖北差委,担任驻沪四川转运局总办,并于宣统元年(1909)开复原官^③。宣统三年(1911),景葵以候补道先后出任度支部所属造币厂与大清银行正监督,拟订改革计划,实行以大清银行为国家银行的政策。不久辛亥革命发生,景葵于九月自行去职出京,计划亦告中止^④。

民国元年(1912),叶景葵与李维格(一琴)同任汉冶萍公司经理,他并代表向政府借得巨额公债,供武昌起义时遭到破坏的汉阳炼铁厂复工;后来却因倡议汉冶萍国有,得罪公司董事会而于民国三年(1914)被迫去职。同年浙江铁路公司决议让归国有,景葵被推为清算处主任,办理与政府交接事宜;而浙江铁路公司附股成立的浙江兴业银行,也同时改制独立,总行由杭州移设上海,景葵当选董事长,对外代表该行,为我国公司有董事长之始^⑤。民国五年(1916),景葵与陈辉德(光甫)等同业协助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抗拒国务院停兑止付的命令,消弭一场迫在眉睫的金融风潮。

银行之外,叶景葵另拥有中兴煤矿公司、海丰面粉公司等,又数度当选

^② 故宫博物院编,《光绪朝宫中档》,第二十四辑,页742,《东三省总督徐世昌附参叶景葵等请旨革职片》,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十日。徐世昌,《退耕堂政书》,卷九,叶20-21,《请将史念祖等议处片》。

^③ 《政治官报》第147号(宣统元年二月二十五日),页12,《湖广总督赵尔巽奏奉天被参各员请开复调川折》。

^④ 叶景葵改革大清银行的各项计划,如设置经济研究会、归并内务府银库、设立清理处及核算股等等,见于《民立报》自宣统三年六月二十一日(第272号)至同年八月十九日(第358号)各日内容。

^⑤ 徐寄廌,《最近上海金融史》,页8。

商务印书馆董事、监察人。叶景葵晚年与张元济等倡设并担任私立合众图书馆董事。但叶氏一生仍以银行为最主要事业,担任声誉颇著的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垂三十年,几度兼任总经理,抗战胜利后退居董事,以迄民国三十八年(1949)四月二十八日逝世,享年七十六岁。民国三十五年(1946)元月,叶氏获国民政府颁发胜利勋章^⑥。

手稿收藏家

叶景葵弱冠前已开始藏书。光绪十七年(1891)他初应乡试时,有人因旅费不足,出售一部名家句读过的《小谟觴馆诗集注》,景葵以东城书院月课奖金七元,加上向母亲索取的三元而购得,这是他生平首次购书藏书^⑦。但他之搜藏善本,却是民国六年(1917)以后的事。当时他事业既成,已有余力注意及此,恰有一位藏书家吴昌绶(伯宛)为筹措女儿嫁资,从所藏善本内选择四十部,定价千元割爱,结果为景葵所得,包括明刊本《吕氏春秋》、《史通》,及旧抄本《劫灰录》等。这四十部书成为卷盒善本的发端,也由于这次的书缘,数年后吴昌绶下世时,友人拟印行其《松邻遗集》,景葵便独力承担一半费用,再度乐成其事^⑧。

藏书家中只有少数力量雄厚者,对任何一类书都能兼收并蓄,大部分则往往依所学或所好而各有收藏重点,如董康“诵芬室”与吴梅“奢摩他室”之于戏曲,如王体仁“九峰旧庐”与任振采“天春园”之于方志,再如潘明训“宝礼堂”之宋本,陶湘“涉园”之明版等等,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在叶景葵的“卷盒”收藏中,虽也有些古本如宋刊《魏志》、元刊《吕氏春秋》等,但他却基于“真”而以收藏稿本著名。由于任何一部书在作者写成原稿交誊写刊刻后,总难免会有或多或少的“手民之误”,这种古今皆同的情形,轻则易失作

⑥ 《国民政府公报》,渝字第 947 期(民国三十五年一月一日),《国民政府令》。

⑦ 叶景葵,《卷盒书跋》,页 151,《小谟觴馆诗集注》。

⑧ 同上注,页 164,《松邻遗集》;页 165,《吴伯宛先生遗墨》。

者本意,重则颠倒错谬,误尽后人,因此叶景葵不拘古今人著述,一以稿本及批校本为重,例如他收藏的惠栋亲笔《周易本义辨正》手稿及定稿、钱大昕《演易》手稿、张惠言父子《谐声谱》两代原稿、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手稿、严元照《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等,都是极有名的著作,其可贵处就在于它们都能纠正通行本的伪误,而保存先贤心血结晶的真面目。以顾氏《读史方輿纪要》而言,当初景葵购得时,原是碎烂不堪的故纸一大包,经他细心整理,剔除数以百计的蛀虫后,再觅人修补,历时二年,花费三倍于购得之款,终于起死回生,完整如新;景葵继之一再校读考订,广征博引,并获钱穆及张其昀协助,始定为顾氏手迹^⑨。这种传古求真的精神毅力,决非单纯的“藏”书家所能为。

稿本之可贵已如上述,可是每书只有一部原稿,即使加上定稿或清稿也不过三数部而已,故其收藏不易,而名家之作更为难得,因此叶景葵又注重批校本。所谓批校本是学者在一书上,就其刊刻错误予以校讎正误,或就其内容思想予以批评阐发,不论或批或校,其价值都仅次于稿本。卷盒中著名的批校本如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合校《管子》、顾千里校《列子冲虚至德真经》、卢抱经校《直斋书录解题》,以及有黄尧圃等人校字的扬子《法言》等等。

卷盒中这些多年辛勤得来的稿本、批校本,连同其他古今刻本、抄本,在民国三十年(1941)全部捐赠他与同志合办的合众图书馆,以公诸于世,由顾廷龙、潘承弼等人编成《杭州叶氏卷盒藏书目录》,于一九五三年印行,景葵却已先卒而不及见。《目录》中有唐写本二部、宋元本九部、明本四百四十一部、稿本抄本六百六十六部、清刊本一千七百一十部等等,合计二千八百七十八部、三万一千五百六十七册^⑩。

^⑨ 同注^⑦,页41-48,《读史方輿纪要稿本》。

^⑩ 《杭州叶氏卷盒藏书目录》,顾廷龙,《跋》。

读书与校书

叶景葵是科甲出身，学识本已不凡，中年以前忙于事业，却无暇多读书。民国十二年（1923）他五十岁以后，银行业务大半有徐新六（振飞）、徐陈冕（寄庾）两位得力助手，景葵便多费心于校读卷盒藏书，以后随着年岁增高而读校越勤，到二十六年（1937）抗战以后，困处上海，又赋悼亡，更只有以书为伴。顾廷龙搜集景葵历年读书之题记跋文，编印成《卷盒书跋》，收录二百零五部，其中在抗战八年内所写的即将近一百五十部。叶景葵对很多书都是一而再地重读，或借友好所藏善本仔细校勘，例如民国十六年（1927）所得旧抄本《贾浪仙长江集》十卷，先借江苏国学图书馆藏本对校，次用《文苑英华》覆校，再用《全唐诗》三校，最后又借到录宋本做第四校，如此不惮其烦，真令人佩服他用功之深。民国二十六年（1937）他的夫人朱氏生病，夜间陪护时，景葵以校勘《韩诗外传》十卷为遣，两个半月后夫人不治，他亦告停笔；到二十八年时（1939）悲痛稍定，便改用黑笔校完所余部分，以慰既亡，并示有始有终之意。

从《卷盒书跋》中可以看出，叶景葵除重视名家手稿与批校本外，凡是他自己或亲朋师友的撰

張道堂先生示我函云：樓燹錄書錄底稿，出於戴用，公南唐書
 箋注，其卷序，係樓燹抄中，未附圖吳先收，合於周耕，屋信，周耕，時好，載
 數，不條，引，業，富，曾，我，精，官，之，思，借，鈔，本，中，書，海，寄，未，陳，仲，並，鈔
 錄，今，三，冊，而，公，每，破，第，二，冊，計，破，第，一，冊，第，八，凡，五，卷，乃，滿，紙，書，携，鈔，補
 完，今，中，書，錄，時，因，見，底，稿，用，藍，筆，錄，耕，屋，抄，用，朱，筆，今，批，以，墨，筆
 補，三，朱，抄，注，未，合，吳，校，注，吳，公，周，耕，注，周，字，慎，表，中，公，吳，有，耕，屋
 校，查，有，公，函，抄，樓，中，書，錄，考，以，有，不，同，者，向，百，何，書，而，字，者，似，仲，並
 錄，後，又，付，耕，屋，審，定，今，係，原，年，一，整，此，補，寫，完，筆，惜，如，葉，全，叶
 二，刊，日，未，見，也，年，也 庚，本，三，月，音，寓，完，系，卷，記

著,不论新作旧稿、巨帙短篇,都极为珍重,并缕述其缘由始末。以他自己的著述为例,如早年模拟乡试闱墨的八股窗课《砖屑录》、思想转变求新时撰写的《太康物产表》、《刍牧要诀》、《地学问答》、《矿政杂钞》等书,无不藏之数十年。再如他二十岁新婚不久,自己抄写而由夫人手为装订的一部《南迁录》八卷,不但珍藏到老,在其夫人逝世后,更是每年都要检视一次,目的就在睹书思人,回忆前情^①。《卷盒书跋》中类此对知交友好念旧的例子极多,娓娓道来,不落陈套,令人读后自会受他影响,而不免奇怪一名精于理财的老银行家,竟有如此丰富动人的情感!

合众图书馆

民国二十八年(1939)五月,叶景葵与张元济、陈陶遗(原名瑶,以字行,曾任江苏省长)三人,发起在沪创设合众图书馆。他们的动机是鉴于抗战爆发后,图书文献大量沦亡或流落海外的惨状,尤其是目睹一些亲朋故旧藏书急遽流失,如与景葵有数十年交谊的邓邦述“群碧楼”、宗舜年“咫园”、沈曾植“海日楼”、曹元忠“笈经室”等等,都在战争中散亡殆尽,有的为后人变卖,有的则成炮火劫灰,景葵也零星收得一些,他不但没有如获至宝的喜悦,反为之怵目惊心、神伤不已,乃与友好发愿,即使“偃鼠饮河,不过满腹”,也必致力于民族文献的存亡绝续,于是而有私立合众图书馆的诞生^②。几位发起人各将一己所藏捐出奠定馆藏基础,三十年(1941)八月一日开发起人会议,成立筹备处,景葵捐十五万元购地建馆^③。此种出钱出力又出书的作法,获得不少人响应捐书^④,的确众擎易举,合众图书馆即使在抗战中也逐渐充实,而该馆存在的十四年中,藏书达三十万册之多^⑤。至一九五二年底,合众

^① 同注⑦,页25,《南迁录》。

^② 同注⑦,页84,《抱朴子》;页106-107,《涉园图咏》;页152,《攀古小庐杂著》。

^③ 叶景葵,《卷盒剩稿》,叶35。

^④ 捐书合众图书馆的名单,参见顾廷龙,《顾廷龙文集》,页561-562,《张元济与合众图书馆》。

^⑤ 同注⑩,张元济,《序》。

董事会决议捐“馆”归公^⑥，易名“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

叶景葵等创办合众的宗旨，除了保存文献，还要广为流传以免湮没亡佚，于是又有编印丛书之举，以馆藏先贤未刊稿或刊而难得者为限，并由董事各人认捐印行。抗战中陆续出版第一集十四种，首先问世的是景葵捐书捐资的《恬养斋文钞》四卷、《补遗》一卷，民国二十九年（1940）排印，这部书是他景仰的杭州乡贤罗以智（镜泉）文集稿本，《补遗》则是他搜集罗氏未收在文稿内的十五篇。

在《恬养斋文钞》以外，叶景葵最早刊印的图书，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在开封署名“存晦居士”所印的《地学问答》，这是当时他为推广新知，开通民智而印赠各界；其次，民国元年（1912）他在汉冶萍经理任内撰刊的《述汉冶萍产生之历史》，其实是一篇文章，先后刊登于《时事新报》、《东方杂志》，并收在《民国经世文编》之内^⑦；第三部书是民国二十三年（1934）他请人校写后石印的张惠言父子稿本《谐声谱》五十卷。至于叶景葵自己撰述的出版，除前述《卷盒书跋》等论著外，顾廷龙又搜辑其读书札记、诗作与联语，编成《卷盒贻稿》，于一九六二年印行；又于一九八六年出版《叶景葵杂著》，内容包含《卷盒书跋》、《贻稿》、《札记》、《文存》、《诗存》、《联存》及《附录》等。

尾 语

叶景葵是一位成功的银行家与藏书家，他值得称道的地方，第一是进取的精神，他原是传统的文人，一旦受到维新思想的影响，便勇于求新求知，不再视翰林清秘为理想，转而从事经济济世的工作；第二是求真的态度，他藏书重视稿本与批校本，固然是为求其真，做其他事也持同样的态度，例如他

^⑥ 《张元济书札》，页179，《致顾廷龙》，第64。顾廷龙笔录、顾燕整理，《合众图书馆董事会议事录》，页36-40。

^⑦ 同注^⑥，页52-57，《述汉冶萍产生之历史》。《东方杂志》，第九卷第三期（1912年9月），页17-19；《民国经世文编》，实业三，叶65-67。以上三处刊载内容长短不一，以《卷盒书跋》所载最为详尽。

身为汉冶萍公司经理,在研究出收归国有为振兴公司最佳途径后,即执著原则,毫不考虑国有后自己能否留任其位,也不惜因此得罪公司董事会而去职;第三是开阔的心胸,对于藏书并不扃密自珍,或希图传之子孙,而是联合同志传之社会。如从义利计其赢亏,则叶景葵真不愧是精于理财——经济财与文化财——的能手!

伦明续书楼

《四库全书》收录书籍三千四百七十种、七万九千余卷、装成三万六千三百册，抄成七部分藏南北各地，足当中国图书集大成之作；而将其中每种书籍措举大旨、条列得失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百卷，也是古今目录学的登峰巨作。可是，自从此一中华文化空前的事业完成以后，陆续有不少学者批评怀疑《四库全书》“稽古右文”的权威性，也有学者多所匡正《总目提要》的一些错谬，其中主张续修四库最力，甚至自号室名为“续书楼”以见志的一位，是广东省东莞县籍的伦明。

家世生平

伦明，字哲如，东莞县溪乡的望牛墩人，生于清光绪元年（1875）十一月，他的父亲伦常，字符第，号棣卿，生于道光十四年（1834），为咸丰十一年（1861）辛酉科乡试举人，大挑陕西知县，因寡母年老呈准改分邻近的福建，光绪八年（1882）左右母亲病歿后再改为江西。伦常精擅医药，前往江西报到时，获得同擅医术并曾为慈禧太后治病的巡抚潘霨（伟如）青睐，委以创办公医院事；再



伦明像

派良口厘局差事,不久补授崇仁知县,任内设征收局、盲人院、疯人院,捐俸修桥坝、县署,增建毓秀书院,捐藏书于院中,光绪十五年(1889)卒于任所,年五十六。

丧父当年伦明十五岁,在兄弟四人中排行第二,他幼年先已失恃,两个弟弟为继母所生。长兄伦迈,字静如,宣统元年(1909)最后一科优贡。伦明自己二十岁入县学,又中光绪二十七年(1901)庚子辛丑并科乡试举人。三弟伦叙,字达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科顺天乡试举人;四弟伦绰,字绰如,监生。

光绪二十八年(1902)诏旨重开京师大学堂,伦明偕同伦叙及堂弟伦鉴(淡如)同赴北京就读,不久伦绰也追随入都,在大学堂五百学生中,伦氏一门四杰,可称佳话。当时大学堂分预备科与速成科,速成科再分仕学馆与师范馆,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开学,伦氏三兄弟均入师范馆习英文,低一班的伦绰也入师范馆,但兼习英文与日文。

两年后伦明升入大学堂新成立的优级师范科,伦叙入文科,伦鉴入农科,三人均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毕业。伦明与伦叙或因原本即是举人,伦明且已是分发广西候补知县,故两兄弟都未列入学部奏奖名单内,伦鉴则以毕业成绩优等(74.33分)奖给举人,以中书科中书尽先补用;伦绰后来入政科,毕业成绩中等(68.06分),奖给举人,以各部寺务用。

大学堂毕业后,伦明遄返广东从事教育工作,先就广东模范高等小学堂校长,继任广西潯州中学堂校长,再回广州先后任两广高等师范学堂教员、两广方言学堂教务长。宣统二年(1910)九月,张鸣歧自广西巡抚升任两广总督,聘伦明入幕,至翌年辛亥革命止。

民初伦明任广东省视学官,四年(1915)举家迁居北京,六年(1917)任参议院秘书,七年执教北京大学法预科;十三年(1924)赴河南任道清铁路秘书长,居河南三载;十七年(1928)任东北奉天通志馆协修,助印《四库全书》;十九年(1930)应日本汉学研究团体“斯文会”之邀,至东京鉴定古籍;其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大、辅仁大学、民国学院等校教授,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研

究员等。

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月,伦明返粤扫墓,以七七事变后交通不便未能北上,改任广东省立图书馆副馆长兼岭南大学教授。日军攻陷广州后避居望牛墩故里,欲往香港任教亦未果,终于抗战中赍志而歿,卒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十月,享年七十岁,另一说伦明卒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①。

续书楼藏书

伦常是东莞当地有数的藏书人物^②。伦明幼承家传,十一、二岁随在江西父亲任所时,已喜爱购书,每月必嘱进省解饷的差役代买若干,因此独获父亲怜爱。四十年后他撰写《续书楼藏书记》^③,犹念念不忘溯至幼年的购藏。

伦氏续书楼的藏书基础,奠定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入京师大学堂至辛亥为止的十年之中。首先是初入大学堂时期,正逢义和团与八国联军之后,王府贵家散出的珍籍颇多,伦明每天赴琉璃厂与隆福寺一带的书肆,必满载而归;同时又经常向广东同乡中有“湖楼”藏书的度支部右丞曾习经(刚父)借抄,曾氏好书成癖,伦明与他“书”味相投,乐此不倦。其次的藏书阶段是他毕业后执教广东期间,收购南海孔广陶“三十三万卷书堂”、鹤山易学清“目耕堂”、番禺何氏、钱塘汪氏等大小藏家流散的图书不少。第三则是辛亥那年,革命起后北京人心仓皇,书价也告贬落,当时伦明在京,正苦行囊不丰,却喜得一位叶姓同乡慨借,痛快搜购了四大箱图书载运南归。

经过这前后约十年的搜求,伦明的“书癖”有增无减,终于在民国四年(1915)迁居北京,以便在宝山书海中从容搜讨,而且经常趁南来北往之便在

^① 前者据恽如莘,《书林掌故续编》,页137-141;洗玉清,《记大藏书家伦哲如》;后者据徐信符,《广东藏书纪事诗》,《伦明续书楼》。

^② 莫伯骥,《五十万卷楼藏书目录初编》,《序》,叶3。

^③ 《辅仁学志》,第一卷第二期(1929年9月),页61-65。

各地留意古籍善本,他比喻自己收书有如伯乐一过而良马空^④。后来为求得书之便,干脆效法前辈大藏家黄丕烈开设“滂喜园”书肆之例,民国八年(1919)前后出资在北京新华街设立一家“通学斋”书肆,自顾之不暇,从另一家“会文斋”找来一名年轻伙计孙殿起(耀卿)代主店务,并指点其版本目录学知识,甚至及于学术流变,久而久之,仅只高小毕业的孙氏竟能先后撰成《贩书偶记》、《丛书目录拾遗》、《清代禁书知见录》及《琉璃厂小志》等书^⑤,尤其《贩书偶记》名似俚俗,实则收录孙氏经手目睹约一万余种《四库》不收或是后出不及收的书,而又完全照《四库》分类编排,因此成为续补《四库全书》相当成功之作,这与伦明可谓是青出于蓝,一脉相承。

伦明搜书的原则有三:以俭、以勤、以恒。其方式则绝不在家等候书贾登门求售,而是亲自前往书肆尘灰寸积之下,或在市摊百货旧书中寻觅,甚至在获知某家书肆派往各省搜购之人将于某日回京,即先期至其肆坐候,以能先得为快。购买之外,伦明又借抄以补购买之不足,他长期雇用三、四名抄工,准备随时抄写。他这种如此嗜书的作法,为自己赢得“书虫”之号,又因他只要有书,即使衣履破旧不堪也不在意,于是又有“破伦”之称^⑥。

可惜伦明虽极力搜书,却疏于整理典藏,除了颇多虫蛀残缺,宣统二年(1910)西江大水,他在广州寓所的书为水浸失不少。事后他将藏书一半寄存南伦书院,先是为人窃取,继而在民国十年(1921)左右,书院因拓路被拆,伦明人在北京鞭长莫及,全告散失,幸而精善本都已在数年前随携北上。伦明所藏编有《续书楼书目》,但未刊行,加以上述的一些损失,故其藏书究竟多少,内容如何,都不清楚。据说以集部较多,集部中又以清人撰著最多^⑦。抗战中,蛰居故里的伦明有意将所藏让归国立北平图书馆,未成先卒。在此

^④ 同注^③,页64。

^⑤ 《丛书目录拾遗》十二卷,1934年冀县孙氏印;《贩书偶记》二十卷,1936年冀县孙氏借闲居印;《清代禁书知见录》,1960年台北世界书局影印;《琉璃厂小志》,1962年北京北京出版社印。关于孙殿起,参见赵明奇,《贩书偶记的作者孙殿起》。

^⑥ 孙殿起,《琉璃厂小志》,页13。

^⑦ 据徐信符,《广东藏书纪事诗》,《伦明续书楼》。

以前,他已看出由于时代演变,“今后藏书之事,将属于公而不属于私”^⑧。抗战胜利后,由冼玉清教授作介,续书楼遗书仍归北平图书馆收藏,完成伦明的遗愿,如今从《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中,可以发现大约有十五部(以集部为多)的书名下,载有伦明批校题跋的字样^⑨。

自藏之外,伦明也与徐鸿宝(森玉)等人共为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代购图书。该会是利用日本退还的庚子赔款设立的机构,委员会预计在北平成立大规模的图书馆与人文科学研究所,在上海成立自然科学研究所,同时进行续修《四库全书》。在图书馆方面,开始筹设即以五十万元(一说四十万)巨款大购图籍,因得伦、徐二人代为鉴定,尽管在数量上不足与北平图书馆抗衡,其价值则几无逊色,尤以钞校稿本及各地方志为最。

续修四库全书

乾隆纂修《四库全书》时,所收既偏而不全,修成以后新出问世的书更不在少数,因此从光绪十五年(1889)王懿荣首先倡议续修以后,不断有讨论响应的主张^⑩。同时,为使仅存的库书广为流传,并宣扬于世界,民国成立后也有数次影印的计划。每当一次旧事重提,便在朝野上下引起骚动热潮,报章杂志连篇累牍,各执一说,甚至通电一番,而不论是倡议续修或照本影印,伦明都是其中最热心的人之一。

伦明自己藏书颇重清人撰著,所以对《四库》所收书范围之偏狭、既收书内容之讹误、未收书种类之繁多都非常了解,因此他主张《四库全书》应予增补、重校、续修,三项中又以后者为最重要。伦明从民国十三年(1924)起立

^⑧ 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正风》半月刊第二十期(1935年9月),页93。

^⑨ 这十五部书是史部的《所知录》、《补寰宇访碑记》、《读书敏求记》、《见闻录》;集部的《杜工部集辑注》、《义丰集》、《海岳山房存稿》、《藏山阁诗》、《姑山遗集》、《白云村文集》、《东江诗钞》、《畏垒山人诗集》、《间丘集》、《西庄始存稿》。

^⑩ 关于续修或影印《四库全书》种种,参见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附录:《四库全书之续修与影印述略》。

志续修库书,自号室名为“续书楼”,又得同乡胡姓富商资助,预计每年以三千元费用,连续五年期以告成,但才开始不久就因富商生意失败而成泡影。

民国十四年(1925),教育部长章士钊计划影印库书。这已是第三次旧事重提,消息腾布后,伦明在报上发表一篇《续修四库全书刍议》,建议改影印为续修,并就搜集、审定、纂修三方面详加讨论,主张凡成于清顺治元年(1644)以后的书均予收录,再依各书内容价值高低分成甲乙丙三等;又建议趁修书之便顺带完成《国史经籍志》与《清史·儒林》、《文苑》两传,因经籍志不限于清代,故用“国史”两字。以后教育部的影印计划中辍,各方建言卓见也告偃旗息鼓,只有伦明的《刍议》长文在十六年(1927)的元月和八月,先后由胡朴安主编的《国学月刊》和袁同礼等主持的《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两度重为披露,可见他的主张受人重视一斑。

民国十七年(1928),伦明应东北当局之邀,赴沈阳协助筹印文溯阁《四库全书》事宜。这是民国以来第四次。伦明以筹印会总裁、副总裁张学良、翟文选等人名义,起草宣言通电全国,并译成外电发至各国,宣言中除揭橥东北地方影印此书的决心,更显示了伦明对《四库》的一贯思想:

[...]学良等爰发宏愿,拟垫私财,就兹巨编,影以新法,售取廉值,成限短期。更有进者,阁书创始,美犹有憾,搜求未遍,忌讳过深,秉笔诸儒,弃取亦苛,漏略不免,亟宜补苴。又况乾隆距今,时逾百载,家富珠璧,坊盛枣梨,或阐古义,或拓新知,冰水青蓝,后出更胜,不有赍续,曷集大成。加以鱼豕之讹,古籍多有,校雠之学,时贤亦精,广参众本,旁稽异文,别成札记,附于书后。凡兹三事,亟待并举。[...]⑩

这段电文内容是他一向主张的增补、续修、重校,这三项学术性的整理工作加上机械性的影印工作如能实现,确实不逊于乾隆初修“库书”的百世盛业。因此通电之后,引起中央也要争印“库书”的一番僵持,不料主持东北影印计划的杨宇霆突于十八年(1929)初被刺,于是又告搁浅而不了了之,而

⑩ 同注⑩,页249-250。

中央方面却也不再进行了。伦明快快而返,此次东北之行只完成了一份《续修总目》,包含一万种图书,几乎是原有《四库全书》的三倍。

第五度影印“库书”的争议起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当时南京成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负责筹备的蒋复璁呈准选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未刊珍本,于是再度引起学界名流如蔡元培、叶恭绰、张元济、董康等等,与教育部之间的函电交驰,《北平晨报》、天津《大公报》、上海《申报》等,都辟专刊报导,甚至举办专题征文,令人目不暇给。

当时伦明也在天津的《国闻周报》上,发表一篇《拟印四库全书之管见》^⑫,这一次他和其他的众说纷纭有些不同,一般人还是和历次争议一样,斤斤于“库书”优劣与选印取舍的问题;伦明却就实际影印的行格、用纸、工费、装订、成本、售价等项加以探究,或许他已预卜这第五次的影印计划终有实现的可能,因此宁可早观厥成。他在此文中引述足发深省的前人《题观钓图》诗:“得鱼同一乐,何必我持竿。”果然在中央图书馆蒋复璁和商务印书馆王云五的合作下,两三年中印成“库书”未刊珍本初集二百三十一一种,一千九百六十册。以后由于抗战爆发,未能继续原订影印近千种的计划,但酝酿十余年的“库书”影印总算有了一些具体的成果。

至于《四库全书提要》的续修,伦明先是独力进行,完成经部尚书类,部分稿曾发表于《燕京学报》上。大约从民国二十年(1931)起,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积极展开续修《四库提要》的工作,伦明应聘为该会十多名研究员之一,在全部六十类中,他参与撰著的有十一类,负责整理主编的有经部尚书类等五类,史部传记类、集部别集类的广东部分,他并以续书楼藏书供委员会之用。

委员会的续修工作,在日人桥川时雄主持下,共完成二万八千余部书的提要,先后参与撰写的有八十五人,直到太平洋战爆发而停顿,而伦明则已在数年前困居千里之外的广东,极可能未曾与闻战争期间的续修工作。

^⑫ 《国闻周报》,第十五卷第三十五期(1933年9月),页1-7。

事隔三十年后,台湾商务印书馆辗转自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获得仅存的一万余部书的续修提要稿,在民国六十年(1971)印成《续修四库全书提要》,连索引共十三册,每篇提要或署作者姓名或付阙如,各类中由伦明署名较多的如四书类的二百四十七篇、孝经类五十一篇,都超过这两类的半数以上。

伦明在《续修提要》以外的著述似不多见,已知有登在燕京学报的《续书楼读书记》、《渔洋山人著述考》,登在《辅仁学志》的《续书楼藏书记》、《建文逊国考疑》等篇,以及蛰居故里时的乡园忆旧七言绝句数百首。此外,他最出名而脍炙人口的,当为继叶昌炽《藏书纪事诗》而作的《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

叶氏的《纪事诗》记至清末为止,每一藏书家各赋一诗,自宣统二年(1910)增订重刻后风行海内,一时步武之作此唱彼和,而关于藏书家的文献也大为增加,伦明除了为叶氏增补数十人,自己也新作《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顾名思义是民国以来的藏书故实,凡一百五十五首,以叶昌炽为首,而梁鸿志殿后,其中不仅私人藏书家而已,又及

于公家藏书与市廛中的书估之辈,自民国二十四年(1935)底起,在《正风》半月刊连载九期。伦明既精于版本目录学,本身又是藏书家,又是书肆老板,加上数十年中南北各地无所不至,耳闻目睹尽是真切的藏书轶闻,因此写来自是与众不同,为人所乐看,徐信符称他是最熟于藏书掌故的广东人,洵非

自賢
 云史先生五十四初度
 東莞倫明呈稿
 汝社相從有幾年
 談齋老去富詩篇
 才名舊著蓮花幕
 韻事新題燕子箋
 祭戟能容長揖客
 竹松共保歲寒天
 不因解肉生微感
 卓帽遼東也

伦明诗稿墨迹

虚誉^⑬。可惜的是伦明此作在体例上不如叶氏的严谨,往往涉想所至即笔而书之,精悍有余,完整不足,尤其各藏书家年里言行等基本资料几都无有,后人据以研究时非大费周章不可。

民国二十年(1931)以后,燕京大学在洪业(煨莲)主持下,陆续编印一套汉学引得丛刊,包括二十六年(1937)左右蔡金重编的《藏书纪事诗引得》一种,收录叶昌炽和伦明两人的先后《纪事诗》^⑭,这套引得丛刊是汉学研究重要的参考工具,而伦明所作得与叶氏并列垂诸久远,确实可以自慰的了!

尾 语

二十世纪上半叶关于影印《四库全书》的几次计划,数十年来已在台湾与大陆先后实现。只是,影印终究与伦明倡议的校补续修有别,性质上既各不相侔,价值上更不可等量齐观,而且影印固可成于民间,校补续修恐非政府不足以为之,即使一时难以蹴及,退而求其次,先编印一部《四库以来中国图书总目》,有如伦明当年在东北所编续修总目之类,将乾隆纂修《四库》迄今二百余年种种书刊作一总的纪录,实在是这一代人对千秋万世应做而且能作的事。

^⑬ 广东文物展览会编,《广东文物》,卷九,页2-7,徐信符,《广东藏书记略》。

^⑭ 伦明的《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一共在《正风》半月刊载九期,从第二十期至第二卷第三期连载八期后,又于第二卷第五期注销最后一篇。蔡金重编索引时,可能因疏忽而未收录最后一篇。

张寿镛约园

褒扬令

私立光华大学故校长、前财政部次长张寿镛，才识恢弘，学术渊懿；南京奠都后，襄理中枢度支，兼长苏省财政，兴利除弊，懋著勋勤；晚年致力教育事业，成材甚众；抗战军兴，留居沪上，身处忧危，犹能殚精著述，觉世救国之忱，老而不倦。兹闻溘逝，轸惜良深，应予明令褒扬，并将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国史，用表耆贤而资矜式。此令。中华民国三十五年（1946）一月十日。主席蒋中正^①

早年经历

张寿镛，字咏霓，号伯颂，别署约园，浙江鄞县人，生于清光绪二年（1876）五月二十九日，卒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七月十五日，年七十岁。他的父亲张嘉禄，字肖菴，号受百，光绪三年（1877）丁丑科进士，历官翰林院编修、监察御史、兵科掌印给事中，是一位正色立朝的台谏典型，著有《困学纪闻补注》二十卷、《小漠觞馆文集注》四卷、《寸草庐奏稿》二卷。

光绪二十二年（1896）张寿镛补县学生员，二十六年（1900）父亲病逝，他经父执引介入江南制造局充当文案，再远赴淮北助榷盐务。光绪二十九年

^① 《国民政府公报》，渝字第955号（民国三十五年一月十一日）。

(1903)中式顺天乡试举人,翌年会试报罢,以候补知府分发江苏从事地方庶政,此后到宣统三年(1911),张寿镛担任过江苏海运京沽局及沪局会办、苏州警察局提调、淞沪牙厘捐总局提调、江苏藩署文案、江苏度支公所淞沪总稽查及筦榷科长等职务;民国元年(1912)出长上海货物税所。这些基层实务的历练,使张寿镛洞悉地方财税利弊所在,奠下以后掌理各省及中央财政基础。在民初二十年的历任财政总(部)长、次长中,不乏从地方出身者,但都不及他遍及制造、盐务、漕运、税捐、警察的基层经验。



张寿镛像

财政事业

民国元年(1912)九月,张寿镛应邀回浙江就任财政司长,此后十五年间历经浙江(两任)、湖北、江苏、山东四省财政厅长,以第一任在浙(元年九月至四年[1915]六月)因政情融洽易于发挥;其次在湖北(四年六月至七年[1918]八月)因连年战事,他又反对督军王占元增加发行钞票的决定而被迫去职;江苏则当九年(1920)五月任命发表后,督军李纯坚持欲用私人,使他无法到任;改调山东后又迫于当地盛行“鲁人治鲁”的说法,以致张寿镛接事七日即主动去职;十一年(1922)底他再度回任浙江财政厅长,两年后因江浙齐卢战争导致孙传芳入主浙政,张寿镛又告去职。上述他的种种遭遇,正可引证贾士毅在《民国续财政史》书中,论民国六年(1917)以后各省军人为谋扩充实力,首在把持财政,攘夺原属中央的财政厅长进退之权^②。

^② 贾士毅,《民国续财政史》,上册,第一编,页243。

在各省厅长之外,张寿镛数度奉调北京财政部秘书、总务厅长、库藏司长,执政府秘书,以及上海南北和议秘书、沪海道尹等职,一度并在北京筹办劝业银行。

民国十六年(1927)初,厌倦了北京风尘的张寿镛回到上海,准备专心于手创的光华大学。同年四月中旬,国民政府奠都南京,江苏省政务委员会随之成立,张寿镛获派为十六名委员之一,并兼江苏及上海财政委员会的委员;同年五月九日,他继陈辉德之后接任江苏省财政厅长,兼上海中央银行副行长;九月三十日升任财政部次长仍兼江苏厅长,十七年(1928)十月底再晋政务次长,但江苏兼职直到十九年(1930)初才告免除。二十一年(1932)元月政府改组,张寿镛随部长宋子文卸任,仅一个月后两人又重作冯妇,但同年底张寿镛终于辞职离开政坛,计担任财政部次长先后五年有余。

张寿镛是一位具备传统学术而求“今”世致用的过渡时期人物。他并没有太多现代财经理论的知识背景,直到辛亥革命事起后,在上海闲居的几个月中,才获读严复翻译的《原富》、《法意》等书^③,倒是他深谙中国历史上的理财治道,经常在各种文牍中引古以证今世财政之所宜,张寿镛对于财政的基本观念是“藏富于民,有予有取”,反对急功近利的财政方式,例如民初历任政府专以东南江浙为各项筹款的对象,他很不以为然,认为这只是一种竭泽而渔的手段。张寿镛这种财政观念,在民国十六年(1927)他接连受命地方与中央度支重任后,如何一面从长计议整顿江苏财政,又能同时筹付北伐大军的庞大耗费,便遭遇到现实的考验。

十六年三月,国民政府原计划由财政部长宋子文直接办理命脉所寄的江浙两省税收事宜,不料扞格难通,竟导致“故障迭生”的现象^④,不得已只好在经过“江苏及上海财政委员会”的短暂过渡后,仍旧假手于地方的财政厅,江苏省先任命陈辉德,十余日后易人,起用与国民党素无渊源但熟悉江浙上海情形的张寿镛。他就职不到一个月,财政部召集已光复的东南六省财政

^③ 张寿镛,《约园杂著续编》,卷六,叶16-17,《杂事二首》。

^④ 《国民政府公报》,宁字第1号(民国十六年五月一日)。

厅长、国税机关主管等,举行以筹款为主旨的“中央财政会议”。会中重新划分国税与地方税项目,地方税收减少,江苏仅卷烟特税(作为全省教育经费专款)一项,全年即损失一百八十万元;此外,江苏又分派得每月向中央解款七十万元(浙江五十万元、安徽三十万元、余省免解)。这次会议的结论,对原已有四百五十万元经费赤字、三千万元省债的江苏极为不利,张寿镛正在应付维艰,并于当年八、九月间身处南京危城筹措军粮,才度过龙潭之役不久,便又身不由己的在职务和责任两者都更上一层楼。

原来,财政部面对浩繁而涸且立待的庞大军费,只有借发行公债济急,当十六年(1927)九月底,即将上任的财政部长孙科携带新债计划赴上海筹款,遭当地以江浙财阀为主的金融界一致谢绝^⑤;两天后财政部即修订组织法,增设次长一人,由孙科慕名“坚邀”无何渊源的江苏财政厅长张寿镛出任其职,九月三十日任命发表,张寿镛“坚辞”了半个多月,十月十七日勉强就职,此后他既需费心于江苏一省的财政,又要分身劝销政府接连不断发行的各项公债。三个月后孙科以“克承先志”调长建设部,由宋子文兼长财政,对张寿镛的借重倚畀如故。据财政部第一年(十六年[1927]六月至十七年五月)岁出入统计^⑥,总数各一亿四千八百万元,其中张寿镛主要参与的各项债券收入达六千一百余万元,可见发行公债在当时财政上的重要性,如再加上各省(实际仅江浙两省并以江苏占大部分)解款收入一千万余元,债券与解款合计几占全部岁入的半数;在岁出方面,各项政费仅合占百分之十,军费一项却独占达百分之九十,就财政部所负每五日即需筹付一百六十万元军费的艰巨任务而言^⑦,孙、宋、张等人诸多点“券”成金之方,可说是击楫中流的北伐军得以免除后顾之忧,并终底于成的重要因素之一。

张寿镛善于理财,襄理度支,除藉发行公债度过北伐时期难关外,他在

^⑤ 《国闻周报》,第四卷第三十八期(民国十六年十月二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页4。

^⑥ 同注^②,上册,第一编,页118-124,《北伐时期财政概况附十六年六月至十七年五月底止岁入岁出表及说明》。

^⑦ 同注^②,《民国续财政史》,上册,第一编,页215-216,《宋子文在五中会议统一财政建议》。

江苏实施县级财政独立、裁并厘捐税所、整理纱丝产销等税,以期开源节流;一面协助宋子文召开全国财政会议、经济会议,以订定财经方针,又对外签订关税新约、对内裁撤厘金等等。到民国二十一年(1932),张寿镛决定还是早自宦海中急流勇退,宁可致力于教育与文献事业,他辞职后写有一首七绝《观湖上鸟飞有感》寄意:“乌鹄不烦洗染劳,天然美质刷云涛。飞飞六月今宜息,岂畏风霜惜羽毛。”^⑧

教育事业

民国十四年(1925),张寿镛就职沪海道尹的第三天,即发生五卅惨案,当地圣约翰大学学生于六月三日悬半旗举行追悼会时,遭到美籍校长禁阻,结果包括张寿镛儿子在内的五百五十三名学生相率退学,有十九名教职员也愤慨离校。张寿镛在随同当局交涉惨案善后之余,又以家长之一的身份与各界及圣约翰师生,共以“六三同志会”名义筹划自立学校,也是家长之一的前外交官上海籍士绅王丰镐捐出上海西郊大西路土地六十亩^⑨,而由张寿镛等人筹款开办,定名“光华大学”,张寿镛被推为校长。十四年(1925)九月开学,同时举行自圣约翰退学的四年级应届毕业生毕业式,于是创校开学典礼又是第一届毕业典礼,就和张寿镛身兼中央与地方财政首长一样,都是独特的纪录,但他从不以官居财政次长为荣,却始终引光华大学的成立,为自己在中举和洞房以外的平生第三快事。

光华大学成立时,设有文理工商四科及附属中学,学生九百七十人,先租赁民房上课,第二年大西路校舍落成后迁回,民国十八年(1929)获教育部立案,并改设文理工三学院及附中。张寿镛因讲慕王阳明之学,定“知行合

^⑧ 张寿镛,《约园杂著》,卷七,页3,《观湖上鸟飞有感》。

^⑨ 王丰镐,字省三,上海县人,广方言馆及同文馆学生,曾任驻英法义比等国随员、驻日参赞及横滨总领事、浙江交涉使、浙江特派交涉员等,生平事迹参见钱基博,《光华大学创办人王省三先生传》,(《光华大学十周年纪念册》,页8-14);张寿镛,《王省三先生墓志铭》(《约园杂著续编》,卷八下,叶45-46);苏精,《捐地创办光华大学的王丰镐》,《传记文学》,第四十七卷第一期(1985年7月),页59-60。

一”为校训,但成立不久由于张寿镛身负财政重任,校务泰半由副校长朱经农等人领导。二十一年(1932)一·二八事变时光华校舍遭到破坏,一度迁到愚园路上课,整修后才又迁还,张寿镛就在此时辞去财政部政务次长一职,专注于光华的发展。以他的长才经营一所学校自属绰绰有余,数年中又增购约六十亩校地,陆续兴建科学馆、体育馆、健身房、工场、疗养院、大礼堂等设施,光华师生并将礼堂命名为“丰寿堂”,表示对王丰镛和他的敬仰。

抗战开始,光华大学受到沉重打击。二十六年(1937)十一月中旬,日军进抵上海西郊,焚毁光华全部校舍,张寿镛率领师生一再迁徙,维持弦歌不辍,先至愚园路,随即转入租界,大学部先后在爱文义路、白克路等处上课,中学部则搬到威海卫路,最后大、中学部都集中于汉口路租屋上课,张寿镛自兼附中主任。他并高瞻远瞩计划逐步迁移内地,于是请商学院院长谢霖甫入川筹备,获得张仲铭捐赠成都草堂寺附近六十余亩土地,开始兴建校舍;二十七年(1938)夏天成都分校落成招生,这时张寿镛六十三岁,不顾战争中蜀道之难,先期自上海、香港、重庆,转抵成都主持开学典礼,随后登青城、峨嵋各山,周历考察四川大学、华西大学,及西迁的中央、复旦、武汉各大学,两个半月后又赶回上海,与光华本校师生共患难,“意气慨然,不知其老”^⑩。战时西移的学校,无不因陋就简,狼狈不堪,据教育部调查,只有光华的成都分校最称完美^⑪。抗战胜利后,分校改由当地人士接办,称为成华大学。

民国三十年(1941)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也失去掩护作用,张寿镛只好在名义上解散光华大学,实际则另设“诚正学社”收容文学院师生,“格致学社”收容理商两学院师生(格致诚正为他为光华所定另一校训),而“壬午补习班”则是附中化身。张寿镛本人则于自宅藉“养正学社”为名,为学生讲授史学大纲、子学大纲等课。由于他的苦心孤诣,身先师范,所谓“雨淋日炙全不管,风霜历练见明驼”^⑫,使光华大学成为沦陷区极少数仍能维持上课的学校之一。

^⑩ 同注③,卷八下,页30,《游蜀草序》。

^⑪ 教育部,《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五编高等教育,第二章公私立大学,《私立光华大学》。

^⑫ 张寿镛,《约园杂著三编》,卷八,页3-4,《壬午夏光华同学来会戏作光华歌》。

文献事业

张寿镛以理财办学之能著名,其实他也是一位藏书家,从民国九年(1920)起大量搜藏,后来约园中十一间书室共积聚达十六万卷^⑬,以数量衡量,其规模介于大小藏家之间。但张寿镛藏书自有其特点:第一,就版本而言,他绝不购求宋刊本,而是以明刊本和钞校本为主。他说:“余以读书人而号藏书家者,所得皆中驷耳,人曰佞宋,我曰避宋,购一宋而非宋者百部千部甚或万部去矣!”^⑭民国二十六年(1937)冬,张寿镛别开生面的以刊刻年代先后为序,编成《约园元明刊本编年书目》,目中除五部元刊本外,共有明刊本七百三十五部,最多的是万历朝的二百八十二部、嘉靖朝二百一十二部。钞校本方面,张寿镛也藏有二百五十四部,其中以阮元校宋本《太平御览》一千卷为最,这部大书是民国十九年(1930)他从歙县宋炳经“一览楼”获得,而一千元的书价也是张寿镛平生购书最大的豪举。

约园藏书第二个特点,是为数众多的宁波文献和乡贤著述。他有计划的从整理、搜集、刊布循序渐进,先集合同志以五年时间编成《四明经籍志》五卷,再请朋好纂辑《四明经籍提要》甲集十卷^⑮,然后进行搜集的工作,除随时搜购外,张寿镛又辑佚、传抄同时并举;辑佚方面先后采获三十二种,包括他亲自辑出的唐虞世南《秘监集》、宋丰稷《丰清敏公遗集》等七种;传抄方面则先后抄自北平图书馆(十七种)、刘氏嘉业堂(十五种)、文澜阁等公私藏家。历来注意各自乡邦文献的藏书家很多,但都只是被动的随遇随购,像张寿镛如此主动而有计划的进行方式极为罕见,因此收获也极为丰富,以明末张煌言的《苍水集》为例,他先后收得有八种不同的版本。

^⑬ 约园中十一间书室各命名如下:独步斋、双流龛、临流轩、带草堂、听雨楼、葆光簾、尚綉室、鸡鸣馆、燕谿榭、三益庐、咫进阁。

^⑭ 同注^⑬,《自序》。

^⑮ 《四明经籍提要》原拟分甲乙丙三集,甲集为四全书著录者,乙集为郡县艺文经籍志所录、《四库》未收而其书尚存者,丙集为不见著录而其书尚存者。但甲集完成后因编纂人病歿而告停。

民国十九年(1930)起,张寿镛开始就所藏地方文献进行《四明丛书》十集的编印工作。他选择付刊的原则是:“先取有关乡邦利弊、足资身心学问,而坊肆无传本或传而未广者,若屡经刻印之书或卷帙过繁者,则皆从缓。”^⑥这部丛书从二十二年(1933)初完成第一集,抗战中仍继续进行,各集刊印情形如下^⑦:

第一集,二十四种,一三六卷,六十册,二十二年六月出版。

第二集,二十二种,一七一卷,六十四册,二十三年九月出版。

第三集,十七种,一八〇卷,六十四册,二十四年五月出版。

第四集,三十七种,二〇九卷,八十册,二十五年四月出版。

第五集,一种,一百卷,一百册,二十六年九月出版。

第六集,三十二种,一三〇卷,六十四册,二十八年十二月出版。

第七集,二十七种,一五〇卷,六十四册,二十九年九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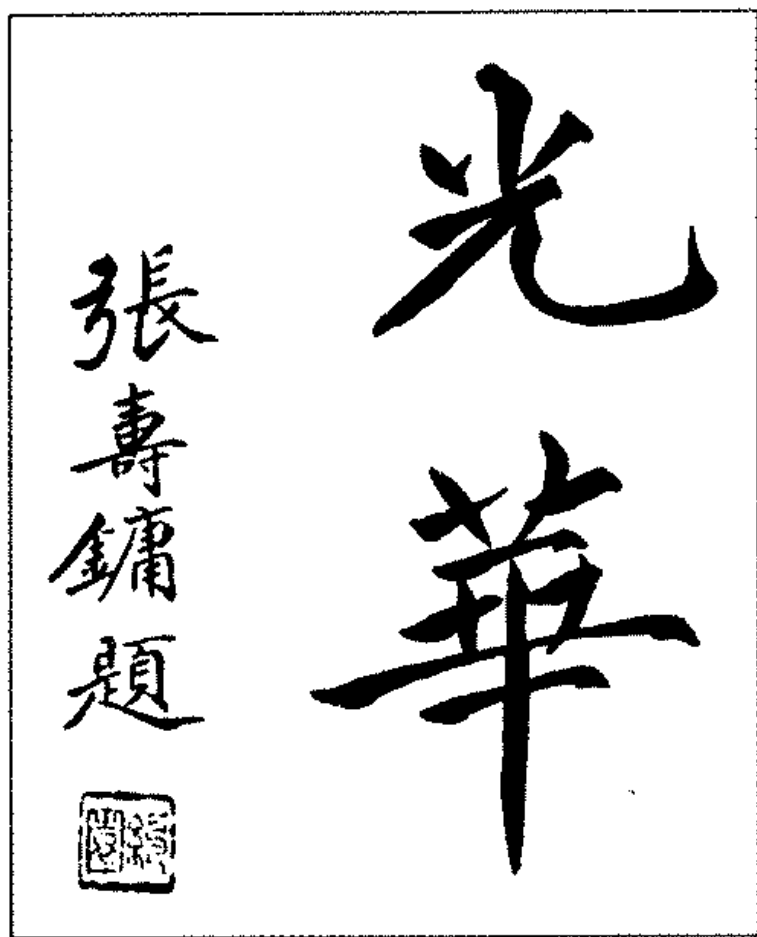
第八集,十八种,九十六卷,六十册,一九五〇年出版。

张寿镛去世前第八集只刻成一半,卒后五年才由儿子张康源等人继志完成,而张寿镛生前已经拟好目录待刊的第九、十两集共二十七种,却永无问世的可能了。其实,单就《四明丛书》这八集、一百七十八种、一千余卷的规模,在浙江林林总总的郡邑丛书中,不但是名列前茅,甚至也比全国大多数的各省丛书更可观。在狼烟烽火中,张寿镛能留在敌人占领区内,尽力于下一代的教育事业,并从事先贤遗著的校刊,“今人与居者在光华大学,古人与稽者在《四明丛书》”^⑧。可说是颇不寻常的,而且他还与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教授郑振铎三人,共同接受政府的委托,负起在上海抢救沦陷区古籍的任务,从二十九年(1940)初到三十年底,共搜购一万五千部左右,后来中央图书馆所藏的善本书,大约三分之一是他们当年冒险的成果,中华历代先

^⑥ 张寿镛,《四明丛书》,凡例,页1。

^⑦ 关于《四明丛书》详情,参见冯贞群,《编辑四明丛书记闻》(《张公约园逝世周年纪念册》);徐小燕,《张寿镛四明丛书之文献价值》。

^⑧ 同注^③,卷四,页24,《四明丛书第六集后序》。



张寿鏞手迹

贤心血所寄,不致尽化煨烬劫灰,后人应当感谢他们奋不顾身的义行。

早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张寿鏞便和其弟张寿鎬及友好,在上海编纂多达一百卷的《皇朝掌故汇编》,他负责外交部分。不久,他开始钻研王阳明之学,以后讲求四十年,当光华大学成立后,又经常在校刊《光华》上撰写理学文章。不过,张寿鏞的述作大都在民国二十年(1931)以后,他离开政海不久,撰成《约园善本藏书志》六卷,接着为《四明丛书》

每一集、每一种撰序。抗战中张寿鏞不忘读书,将藏书遍加题跋,普通本者辑成《癸未检书记》,善本则为《甲申检书记》,并先后完成《诗史初稿》十六卷、《史学大纲》、《子学大纲》、《约园杂著》及《续编》、《三编》均各八卷,《游蜀草》、《和陶吟》两部诗集。张寿鏞就是因为讲学、治事、著述过于劳瘁,在糖尿病和肺疾的侵袭下终于不治,他七十岁生日当天,学校师生聚集病榻前祝寿,他还殷殷以“复兴中华、复兴光华”为念,不幸七天后就去世了,距抗战胜利只差一个月。

莫伯骥五十万卷楼

生平简历

莫伯骥，字天一，广东东莞人，生于清光绪四年（1878）。他的父亲莫启智，字毓奇，号镜川，县学廪生，以教读为业，并钻研宋明理学，在当地颇受敬重，著有《诫子庸言》二卷，不幸年仅三十七岁而卒，有子二人：莫伯坝，字友箴，宣统元年（1909）岁贡生；次莫伯骥，二十岁以案首入县学，又到广州光华

医学堂学医，毕业后自设“仁寿西药房”于广州西关。光绪庚子前后，伯骥协助堂兄伯伊（字任衡，光绪二十三年〔1897〕拔贡）创办《羊城报》，伯骥负责编辑工作，直到民国十四年（1925）羊城报停刊。二十六年



莫伯骥画像

(1937)抗战爆发,莫伯骥举家迁往香港,再移居澳门,但双目失明并患瘫痪,至一九五八年卒于澳门,享年八十一岁。

五十万卷楼藏书

近代广东藏书的风气很盛,而且各具特色,以民国以来较著名的几人为例,如伦明“续书楼”的清人诗文集、徐信符“南州书楼”的广东地方文献、潘宗周“宝礼堂”的专收宋本,而莫伯骥的“五十万卷楼”顾名思义即是以量取胜了。在他之前,广东藏书家以卷数名楼的是清末同光之际的孔广陶“三十三万卷书堂”(即岳雪楼),莫伯骥后来居上,五十万卷的声势惊人,直逼近代我国藏书第一的刘承幹“嘉业堂”六十万卷。不论莫伯骥所藏是否真达其数,他的藏书之多居民国以来广东第一,确是翕口同声公认^①。

莫伯骥最初从父亲承继一些宋明诸子的图书,以后从乡间到广州创业办报,开始大力搜藏,药房生意的盈余全部投入购书,广东之不足,又推广赴江浙京津各地搜求。他的藏书处原来称为“福功书堂”,是根据阮元所撰《虞山张氏诒经堂记》一文,勉人藏书、撰书、刻书,则于己有福、于人有功的说法而来^②。以后积聚多了,才改称五十万卷楼。莫伯骥自己叙述,他得书来源包括盛昱、徐坊、丁日昌、方功惠等十几个大家的旧藏,以及清宫内府流出的珍本等等^③。不过,他的藏书目录显示,他并没有从任一家收过大量的旧藏,最多的是原属叶德辉“观古堂”的三十许部,另外曾一次买到孔广陶“岳雪楼”六橱图书,究竟若干部则没有说明。

莫氏五十万卷楼中有三十八部宋本和八十部元本,这个数字就民国以来收藏宋元古书的情形而言,约略介于大、中两种规模的藏书家之间。其中

^① 徐信符,《广东藏书纪事诗稿》,《广大学报》,第一卷第一期(1949年3月),页662。何多源,《广东藏书家考》(二),《广州大学图书馆季刊》,第一卷第三期(1934年6月),页398。朱希祖,《朱希祖先生文集》,第六册,《郾亭粤行日记》,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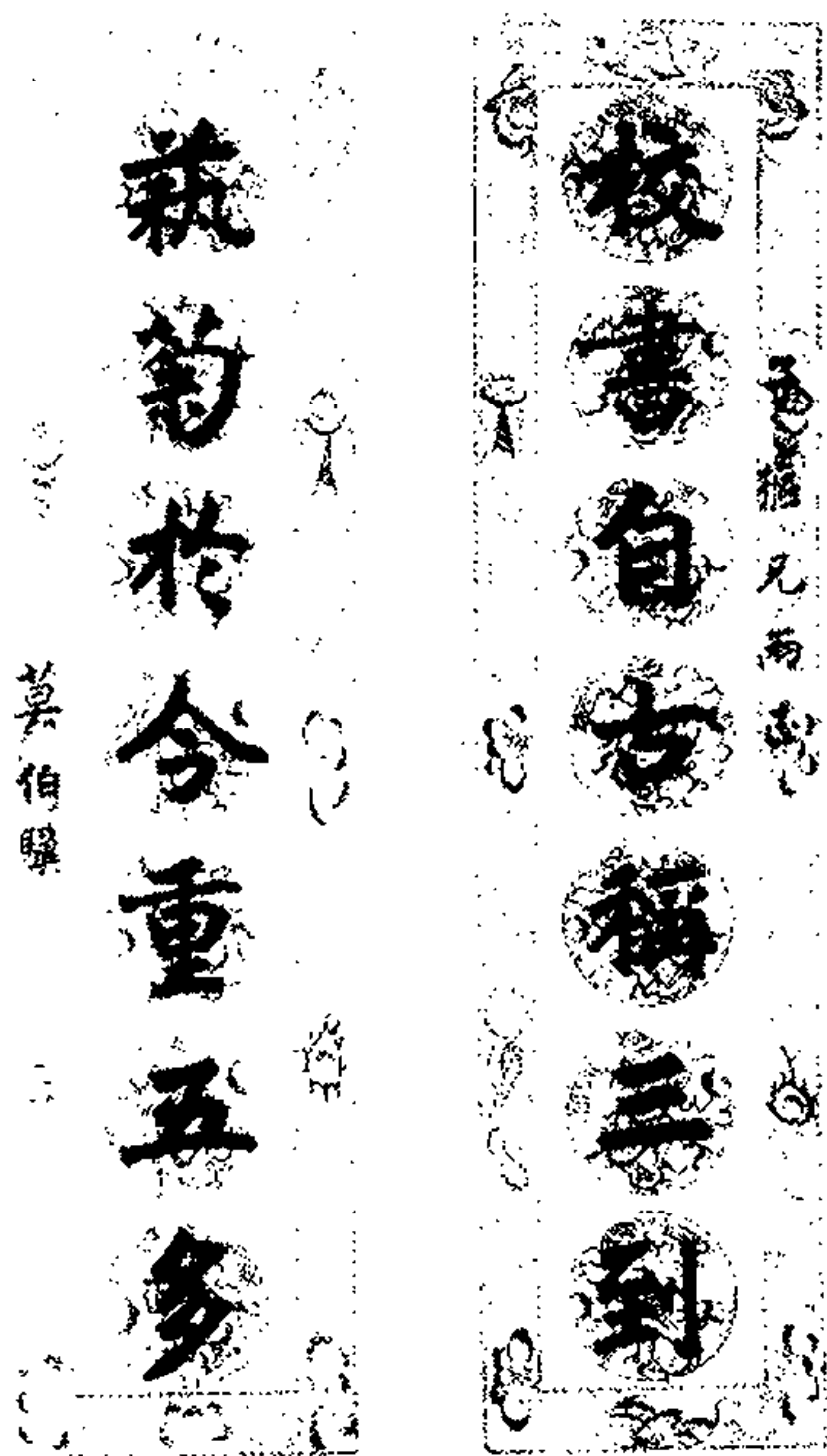
^② 阮元,《羣经室集》,卷三,页133-134,《虞山张氏诒经堂记》。

^③ 莫伯骥,《五十万卷楼藏书目录初编》,《序》,页4。

他最注重的是两部唐人文集：李翱的《李文公集》和孙樵的《孙可之集》。《李文公集》的宋刊本极为罕见，因此莫伯骥从书估买入时也不敢断为宋版，历经考证才予确定，无怪他要兴奋地写下将近三千字的长跋了。至于《孙可之集》则更是五十万卷楼的镇楼宝书，莫伯骥形容其“字画介于欧颜之间，骨肉停匀、调节环燕，雕镂精美、扞之有棱，选楮用墨、咸臻佳妙，[…]且朱字灿烂、新若未触”^④。此书原是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的珍藏，书中并有顾千里、黄尧圃的题跋，民国十九年（1930）海源阁遭劫匪抢于前，主人售于后，珍本相继散出，其中的《孙可之集》由北平书估买进后，千里远寄莫伯骥求售，他自承秘籍当前，能不

心动？于是不惜以将近三千元的高价收购，成为五十万卷楼的大弓美玉。

抗战中莫伯骥避居香港，随身携带的书仅有四箱，留在广州的多达一千四百箱，散出流落市面的不少，部分被人以废纸出售，损失之重可说是图书文献的一大灾厄。他最为保重的《孙可之集》后来归于北京图书馆，其他五十万卷楼藏书也零星散入“中央图书馆”、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据说中山图书馆所得的六十六种中，竟有十五种是孤本^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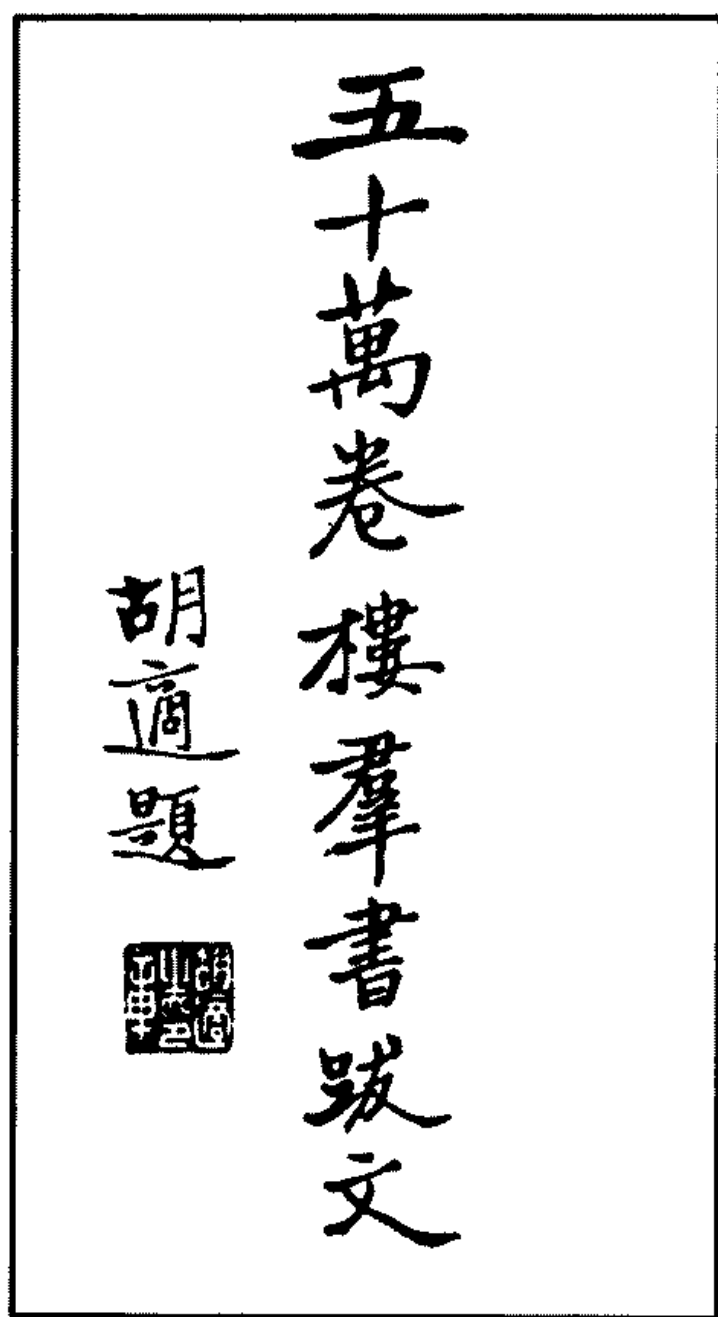


莫伯骥手书对联

④ 同注③，目十五，页 893。莫伯骥，《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集一，页 400。

⑤ 罗焕好，《我国近代著名藏书家莫伯骥及其五十万卷楼藏书》，页 269。

藏书题跋



胡适题莫伯骥书跋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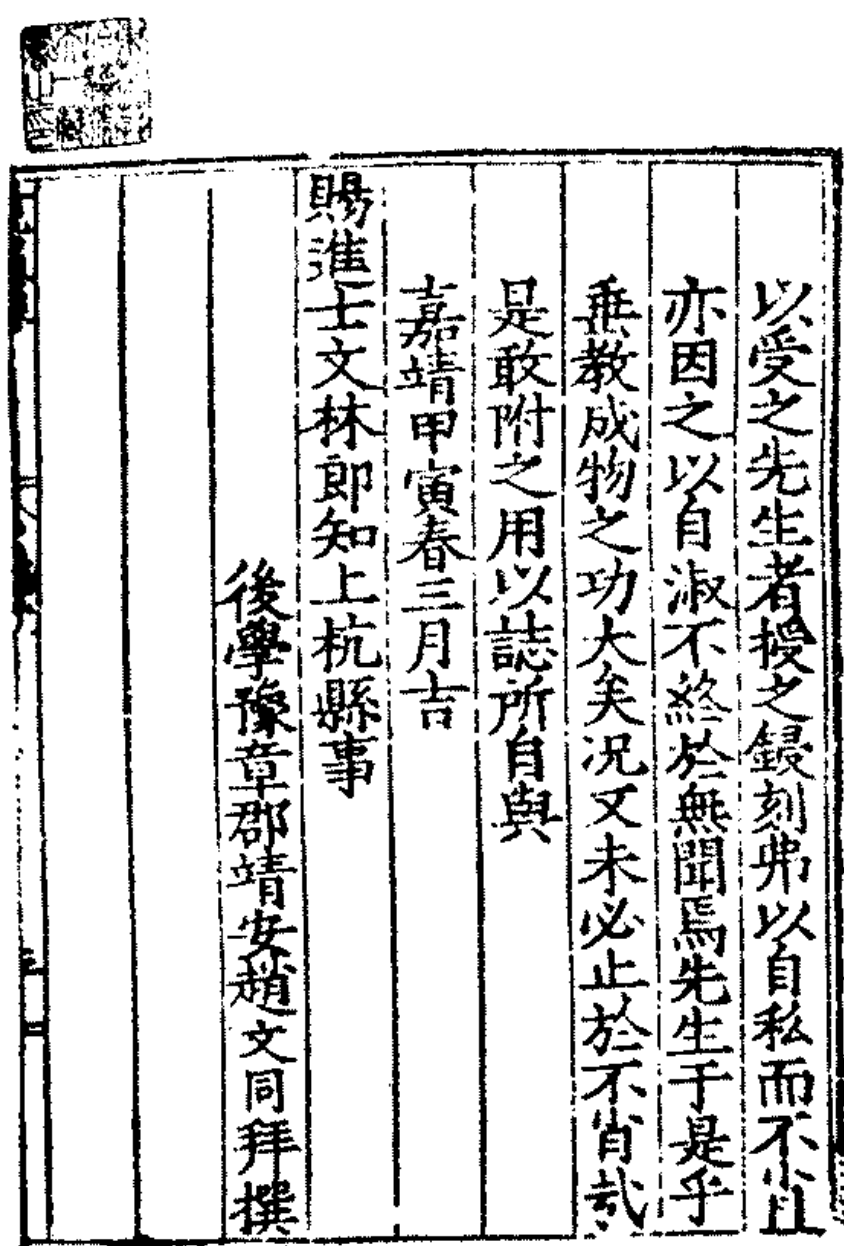
莫伯骥青年以后由儒入商，但他对所藏书仍然好读不倦，所撰题跋陆续刊登于《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月刊》、《岭南学报》、《图书馆学季刊》、《北平图书馆馆刊》等处。民国二十年（1931），莫伯骥将历年题跋交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五年后出版《五十万卷楼藏书目录初编》二十二卷，收书九百部左右。此后他继续加以修订，到一九四九年又出版《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收书四百零三部，其中只新增一部《虚斋乐府》，其他四百零二部的跋文都是就《初编》所写予以改定删补者，几乎每篇都大为增长，以致收书数目虽不及《初编》之半，全部字数却约略相近。

莫伯骥撰写的题跋是历来最特殊的一家，不仅篇幅长度可观，动辄洋洋数千言，而且内容几于无所不有，取材引证也古今中外不拘，以经部的《五侯鯖字海》一书为例，此书原是清代内府天禄琳琅所藏，书上钤有“古稀天子之宝”、“五福五代堂”等玺印，于是莫伯骥详考其缘由，涉及撰《二十二史札记》的赵翼，由赵翼而谈其治河之法，再由治河而引述两位外籍工程师对治理黄河的意见等等。又如集部的《逃虚子集》一书跋文，莫伯骥除作者明代姚广孝其人其事，因集内有咏石经诗，莫氏于是详考汉朝《熹平石经》、唐朝《开成石经》，以及北齐佛经石柱的来龙去脉，然后又接述法国人摩氏发现《巴比伦法典》石柱等等长篇大论。此种写

法固然可如他的同乡容肇祖推崇的博征明通^⑥，反之却也可说成是枝蔓芜杂、冗赘不堪，将跋文其他的优点掩盖了不少，除了莫伯骥，还真没有第二个人是如此写法的。

莫伯骥勤于著述，不下五十种之多，其中颇有关于图书文献方面者，如《四库提要举证》、《四库撰人考》、《书目答问述补》、《清代女子著述考》、《历代广东书征》、《藏书纪事诗补续》、《群书索引》、《廿四史索引》，以及他的《福功堂日记》等等^⑦，可惜他的文稿未及刊刻，都在抗战中遗失了。莫伯骥服膺阮元所论藏

书、撰书、刻书三者于己有福、于人有功的说法，遗憾的是他的五十万卷藏书、五十种著述却都厄于战争灾难，幸而刻书方面还有先后两部题跋传世，并不只一家出版社为之影印再版^⑧，得以化身千百，裨益后代学子，福功之说，总算还有些信而可征！



莫伯骥藏明刊本《丹铅总录》

（“中央图书馆”藏）

⑥ 容肇祖，《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序》。

⑦ 《燕京学报》，第三十七期（1949），页 249-251，容媛所撰《莫氏群书跋文书评》一文，附有莫氏全部五十种著述稿名称。

⑧ 《五十万卷楼藏书目录初编》一书，有 1967 年台北广文书局影印本（《书目丛编》），及 2005 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影印本（《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则有 1968 年台北文海书局影印本（《国学集要》二编）。

朱希祖 郇亭

生平简历

朱希祖，字暹先，浙江海盐人，生于清光绪五年（1879）正月十一日。朱氏先人明清两代有进士十三人、翰林一人、状元一人^①。朱希祖幼年由父亲朱永繁（字子庄，邑庠生）亲自课读，光绪二十三年（1897）入县学，因家贫在外就馆，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考取浙江省官费留学日本，进早稻田大学研究历史，毕业后回浙执教杭州两级师范学堂、嘉兴浙江第二中学国文。

辛亥革命时朱希祖被推为海盐县民政长、知事，半年后大局已定，于民国元年（1912）三月辞职，改任浙江省教育司第三科科长。民国二年（1913），朱希祖奉派以浙江代表赴北京出席国语读音统一会议定注音字母，旋即应聘北京大学预科国文教授兼清



朱希祖于北京老宅

^① 朱僊等，《朱暹先先生讣告》。

史馆纂修；民国六年（1917）起担任北大史学系主任，讲授史学概论等课程。十二年（1923）赴陕西讲学并搜寻碑拓史料，再往山西遍访大同云冈石窟。十六年（1927）张作霖入主北京政府并改组北大，朱希祖辞职改任清华及辅仁大学教授，又发起成立中国史学会、主编天津《益世报·学术周刊》，十八年（1929）重任北大史学系主任，两年后改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民国二十一年（1932），朱希祖南下担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史研究所主任及广东通志馆纂修，在粤访求明季史迹，两年后应聘赴南京任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行政院又聘兼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朱希祖即考察南京附近古迹，调查六朝陵墓，陆续撰《伪齐录校正》、《伪楚录辑补》等书。自二十五年（1936）初起，朱希祖应章太炎之约，每月赴苏州国学讲习会授课一次，朱希祖早年留日期间即受业章氏门下，洪宪帝制时两人又在北京同患难，因此师生谊笃，章氏逝世后，朱希祖仍继续赴苏州讲授，直到中日战争爆发为止。

抗战后，中央大学西迁，朱希祖随赴重庆执教，又倡修国史，拟订建立总档案库与国史馆草案，民国二十九年（1940）初政府决定筹设国史馆，张继主持筹备委员会，以朱希祖为委员兼总干事进行其事，希祖即辞去教职，专一致力筹划，约两年后辞职，专任考试院考选委员。民国三十三年（1944）七月五日在重庆病逝，年六十五岁。

郾亭藏书

朱希祖藏书最主要的特色，是关于南明（明代崇祯以后的弘光、隆武、永历三朝，即清顺治元年至康熙二十二年〔1644—1683〕之间的四十四年）的史籍。自清朝中叶以后，由于违碍文网较弛，因此收明末图书、治明末史实的人不绝如缕，如同光之际的傅以礼“华延年室”、李文田“泰华楼”等；到光绪末年时革命思想渐次形成，加以“神州国光社”邓实、黄节等人出版《国粹学

报》、影印禁毁旧籍的刺激,一时收书治明末史的人较前普遍。朱希祖留学日本时,受章太炎影响的缘故,有意从事这方面的搜集研究;民国二年(1913)后他执教北京大学,开始肆力收藏南明史料,与他熟识的伦明记述他搜罗的殷切之情:“海盐朱邇先希祖购书力最豪,遇当意者不吝值,尝岁晚携巨金周历书店,左右采掇,悉付以现;又尝欲以值付书店,俟取偿于书,故君所得多佳本,自大图书馆以至私家无能与君争者。”^②

由于朱希祖此种“好书何必惜兼金”,“勿吝千金名马至”的豪爽作风,到民国十余年时,邨亭所藏的南明史籍已是此中巨擘,不论质量都和他对于南明史的研究一样,公认名列全国公私第一^③。民国二十年(1931)初,朱希祖在《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第二卷第七期发表《编纂南明史计划》,统计他收藏的资料已有四百多种,包括史料数十种、诗文集一百五六十种、笔记杂著数十种;再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时,他准备着手撰写《南明史》,所藏更进一步达到七百余种之多。

南明史籍以外,朱希祖也收藏其他古本与抄稿本,他的藏书处“邨亭”就是因为藏有一部明抄本邨道元《水经注》,而由章太炎代为取名而来。这部明抄出自宋本,王国维曾称之为当世所存邨书各种版本中第一^④。民国二十一年(1932),朱希祖应聘广州中山大学,十月十五日抵粤当天,征尘才卸,即旧习难忘的前往书店看书,以后在他一年多的粤行日记中,不断出现看书、买书、抄书的记载。除了他致力最勤的明末屈大均(翁山)各种著述与方志,他又向广州著名藏书家“南州书楼”的徐绍棠(信符),商购一部宋刻宋印的《尚书孔传附释文》。至于方志,朱希祖自民国十二年(1923)开始搜集,其数量达到一千七百余种,在全部的邨亭藏书中,重要性仅次于南明史籍,他曾

^② 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二),《正风》半月刊,第二十二期(1935年11月),页101。

^③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页94。谢国桢,《晚明史籍考》,《自序》,页10。燕公(谢兴尧),《书林逸话》(上),《古今》半月刊第十二期(1942年12月),页8;《书林逸话》(下),《古今》半月刊第十四期(1943年1月),页32。

^④ 郑德坤,《水经注板本考》,《燕京学报》第十五期(1934年6月),页216。

在民国三十一年(1942)手编所藏方志目录^⑤。

郾亭南明史料和方志等等的保藏,却大为不易。这些原都存放于北平,二十二年(1933)初日军攻占热河及长城之役,平津震动,在中山大学的朱希祖从广州急电北平家人,指示分藏各处和南寄办法;继由其夫人北上整理,半年中共邮寄七百六十余包善本到粤;同年八月,他又亲自返平选择部分携至广州。第二年朱希祖应聘中央大学,再将这些书运到南京。不久,他感到日本的侵略日亟,于是煞费苦心在浙皖两省到处勘查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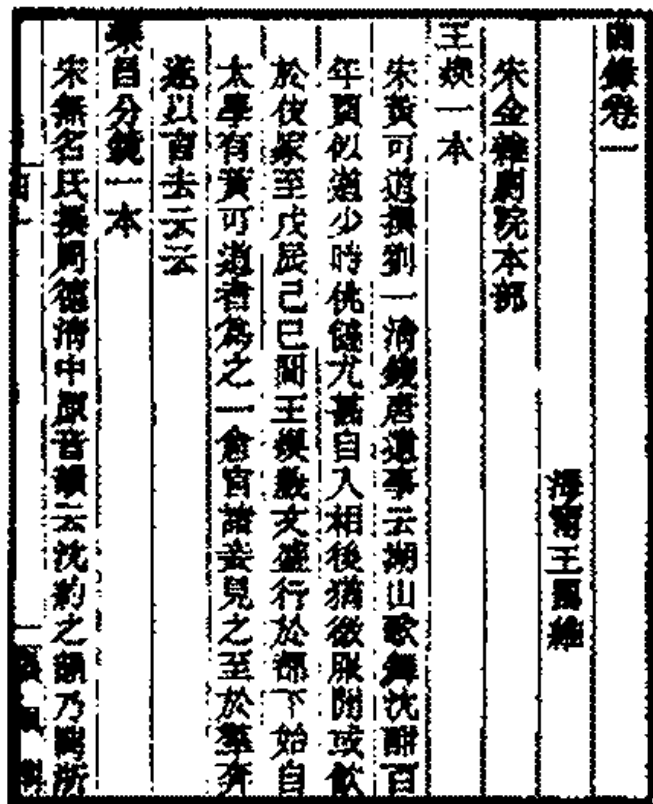


朱希祖(居中)与家人

势,寻觅一个可避兵燹的藏书之所,曾两度到浙江严州(建德一带)探查,有意迁居这个东汉时严光隐居的地方,以著书终老。二十六年(1937)抗战开始后,他终于决定移书到皖南徽州(歙县一带),七月中旬战火逼近,匆忙中装了六十大箱善本及方志,水路兼程辗转运抵休宁乡间的隆阜,存于清代戴震的藏书楼。此后郾亭藏书就分散在北平、南京、隆阜乡下三处,身为主人的朱希祖却又身在远隔关山之外的重庆,而在太平洋战争发动前,存于北平的藏书曾由亲友设法代为运出二十六箱善本。在民国以来的藏书家中,还没有第二位像他这样人书都历经迁徙流离的。民国三十二年(1943)底,他同意长子朱僊的建议,三处藏书将来集中后成立一所“郾亭图书馆”,仿照天一阁作为家族公产的方式以保永久。可是不久朱希祖就病逝了。

^⑤ 《朱希祖先生文集》,第六册,页733,朱僊,《先君邈先先生年谱》。

徐文長有嘉靖己未作南
詞叙錄吉南詞始於宋元
宗朝永嘉人作趙貞吉
王魁二種皆自之故物也
村有北後是書誰管得清
村有北後是書誰管得清
詞叙錄所引宋元雜書皆
伯題有本原二部注云即舊
伯題有本原二部注云即舊



朱希祖批注墨迹
(孟宪钧先生提供)

抗战胜利后,隆阜的藏书幸而完整地运回南京,而酈亭全部藏书也在一九五〇年以后,由家属分次捐入北京图书馆与南京图书馆,捐给后者的部分曾于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人为焚烧^⑥。至于前述的宋刊本《尚书孔传附释文》,在大约十年之间一再转手后,为“中央图书馆”所得而携至台湾,书中的收藏印记除他当初跋文所记以外,又增加了数个^⑦,时间如此短促,转手却是如此容易,展卷相对,令人感叹!

朱希祖也很重视公藏,不论他人在何处,必致力于当地古物、史迹或文献的整理维护。以图书文献而言,民国十三年(1924),他在北京一家汇记书店购得清代“升平署”几乎完整的档案五百七十七册、戏曲抄本约七百种,后来以廉价让给北平图书馆,为公保存珍贵的近代戏曲、名伶,及宫廷礼乐史料^⑧。再如民国二十

余年,他听说西北地区发现约百册西夏文佛经,有流出国外之虞,即透过中央古物保管会和地方当局,促成由北平图书馆购藏^⑨。而他在抗战中倡设国家总档案库,又肩负国史馆筹备工作,更是一个史学家善尽对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言责与行动。

⑥ 朱元曙,《酈亭藏书的艰辛与悲凉》,《传记文学》,第八十六卷第四期(2005年4月),页106-107。

⑦ 朱希祖,《跋宋浙本尚书孔传附释文》(《明季史料题跋》,页124-128),记书内藏印有“柳塘”、“白门张氏藏书”、“曾藏白门张氏古照堂”、“吴越王孙”、“白堤钱听默经眼”,到“中央图书馆”收入前又已增加“张珩”、“蒋祖诒”、“谷孙”、“希逸”、“宝绛阁藏书记”、“任邱王文进字晋卿藏”等六方。

⑧ 同注⑤,第二册,页529-625,《整理升平署档案记》。

⑨ 同注⑤,第二册,页977-1000,《西夏史籍考》。

读书题跋

朱希祖是史学家，因此郵亭藏书非供赏鉴，也不徒备校讎，而是取以读书治学之用。从他的题跋中可以看出，一位读书的藏书家与其他欣赏的、校讎的藏书家不同之处。后两者往往只娓娓于一书的递藏授受源流与自己的收藏经过，或是断断于字词同异的争辩，与版本甲乙的校勘；而读书的藏书家着重的则是一书内容的考订论证、本旨要义的发明

阐述，以近代学人而言，王国维、胡玉缙等人如此，朱希祖同样是如此。他历年题跋大都有关南明史籍，据罗香林所述，朱氏已撰成《明季史籍题跋》六卷、《郵亭藏书题跋记》四卷^⑩；一九六一年，其子朱僂搜集他发表于杂志及摘抄自日记、未刊稿中的八十二篇，编印成《明季史料题跋》一书，出版时却因政治因素撤去朱僂整理之名^⑪。目前通行的《朱希祖先生文集》中，也收录部分题跋和其他论著。

在“编纂南明史计划”中，朱希祖提出搜访资料、鉴别史事、归纳研究、整

此翻西廂題言其研雪子撰不知其姓氏謂
為崔鄭洗垢為世道持風化余讀清初沈
謙東江別集南北曲二卷中有其伯授商霖
是日演余新劇翻西廂北曲套數一篇其卷
後兒云淹將這西廂業業平反盡費數許
移在門笥止不過痛惜那雙文根究出微
漏網元因似此本翻西廂即為謙所撰惟謙
為仁和臨平人祖籍湖州武康不可謂言吳
豈別有一翻西廂耶謙與洪昉思毛稚黃
彭羨明沈豐垣等相唱和才調極於時觀
其所作南北曲六曲中名手毛稚黃為作墓
志銘謂所著有傳奇若干卷意其不僅
翻西廂一種未知尚傳於世否書以候
訪市
十六年三月朱希祖跋

朱希祖题跋墨迹(“中央图书馆”藏)

^⑩ 同注⑤，第二册，页1269，罗香林，《朱遇先先生行状》。

^⑪ 同注⑥，页104。朱僂另编有《郵亭藏书目录》，未刊，见朱元曙，《朱希祖的郵亭藏书》，《藏书家》第十三辑(2008年1月)，页45-61。

理编纂四个步骤；又在为谢国桢《晚明史籍考》一书所写的序中，列举作史三期：搜罗务期广博、考订务期精审、去取务权轻重；而朱希祖本人搜罗史料之多，已是海内第一，在考订研究上也有相当成就，却在准备着手编纂之际，被战争毁灭了原本可期其成的千秋史业，难怪他逝世后吴敬恒（稚晖）要挽以：“人间遽失先生，从此南明无史。”^⑫

^⑫ 同注⑤，第六册，页764，《朱邇先先生哀挽录》。

吴梅奢摩他室

褒扬令

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吴梅，持身耿介，志高行洁；早岁即精研音律，时以革命思想寓于文字，播为声乐；嗣膺各大学教席，著述不辍，于倚声之学多所阐发；匪特有功艺苑，且超轶前贤。兹闻溘逝，悼惜殊深，应明令褒扬，并特给恤金三千元，以张宿学而励来兹^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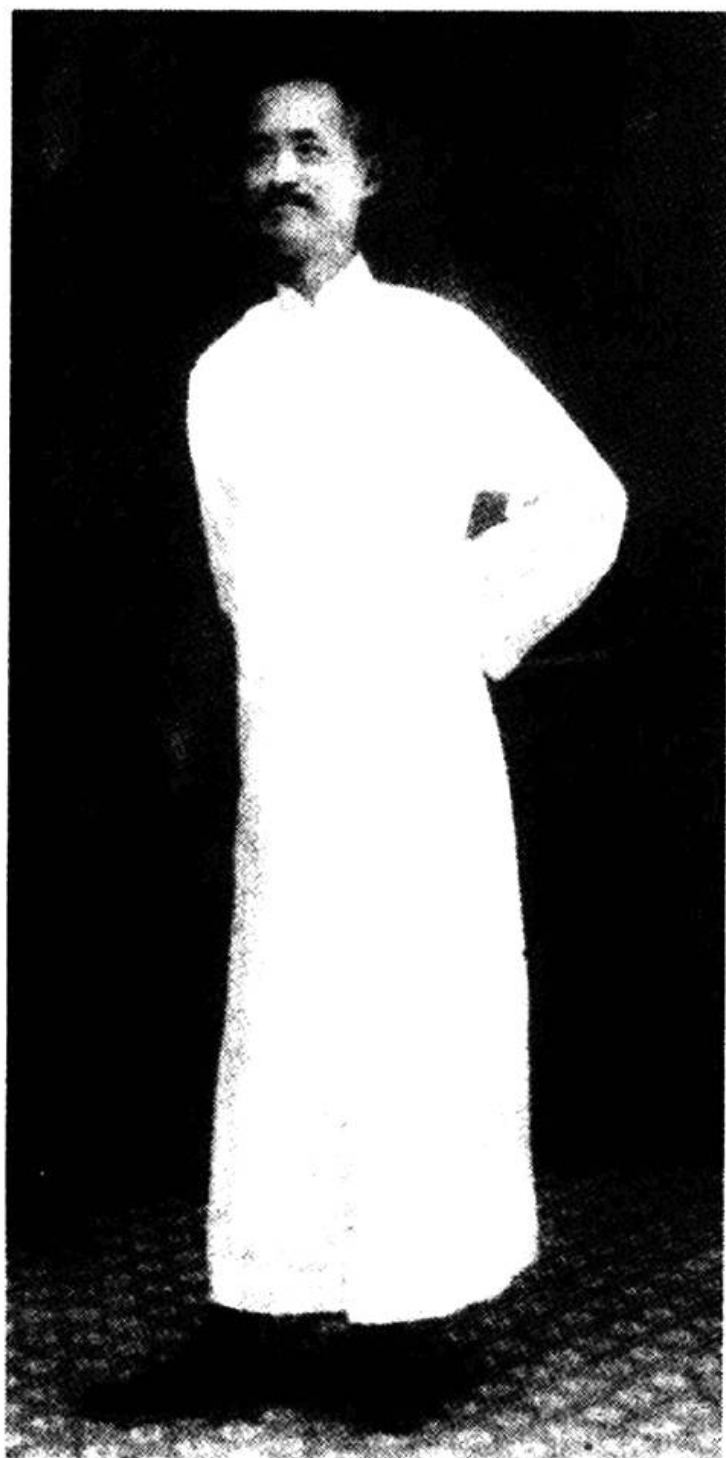
吴梅像

生平家世

吴梅，字瞿安，一字灵鹫，号霜崖，江苏长洲人（民国以后长洲并入吴县），生于清光绪十年（1884）七月二十二日，卒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三月十七日，年五十六岁。他的高祖吴颐，嘉庆间进士，回里主讲正谊书院；曾祖吴钟骏，字崧甫，号晴舫，道光十二年（1832）壬辰科一甲一名进士，授翰林院修撰，曾二典乡试、三任侍郎、四督学政，著有《禹贡举要》、《师汉斋经义杂识》等七种；祖父

^① 《国民政府公报》，渝字第 146 号（民国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二日）。

吴清彦，乡试举人，刑部员外郎；嗣祖吴长祥，父亲吴国榛，字声孙，乡试举人，年仅二十二岁即过世，著有《髀勤斋诗残稿》等。吴梅出生前家道已经中落，所有田产不满一顷，他幼年三岁丧父，十岁又失母，依赖嗣祖父吴长祥养育成长，备尝故家后世的艰辛^②。



吴梅像

光绪二十七年(1901)吴梅十八岁，以第一名入长洲县学，但接着两次乡试都告失利。光绪二十九年(1903)赴上海东文学社习日文，三十一年(1905)应邀在邑人所办小学任教，不到一年即应聘为东吴大学堂教习，宣统元年(1909)吴梅一度前往河南游幕，仅只几个月后便回里教于存古学堂。光宣之际，吴梅先后参加神交社、南社等团体。

从民国元年(1912)开始，吴梅执教于南北各地学校。先是在南京的江苏省立第四师范，不久改往上海担任私立中学国文教员，并为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撰写《顾曲麈谭》连载。民国六年(1917)，吴梅应聘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先后五年，并兼在北京高等师范授课；其间西北筹边使徐树

铮拟聘他为使署秘书长，他以“懒向王门再曳裾”婉谢不受^③。十一年(1922)，吴梅任教南京东南大学，并主盟词社“潜社”；十六年(1927)南下广州中山大学，十七年(1928)转教上海光华大学，并兼课中央大学；同时与邓邦述等在故里合组“六一词社”。十九年(1930)起专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

^② 卢前编、徐益藩补，《霜崖先生年谱》，光绪十九年下，引吴梅诗：“三岁丁孤露，不知饥与寒。母娘勤抚育，四序无笑颜。顾家已中落，百忧初发端。薄田未满顷，安足供三餐。[…]”

^③ 同上注，民国十年。

兼课于金陵大学；二十年初应上海富商王伯元聘为西席，为时一年；再返中央大学任教，直到抗战爆发，吴梅以喉疾请假，举家经汉口抵湖南湘潭客居一年，辗转经桂林于二十八年（1939）一月抵达云南大姚李旗屯暂住，不幸同年三月即在当地病卒。

奢摩他室藏书

吴梅早年寒素，无力藏书，只因从十八岁起嗜好戏曲一道，购买一些传奇本子。直到宣统中从河南游幕返家以后，才开始着意收藏^④，初时从清代普通刊本入手，以后逐渐推及明本，民国六年（1917）应聘北京大学以后，更大量购藏，几乎无日不游琉璃厂、隆福寺一带的书店，每游必满载而归，这段期间他共收得不下二万余卷的图书。

吴梅是一代曲学宗师，奢摩他室藏书也以戏曲为主，民国十七年（1928）所得已有七百余种，其中不乏罕见珍本，例如中央图书馆所藏《琵琶记》的最早刊本，据说便曾经奢摩他室旧藏^⑤。有这些珍本作为基础，吴梅在曲学上的成就实在不是偶然的。他平生三大愿望：一集《奢摩他室曲丛》，以比于《元曲选》与《六十种曲》；二定曲韵，以比《中原音韵》；三正曲律，以比《太和正音谱》^⑥。从第一愿可知他并不秘惜所藏，除自己钻研外，又乐于供同道及门下弟子利用，他最早在宣统中已刻过《奢摩他室曲丛》第一辑，收入吴伟业的《梅村乐府》两种和他自撰的“暖香楼”杂剧；民国十一年（1922），吴梅又选刻一部《古今名剧选》，包含十种元曲和五种明杂剧；十七年（1928）吴梅计划和商务印书馆合作，将自己所藏六百种一次全部付印公诸于世，但为顾虑定价可能过昂，贫寒士子将无力购买，于是先

④ 吴梅，《无价宝》，《自序》。吴梅此部杂剧，内容是有关宋刊本《唐鱼玄机女郎诗》。

⑤ 这部明初刊本《琵琶记》，全名《新刊巾箱蔡伯喈琵琶记》，二卷二册。曾经吴梅收藏的说法，出于郑逸梅，《南社丛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页163，说是吴梅得自翁同龢家。但遍查书内题记及藏印，在翁氏之后历藏刘氏暖红室、蒋氏密韵楼、张氏适园等家，并无吴梅藏印。

⑥ 《戏曲》第三辑（1942），页83，陆维钊，《满江红》。

霜崖曲话

长洲吴梅

曲者。梁之支。隋之。自唐徽。馨。壤。黄。泽。白。云。以。降。於。是。越人。易。水。大。風。發。于。相。繼。而。作。聲。漸。靡。夫。梁。府。之。作。於。西。漢。其。目。有。鼓。吹。橫。吹。相。和。清。商。雜。調。諸。名。六。代。沿。其。聲。調。稍。加。藻。艷。靡。靡。今。曲。略。述。入。唐。則。以。絕。句。為。曲。如。清。平。鬱。輪。涼。州。水。調。諸。歌。不。盡。其。實。於是。始。創。為。憶。秦。娥。善。渡。雙。等。曲。蓋。太。白。飛。卿。輩。嘆。其。作。備。兩。宋。久。人。注。全。力。於。此。署。曰。詩。餘。軒。今。曲。蓋。近。然。平。詞。變。登。歌。止。一。閱。又。不。能。盡。其。變。而。雜。劇。大。曲。以。興。宋。時。每。春。秋。聖。節。三。大。宴。小。兒。隊。如。弟。子。

蘇州吳氏齋

吴梅稿本墨迹

从中选择一百五十二种交商务分期影印，仍称《奢摩他室曲丛》，如果计划完成将是嘉惠学界的盛事，单以数量而言，已远较同时代的刘世珩“暖红室”、董康“诵芬室”等家所刊戏曲为多。不幸，《曲丛》第一、二集共三十五种问世后，遭逢上海一·二八事变，他交给商务制版的藏本，因抢救不及而焚毁二十八种^⑦，连已印好待发的《曲丛》三、四集都随着商务印书馆付之一炬，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损失，也是戏曲史上的劫难。吴梅伤感可想而知，他甚至说：“曲者不祥之物也！”^⑧事变后三个多月，仍在悲痛中的吴梅，正考虑悉数出让藏曲时，有人持他购求三十年不遇的明刊传奇《麒麟齋》前来，他却又爱不释手“以巨值百金，存之篋衍”，然后在题跋中感叹：“近日传奇之贵，较经史不啻十倍矣。”另日再读，又写下：“余破百金购此，亦不为枉矣。”^⑨这应该就是书生结习，只要有明珠见投，一切即置之度外了。

奢摩他室藏书的第二个重点，是他发愿要搜罗到一百部的明代嘉靖朝刊本，吴梅在苏州故居楼上的室名，便称为“百嘉室”。从民国以来，不约而

⑦ 同注⑥，页19，徐益藩辑，《霜崖叙跋》，《明张楚叔旭初同辑吴骚合总跋》。

⑧ 郑振铎，《记吴瞿安先生》。

⑨ 吴梅，《吴梅戏曲题跋》（上），《文献》第十二辑（1982年6月），页19-20。

同都立意要收藏百部嘉靖本的藏书家同好中，以陶湘的成就最大，他的“百嘉斋”后来竟获得两百部以上；其次是邓邦述的“百靖斋”，也超过了百部的目标；只有吴梅的“百嘉室”似乎未及如愿就辞世了^⑩。这也许和个人财力有关，吴梅在“架上日丰，筐中日啬，饔飧不继，室人交谪”的情况下^⑪，有时不免要望书兴叹，他究竟只是个为研究而收藏的读书人，不是为了赏鉴的收藏家。从民国二十五年（1936）他手编的《瞿安书目》中，当可知悉总数多达五、六千部的奢摩他室藏书

昔
 庚申年九月朔晴是年余四十八岁余生於清光緒十
 年甲申七月朔又二十二年午時二十八歲乃空統
 年庚申年清土自以先立中望不敢忘奉仕進前北校
 使聊以酬口日食亥之秋移魂南都迄今子載其間一
 遊學東山自北八兩至滬上東六信德無可化述今
 年八月日本黎五瀋陽通路傳聞公私空炭今之所謂
 政府者方傳徑無措如位正保兵艦已陸續駛至滬上

瞿安日記卷一



長洲吳梅



吴梅日记

全貌，可惜这部书目未曾刊行，只知北京图书馆藏有两册的稿本^⑫。

抗战起后，吴梅流转于湘滇几省，随身所携只有少数图书，大部分留在吴县家中，衣物遭洗劫一空，藏书也有残缺，尚无大损失，他远在湘潭得悉后还达观地称幸^⑬。只是奢摩他室中知音不永，吴梅等不及抗战胜利先逝世了。一九四九年以后，他的儿子吴良士等四人将藏书捐献于北京图书馆，列入该馆善本书目的有一百七十一部，以集部一百四十部最多，超过

⑩ 据《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所载，注明吴梅儿子捐赠的一百七十一部吴梅遗书中，明本有八十二部，内嘉靖本仅七部而已。但捐书时已在吴梅卒后十余年，其间可能散失或另有处置，否则总数不致仅有一百七十一部。

⑪ 同注②，民国六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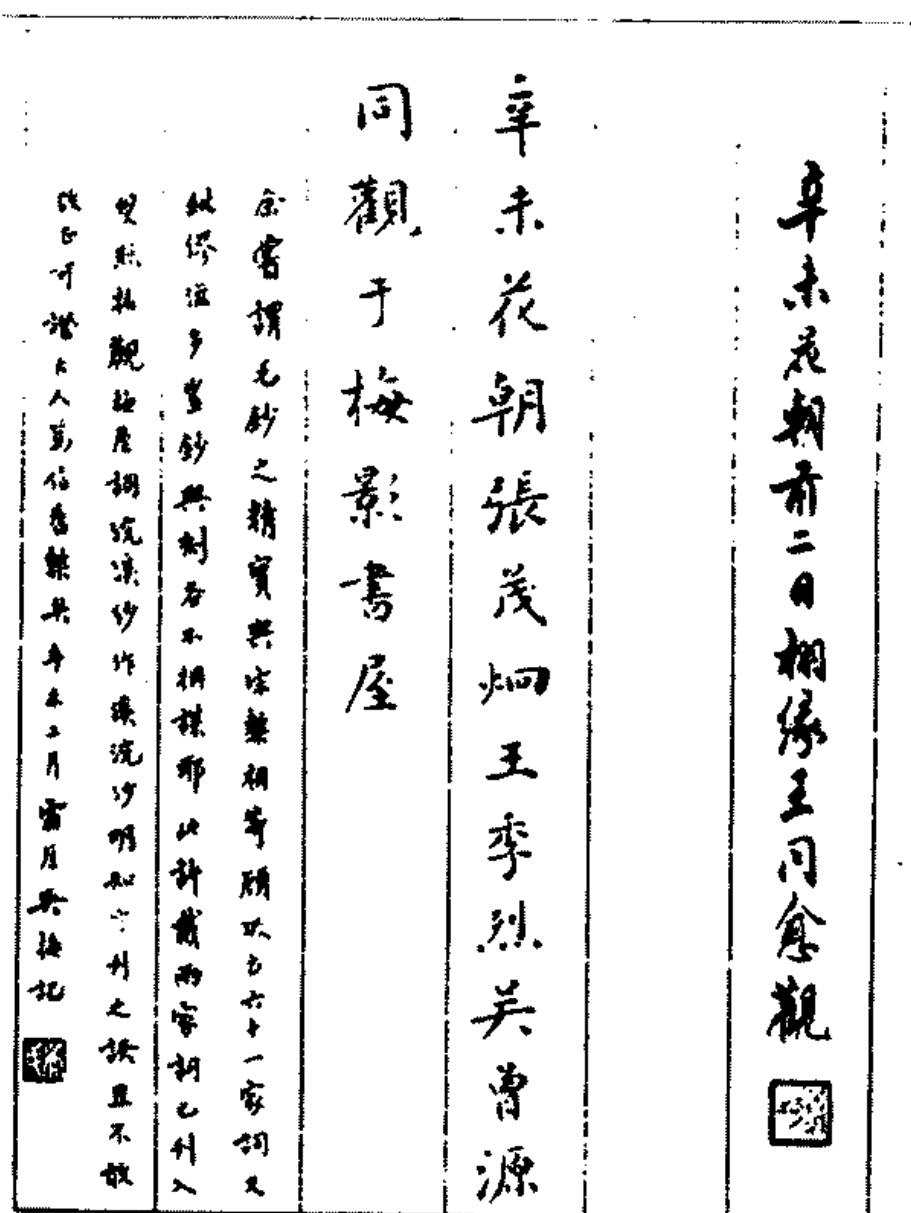
⑫ 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卷三，页51。可惜的是2005年出版的《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巨编，收录的是吴梅准备出版的《奢摩他室曲丛》目次，而非《瞿安书目》。

⑬ 吴梅、夏承焘，《关于词诗研究的通信》（续），《文献》第四辑（1981年2月），页43，《吴梅致夏承焘》（十九），1938年4月19日。

十分之八；集部中又以曲类一百零四部占大多数，包括杂剧二十部、传奇五十九部、散曲十一部，经吴梅钞校批跋的有六十五部。列在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中的这些，当不是奢摩他室旧藏的全部。

创作与论著

吴梅与王国维是清末民初两位戏曲宗师。王国维着重于历史的考证，吴梅则遍及曲学研究的各方面，他兼精曲律和曲史、能谱曲也能唱曲，在创作方面，吴梅写有传奇和杂剧各六种，传奇最早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做的《血花罪》（又名《苌弘血》），以后到民国五年（1916）之间，依次写成《风洞山》（光绪三十年〔1904〕）、《双泪碑》（民国二年〔1913〕）、《绿窗怨记》（民国二年）、《白团扇》（民国三年〔1914〕）、《东海记》（民国五年〔1916〕）；杂剧最早是光绪三



吴梅题跋墨迹

十二年（1906）的《暖香楼》（后名《湘真阁》），陆续又撰《轩亭秋》（光绪三十三年〔1907〕）、《落茵记》（民国二年〔1913〕）、《无价宝》（民国五年〔1916〕）、《惆怅爨》（民国十九年〔1930〕）、《义士记》（民国二十二年〔1933〕）。上述这十二种作品外，吴梅还有《霜崖曲录》、《霜崖词录》、《霜崖诗录》、《霜崖文录》等集，以集《霜崖读画录》，《读画录》是他馆课王伯元“一贯轩”时，题王氏所藏名画的跋文。

平生落笔，中实蕴密，不惟辞章有佳，
 且步韵相不啻增华，入者大抵不若伴
 公当年旗亭，亦遂使双鬟，故道词咏
 尊前，似淡秋夜，霜移鹤唳，花堪
 伴，散教为思，回有花看，地接了，以以兼
 倚，由风，不副，他，晚，中，踏，台，门，使，重，胡，与，水
 影，事，外，任，法，总，算，在，愁，酒，深，始，未，醉，付
 袖，挥， 调寄高山流水

行年五十，前感，醉骨，的，女，君，子，在，乃
 此，刻，作，倚，琴，窗，自，度，腔，微，则，人，属，如
 焉，可，所，别，大，本，所，事，已，成，冬，古，脱，物，余
 已，之，十，二，成，矣，下，且，曠，治，請，言，在，此，表，以
 大，海，書，行，百，嘉，堂

吴梅填词手迹

论著方面，早自光绪三十三年(1907)即在上海《小说林》撰写连载的《奢摩他室曲话》，民国二年(1913)起又在《小说月报》先后连载《蠡言》、《臞庵笔记》、《顾曲麈谭》等，而以后者最为脍炙人口，由商务印书馆辑印成书，相继列入商务的《文艺丛刊》、《国学小丛书》、《人人文库》之一。民国六年(1917)以后，吴梅授课大学，撰著有《词余讲义》(即《曲学通论》)、《词学通论》、《中国戏曲概论》、《元剧研究 ABC》、《辽金元文学史》、《南北词简谱》等。

陈群泽存书库

生平简历

陈群，字人鹤，福建闽侯人，生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十月四日。他早年就读福建巡警学堂、福建法政学校，在民国初年赴日本留学，先后就读明治大学及东洋大学。返华后于民国九年（1920）为孙中山先生识拔，在广州担任大元帅府秘书，当陈炯明叛变时，陈群追随在永丰舰上共患难。十五年（1926）北伐，陈群在武汉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委员联席会议的党代表，十六年又奉派为北伐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抵达上海后兼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长，组



陈群像

织清党委员会执行上海地区的清党工作，至十七年九月与警备司令杨虎同时免职。不久杜月笙在沪创办私立正始中学，陈群应聘为校长，为杜氏策划扩展影响力于各阶层，并执业律师。

抗战爆发后，“维新政府”于二十七年（1938）三月成立，陈群出任内政部长；同年九月，南京与北平两伪政府组成联合委员会，陈群为委员之一；二十

九年(1940)汪精卫的“国府还都”,陈群仍留任内政部长,旋遭国民政府通缉。陈群在汪精卫政权中又先后担任过伪中央监察委员、中央警察学校校长、江苏省省长及考试院院长等职,到民国三十四年(1945)日本宣布投降,三天后陈群随于八月十七日服毒自杀,年五十六岁。

泽存书库藏书

陈群早年并未以藏书闻名,而是在官居伪政府内政部长后才大举搜藏,其中一部分以他丰厚的利禄高价收买,并以明版书为主,来往交易的远及北平的书肆,因此他也成为沦陷区少见的书林豪客。此外,陈群大部分藏书的来源,是战争期间各公私藏家、文献机构等等,不及疏散后方或无力保存而散落的图书档案,由各地方伪组织接收后转送内政部,他一概照收,并为处理这些如潮水般涌到的图籍,同时在上海和南京两地各建造一所书库。上海的一所规模较小,民国三十一年(1942)初落成,以收藏日文书为主;南京的一所在颐和路,自民国三十年三月动工,翌年二月落成,工程费达二三五万元,落成后汪精卫命名,因是陈群为纪念父母亲而建,汪精卫取《礼记》“父没而不能读,手泽存焉”之意,命为“泽存书库”^①。



陈群泽存书库旧址(南京)

泽存书库楼高三

^① 汪精卫,《重刊随山馆诗简编后序》,《古今》半月刊,第二十七、二十八期合刊(1943年8月),页1。

此係澤生堂藏書有印記五方洵足珍也得者寶之

開樓



陈群题跋墨迹

(“中央图书馆”藏)

层,面积三千五百四十平方米,有书库十二间,收藏新旧图书达四十万册之多,包含汪精卫“双照楼”寄存的五千册,其他伪政府官员寄存的也不在少数,陈群对京沪这两处书库确是尽力维持,单是南京方面即雇用员工达四十人,因为四十万册图书一时无法都整理编目,稍有头绪后自三十二年(1943)底先将普通本开放供人阅览。在善本书方面,南京的泽存书库已有四千四百余部、四万五千册左右,宋元刊本及精抄稿本很多,其中宋刊本如《大易粹言》(南宋建安刘氏刊本、存六十卷十二册)、《尚书》(乾道淳熙间建安王氏刊本、十三卷四册)、《隋书》(绍熙间建安刊本、存二卷二册)、《五代史记》(庆元五年曾氏校刊元明修补本、七十四卷二十四册)、《临安先生文集》(绍兴间王钰刊明修补本、存二十二卷八册)、《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咸淳元年建安书院刊本、一百二十一卷一百六十册),以及手稿本如赵烈文《能静居日记》五十四册、何焯《语古斋披华启秀》六册等等,目前都在“中央图书馆”内可以见到^②。

京沪两地的书库以外,陈群在苏州还有些藏书,数量或少于南京的部分,而善本书却也有二百九十三部、三千三百四十二册之多,宋本如《十三经注疏》一百六十册、《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三十册、《陀罗尼杂集存》卷五的一册等十余部,而元刊本更多达七十部左右。

^② 这几部书是对照“中央图书馆”当年接收泽存书库的目录和目前该馆的善本书目而知的,经检视每部书上都没有钤盖陈群或泽存书库的任何印记,其中《尚书》一部是朱希祖旧藏,请参阅本书“朱希祖墓碑”一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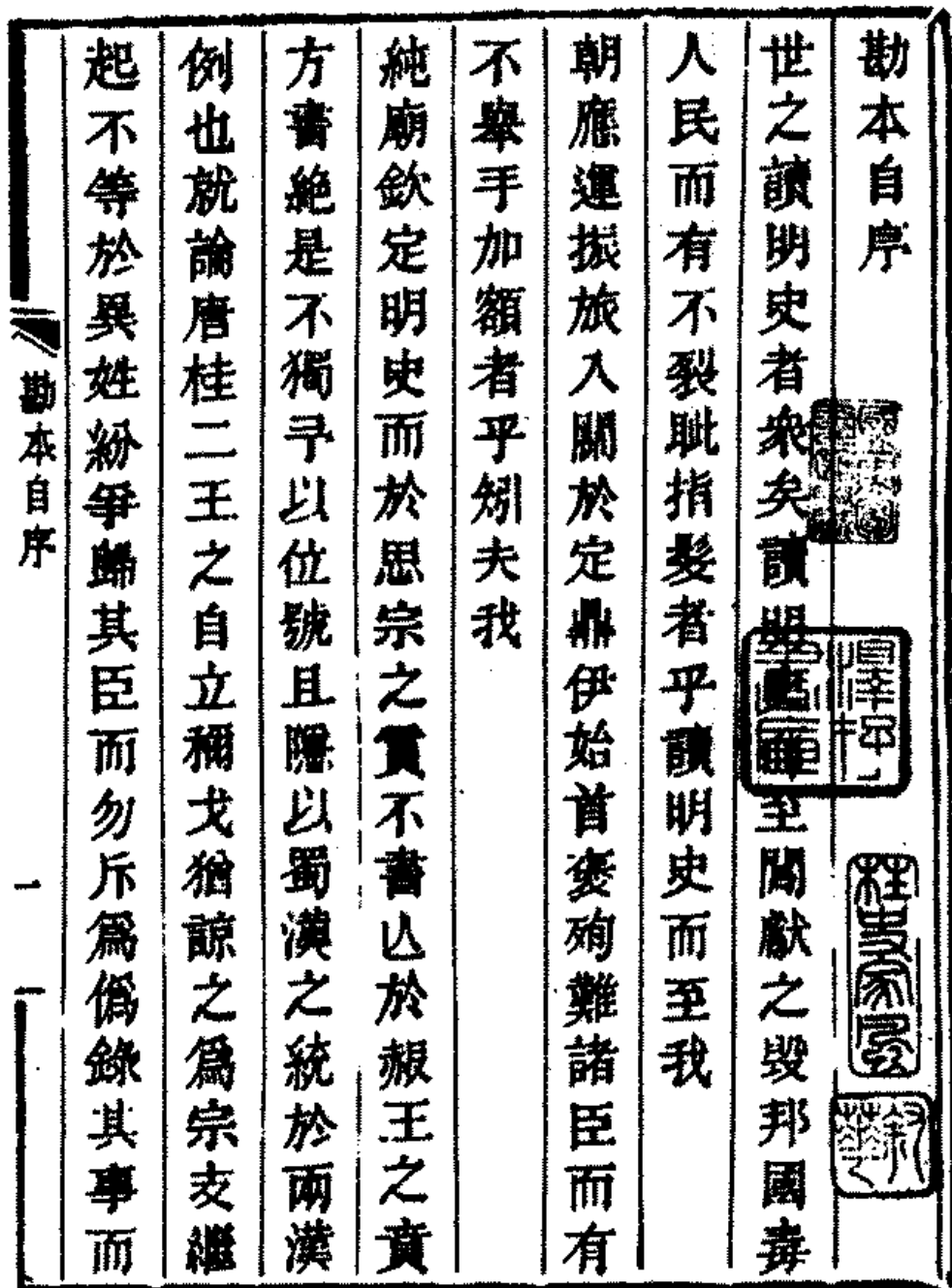
因此，连同南京部分合计，陈群可说是抗战期间唯一崛起的私人藏书家，而且在图书之外，他还有一些特殊的文献，例如苏州当地的社会经济史料——鱼鳞册、田单、租簿等，又如北伐二路军政治部的档案、吴淞炮台的档案等等。

抗战胜利后，泽存书库先由教育部上海区接收委员会接收，再转交复员回京的“中央图书馆”，南京的部分改成该馆北城阅览室，专供善本书库及特藏组办公之用，由屈万里主任坐镇，接收的目录共二

十六册，自三十五年（1946）四月起费时半年始清点完毕，凡书上有原藏机关或私人藏印者都予发还。上海方面接收的泽存藏书也有十七万册，这些连同各地的大批无主图书，都分发给新设立的罗斯福纪念图书馆和西安图书馆等。

一九四九年中央图书馆藏书移往台湾时，因以抢运善本为主，原来泽存书库所藏并未悉数赴台，尤以普通本为然。但即使如此，目前“中央图书馆”内属于泽存书库旧藏的仍比比皆是。展卷怀想数十年来文献浩劫，真是令人感叹何如，由陈群钤在书上“来生恐在蠹鱼中”的印记，再想到他短短数年中藏书的迅来疾去，竟是近代藏书时间最短的一位藏书家！

或谓泽存所藏，都是陈群在沦陷区中强取豪夺而来；可是，在战争动乱中人命几如草芥，遑论斯文？当时除了善本古籍还有“市场”外，占绝大多数的普通本并无人多事收藏，尤其各地公家所藏图书，由于人员的撤退走避，



陈群藏书印“泽存书库”
（“中央图书馆”藏）

以致散落的部分如同无人理会的敝蕪，如非陈群这般强豪为之收容，只怕结果更要不堪闻问了，就图书本身而言，总还算是幸运的。可惜陈群虽为纪念先人而有创建书库、保存文献之举，然而民族千秋不义之罪，又岂是人子一己之私所能弥补于万一的呢？

周叔弢自庄严龛

千年来我国私家藏书的传统,在二十世纪前半由于一些因素——例如新式印刷技术及洋装书通行的影响而急速衰落,历经八年抗战之后,从前动辄家藏数万册古籍的景象已不常见,再到一九四九年以后,大陆上为数已不多的大藏家不但或捐或卖将书归公,他们个人也陆续凋零,当硕果仅存的周叔弢于一九八四年在天津病故,千年以来私家收藏大量古籍的传统可说是结束了,周氏可称为大藏书家的殿军。

家世生平

周叔弢,本名暹,以字行,安徽省建德县人,生于清光绪十七年(1891)六月十三日,卒于一九八四年二月十四日,享年九十三岁。

周叔弢的祖父周馥,早年追随李鸿章起家,历任津海关道、直隶按察使及布政使、山东巡抚、两江及两广总督等职。父亲周学海,字澄之、健之,光绪十八年(1892)壬辰科进士,官内阁中书、扬州河捕同知、江浙候补道,平素钻研医学,著述十余种,



周叔弢像

又曾刊印《周氏医学丛书》，却年仅五十一而卒。周叔弢的几位叔父也各有功名官职，其中周学熙自道台、盐运使、农工商部丞参，直至民国初年曾两任财政总长，并经营实业。

周叔弢生长宦翰世家，早年就读私塾十年，也有候选通判的职衔。他在父亲病故后，往依叔父周学熙，而于民国三年（1914）移居天津，五年后随周学熙在青岛创办华新纱厂，担任常务董事，以后历任其家族实业如滦州矿务局、耀华玻璃公司、江南水泥厂等董事；抗战爆发前后为唐山、天津华新纱厂经理，战争中他的实业曾被日伪强予吞并。一九四九年前后他担任启新洋灰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接着更从工商界兼跨政界，在中央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常务委员、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政务院财经委员、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在地方则担任过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天津市副市长、天津文物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务。

启新洋灰公司自一九五四年起实施公私合营，周叔弢获得一些补偿。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年事已高的他也一度遭到迫害^①。一九八二年周叔弢亲笔遗嘱：“我平生无他长，只是不说假话，临终之时定能心地坦然，无愧于中。我死后千万不要发讣告，千万不要留骨灰盒，投之沧海，以饱鱼虾，毋为子孙累。存款五年定期一万元，国库券一万五千元，全数本息上交国家，在四化大海中添一滴水。”^②逝世后被官方誉为“忠诚的爱国主义者，共产党的亲密朋友”^③。

周叔弢在大陆学界颇受敬重。一九五〇年，学术界为他编印《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作者都是著名学人，如丁声树、余嘉锡、周祖谟、俞平伯、唐兰、顾颉刚、钱锺书、陈梦家等二十九篇论文，一九五一年出版。

① 周一良，《毕竟是书生》（续三），《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4期，页147。

② 周珏良，《两份遗嘱一片心》，《文物天地》1984年第3期，页10。

③ 《新华月报》1984年4月号，页16。

自庄严龕藏书

光绪三十四年(1908),周家在扬州的住宅失火,先世藏书尽毁^④,后来周叔弢立意自己收藏善本,始于民初居津以后。民国六年(1917)底,清宫流出一些宋元本待价而沽,周叔弢获得《寒山子诗》、《诸史提要》两部,这是他收藏宋本书的开始。《寒山诗》的宋刻本到近代已知仅存此部及日本宫内厅图书寮的另一部而已,据见过这两部的傅增湘鉴定,周叔弢的藏本不仅内容较齐全,刊刻的年代也较早^⑤,加上此本曾经清宫旧藏,钤满天禄琳琅、乾隆御览之宝、太上皇帝之宝、五福五代堂宝等玺印,难怪初涉书林的周叔弢要取室名“寒在堂”作为纪念了^⑥。以后他的几个室名也都各有因由,例如由于收得两部宋本《南华真经注》而称“双南华馆”,因为收得《稼轩长短句》及《东坡乐府》两部元本而称“东稼草堂”,获得宋刻本《王摩诘文集》而号“半雨楼”,以及获得元本《孝经》而号称“孝经一卷人家”;不过,周氏最常用而为人知的室名则是“自庄严龕”,典出《楞严经》“自得心开、香光庄严”。

自庄严龕前后收藏过约百部的宋本及半数的金元本,由于宋元古书的罕见可贵,几乎每位藏书家的每部古书都有其动人的来历,周叔弢也不例外,一部宋刻本《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原已散成残卷,各为人藏,民国二十四年(1935),周叔弢先以重金获得山东海源阁旧有的二十三卷,再以双倍的价钱从李盛铎购得四卷,一年后又以更高的代价获得另外一卷,可说是卷数越少而书值越高,他却自承“衷心耿耿”^⑦,为求完璧在所不惜,遗憾的是此书终于仅差一卷而未能完整的复合。可是另一部元刻本《春秋经传集解》,却在他锲而不舍的努力下,历经十七年分别从四个来源补成完书,其中的曲折

④ 周达,《今觉龕诗》(1940),卷四,叶17,《题自庄严龕勘书图》第五首注。

⑤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页1012,《寒山诗》;页1013,《寒山诗集》。

⑥ 据周珏良,《我父亲和书》一文(页161),称周叔弢为此书又取室名为“拾寒堂”。

⑦ 《自庄严龕善本书目》,页111,《春秋经传集解》。

婉转真是令人赞叹不置,尤其他在夙愿得偿以后,推己及人,毅然将所藏《左传》、《群经音辨》两部宋刻残本各两卷送给故宫博物院,让故宫原有的此两部残书因而补成完璧,此种仁心诚如他自己所说:“余岂忍私自珍密,与书为仇耶!”^⑧令人惊讶的是这并非周氏促成古书复合仅有的一次义举,例如他在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见到残缺一册的宋刊本《西汉会要》后,即主动将自己所藏同一部书残缺的一册赠与该馆^⑨,不是真爱书人不会如此舍得,何况还是宋本!

周叔弢非常喜好宋陈师道(后山)的诗,他原只收藏得明代刊本,民国二十年(1931)底,北平文德堂书肆以一部《后山诗注》的宋刊残本求售,并表示北平图书馆已出价七百元欲购,结果周叔弢竟主动加倍购入自庄严龛。据先他见到此书的傅增湘表示,此书旧为清宫物,当年流出市面的代价仅为四十元,此次为文德堂以一百元购得^⑩,再转手即为爱书如痴的周叔弢以十余

唐午春余送文友李先得春秋年表及名彙歸一團
 是年秋送萍玉至得是書卷十三卷廿七至卅計六卷越
 歲辛未冬復從肆文堂得卷二至十一卷十四至廿六計廿三卷舊
 裝未改居然壓合同卷一前十年歸嘉定徐氏因急訪之北平乃
 前數日為一龔姓用六百圓買去故都人海渺不可追矣延津之
 合或有待耶每展卷輿歎殊不能自已也壬申十二月
 按邵桂子宋淳安人字德芳號玄同以文名著登咸淳進士任
 雲州教授宋亡避地雲間擇亭湖上名雪舟著述其間天祿
 琳琅前編著錄元本東坡集即其所藏也
 龔其氏所得首冊項已毀於上海南水之難不在人間則從
 沈叔文先生所藏宋梅州本第一卷以補此書之闕而記其歲月
 於此癸酉三月三日亦後記



周叔弢題跋墨迹
 (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藏)

⑧ 同上注,页 113,《春秋经传集解》。

⑨ 顾廷龙,《顾廷龙文集》,页 244,《自庄严龛勘书图跋》。周叔弢促成古书复合的其他事例,参见周珏良,《我父亲和书》一文,页 165-166。

⑩ 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初集》,卷六,叶 11,《宋刊残本后山师注跋》。

倍高价收藏,有人认为此举未免近奢,他则自信人生几何,异书难遇,不暇为财物计了。如果再证诸傅增湘以此书一卷即已校订出后代刊本的数十个讹误,是足以令人相信周叔弢鉴赏古书的精到眼光。

收藏众多宋元古本是自庄严龛的主要特色之一,尤其民国二十年(1931)左右,他获得海源阁售出的一批旧藏后,与傅增湘“双鉴楼”、李盛铎“木犀轩”鼎足而立,成为北方平津一带三个最大的宋元本私人收藏。木犀轩在抗战开始后,很快就易主,傅、周两人则继续颉颃竞争,有次书肆新到一批书经周叔弢捷足先登挑购后,傅增湘只能兴叹:“大率善本均为叔弢收得,此外亦非所欲矣。”^①谢国楨认为当时还保有乾嘉正统风度的北方藏书家,只有傅、周二,而“傅氏藏书的博大,周氏藏书的精深,都是世无伦比的”^②。

周叔弢爱书及人,民国二十年他获得一部宋代建安务本书堂刊刻的《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然后他听说傅增湘曾发愿收藏这位四川先贤的宋版诗集,正缺少这个版本,周叔弢由于自己求书若渴的经验,颇能体会彼此的书痴精神,于是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主动以此书和傅氏交换三部明版书,傅氏感于“良友之嘉惠、明珠之见投”^③,特地邀集朋好在其藏园举行祭苏盛典。抗战中,傅氏将得来不易的数种宋版苏诗,分交好友保管以策安全,惟独留下周叔弢让他的一部在藏园中朝夕相对,可见此书的精善可宝,而周叔弢的慨然之让,不仅有成人之美,也是成书之美的佳话。

爱书读书

自庄严龛中除宋元古本外,收藏有更多的明清刊本,但是周叔弢选择收藏的眼光极高,不但求其书之刊印精良,而且求书之保存完美,更进而求书之曾经昔贤校跋者:

① 张元济、傅增湘,《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页313。

② 谢刚主,《雨窗谈书》,《古今》半月刊第四十九期(1944年6月),页7。

③ 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续集》,卷四,叶6,《宋刊虞平斋百家注苏诗跋》。

凡遇刻本，卷帙必取其周完，楮墨务求其精湛，尤重昔贤之题识与传授之渊源；又其书必经子古书、大家名著，可以裨学供循诵者。至校抄之书，审为流传之祖本，或名人之手迹，必精心研考之，亦定其真贋。不幸有俗书恶印、点污涂抹之累，则宁从割舍，不与滥收。设遇铭心绝品、孤行秘本，虽倾囊以偿，割庄以易，而曾不知恤。既收以后，又亟缮完补缀、存其旧装，就以金粟之线，盛以香楠之匣，牙签锦囊，芝芬麝馥，宝护用勤，故其藏书不奢阔富之名，而特以精严自励^⑭。

周叔弢最脍炙人口的收书标准，是他的拟人五好之说：第一，他认为如果一部书的版刻好，即等于人之先天体格强壮；第二，纸张好等于人之后天营养得宜；第三，题跋好等于人之富于才华；第四，藏印好等于美人薄施脂粉；第五，装潢好等于人之衣冠整齐。当他有意捐出藏书时，所拟的唯一条件便是好好爱书：“展阅者应严守赵文敏毋以爪侵字、毋以唾揭幅之训。保存古籍，斯为最要，典长者宜熟知而谆诚也。”^⑮

周叔弢非常重视古籍外观形式的完美，特地延揽一名修补书籍的师傅在家工作，专门维护自庄严龕中的藏书。例如一部元刻本《复古编》，因纸张曾经染色，发生化学变化，以致触手即碎，他加以重装，四周围以素纸，不但便于翻读，重要的是延长了此书的寿命，绝非仅供赏心悦目而已。类似的例子极多，周叔弢时常感叹装裱工艺的没落，将影响古籍的保存与维护，因此在一九五九年的全国人代会上，联合另一位文物专家徐森玉提案，建议设立古籍装修技术班，培训这项传统工艺的继承人。他们的提案获得通过实施，由北京图书馆与中国书店各开设一班，每班受训期间长达两年，学员结业后分发各有关机构工作，至第三班时因文化大革命而中途停办。即使如此，周叔弢的努力已获得相当程度的实现，而对大陆各处古籍的保存维护有其贡献。

家境的富裕促成了自庄严龕的大书藏，周叔弢却不是只藏不读的附庸

^⑭ 周绍良，《周叔弢传略》，《晋阳学刊》1985年第1期，页68，引傅增湘《自庄严龕检书图序》。

^⑮ 同注①。

风雅之辈,他有一幅《自庄严龛检书图》,知交好友遍为题诗作跋,对他经营企业与藏书读书两者能够兼筹并顾,莫不大表钦佩。从他的群书题跋中,也可以见到他用功之勤,例如民国六年(1917)底,他以十天工夫校出明刊本《太玄经解赞》的千余个错误;又如民国十九年(1930),他以宋本《新序》改正明本约三百个错字;再如民国二十九年(1940),他以宋本《金壶记》三卷即校出同书抄本的数十条脱误后,有感于宋本的确可贵,不禁在跋语中对于有人讥刺他佞宋而辩解一番^⑩。在周叔弢的许多书跋中,随时可见讨论版本、内容、前人题识等等问题的精审之词,梁鸿志称他“周侯书眼炯如月”^⑪,实非过誉。

捐书归公

五十岁以后,周叔弢已有捐书的念头。民国三十一年(1942),他编成《自庄严龛善本书目》后,序言如下:“生计日艰,书价益贵,著录善本或止于斯矣。此编固不足与海内藏家相抗衡,然数十年精力所聚,实天下公物,不欲吾子孙私守之。四海澄清,宇内无事,应举赠国立图书馆,公之世人,是为善继吾志。倘困于衣食,不得不用以易米,则取平值也可,毋售之私家,致做云烟之散,庶不负此书耳。”从一九四九年,周叔弢开始整批或个别地陆续捐书:

一九四九年中,他以二两黄金从居奇的书贾手中买下一册宋刊本《经典释文》卷七,捐献给故宫博物院,使故宫原藏的此书残本成为完帙,而他也被誉为“新中国第一位向国家献书者”^⑫。

一九五〇年,周叔弢召集居住在天津的阖族会议,将家祠“孝友堂”收藏

^⑩ 同注⑥,页121,《金壶记》。

^⑪ 梁鸿志,《爱居阁诗》(1938),卷六,叶7,《题周叔弢自庄严龛检书图》。

^⑫ 王芝兰、刘国展,《为珍品找到了理想的主人——访文物图书收藏家周叔弢》,《文物天地》1981年第5期,页34。

的三百八十余箱、六万余册书,捐给南开大学文学院,其中包括明刻本《南藏》及百余部的丛书。同时捐出的还有祠堂名下的三十余亩房地。

一九五一年,北京举行盛大的《永乐大典》展览会,他将自己收藏的两卷(卷7602—7603)捐出一并展览。

一九五二年,周叔弢对自己辛勤经营数十年的自庄严龛藏书,终于做成最重要的决定,捐出其中最精华的古籍七百一十五部、二千六百七十二册,包括宋刻本五十九部、金元蒙古刻本三十四部、著名的黄(丕烈)跋本五十七部、周叔弢自己校跋的五十部等等。这些琳琅满目的古书先参与同一年北京举行的大规模“中国印本书籍展览”,然后即归北京图书馆珍藏。周氏捐书近三十年后,北京图书馆终于编成《自庄严龛善本书目》,于一九八五年印行,附有《自庄严龛勘书图》及五十部善本书影。

一九五四年,他再度捐给南开大学三千余册书,包括外文图书在内。

一九五五年,捐赠天津市图书馆三千一百部、二万二千余册,包括清代善本及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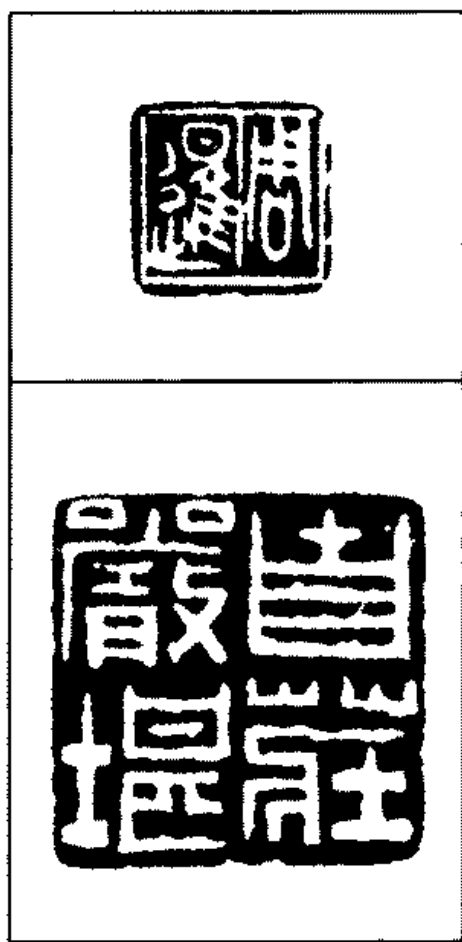
一九七三年^①,周叔弢将自庄严龛仅存的一千八百二十七部、九千一百九十六册藏书,再度捐给天津市图书馆,包括清代铜、泥、木三种活字本七百多部。另外又捐赠一千二百六十二件战国以来玺印等文物给天津艺术博物馆,一九八四年该馆编印《周叔弢先生捐献玺印选》,其中多达四十方玺印属于国家一级文物。他这次捐出文物图书曾于一九八二年在天津、北京两地陆续展览。

从上述这多次捐献的质与量,可想而知周叔弢毕生收藏的美富。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他将自庄严龛全数捐出,正象征千年来私人藏书事业的结束,周叔弢可说是最后的传统大藏书家。

^① 有的资料认为此次捐赠是在1982年。但实际捐赠在1973年,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周叔弢又遭困境,以致延迟至1982年才有正式赠受之举及公开展览。

刊书与著述

周叔弢曾将十余种藏书刊刻或影印传世,首先是民国七年(1918)因其夫人有疾,他发愿印行佛经,遂以宋刻本《诸史提要》、《庄子口义》二书售归傅增湘,而以所得书价印行傅氏附赠的《庐山复教集》。以后周叔弢刊印的书,包括他收藏的第一部宋本寒山子诗(民国十三年[1924])、《孝经注》(十六年[1927])、《宣和宫词》(十九年[1930])、《十经斋遗集》(二十五年[1936]),以及不确知何年刊印的《鱼玄机诗集》、《稼轩长短句》、《东坡乐府》、《屈原赋注》、《九僧诗》、《寒云所藏宋版提要》等。他又编印所藏诸家藏印汇辑、弢翁续得印、封泥拓片,及其弟周季木藏铜器集拓等。



周叔弢藏书印

周叔弢出身宦翰世家,加上数十年浸润书海,自有其深厚的学识,难得的是他又通习英文、德文^②,为传统藏书家中罕见,周叔弢早年已译有《康德人心能力论》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原计划续译《康德传》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两书而未果。

^② 周叔弢学习外文与读藏外文书,参见周珏良,《自庄严龛藏书综述——纪念先父叔弢先生逝世五周年》,《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988年第3期,页1-3。

郑振铎玄览堂

民国以来的文学界,有不少人以一身扮演多样的角色,但除了胡适、鲁迅等极特殊的例子,能在每个角色上都有很高的成就和深远的影响外,通常只是在一二专门研究或创作方面出类拔萃,学有余力时再旁及其他,很少人会像郑振铎一样,由于对文学的万分热忱和强烈的使命感,成为一个中外不拘、新旧不挡,翻译、创作、研究多管其下,极其“复杂”的文学家,以致他成名虽早,影响也大,可是一般对他的成就却看法不一,近年来有关忆述郑振铎的文章,多着重于新文学方面的种种,本文主要介绍的则是藏书家的郑振铎,记述他以狂热的爱好,为私为公搜藏图书文献的事实。

文学的健将

郑振铎,字西谛,笔名宾芬、郭源新,别署纫秋、幽芳阁主、玄览居士等,福建长乐人,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十一月七日出生于浙江永嘉^①。民国六年(1917)他从中学毕业后,进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因受到才



郑振铎像

^① 陈福康,《郑振铎年谱》,页1。

开始的新文学运动影响,发愤写作白话文,并勤读西洋文学名著,五四运动时郑振铎是学生代表之一,认识了瞿秋白、许地山、瞿世英、耿继之等人,并先后担任《新社会》周刊、《人道》月刊的编辑,又因投稿于《新青年》及《晨报》之上,而在新文坛初露头角。

民国九年(1920),郑振铎自学校毕业,当年底与友人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他负责起草简章,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三项为宗旨,这个提倡“为人生的艺术”的文学团体,于十年(1921)一月初在北京正式成立,他和耿继之分别当选会中的两名职员:书记干事与会计干事,他的寓址也成为会所,并为该会的代用会刊——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负责北京地区的集稿事宜。

十年(1921)五月郑振铎南下上海,主编文学研究会的另一刊物——《时事新报》的《文学旬刊》,十二年(1923)一月继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以后除一度赴英、法考察研究外,他一直主持《小说月报》的编务,到二十一年(1932)一·二八事变因商务被炸毁而停刊,文学研究会亦无形中停顿为止。郑振铎因文学研究会和《小说月报》奠定他在文学界的地位,而文学研究会和《小说月报》主要也因他的热忱推动而蒸蒸日上,发展出极大的影响力,郑振铎还是研究会的十二名发起人中,最完全而始终献身该会中外、新旧、文学三项宗旨的一位。在这十年中,他经常发表创作及研究性文章,更勤于译介各国文学,主要的著作有《文学大纲》、《俄国文学史略》,和以俄国文学为主的一些翻译作品;他也在复旦大学、中国公学教书,并在五卅事件后办过《公理日报》。

从民国二十年(1931)秋到抗战前的六年中,郑振铎同时从事文学教育、编辑刊物、个人创作和旧文学的整理研究四项工作:他先后担任北平的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暨南大学的中国文学教授;继《小说月报》后主编《文学》月刊、《文学季刊》及丛刊式的《世界文库》;创作以西方神话和中国历史小说为主的作品;并开始大量影印明清两代的戏曲;这时期他的主要著作有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等。在上述繁忙工作外,郑振铎又

参加文化团体如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中国文艺家协会的活动,他由对时局的关怀,逐渐转为对政府的不满,不仅喻之于作品的字里行间,甚至形之于与学界人士联名发表的宣言主张^②。

抗战中郑振铎留在上海,任教于迁入租界的暨南大学,参加以出版《鲁迅全集》为主的“复社”,同时为己为公的大量搜集古籍善本,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学校关闭,他也蛰居避祸。胜利后郑振铎主持全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的成立,并以最高票当选理事,又编辑《民主》和《文艺复兴》两种刊物,前者是他唯一的政论性杂志,这时期他的文学创作减少,整理编印的工作则更形庞大,陆续出版《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等巨册,同时他反对政府的态度也更激烈,加入马叙伦、许广平等文教界人士为主的“中国民主促进会”,到各处演讲游行。

一九四九年二月,郑振铎从上海间道香港北上,至三月中抵达北京,先后获选为人民政协委员及全国人代会代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出任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局长,先后又兼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一九五四年十月晋升文化部副部长。这几项职务都和图书文物的保护整理有关。他曾赴西北敦煌各地勘察,又曾几次赴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苏俄东欧等国访问,最后于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七日,率领文化代表团赴阿富汗及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途中,飞机失事丧生于苏俄境内,结束了纵横文坛四十年的生涯,他在此前遭遇到的严厉批判也随之落幕^③,终年六十岁。

狂热的书痴

从民国十年(1921)文学研究会成立后,郑振铎开始搜集以戏曲、小说等

^② 郑振铎表现对政府不满的作品,如1935年写的小说《漩涡》(原载《文学季刊》,收在徐沈泗、叶忘忧合编,《郑振铎选集》,页11-37,1936年上海万象书屋印行)。与他人共同发表的宣言,如1935至1936年间的《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看法》、《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等等(以上均见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页105-119、144-145)。

^③ 关于郑振铎遭遇的批判,参见陈敬之,《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一辑),页35-48,《郑振铎》。

旧日白话文学为主的作品,为他起草的研究会宗旨之一——整理中国旧文学,做准备的功夫。然后在将近四十年中,由于他持续不断地收藏,搜得的图书虽然或聚或散、有得有失,但在他逝世后,由遗孀高君箴捐赠给北京图书馆的“玄览堂”全部中外文藏书,竟多达一万七千二百二十四部、九万四千四百四十一册,这个数字绝不逊于一般大学图书馆的收藏量,而其中线装书占七千七百四十部、四万一千册,约略将及中央图书馆所藏的半数,国立图书馆自有政府拨款购买,郑振铎却是凭着一己之力造就的书藏,而且其重要性不仅止于数量之繁多,或其中三十余部难得的宋元本(大部分是残本),而是在于如下的几项特藏:

一、戏曲

戏曲是元代文学的灵魂,明清两代也兴盛不已,但直到清末民初才有王国维、董康、吴梅等学者注意收集和研究。郑振铎较他们年轻,起步也晚得多,民国十二年(1923)的《小说月报》上,才开始刊登他自己的《读曲杂录》。入迷之后从第二年起,在上海和苏杭一带不论新旧版本大量购买,只要他看中有研究价值的,总是急不及待的非立刻到手不可,根本不考虑自己有钱没有,或甚至将一家十口的数月费用一掷无遗。有次他在上海听说苏州出现百十种明代传奇的抄本,患得患失地失眠了一夜,第二天绝早赶到苏州去先得为快,归途上心满意足之余,觉得世界都变得可爱起来:“心中充满了无限止的生的喜悦,我一点也没有想到那一笔书债要如何的偿还法。儿童时代以后,从来不曾有过像这样不倦的、喜悦的旅行。”^④

类似的一幕在他的生活中不断地重演,“从来不曾有过的喜悦”也一再地出现,就由于投注了如此之巨的精神和金钱,郑振铎到抗战之前已收藏了一千余部的戏曲图书,不论杂剧、传奇都有独步一时的成果。民国二十一年(1932)他任教燕京大学时,曾在该校天和厂一号的住所,举行“北西厢记展

^④ 郑振铎,《徇俸集》,页643-654,《钞本百种传奇的发现》。

览会”，公开展出他收藏的二十一种《西厢记》版本（明刊十一种、清刊十种），再从北平图书馆借得六种助兴。这个别开生面的专题展览，引起学界一阵瞩目，郑振铎倒非藉此出风头，而是提倡文学史的研究应重视版本，才能显示古人作品的真面目，免受历来好事删改者的愚弄而自误误人。

郑振铎最喜将所得戏曲汇辑影印以公诸同道，较著的如《清人杂剧》、《汇刻传奇》、《古本戏曲丛刊》等，都是接二连三集的大部头出版。在《清人杂剧初集》的序文中，他以继承编《元曲选》的臧晋叔与编《盛明杂剧》的沈泰两人自期许，从传存元明清三代戏曲史料一脉而言，他确可媲美前贤、当之无愧的。一九四九年以后，郑振铎继续影印不少罕见的孤本秘籍，例如从程砚秋“玉霜簪”和梅兰芳“缀玉轩”发掘出的十余种曲本都是。

郑振铎以一介书生，既经常不顾一切的“见好就收”，又不时的要付之影印，而且每次都只限印一、二百部的数量，久而久之不免捉襟见肘，抗战起后景况更紧，虽然他才亲手编写印成《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却不得不送出百余部典质易米，期满后无力赎回，想出以东墙补西墙的办法，选择其中的八十二部最精本，在二十八年（1939）秋天以七千元让售给北平图书馆，包括他认为当时存世最早的一部《西厢记》，以及四百年来首度出现人间的《蓝桥玉杵记》等等。连这两部书都想脱手，便知他当时确已如自己所形容的“一贫如洗、

近二三十年來劇曲之研討風行一時靜
 菴瞿菴導其先路陽卿斐雲搜訪尤力
 予亦購求頗助微有所獲今王吳洪
 逝陽卿亦墓木已拱南北數千里間惟
 斐雲與予尚於風雨如晦之時事以不
 急之務耳偶發一念欲續後古之業
 惜力有不足僅收一集謹郵致一函於
 斐雲兄以寄遠思

諦
 上青書

郑振铎题跋墨迹（孟宪钧先生提供）

彷徨不安、踌躇无策”^⑤，否则像他这样爱书如命的人，不到最后关头岂肯和“无限止的生的喜悦”轻易相舍呢？可笑郑振铎以七千元的半数赎回典书，暂时解窘后，旧习难除，短短一两个月内已将另外半数用光，又换来八、九百部图书，说他是狂热的书痴，谁曰不宜？

二、小说

郑振铎从少年时代对古典小说的阅读兴趣，进入民国十年（1921）以后的研究阶段。他主编的《小说月报》革新第一号，在《改革宣言》之后，紧接着了一篇《文艺丛谈》中，郑振铎抨击《四库总目》不录小说的不平现象，并呼吁整理“混乱”的中国文学。因此当他着手搜集戏曲的同时，也在大量网罗小说。国内搜集之不足，又远渡法国访求，写成一篇《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登在《小说月报》第十八卷第十一号，这篇中国小说研究史上的重要文献，不但是以后一些类似文章的先导^⑥，甚至在远隔半世纪后，还能引起在同一地点看书的新一代小说史家的激动情怀^⑦。

一般都把郑振铎收藏的小说列在他的戏曲之后，但有趣的是他自己对于小说，却不曾像戏曲般割爱出让过，他倒未曾说明何以对小说有如此的“偏爱”，在他死后编印的《西谛书目》中，小说类是六百八十二部，比戏曲类的六百六十七部还多些，或许就是他有厚爱于小说的结果吧！在这些小说中，明刊本占四十四部，这是相当难得的，因为小说虽是明代文学的代表之一，但当时刊印而流传至今的本子为数不多，以中央图书馆所藏，加上代管北平图书馆的部分合计，明刊本小说也不过三十五部而已，由此可知郑振铎所藏的价值；尤其小说比戏曲更易遭到自命不凡的后代文人改削增减，因此留古存真是非常重要的。国人对古典小说进行学术的研究，始于胡适的从

^⑤ 郑振铎，《劫中得书记》，《序》。

^⑥ 记述海外访书的文章，清末即有，但专以小说为主要对象者始于郑振铎，在他之后的如1931年孙楷第的《日本东京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书目提要》、1956年李田意的《日本所见中国短篇小说略记》、1957年柳存仁的《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等。

^⑦ 马幼垣，《中国小说史集稿》，《小说研究的点点滴滴——代序》。

版本考证入手,郑振铎走的是同样的方向,当民国十五年(1926)他在《鉴赏周刊》撰写《中国小说提要》时,所见所藏的还大多是清末民初的坊刻本,然后他一面向前追本溯源,一面向左右广收异本,到民国十八年(1929)以后,陆续在《小说月报》发表《水浒传的演化》、《三国志演义的演化》、《明清二代的平话集》,以及在《文学》月刊撰写《西游记的演化》、《岳传的演化》等等,都已根据他新得或别人发现的古本侃侃而谈,说明其演变发展的过程,从而奠定他在小说研究上的地位。

郑振铎对同一小说的广罗异本,可以《水浒传》为例(不含《水浒》的续书),在《西谛书目》中,从最早的明嘉靖朝到民国以后,共有二十一种版本,包括图像及注略各两部。其他如《列国志》、《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等等,无不如此,在其书目中难得有两部书名、卷数、刊者、年代等著录完全相同的同一小说,要经营成如此这般一个书藏,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也由于有这样的依靠,难怪郑振铎在小说研究中经常会有些大胆的推断。在孙楷第著名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不仅多处引用郑振铎的说法,事实孙氏书目收录现存小说所根据的藏家,在个人方面主要的就是郑振铎的收藏,孙氏并邀请郑振铎写了一篇序文。

三、版画书

戏曲和小说书大都附有图画,郑振铎爱屋及乌,对此也深所喜好,他编辑的刊物上固然经常刊出版画作品,他最早的专著《文学大纲》也附有不少插图,稍后的《中国文学史》更因附图多达一百七十余幅,而要特别冠称《插图本》,尽管这部书出版后评价不一^⑧,但对于他的附图之多,倒是有口皆碑。

民国十六年(1927)一月,郑振铎在《小说月报》撰登《插图之话》,主要的内容是借着他所藏附图的戏曲和小说,介绍明清两代的版画,此文是已知

^⑧ 有关评论这部书的文章,较重要的如吴世昌在《新月》第四卷第六期(1933年)的长文,郑振铎旋于次期撰文辩驳。吴世昌再于(1933)《图书评论》第二卷第七期(1934)登载更长的书评;另日本的《书志学》第一卷第二期(昭和八年[1933])也有评文。

他关于版画研究的第一篇文章。不过,这时在郑振铎涉猎的领域中,版画还只算是附庸而已,再经过十余年的博闻广见之后,到民国二十九年(1940)他著名的《中国版画史图录》开始分册出版,所述上自唐及五代,以迄民国当世,除参考小说戏曲而外,更扩及经史子部,见书三千种、引书一千种、图录一千七百幅,穷委探源版画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及其演变过程。这时附庸早成大国,版画与戏曲、小说鼎足而立,成为郑振铎最主要的三项研究。

当郑振铎进行版画史的个人研究时,鲁迅也正以各种方式鼓吹版画艺术,提倡木刻画风气,两人从事的范围虽有广狭不同,却合作编印过《北平笈谱》和《十竹斋笈谱初集》两部传统版画书^⑨,后者的明代原刊本极为罕见,他们翻刻时向朋友借到的底本还是有缺页的,可是后来郑振铎却收得两部完美的原刻本,这当是上天对他一番苦心的酬庸吧!

郑振铎所藏“图”书的质量数一数二,在《西谛书目》中,除了本来就是美术图录的书外,注明“有图”的共是一千零二十部左右。换言之,他的藏书中大略每七部就有一部是附图的。以时间而言,郑振铎所藏最古的版画,是宋元之际平江《碛沙藏》佛经内的佛像与杭州的天竺灵签;不过,郑振铎所藏精华,仍在版画黄金时代的明人作品,包括美术谱录类的专书及附图的戏曲小说两者:

专书方面,他最宝贵的是《程氏墨苑》、胡氏《十竹斋画谱》和《笈谱》、《芥子园画传》等,这几种珍品都在抗战中获得,当时正是他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却不惜以卖去戏曲善本的余钱,换来一批谱录善本,每得一种往往几天睡不安稳,或赞叹自己生平书运之佳,或跋称“收异书于兵荒马乱之世,守文献于秦火鲁壁之际,其责至重,却亦书生至乐之事也”^⑩。从他这几句难得一见文绉绉的跋语,可以想见一位眉飞色舞、兴奋无极的书痴情状,因为这些

^⑨ 《北平笈谱》于1933年序刊,由郑振铎在北平搜集笈样,寄至上海经鲁迅选定,再寄回北平付印。郑振铎撰有《访笈杂记》收在《佻倭集》,页37-57。《十竹斋笈谱初集》于1934年以版画丛刊会名义刊行,此书与前者不同,前者仅就原笈底板重新刷印,此书则据明刊本重予摹刻,交荣宝斋刷印,因纸墨印工都极精妙上乘,出版后评价甚高。

^⑩ 郑振铎撰、赵万里编,《西谛题跋》,页8,《跋芥子园画传三集》。

明末以至清初的彩色套印本，其光彩耀目确足以代表版画史上登峰造极之作。

附图的戏曲小说方面，郑振铎所藏更指不胜数，举凡金陵、建安、新安等明代刻书中心出版的作品，几无不备，而郑振铎只要对戏曲小说有所题跋，必然兼及附图，或考证刻工家传，或评断年代真伪，或赏析笔意格调，这些对于他自己从事戏曲小说的研究大有帮助，这是他比别人条件优越处，更不是今日依赖“影印本”作研究者所能望其项背。印刷原是中国少数几项得意于世界的技能，版刻套印更是文学与艺术的结合，可惜台湾地区目前对于此道（西洋版画不论）的探索，难得其人，更遑论有助于戏曲小说的研究。

四、其他

郑振铎藏书的特色，不只上述三项而已。例如文学方面的弹词、鼓词、宝卷等类，当民国十六年（1927）他在《小说月报》的号外《中国文学研究》上，刊登《西谛所藏弹词目录》，列出一百一十七部；到民国二十三年（1934），他在《文学》第二卷第六号撰写《二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的发现史略》，已增加到三百部以上。宝卷方面，郑振铎从十六年（1927）开始搜集，起初都是光绪至民国的印本，以后在北平教书时，获得一些明代至清初的本子，在《西谛书目》中列有九十一部宝卷，包括明本七部，最珍贵的当是他称为“金碧钞本”的一部彩绘《目连救母生离地狱升天宝卷》，在他的《中国俗文学

李長吉詩想像奔放奇語叠見世人苦枯澀者
 讀長吉詩便知天才詩人是如何的文思沛旺
 像長江大河之不可竭其造辭用字又是
 如竹的破天心揭地胆凡宇宙間物無不
 可投入詩里而為之盡忠肆力予非詩
 人而素喜長吉詩今得曾益釋本紙墨
 精良其是怡悅復增誦吟之趣矣
 西諦跋清初刻本《昌谷集》

西諦跋清初刻本《昌谷集》
（国家图书馆藏）

史》书中,曾以很多篇幅介绍其内容。最可惜的是郑振铎委托商务印书馆在各地的分馆,搜集到全国一万二千种歌谣俗曲,全毁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的一·二八事变,否则又是他的玄览堂藏书另一项特色,而《中国俗文学史》的民歌部分也必更为精彩。类似的情形在二十六年(1937)八·一三沪战的翌晨重演,他眼睁睁地看着寄放在虹口开明书店的一百多箱书,遭到焚烧净尽的厄运。

此外,郑振铎还有许多不可忽视的专题收藏,例如《诗经》、《楚辞》、佛典、《陶渊明集》、唐人诗集、各种目录,以及他最后一两年觉得“近三百年的学人心力所聚,似应有一个结束”^①,因而致力搜藏的清人诗文集等等,真令人奇怪何以他收藏的兴趣如此广泛,却又有如此可观的成绩?郑振铎痴心的目标是藏书三万种、三十万册^②,估计当在百万卷以上,这是历来藏书家可望不可及的天文数字,但是以他充沛的精力、无限的热忱,和解放后的权位,是有可能实现这样的梦想,不料他才只六十岁即意外丧失了生命,也丧失了私家藏书史上登峰造极的机会。

文献的卫士

抗战八年中,郑振铎未到后方,这引起一些揣测,有人认为他是对政府没有信心才留在上海^③。然而,战时留在陷区的人不少,而到后方者立场也未必全和政府一致。就郑振铎而言,留在上海也许是因为他担任文学院院长暨南大学一时并未撤退,也许是多达十口的家累,也许是舍不得视如生命的庞大藏书,甚或这几个也许都是。与其追问郑振铎为甚么不到后方,还不如问他在抗战中做了些甚么?

抗战胜利不久,郑振铎在上海的《周报》上,刊登一连串的《蜚居散记》,

① 《郑振铎先生遗札(1955—1956)》,《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1期,页341,“第八札”。

② 刘烜撰,《郑振铎日记手稿》。

③ 苏雪林,《文坛话旧》,页92-97,《坠机丧生的郑振铎》。

内容是战时的见闻录,后来他又出版《劫中得书记》、《续记》,叙述炮火下一个本性难移的书痴生涯。他这《三记》虽然追忆了不少战时生活,却始终没有提到冒险参加政府在上海抢救古书的事,当时参与的其他人也从没有一字及之,一般只晓得郑振铎未向敌伪靠拢,并赖典当旧书度日,谁知他还有与政府合作抢救文献之举呢?

郑振铎为公抢救古籍的行动,以民国二十七年(1938)中的《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为序幕。这部六十四册、二四二种的元明杂剧内,包含有大量过去元曲研究未曾一见的史料,只是三百年来此书一直在若存若亡之中,当重现人间待高价而估时,郑振铎无力问津,便主动敦促后方的政府收购,以免再度落入不见天日的谁家书篋中,后来书商自三千元哄抬至一万元,郑振铎又自告奋勇筹款垫付,经过一番周折,终使此书归于公藏。他写有一篇长跋附在《劫中得书记》书后,这部《古今杂剧》的获得,虽然尚不至于如他说的,不下于甲骨文字或敦煌写本的重要,但确是近数十年来戏曲资料一次最可观的发现,他自己认为:“从文化上看来,实较克一城、得一地尤为重要也。”^⑭

更大规模的抢救行动,开始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初。当时江南一带的故家藏书,因战祸而源源不断地流入上海书市,日本、美国、伪政府都在角逐竞购,善本古籍不是因炮火灰飞烟灭,就是漂泊散落异域,于是教育部和中英庚款董事会出钱,留在上海、香港的学者文人出力,而由中央图书馆居中策划联系,三方共同进行抢救的工作。这个行动的全部经过,参见本书附录《抗战时秘密搜购沦陷区古籍始末》,以下所述是当时郑振铎个人的工作情形。

在全部抢救过程中,二十九年(1940)和三十年是搜购阶段,三十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搜购停顿,接着是到胜利为止的保管阶段。在第一阶段中,上海方面由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和郑振铎三人共同负责,郑振铎主要是担负第一线抛头露面的搜书任务,每天往还各书店

^⑭ 刘哲民、陈政文编,《抢救祖国文献的珍贵记录——郑振铎先生书信集》,页290,《致张元济》,民国二十七年六月九日。

间奔走看书,甚至赶到听说要售书的藏家去直接洽购,他把为自己藏书的狂热精神,扩大为民族保留书种的长远之计,虽说他自己本来就是书店的常客,但是像这种突然进行的大手笔搜购,很难掩尽耳目、秘密到底,日本秘探曾到各书店查访他的行踪,他也身历过书市附近街道的临时搜检,有时甚至不敢住在家里,而躲到朋友处避风头。在如此困难的环境下,郑振铎的态度、决心和毅力在当时他写给张寿镛的几封信中表露无遗:

我不惜时力,为此事奔走,其中艰苦诚是冷暖自知。虽为时不久而麻烦已极多,想先生亦必有同感也。然实甘之如饴,盖此本为我辈应尽之责也^⑮。

我辈爱护民族文献,视同性命,千辛万苦,自所不辞,近虽忙迫,然亦甘之如饴也^⑯。

我辈自信眼光尚为远大,责任心亦甚强,该做之事绝不推辞,任劳任怨,均所甘心。为国家保存文化,如在战场上作战,只有向前,绝无逃避,且究竟较驰驱战场上之健儿们为安适。每一念及前方战士们之出生入死,便觉勇气百倍,万苦不辞。较之战士们,我辈之微劳,复何足论乎^⑰!

三十年(1941)底太平洋战争爆发,租界已非安全地带,负责上海搜购的三人中,何炳松奉命暨大迁校,并去福建筹办国立东南联合大学,张寿镛则须维持光华大学转入地下的秘密上课事宜,他们两人都各有所忙,无暇兼顾,只有郑振铎在上完“最后一课”^⑱之后失业了,于是这大批得来不易的大批古籍保管工作,落到他的肩上。

当时购得的书中,已有部分运往香港,留在上海的还有大约一千六百部精善本、一万一千部较次的善本,包括刚刚才以七十万元购进的张氏适园珍

^⑮ 同注^⑭,页23,《致张寿镛》,民国二十九年三月二十日。

^⑯ 同注^⑭,页26-27,《致张寿镛》,民国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⑰ 同注^⑭,页141,《致张寿镛》,民国二十九年九月一日。

^⑱ 《最后一课》是郑振铎所撰《蛰居散记》的第七篇(页42-46),记叙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暨南大学停课关闭当天的经过。

長樂鄭氏所印珂羅版書

(一) 中國歷史參考圖譜 (香及本)
凡二十餘種，但二古服用至清末，所有重要之文化史蹟，名人圖像，社會制度，書畫美術，建築雕刻，日用器物，凡此以迄晚清時代史實，人在生活之發達者，無不具備。收圖二千餘幅。厚紙之裱裝，香及本在印刷中。用上等厚厚料紙，珂羅版精印，合訂八框冊，外附說明冊。每部預約價五百萬元。同時預約十部以上者，每部預約價減為四百五十萬元。同時預約二十部以上者，每部預約價減為四百萬元。同時預約一百部以上者，每部預約價減為三百三十萬元。

(二) 中國城外所藏古畫集 (香及本)
凡二十餘種，收城外所藏漢晉六朝以來至唐宋古畫一千四百幅，用上等厚厚料紙，珂羅版精印，合訂二十冊。每部預約價七百二十萬元。同時預約十部以上者，每部預約價減為六百九十萬元。

(三) 中國古銅器陶俑圖錄
凡四百餘頁，收圖近千幅，連說明冊之冊，一布函。用上等厚厚料紙，珂羅版精印，並附彩色圖十幅。為研究漢唐史及美術雕塑者必備之書。每部預約價五百萬元。同時預約十部以上者，每部預約價減為四百五十萬元。

(四) 唐宋以來名畫集 (香及本)
凡一百三十五幅，用上等厚厚料紙，珂羅版精印，裝一巨冊。預約價每部二百萬元。同時預約十部以上者，每部預約價減為一百八十萬元。

鄭振鐸手迹(“中央圖書館”藏)

藏在內，這些書都分藏在法寶館和外商銀行中，鄭振鐸在蟄居中得隨時照顧圖書的安全。困難的還有物價飛漲中的生活問題，他一面靠重慶的接濟，並將印好不久的《玄覽堂叢書》零星出售易米，這部叢書是他與何炳松、張壽鏞三人，就獲得的書中選擇有關明季史料印成的，此時正好救急；另一方面鄭振鐸也賣去不少自藏的圖書，整批賣的有三、四次，零星出售更是常事，他承

認抗戰最後的兩年，幾乎天天都在打書的主意，如果勝利再遲些到來，則他連自己三大藏書之一的版畫書都會脫手而去^①。

勝利後，這大批藏匿在上海由他保管的古書，陸續由中央圖書館起運到南京，鄭振鐸才得卸重擔，遺憾的是這付重擔在后來的公私記載中，都有意無意地被忘記了^②。

一九四九年以後，鄭振鐸擔任的各項職務都與圖書文獻的保護整理有關，從各項數據中，可以知道他絲毫無忝於這份保護者的工作：進行大規模的考古發掘活動、籌開盛大的出土文物展覽會、編印數百種戲曲叢刊、鼓動藏書捐贈歸公等等。鄭振鐸在最後“居官”的十年中，將以往三十年對圖書

① 鄭振鐸，《蟄居散記》，第十七篇（頁104-114），《售書記》。

② 以《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的序文為例，只提“得張詠寬（壽鏞）、何柏丞（炳松）兩先生之贊助”，而不及於鄭振鐸。

无止境的狂热,洋溢扩大到地面上下的各类文物,他在坠机丧生前,不论公私都还有尚待完成的庞大计划,如搜集六朝人文集和各地方总集、编印文学史和美术史资料丛刊、撰写古代版画史等等,真有如叶昌炽咏黄丕烈的诗:
“翁不死时书不死,似魔似佞又如痴!”^②

^② 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五,《黄丕烈》。

潘承厚潘承弼宝山楼

名门之后

清朝中叶以后,江苏吴县的潘氏不仅是当地最煊赫的门第,也是全国著名的家族之一。从乾隆中至光绪末约一百二十年间,以乡会试科名而言,潘氏先后约三十五人金榜题名,包括一甲一名的状元和两位一甲三名的探花;以服官从政而言,二品以上的有尚书侍郎三人、巡抚一人,中下级官员则是屈指难数。如果要观察清代士绅家庭崛起繁衍的过程、家族中伦理、在社会中地位及其影响力等等,吴县潘氏是个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本文则在介绍他们之中几位较著名的藏书家,并以民国以后的潘承厚、潘承弼兄弟两人为主。

潘承厚字温甫,号少卿,又号博山,别署蘧庵,生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十二日;潘承弼字良甫,号景郑、寄沔,别署盍山,生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七月二日。潘家从乾隆中叶开始发达的第二十九世奕字辈算起,到第三十四世的承厚兄弟已是第六



潘承厚像

代，他们的高祖是官至太傅、武英殿大学士的潘世恩（谥文恭）；曾祖潘曾玮，字宝臣，号玉泉，官兵刑两部郎中；祖父潘祖畴，字叔九，号叙亭，县学生员；父亲潘亨谷，字仲衡，号子嘉，也是县学生员，从亨谷起又出嗣堂伯父潘祖同（字谱琴）之后。



潘承弼像

在潘世恩四子中，季子曾玮一房的功名仕途都较逊，可是到民国时潘承厚却经商有成，他早年丧父，以下还有兄弟四人，长大后独力撑持门户，不仅振兴潘家已有两百年历史之久的酱园生意，并在吴县当地倡组电器公司、田业银行，抗战初期又在上海创设通惠银号。不幸英年早逝，民国三十二年（1943）四月三日病卒，年仅四十岁。潘承弼则专研国学，受业于章太炎和吴梅两位国学与曲学大师门下，抗战中应其姊夫顾廷龙之邀，前往上海张元济等人创办的合众图书馆工作，至一九四九年以后回苏州故里。一九五六年潘承弼重至上海，担任上海图书馆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系兼任教授，一九七〇年代末应聘为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顾问，至二〇〇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病逝，享年九十七岁。

藏书渊源

我国自来最重读书，而每一士人家中也多少都有些藏书。潘氏藏书可溯自乾隆时代，正与他们读书科名的发达同时而起。奕字辈的三兄弟当中，潘奕隽字守愚，号榕皋，乾隆二十七年（1762）乡试举人，一洗其祖父连续十三科不第的抑郁，接着三十四年成进士，首先为潘家开创金榜题名的纪录，

但不几年便乞归故里,与同时的大藏书家黄丕烈、袁寿阶等人优游林下,赏书品画,在他的《三松堂集》中,颇多与黄、袁唱和之作,如黄丕烈两次迁居,奕隽分别赠以《担书图》及《载书图》两诗^①。至于奕隽自己的藏书,编有《三松堂书目》,据说是“虽无百宋之珍,而精钞名校所获亦伙”^②。其中曾经黄丕烈校跋的在一百种以上^③。奕隽因独子世璜(字黻堂,号理斋,乾隆六十年[1795]进士)先卒,所藏分传给遵祁、希甫两孙各约数万卷。潘遵祁字觉夫,号顺之,别署西圃,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在吴县城郊筑“香雪草堂”归隐,他获自三松堂的书在洪杨之役损失几尽,有“楹书冷落鸡窗雨”之叹,但事后结习难忘的“还觅图书结古欢”^④,并将所藏编成《西圃藏书目》与《香雪草堂书目》,只是香雪草堂再传后陆续散失,剩下的数百种到民国二十三年(1934)终为后人全部出售,潘承厚兄弟曾以千余元收回其中的数十部。潘希甫字保生,号补之,道光十六年(1836)举人,他获自三松堂的书递传第三子介祉(字玉荀、号叔润),介祉好书不下其祖,藏书处称为“渊古楼”、“桐西书屋”,可惜所藏散得比香雪草堂还更快,光绪中即为儿辈斥卖一空。目前台湾地区所知潘奕隽一系的藏书仅有两部:一是三松堂钞本《唐诗偶钞》一卷,书上有他几次重读的题识、评语及印记;一是潘介祉的手稿《明代诗人小传》十四卷,稿成后又增删极多,可见用功之勤。以上两书都属“中央图书馆”珍藏。

奕隽的仲弟奕藻,字思质,号畏堂,乾隆四十九年(1784)进士,无子。幼弟奕基,字汝勤,号云浦,府贡生,他的功名不及二兄,后代的富贵却不在其下,长子世荣,字锦堂,号树庭,乡试举人;次子世恩,字槐堂,号芝轩,乾隆五十八年(1793)殿试状元,宦途直上,位极人臣,卒后冯桂芬在其墓志铭中说:“国朝以来生加太傅者五人、重宴琼林者八人、廷试第一官大学士者八人,惟

① 潘奕隽,《三松堂集》,卷一三,叶6,《黄尧圃移居担书图》;卷一六,叶1,《黄尧圃移居载书图》。

② 潘景郑(承弼),《著砚楼书跋》,页130-131,《三松堂书目》。

③ 叶景葵,《卷盒书跋》,页127,《苏学士文集》。

④ 以上两句见潘遵祁,《西圃集》,卷八,叶5,《六十述怀敬次先大父嘉庆己未诗韵》。

公兼之,至历事四朝,则昭代一人而已。”^⑤潘世恩四子中,长子曾沂,字企曾,号功甫,嘉庆举人,官内阁中书,积藏图书数栋,计划建藏书楼供乡里学子利用,但咸丰九年(1859)时火焚损失殆尽;次子曾莹,字申甫,号星斋,道光进士,吏礼等部左侍郎,其“小鸥波馆”以收藏书画著名,至于藏书则要到再下一代的祖字辈才卓然成家,最有成就的是潘祖荫“滂喜斋”,其次有潘祖同“竹山堂”及潘祖颐的藏书等。

潘祖荫字东镛,号伯寅,又号郑盦,是潘曾绶(世恩第三子,字黻庭,举人)的长子,咸丰二年(1852)一甲三名探花,仕至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卒谥文勤。他在政事余暇致力收藏金石书画,成就不仅是潘氏之最,也是人文渊藪的吴县一时之冠。光绪十五年(1889)潘祖荫延叶昌炽就其苏州所藏最珍本一百三十五部,编成《滂喜斋书目》^⑥,其中宋元本五十八部,包括脍炙人口的赵明诚与李清照夫妇的《金石录》、秦观的《淮海居士长短句》,杨守敬从日本带回北宋刊本《广韵》和南宋刊本《竹友集》等等,可惜在此之前的咸丰九年(1859)英法联军时,祖荫分藏上海、京师两地的珍籍,先后付之荡然,否则滂喜斋足以傲世的藏书绝不只此数,从他的“分廛百宋”、“迻架千元”两个印记,可以知其气势一斑。光绪十六年(1890)潘祖荫死后无子,金石为僮仆窃取几空,图书则大致还在,归其弟潘祖年(仲午)所有,民国十四年(1925)祖年病逝后,藏书仍未散失,抗战以后不知结果如何。

潘祖颐,字祝年,号竹岩,为曾玮季子,历署浙江温州等地知府,收藏图书中有宋刊本《皇朝文鉴》、《史记》等数十种,却在光绪十六年(1890)时意兴萧索至倾囊出售,虽经叶昌炽等人劝请留存,终以四千余元尽售于翰文斋书肆^⑦。

潘祖同,字桐生,号谱琴,潘曾莹长子,恩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咸丰

^⑤ 冯桂芬,《太傅武英殿大学士文恭潘公墓志铭》。

^⑥ 《叶昌炽日记》中称所撰为《滂喜斋书目》,以后易名《滂喜斋读书记》,祖荫后再改为《滂喜斋藏书记》,并嘱潘祖年以祖荫之名付刊,刻成后潘祖年因与缪荃孙为借书事不愉快而未曾发行流传,后陈乃乾获得缪荃孙当年所得潘氏藏书记内容,于1924年据以排印出版,并于序文中对潘氏后人有所诋毁,导致1928年承厚兄弟以潘祖年原刻旧版印行,并附序辨诬。1969年台北广文书局影印通行者系陈乃乾排印本。

^⑦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抄》,记七,页31-32,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十六日—二十九日。

八年(1858)涉及顺天乡试弊案免官居家,他在兄弟分产时获得其父所留全部图书,又陆续收购而积成“竹山堂”四万卷藏书,并递传给嗣孙潘承厚、承弼兄弟。

宝山楼藏书

承厚兄弟家学渊源,又有志同好,于是以竹山堂四万卷藏书为基础,共同努力建立起他们自己多达三十万卷的“宝山楼”。民国十八年(1929)秋天,吴县书市出现一部宋蜀大字本《后山居士文集》二十卷,由于纸色晦暗,大家都以为是明代翻刻本不屑一顾,兄弟两人却独具慧眼以二百元毅然收下,又将藏书处取名为“宝山楼”以示珍重^⑧。他们获得这部镇库书后,有次傅增湘从北平南下,曾到吴县潘宅借赏,他描述为“字大如钱,气息朴厚, […]披玩再三,惊喜出于意表,盖不特为海内孤行之帙,亦实为后山集传世最早之编”^⑨。

从民国十一年(1922)起,承厚兄弟以不及二十岁的少年从事收藏,他们与吴县当地老一辈的藏书家邓邦述(群碧楼)、宗舜年(咫园)、丁祖荫(湘素楼)、许博明(怀辛斋)等人,朝夕往还过从,既是古籍版本的忘年同好,也是角逐书林的竞争对手,承厚兄弟只是初入此道的后起之秀,一些好书经常为上述诸家捷足先得;可是,以后十余年中,老辈陆续凋零,藏书相继散出,结果终究为兄弟两人所得的不在少数,尤其连诸家手写的著述与收藏目录也流入宝山楼之中,不免让他们对人间的无常感慨不已。他们收得老辈的藏书,较多的还有曹元忠(笺经室)、莫棠(铜井文房)、孙毓修(小绿天)几家,都各约数十部左右。

宝山楼藏书未见编有全目,从潘承弼自撰的《著砚楼书跋》中,可以看出一些他们收藏的重点:

^⑧ 同注^②,页222-223,《陟冈楼丛刊》。

^⑨ 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续集》,卷四,叶9-12,《弘治本后山先生集跋》。

丁丑之難吾吳七物備極蹂躪故家散盡流離中履者亦不知凡幾如婦人丁
 芝孫先世履履皆所珍珍秘之者亦不一而足矣其猶與潘氏同庚者以
 還與芝孫有連者林偶見一序快極輒中取之者實從中居者至相射者芝孫
 所得者多於時吾吳藏書家如郭又素先字文子必欲在夕遂從履閣借論在方
 弱冠而歸公嗜嗜然者有志年賞新之樂而今忍之誠以履華東未去此書
 芝孫先世手錄方今預則校注者方且也是國書館獲贈錄入士礼度於芝孫
 全書山林芝孫自之故天如人禁社去三十年既不示人既年標別於城中
 改取未數載後潘蘇臺証其寓處遂送芝孫散失華書店唐君先得翻刻
 之下年却索二百元亦有向洋適先兄博山以事遠里說者如性如值據疑
 沈上相與費新者累月未獲亦實為之歸伯淵與書者同主揚身謀亦宜
 是書之上半部先兄屬潘劍台孫揚之愛唐君不肯讓如唐君年終吾友西歸為
 商詳公之訂信送嘉談及先兄潘先兄度而終劍台亦以歸之唐君在唐君間
 費玉潘下圖最外贈價九十元孫揚學取四之三而以其一歸值先兄以書還唐
 君亦一任存值以全書者商務印書館存並由王君九表文為之校定楷徑王
 文以意竄改遂失其面目今日所存所存者不先白書之指身年事之 孫上書
 先世詳錄編成孫自孫証証內外並知以書之珍貴三十年來若若若之孫即
 今親之去故不為以書款年并并并并并并并并并并并并并并并并并并并
 刑神精木德備之致等視雲烟深到二十年來那大華那字云起因早教康遠而
 丁氏照堂所有史不之能歸什一原教年常進物遠忘身徑日野子控諸校簡而已
 頃往書舟郵奉一 日書先世所供考據之一函藉有歸行之微細並未取未以
 再書日書林上係錄之年載唐實之書月日潘少所撰於亦未取

潘承弼題跋(孟宪钧先生提供)

第一是明末史料。光绪末叶以来,明季史料逐渐受人重视,收藏和研究都颇成风气,如朱希祖、谢国桢等都是其中翘楚,承厚兄弟对此也有一番罗致,如庄廷珑因而贾祸的《明史钞略》、查继佐续《罪惟录》后所著的《国寿录》等抄本。潘承弼书跋中有关明末的史籍和文集共约四十部,占其书跋全部的十分之一。他受章太炎的影响,曾有意撰写南明史,因此搜购不少此方面图书,后来因同门朱希祖已着先鞭而告放弃。

第二是乡贤文献,这是宝山楼最大的特色,凡是乡贤稿本、校跋,甚至只有只字片语题记的书,他们都见无不收,《著砚楼书跋》几近半数是乡邦文献,尤其集部更大半都是。他们搜藏的范围不限吴县当地,而是包括旧日苏

州府辖的常熟、昆山各县在内,他们又不仅收藏而已,更常常就零散碎烂的稿本加以整理装裱。江南是我国精华之区,以吴县为中心的苏州地方,又是其中的人文渊藪,承厚兄弟勤于乡贤文献,先河后海,其实也正是为中华典籍留根的事业,可惜二十六年(1937)以后的战火动乱,使得他们欲编订类如苏州艺文志的期望,成为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对日抗战开始,宝山楼连遭炮火和盗窃,损失约十分之三四。接着兄弟移住上海,尽管个人收书之兴随之稍减,当郑振铎等人在上海为公抢救江南沦陷区流散的古籍时,承厚却积极地参与协助,居间代为和居奇的书贾讨价还价,尤其在收购邓邦述“群碧楼”大宗藏书一事,承厚付出相当多的力气,所以郑振铎在日记中写道:“保存文献,人同此心,博山为我辈中人,故尤具热忱。”^⑩

不幸承厚在两三年后病逝,潘家失去主要经济支柱,此后承弼购书,也会有“室人交谪”的时候,而且所藏也陆续有些出售易米,例如明代文倣(文徵明重孙女)彩绘的一千三百幅《金石草木昆虫状》,为中央图书馆收购,这部具有中药研究及艺术欣赏双重价值的图籍,此后成为该馆在宣扬其珍贵收藏时,经常展出的样本之一。抗战胜利后承弼仍居住上海,而在故里的宝山楼藏书,竟被承厚一子论斤出售^⑪;一九四九年以后又将剩下的一些善本捐献给北京图书馆,包括一部宋刊本《古尊宿语录》在内^⑫,而宝山楼镇库的《后山居士文集》也已成为北京图书馆的珍藏^⑬。有聚有散本是历来藏书家必然的结果,只是大都发生在身后。少数生前即散的也不至于到当废纸卖

^⑩ 郑振铎撰、陈福康编,《郑振铎日记全编》,页104,民国二十九年一月十五日。郑振铎在随后的日记中,屡次记载潘承厚和书贾联系书价的事;而郑振铎在致张寿镛报告收购情形的信函中,也有同样的记载,参见刘哲民、陈政文编,《抢救祖国文献的珍贵记录——郑振铎先生书信集》,页6、17、19、33、65等。

^⑪ 同注^②,《自序》,页1。潘承弼,《著砚楼读书记》,页330,《跋先泽麟羽》。

^⑫ 《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中,注明《潘家多先生捐赠》者约二十七部。潘家多为潘承厚次子,字希曾,号宜卿,1925年生。

^⑬ 《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在宋刻本《后山居士文集》之下,并未注明系潘氏所捐。此处说该馆收藏是依据亲眼目睹本书的徐小蛮,《陈后山集版本源流考》,《文献》第十九辑(1984年3月),页174,但徐文并未说明本书是潘氏捐赠或出售或其他方式进入北京图书馆。

的地步,承弼竟不幸如此,难怪他伤心凄然之余,会屡屡梦回宝山楼中兄弟共赏的旧时欢乐。一九五六年承弼重至上海工作时,随身犹携有宋元明钞校稿本千余种,但先是家累越重,十余年中时常出售易米,再至文化大革命期间,终于在一九六八年化为云烟,但他后来只保留地说:“戊申之役,囊笈尽失。”^⑭

宝山楼共同藏书以外,潘氏兄弟又各有所好。承厚收藏历代尺牍,承弼则嗜好石拓。承厚积二十年所得名人手迹一千余家,上起元代,下迄清末,而以获自无锡沈梧“古华山馆”及陈骥德“吉云居”旧藏的明末忠贤书翰最多。抗战中他全部携往上海,准备付印流传人间,分为忠贤、儒林、文苑、金石、藏书、画苑、方外、闺秀、吴郡先贤九类,但在完成藏书及画苑之后即病逝,所藏尺牍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全数捐给北京图书馆,再转交故宫博物院收藏^⑮。承弼则自弱冠便图书与石刻同时并收,抗战前他积藏的石刻拓本已超过一万件,战争中幸无太大损失。民国二十九年(1940),安徽贵池刘世珩“聚学轩”所藏石拓七千余件(包括叶昌炽五百经幢馆的三千余件),在上海的书市上待沽,其中可补承弼所无的颇多,只以一万元悬价过高,他几经考虑踌躇,好不容易才毅然购下,到了一九五〇年代又将自己所有全部收藏二万余件,都捐入由合众图书馆改名的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⑯。

编刊与校订

潘承厚因忙于经营事业,编校图书的数量不及乃弟,仅辑印有《明清藏书家尺牍》、《明清两朝画苑尺牍》两种,都以珂罗版精印,前者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出版,收录一百四十八家;后者于三十二年出版,收录二百四十六家,他不幸于出版前病逝,承弼搜集他生前的二十幅画作,题为《蓬盒遗墨》,

^⑭ 潘承弼,《著砚楼读书记》,页571,《自跋行笈吟残稿》。

^⑮ 潘景郑,《寄沅跋语》,《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4辑,页266。

^⑯ 同注^②,页156-157,《五百经幢馆碑目稿本》。

附在书后留念。承弼并继志在翌年辑印承厚所藏尺牋两种：《元明诗翰》，收三十六家；《瞿忠宣公蜡丸书、侯忠节公绝纓书合璧》，是明末忠臣瞿式耜与侯峒两人的书札。

潘承弼年轻时读书，曾从事辑佚晋书等部，将所得汇成《著砚楼辑佚初稿》，共一百三十五种，未刊^①。他在抗战前参与编辑章太炎所办《制言》半月刊，并撰登所藏书跋数十篇，后来收入《著砚楼书跋》一书，于一九五七年出版；四十余年后再加入一些新章并改名《著砚楼读书记》，于二〇〇二年出版。潘承弼另有《寄沅剩稿》一书，于一九八五年出版，内容仍为题跋，并与读书记有些重复。

右詩翰三十六家都四十通元明聖妙具見一二先兄藏
簡札至夥此其弁冕兄手輯畫苑尺牋客歲既得歲事茲
冊兄曾置紙待印遺志惓惓何日忘之爰為詮次付諸墨
版各家傳略其著者昭在士林無待贅辭間有一二湮晦難
稽者俟博雅有以詳考焉斯編繼藏書畫苑兩集而成列為
遠盒所藏尺牋之三藉踵遺業冀以餘力得次第布刊垂諸
不朽庶兄二十年披羅之辛勤不隨雲煙俱化我心無欲
差慰九京耳書成附誌數語以存願末距兄之喪歲星將
周追念前塵益不勝如剗之痛矣甲申二月弟承弼謹識

潘承弼題跋墨迹

在抗战前及战时，潘承弼曾陆续印行一些图书，如其师章太炎《春秋左传句读》、张鸣珂《寒松阁题跋》、龚自珍《定盦续集》、陈骥德《吉云居书画录》等。民国三十年（1941）他与姊夫顾廷龙合编《明代版本图录》一书，网罗明代所刻书籍，分监本、藩府、家刻、活字等十二类，每书以摄影图版一、二页并附说明，类似这种作法自清末杨守敬的《留真谱》以来，效法者颇多，但都以宋元古本为限，潘、顾两人的明代版本图录，则是首先为研究明代版本

^① 同注^⑮，页258。

者提供系统条理的图证,因此出版后风行一时。潘承弼为纪念与承厚手足之情,在民国三十三年(1944)编印《陟冈楼丛刊》甲乙两集。甲集包括潘家先世未刊稿四种:潘祖荫的《古坝考释》、潘世恩的《兰陔絮养图咏》及《家庆图咏》、潘祖年的《拙速诗存》;乙集则是他的老师吴梅所著《霜崖词录》与《霜崖诗录》两书。

潘承弼校订的书,有毛晋《汲古阁书跋》、钱谦益《绛云楼题跋》、沈复槃《鸣野山房书目》、马瀛《吟香仙馆书目》等,都于一九五八年在上海出版。

藏书之乡 藏书之家

绪言

浙江西北隅邻近太湖的吴兴,是著名的江南鱼米之乡,民国十一年(1922)王国维撰《传书堂记》一文^①,又称吴兴为藏书之乡,因为从六朝的沈约以来,当地的藏书家不知凡几,清末产生当时海内四大藏家之一的陆氏“皕宋楼”,民初又崛起声势直追四大的张氏“适园”、蒋氏“传书堂”、刘氏“嘉业堂”,这三家不但都是吴兴人,更是其中首善之邑的南浔镇小同乡,彼此或有姻戚之谊,或是通家之好,又都以富豪而好藏书,并且在开始收藏以后短短数年或十数年中,即相继蔚然成家,本文追溯他们藏书聚散的经过、所藏的异同,以及刊刻的图书等。

张钧衡适园

一、家世背景

张钧衡,字石铭,号适园主人,生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他的先祖是

^①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三,缀林一。

安徽休宁人,康熙中迁到南浔后,世代经商并以盐业致富,祖父张颂贤,字竹斋,当同治初年平定太平天国之后,颂贤受浙江巡抚委办恢复浙西盐场的产销,使得“商利益滋、官课以充,而公之家亦日丰”^②。颂贤长子张宝庆,即钧衡的父亲,字质甫,光绪元年(1875)入县学,以后又捐花翎候选郎中,以孝友行义著名乡里,可惜年仅四十二岁而死。张钧衡幼年失恃,由母亲桂太夫人抚育,光绪十六年(1890)入县学,二十年(1894)又中甲午科乡试举人,会试不第后捐主事分兵部车驾司候



张钧衡像

补,晋郎中后改外官江苏候补道员,事实他人在上海经营商业。光绪二十一年(1895),张钧衡将他的祖父在江苏常熟所置田产一千余亩,捐建“张氏义庄”以济助族人,张钧衡卒于民国十六年(1927)十二月十七日,年五十六岁。他生有五子,长乃熊,字芹伯,一字芹圃,生于光绪十七年(1891),光绪三十一年贡生,父亲死后继承适园之名,卒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五十二岁;次子乃骅,先卒;三子乃骥,字叔驯,上海古泉社及古泉学会创始人之一,以收藏金石泉币闻名,得有南唐前朝之“大齐通宝”,自号齐齐;四子乃騫,五子乃骝。张乃熊之侄张珩,字葱玉,别署希逸,生于民国四年(1915),一九五〇年起担任文化部文物局文物处副处长,卒于一九六三年,室名“韞辉斋”,收藏古籍名画也多。

二、适园藏书

张氏既不如蒋氏是藏书的世家,也不如刘氏有金榜的功名,张家的正途功名只是钧衡的举人,藏书也是从他才开始。以个人而言,张钧衡立志藏书

^② 周庆云,《南浔志》,卷三九九,碑刻四,叶16-18,张睿,《乌程张封公墓碣》。

其实要早于蒋汝藻与刘承幹两人，他在光绪二十年（1894）稍前已着手进行，并在南北各地搜购。光绪三十三年（1907），他在故乡南浔的南栅补船村筑成一处园林，取《史记》季鹰适志的典故称为“适园”，园在浔溪支流鸕鹚溪畔，与刘氏的小莲庄毗近，为明末遗民董说“丰草庵”故址，占地三十余亩，有池馆亭台之胜，其中的“六宜阁”是钧衡藏书所在，宣统元年（1909）郑孝胥曾为他撰写一篇《适园记》^③。

主人所引以自豪者也此怡邸舊藏初
 印精絕乃宋槧中無上之品董授經
 得自東瀛以千金歸余客舍燔道
 跣香重裝因泐如右戊午冬日吳
 興張乃熊呵凍書

张钧衡之子张乃熊题跋墨迹
（“中央图书馆”藏）

张钧衡移住上海后，在辛亥革命之际收得不少善本，加上和缪荃孙、沈曾植、费景韩等人交往，民初几年中适园已经藉藉其名。到儿子张乃熊时，搜书之兴不下其父，鉴定甄别之精则有过之，于是适园所藏更加美富，与密韵楼、嘉业堂一时并称于上海。适园藏书特点如下：

（一）宋元古本

民国五年（1916）张钧衡编印《适园藏书志》时，已经拥有宋本四十五部、元本五十七部；到民国三十年（1941）张乃熊编《芹圃善本书目》的时候，所藏的宋本增为八十八部、元本七十四部，巧合的是宋本恰与蒋氏传书堂相同，元本则和刘氏嘉业堂一样。将张氏父子两人的

目录两相对照，可以发现《适园藏书志》中的宋元本，并未全部包含在《芹圃善本书目》中，只是半数稍多而已，这应该是张钧衡死后诸子分产的缘故。

在适园父子相继递藏的宋本中，较特殊的如《东都事略》一百三十卷，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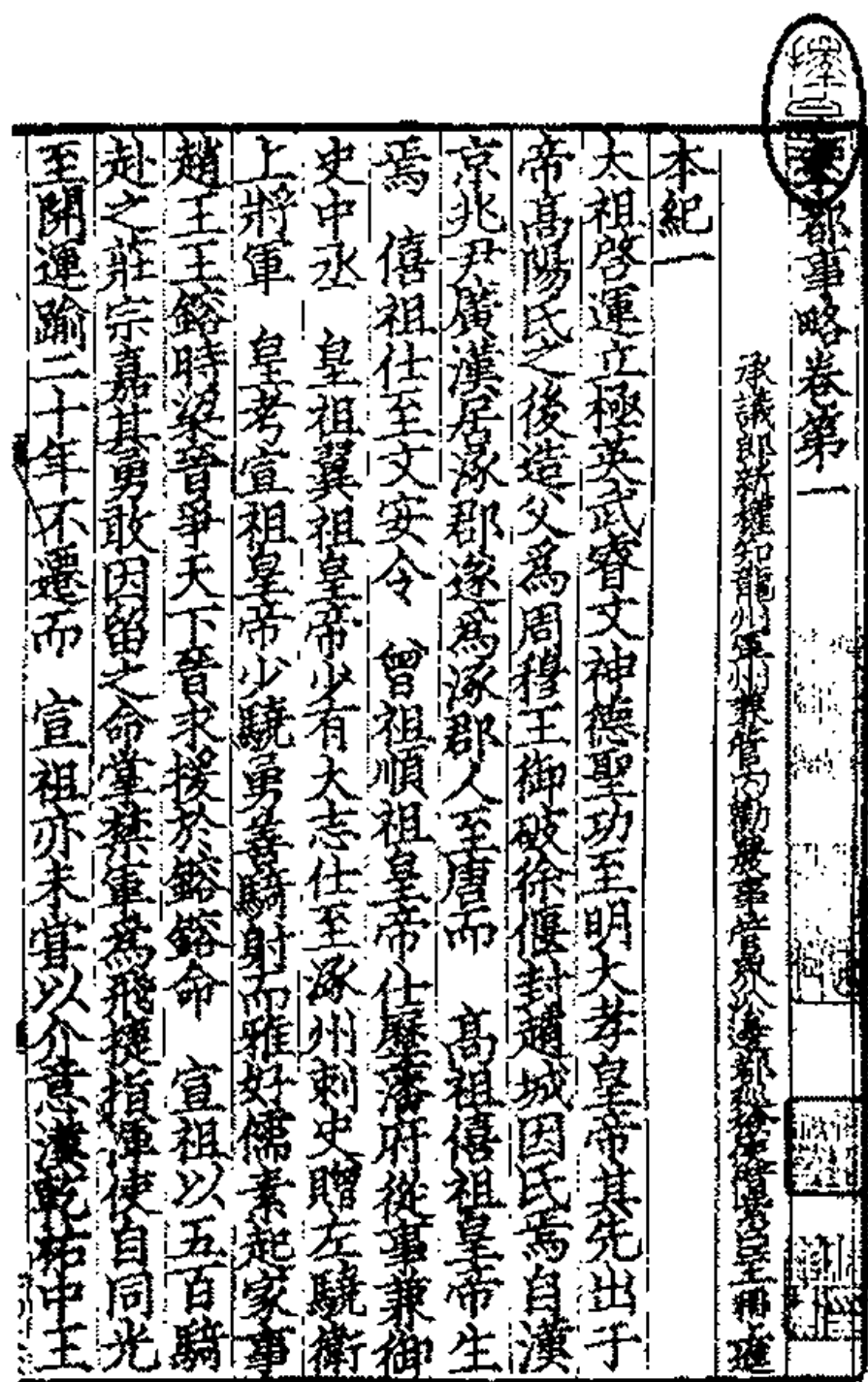
③ 同注②，卷三九九，碑刻四，叶23，郑孝胥，《适园记》。

目录后刻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两行牌记，正如近代通行的“版权所有，翻印必究”一般，可知我国对于著作权或版权的保护，起源甚早，至迟在公元十二世纪的宋代，印刷术发达后已有此种观念和实施。这部《东都事略》曾经清代怡贤亲王所藏，因此书上钤有“怡府世宝”、“明善堂”、“安乐堂”等印记，民初为董康所得，携回国内以千元代价转让给适园。

适园中还有《北山小集》与《李贺歌诗编》两部珍藏，都是宋人利用当时废旧的公文纸背面印刷的，甚至还留有不少的关防朱印，用的是宋孝宗乾道年间(1165—1173)手写的官府账簿册纸，其中官衔、人名和年月都历历可辨，古人的爱惜物力留下至今八百余年难得的史料，颇足令人深思。《北山小集》与《李贺歌诗编》后来都成“中央图书馆”珍藏，可惜前者残存四卷，仅是原书的十分之一，后者则已由该馆于民国六十年(1971)以线装仿古印行，遗憾的是未能显示原书纸背的账册等史料情状。

(二) 抄稿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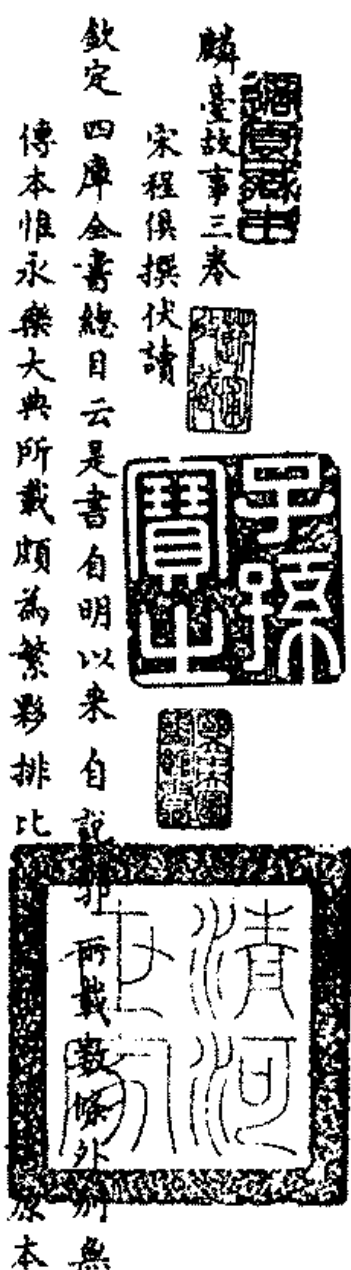
历来印刷成书的数量远在手抄之上，因此一般人的藏书中，必然绝大多数是刊印本，可是适园中的抄本，却是与众不同地达到和刊本相埒的地步。在张钧衡时期，这是适园藏书最大的特点，九百二十部左右的善本中，抄本(含稿本)和刊本都在四百六十部间，各占半数；到张乃熊手中，适园善本增加到一千二百部，虽然他藏书的方向有所转移，但抄本仍维



宋刊本《东都事略》(钤张钧衡“石铭秘笈”、“张钧衡印”、“择是居”印，张乃熊“适园收藏”印，“中央图书馆”藏)

持他父亲时期的数目,只是占全部藏书的比例,降到约百分之四十而已。

适园抄本中,不乏名家精钞之作。张钧衡曾大批收购朱学勤“结一庐”、张蓉镜“小琅环福地”、吴騫“拜经楼”、顾沅“艺海楼”等家旧藏,这几家原都是以收藏或从事抄写著名的。张乃熊陆续收入的韩应陞“读有用书斋”旧藏中,又有不少的抄本,杨守敬在日本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云是書自明以來自說部所載頗為繁夥排比五卷十有二篇今篇名散見於永樂大典中者曰沿革曰省舍曰儲藏曰終纂曰職掌曰選任曰官聯曰恩崇曰祿康祇存其九謹依類哀輯仍為五卷云、此本凡三卷關四五兩卷蓋不完本也卷一曰官聯曰選任卷二曰書籍御製御書附曰校讎卷三曰修纂曰國史凡六篇與

武英殿聚珍本命篇敘次多有異同又篇名見永樂大典者凡九而此本所載書籍校讎國史不與馬合之恰十有二篇俱足以資參考前有紹興元年尚書省劄一通中如凡十有二

壬子仲夏適園得於滬上



张钧衡墨迹(钤“适园藏本”印,“中央图书馆”藏)

抄所得,也有十三部让给适园。就适园全部抄本而言,影宋抄的四十四部最具版本学上的价值,足供校勘订正明清刊本之用。

(三) 黄丕烈校跋本

这是适园在张乃熊时期最突出的一项。江苏吴县的黄丕烈(字尧圃, 1762—1825),是清朝乾嘉以来最著名的一位藏书家,他的“士礼居”收藏宋本二百部以上,而且他对藏书校订题跋的繁多与精审,也最为人钦服乐道,他在目录、版本、校勘三方面的创获,百余年来影响很大。道光初年黄丕烈过世以后,士礼居散出的藏书成为大家争相搜购、甚至悬价以求的目标,特别是经他校跋品评过的所谓“黄跋本”,更是书价倍增不止,到民国初年时,只要能拥有二十来部的黄跋本,便足以傲视群侪,蒋汝藻的四十四部、韩应陞的六十五部,已是凤毛麟角,可是他们都还远不如杨氏海源阁的九十九部,以及独占鳌头的适园一百零一部。张钧衡时的黄跋本已近三十部,张乃熊继承了大部分,又自行搜求了八十二部,可以说是他最专注的一项藏书,

这些黄跋本后来都让售给中央图书馆。目前所知收藏黄跋本最多的是北京图书馆,约有三百一十部,而“中央图书馆”约一百六十部居次,其中适园旧藏占了三分之二。

民国二年(1913)底,张钧衡计划将藏书编印目录问世,原请缪荃孙介聘叶昌炽主持其事,后来叶氏改应刘承幹之聘,钧衡即请缪荃孙代笔,民国五年(1916)完成《适园藏书志》十六卷,以钧衡名义付刊,分四部著录共九百多部。遗憾的是以缪氏之盛名,这部书志编得颇为粗略,远不如王国维为蒋氏所编《传书堂书志》精到,有些书连必要的版本项都未注出,有些版本的鉴定但教人信毋庸置疑,却未举述足够的证据理由,而其中认真校勘过的书只有寥寥几部,各书更少有对于内容主旨的发明。

民国三十年(1941),张乃熊以战乱中守藏不易,有意出让,于是编成《芹圃善本书目》六卷,待价而沽,经过几个月与中央图书馆代表人张寿镛、郑振铎等折冲谈判,张乃熊除留下一些清代刊本和吴兴乡贤著述外,全部由该馆在三十年(1941)十月底以七十万元收购^④。

至于张珩“韞辉斋”中的藏书,从他的祖父张钧衡再传而来的虽有一些,例如宋刊本《忠经篆注》、元刊本《范文正公政府奏议》等,但大部分都是张珩自己搜罗所得,其中获自松江韩氏“读有用书斋”及南浔同乡蒋氏“密韵楼”的不少,前者如宋刊本《范文正公集》、《宋文鉴》、《昌黎先生集》,后者如宋刊本《新编婚礼备用月老新书》、影宋抄本《盘洲乐章》、校宋本《韦苏州集》等。张珩一度收藏过的宋本还有著名的《施顾注本东坡先生诗》、《尚书孔传附释文》等等^⑤,可惜韞辉斋藏书来去都快,抗战中和胜利后两度将所藏让售给中央图书馆,其中除上述的宋元古本和精钞名校以外,值得注意的是

^④ 关于此次收购经过与谈判,参见刘哲民、陈政文编,《抢救祖国文献的珍贵记录——郑振铎先生书信集》一书,尤其页124至283。但张乃熊仍留下一些宋元至明清版本,其中一部分由后人于一九五〇年捐入北京图书馆,一部分则分售于苏州、上海的旧书店,见柳和城,《适园藏书的聚与散》,《藏书家》第十三辑(2008年1月),页34-44。

^⑤ 关于《施顾注本东坡先生诗》,参见郑騫撰,《宋刊施顾注东坡诗提要》(1970年台北艺文印书馆印本);关于《尚书孔传附释文》参见本书“朱希祖郾亭”部分。



张钧衡、张乃熊藏书(钐张均衡藏书印
“石铭”、“乌程张氏适园藏书印”，
张乃熊藏书印“适园收藏”，“中央图书馆”藏)

为数颇多的时宪历书,从明朝景泰年间到民国二十七年(1938),约两百册之多,目前“中央图书馆”所藏历书十分之九以上都是张珩的旧藏。

张钧衡祖孙三代的这些图书,数十年来一直是“中央图书馆”所获最大宗而且最完整的故家旧藏,目前该馆约十四万册善本图书中,适园三代的印记最多^⑥,这大批古本珍籍灌注私人心血于先,继之公家力量保藏于后,传诸久远可待,比起下文所述蒋氏传书堂的灰飞烟灭,或嘉业堂的离散四方,真是幸运之至,张氏父子、祖孙是可了无遗憾的!

三、刻印丛书

张钧衡印过三部丛书,最早是宣统三年(1911)排印的《张氏适园丛书初集》七种、十册。民国初年他向缪荃孙请教刻书之道,正巧刘承幹不约而同也向缪氏求教,有趣的是缪荃孙一函两覆,除就采书、办书等分项说明外,曾颇为担心张、刘同时大举并刻,将使上海一带的工匠有不足之虞^⑦。

张钧衡依缪氏的指点,又刊刻了两部丛书:《适园丛书》和《择是居丛

^⑥ 张氏父子、祖孙三人的藏书印记不少,合计已知的就有十八个,他们收藏的珍善本上几乎都是钐印累累。

^⑦ 缪荃孙,《艺风堂文漫存》,乙丁稿,卷三,叶9-11,《与张石铭刘翰怡书》。

书》。前者从民国二年(1913)刻到六年(1917),共十二集、七十四种、一百九十二册,收录的书大都是他收藏的抄本和稿本中,旁人从未刻行或刻而流传不广者,这种抉幽发隐、传播文献的作法令人起敬。

“择是居”原是张钧衡又一个书室名称,大凡适园中较珍贵的古书,每卷第一页上端都前有这个朱文椭圆的印记,而他在民国十五年(1926)前后刊刻的《择是居丛书》,也是以宋元本为主,在全部十九种(五十六册)中占了十六种。张钧衡刻的三部丛书,共含书一百种,也算是巧合。这许多板片,后来由张乃熊捐赠给浙江省立图书馆,如今不知是否仍在。所幸其中占大部分的《适园丛书》,已有艺文印书馆在台影印,收在《百部丛书集成》内出版,前人播种,后人灌溉,中华文化正是赖此绵延不绝的。

蒋汝藻传书堂

一、家世背景

蒋汝藻,字元采,号梦莘,别署乐庵,生于清光绪三年(1877)六月二十二日。他的先世在嘉庆道光时以丝业致富,祖父蒋维基,字厚轩,号蛰安居士,精于小学和书画。父亲蒋锡绅,字书箴,号婴宁居士,光绪五年(1879)乡试举人,因两次会试不中,改捐内阁中书,曾为岳家掌理南通附近的海门当铺,因此与张謇熟识,光绪戊戌以后即协助张謇经营纺纱事业,著有《婴宁斋集》。蒋汝藻自光绪二十二年(1896)入县学,又中光绪二十九年(1903)乡试举人,翌年甲辰科后,科举即告废除;他在宣统中捐贡郎中,分发在学部,事实他在上海经营轮船及垦牧等实业,也是南通大生纱厂的大股东;民国十四、五年(1925、1926)之际,由于江、浙战争的牵累,导致生意失败,晚年情况不悉,卒于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一日,享年七十八岁。其子蒋祖诒,字谷孙,精于图书版本学,民国二十四年(1935)印行所辑顾广圻《思适斋集外书跋辑存》一书,其后在台担任台湾大学教授。

二、传书堂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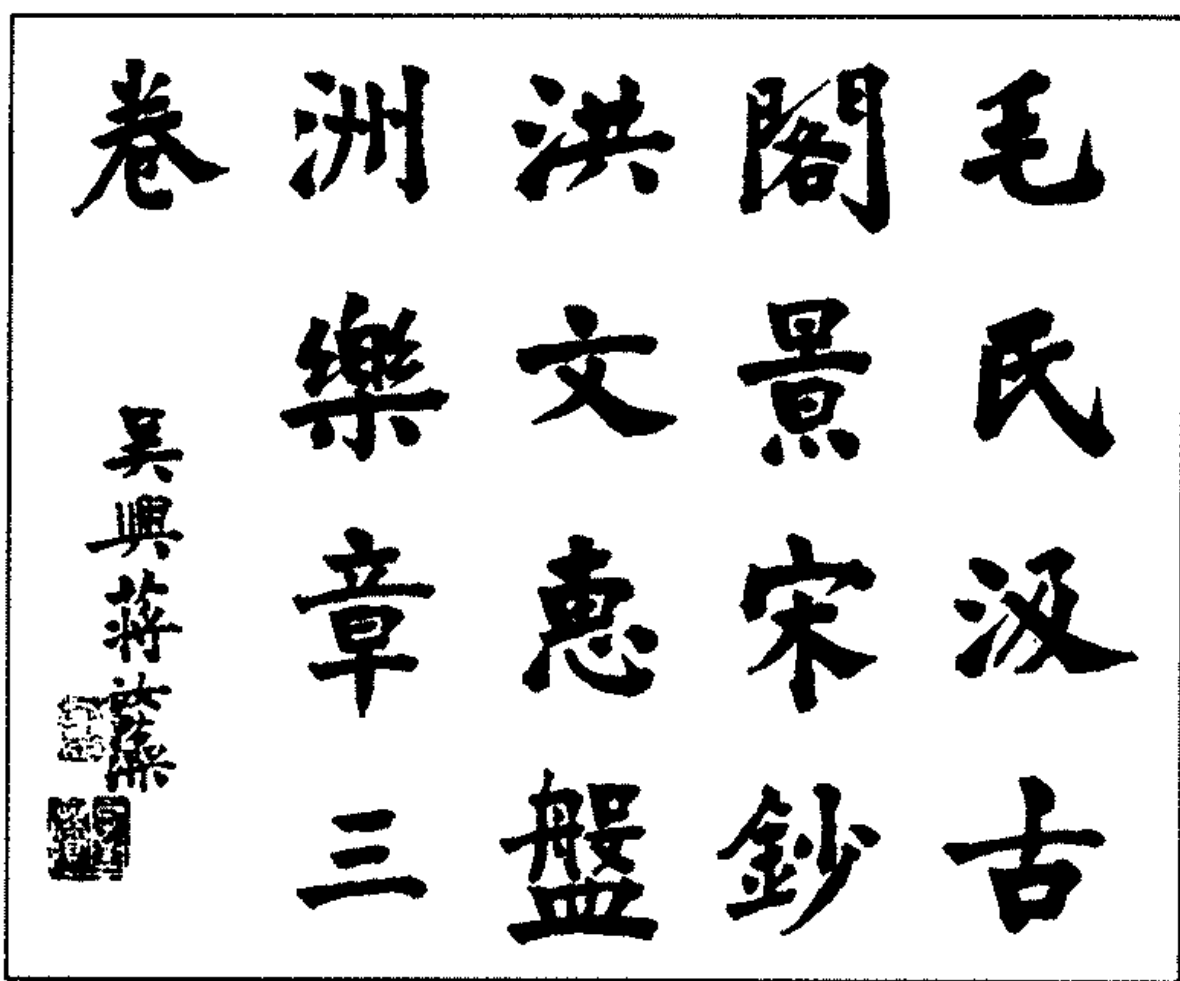
早在道光、咸丰之际,蒋汝藻的祖父和叔祖藏书已经小有名气。蒋维基有“俚簾馆”及“茹古精舍”之藏,叔祖蒋维培(字寄嵌,号季卿)则有“求是斋”藏书,兄弟各聚书约万卷,两人都是文字声韵专家,因此他们手抄手校的小学类图书不少,蒋维培还抄过一部多达八百五十卷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编》。太平军之役时,蒋家藏书丧失大半,后来由汝藻陆续又收回四十多部。

“传书堂”之名是因为蒋维基留下的二十箱藏书,由三子蒋锡绅继承,锡绅即将住宅命名传书堂以示纪念,以后又递传给汝藻。至于汝藻自己购书,始于弱冠时的一部明刊本《苏老泉先生文集》,但直到光绪三十年(1904)以后才大举入手,民初随着他的事业日盛一日,购藏的意兴更浓,又结交聚居上海的前清遗老学者沈曾植、朱祖谋、曹元忠、王秉恩等,在他们的指点协助下,不数年即声名鹊起,成为上海的大藏书家之一。传书堂所聚的二千六百六十七部善本,有如下的几项特点:

第一是多达八十八部的宋本与一百零五部的元本,宋本中有七十部是宋刊宋印,只有少数曾经元明两代修补的本子。这些宋本很多是从他的吴兴同乡吴云“两墨轩”、湖南湘潭袁芳瑛“卧雪庐”两家后人所得,其中颇有一些珍本,例如宋高宗绍兴四年(1134)序刊的《吴郡图经续记》三卷,是现存最古的一部方志。再如蒋汝藻最得意的一部《草窗韵语》六卷,是宋代撰《齐东野语》等书著名的周密(公谨)诗集,可贵处一在此书已有数百年不为人知,一是字画依照周密手稿真迹摹刻,因此当蒋汝藻在民国五年(1916)以一千五百元高价获得后,取作者及书名各一字,将传书堂又命名为“密韵楼”。有次学人墨客燕集,蒋氏出此书供赏,竟被沈曾植呼为“妖书”,叶昌炽则称之为“尤物”,说是“纸墨鲜明,刻画奇秀,出匣如奇花四照,一座尽惊, […] 触手古香,令人著录为希有奇珍也”^⑧。

^⑧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抄》,记一六,叶66-67,民国六年四月十五日。

第二项特点是名家钞校本。较大宗的如孔子六十九世孙孔继涵“微波榭”的三十部抄本,黄丕烈“士礼居”的四十四部校跋本,陆心源“十万卷楼”进呈国子监的二十几部抄本等等。蒋汝藻藏有二十卷的《永乐大典》,其中最重要的是从卷一一一二七至一



蒋汝藻手迹

一一三四的“水”字四册,恰好是酈道元《水经注》的前半部。《水经注》四十卷的研究是一项专门的研究,只是此书的宋刊本到民初时只存十二卷的残本,其次明代以后的各家刊本、抄本等,虽多至百余种,却都互有出入,甚至聚讼纷纭^⑨;而传书堂这四册《永乐大典》抄本,经傅增湘和王国维先后考校,认定是明代修大典时,根据当年尚存的宋刊本抄录的,因此比其他各本较少错误,也相对的较为重要。《永乐大典》在明清两代陆续亡佚,英法联军之后更是零落几尽,抄有《水经注》全书的八册也不知下落,到民国初年才出现踪迹,前半四册归傅增湘的双鉴楼,后半四册则为李宗侗所有;傅增湘再售于蒋汝藻的密韵楼,民国十六年(1927)又转入商务印书馆的涵芬楼,逃过一·二八事变及抗战的劫难,到一九五一年由商务捐给北京图书馆;另外的四册也由李宗侗而北京大学而北京图书馆,总算延津剑合,复成一家,其间曲折沧桑,正不下于这百年中的人事国事!

传书堂藏书第三项特点,是拥有范氏“天一阁”和陈氏“听诗斋”的旧藏

^⑨ 关于历代《水经注》版本的研究,参见郑德坤,《水经注版本考》,《燕京学报》第十五期(1934年6月),页207-233。

最多。宁波天一阁由明代嘉靖时的范钦所建,到民初已近四百年,是我国藏书史上保存最久的一家,虽有些散出,但清末民初大约还存有三千来部,不料却在民国三年(1914)被人大批窃出约四分之一左右,造成书林的一桩巨案。这些被盗的书运到上海后一再易手,除零星出售外,最后由蒋汝藻以八千元全部收下,经统计《传书堂藏书志》所载,凡七百一十二部:经十二部、史一百九十七部、子一百六十二部、集三百四十一部;以内容言,则明代史料(奏议、刑律、关榷、登科录等)和明人诗文集(二百一十部)两类最多。

贵阳陈田,字松山,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官翰林院编修、监察御史,曾根据自己所藏明人诗文集撰刻《明诗纪事》,收录近四千家。辛亥革命时陈田匆促离开北京,藏书则典押于书肆,又整批流落到日本,经罗振玉从东京购回,又转售给蒋汝藻,共二百三十五部,除了一书外全部是明人文集。天一阁和听诗斋旧藏合计将近九百五十部,已经超过传书堂全部善本的三分之一,而明人集部中更十有八九是这两家的旧物。

蒋汝藻以二十年经营之力成就的传书堂巨藏,到民国十四年(1925)时,因事业亏折不得不向浙江兴业银行典书偿债,移交时根据王国维为他编撰尚未完成的(至元人集部止)的书目清点,因此明人诗文集部分未曾俱去,到二十一年(1932)终由国立北平图书馆将这剩下的一批囊括一空;至于典当于银行的大部分书,期满后无力赎回,民国十五年(1926)由商务印书馆以十六万元购去,计宋本五百六十三册、元本二千零九十七册、明本六千七百五十三册、抄本三千八百零八册、《永乐大典》十册^⑩,成为涵芬楼历来收藏最珍贵的一批藏书,不料却在一·二八事变中,除了事先移置他处的二百余部外,全毁于日军炮火,可想而知蒋汝藻内心之寥落萧索何如。王国维在听说传书堂书散时,从北京致函蒋祖诒:“复览前编书目草稿,乃知再竭数十年力,未必能再得此数,然山河大地尚有变移,不过当局者难以为情耳。”^⑪

^⑩ 张树年等编,《张元济年谱》,页263。张人凤编,《张菊生先生年谱》,页240。

^⑪ 王国维,《观堂遗墨》,卷下,《致蒋谷孙札》,民国十五年农历五月二日。

三、蒋汝藻与王国维

民国八年(1919),蒋汝藻经罗振玉的介绍,延聘王国维编撰《传书堂藏书志》;民国十年(1921),蒋汝藻又为王氏排印《观堂集林》一书。在这前后数年中,王国维的治学也颇取资于传书堂丰富的善本,王氏自承:“余家无书,辄借诸居士,虽宋槧明钞,走一力取之,俄顷而至,[...]余在海上时,视居士之书犹外府也。”^⑫十二年(1923)五月,王国维奉溥仪之命,北上担任“南书房行走”,此后蒋、王在南北两地以函商继续编订《书志》和印行《集林》的事,所谈还包括王氏代为访购考校图书、王氏自己的工作情形,以及托蒋汝藻照料留沪的家事等,一直到十四年(1925)五月止两年中,彼此往来通信各约五十封左右,平均每月两封,可见交谊之不同寻常。

王国维应聘编撰《藏书志》后,开始检校传书堂群书,他对于宋刊本最为着意,经他一一穷究其版刻源流和比较优劣的有《纂图互注礼记》、《三国志》、《杜工部草堂诗笺》、《李贺歌诗编》、《元微之文集》等书;又如经他校勘各种版本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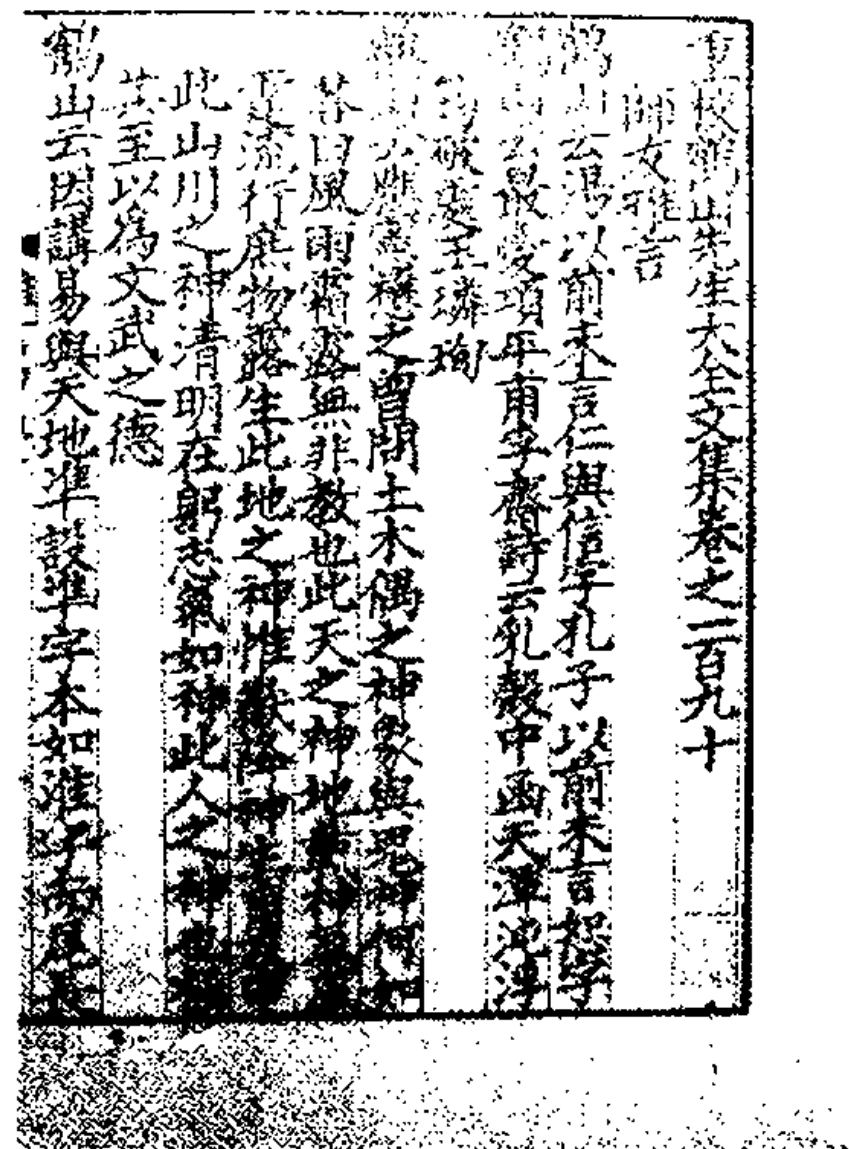
孟頫吾无百道必得少花衣于十二日收到感荷之至表
 接
 手书致意一切未及精研可谓秘笈不知未日何密
 不售藏诗半亦迄今未天物而均不全南方亦有言在藏者家
 不可不知也非大在语行数与百川学源正同疑奉大覆刊之
 前已有他刻十前藏之嘉同刊本一行二十字前人均未
 见述多见明代此者盖有数刻也同按往未此已数日不久
 印南屏集言十盛明雅别并未其多可以考辨也印
 但不知能如其言否耳多南印清
 得安不一 王国维书 十二日
 先以家书注原望时此七石路碑以考作收材料 座式快就 刻有小

王国维致蒋汝藻函

^⑫ 同注①,卷上,《乐庵居士五十寿序》,民国十五年农历天贶节。

字异同和辨正伪误的有《尔雅》、《春秋公羊疏》、《龙龕手鑑》、《韦苏州集》等书。事实王国维对宋本所下的这些功夫和他当时正在进行的《五代两宋监本考》、《两浙古刊本考》等研究,是相为表里的。此外,如他对于元刊本《资治通鉴》不同于历来目录学家的看法,对于明刊本《周礼》郑氏注推翻前人的优劣评断,发掘一千余卷的明抄本《三才广志》的作者名氏,以及考订从未有人提到的白鹿洞书院刻本《史记》等等,都极为精审明辨。这些不胜枚举的成果,说明了蒋汝藻独具慧眼,不聘目录学家,而聘读书家的王国维编撰《藏书志》,使得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和传书堂的精善古本,为之相得益彰。

藏书志的撰写工作,在王国维离



蒋汝藻亲笔影钞宋本
《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

沪前完成初稿的大部分,他携往北京从事修订,并继续撰写最后的明人集部,可惜不久蒋汝藻事业顿挫,连带使这部众所瞩目的《传书堂藏书志》,完成后一直深藏于蒋氏,在外流传的只是简略摘记书名、卷数、版刻的《传书堂善本书目》十二卷、《补遗》四卷而已。直到一九七四年,才经台静农介绍由艺文印书馆以蒋祖诒的校抄本在台影印出版,距王氏完成初稿已历半个世纪,王国维与蒋汝藻两人早已久谢人世,蒋祖诒也不及见此,而志中所载群书,或已散入公私藏家,或毁于战火煨烬。

四、写书与刊书

宋刊原书不易获得,一些好古的藏书家便设法借来抄录,其中精心影写

照摹,甚至字体点划、行格款式,都和原本相似的,版本学上称为“影宋抄本”,由于这种高明的抄手难求,而且费时费事,因此大都是卷册较少的书,大部头的影宋抄本事实难得一见,传书堂中收藏的二十三部这种抄本,超过五十卷的只有两部:一百零八卷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与六十一卷的《沈氏三先生文集》。

民国六年(1917),蒋汝藻看到表弟刘承幹收藏的宋刊本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因为这是这部书数百年来唯一所知的宋刊孤本,而且可以订正明刊本的许多错误,具有校勘上的价值,蒋汝藻即借回传书堂发愿亲手影钞一部。这部书多达一百一十卷,装订成六十四册,全部在一百万字以上,他利用每天晚上的一笔一划一丝不苟地影摹,连续两年半之久才告抄成。画家汪沅客为他绘《乐庵写书图》,王国维写序,称见此巨册抄本后,“张目哆唇,舌拮而不得下,盖海内藏书家如乐庵者,屈指计之尚可得四五,至于手模宋本至百余卷之多,非独今所难能,抑亦古所未有也”^③。写书之外,蒋汝藻从民国十二年(1923)起,委托董康在北京刻印《密韵楼丛书》,计划从所藏的近百部宋本中,精选二十部影刻传世,两年后他的事业失败而停顿时,只刻成包括周密《草窗韵语》在内的七部而已,这固然是他个人的遗憾,其实也是图书史上的遗憾。

刘承幹嘉业堂

一、家世背景

刘承幹,字贞一,号翰怡,别署求恕居士,晚号嘉业老人,生于清光绪七年(1881)。他的先世起家较蒋氏为晚,直到他的祖父刘墉才经商致富,刘墉字贯经,少年时在棉绸布行当学徒,以后改入丝业自立门户,经营湖丝出口

^③ 同注①,卷二三,缀林一,《乐庵写书图序》。



刘承幹(后排右二)与家人

生意,同治初年时已经富甲一方。刘承幹的父亲是纂辑《皇朝续文献通考》著名的刘锦藻,字橙墅,号澄如,光绪十四年(1888)乡试举人,二十年(1894)甲午科进士,分发工部主事,晋郎中后丁忧,在籍办理慈善事业,光绪二十七年(1901)陕西赈灾捐银六

万两,获颁五品京堂。三十年(1904)浙江铁路公司成立,汤寿潜和刘锦藻分任正副总理,不久又和张謇等在上海合办大达轮埠公司,并经农工商部奏派为总理。宣统二年(1910),锦藻以《皇朝续文献通考》三百二十卷进呈,得赏内阁侍读学士衔;民国后他又增订为四百卷,上接《清文献通考》,下至清亡,是研究清史的重要参考书,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刊行,次年锦藻即告病逝,年七十三岁,他另外撰有《坚匏庵文集》与《絅宦尺牍附楹联》两书。

刘承幹为刘锦藻长子,幼年因伯父刘安澜(字紫回,附贡生)早死无子,出继安澜之后。承幹为光绪三十一年(1905)贡生,由于科举停废没有进一步的功名,到宣统中却因连续在各地灾赈中捐银三万多两,获得四品卿衔,因此人都习称他“京卿”。刘家三代都不是富而吝嗇之辈,经常倡捐乡里公益和慈善事业^⑭,以济助族人的“刘氏义庄”为例,先后捐出江浙各地价值二万五千两银的房产做为基金。刘承幹长居上海,曾经清史馆与浙江通志局分别聘为协修,又担任张謇通海垦牧公司、如皋吕四同仁泰制盐公司等多家企业董事。刘承幹于一九六三年辞世,享年八十三岁。

^⑭ 刘承幹历年捐办公益慈善事业,见其自撰《嘉业老人八十自叙》,缪荃孙等撰,《嘉业堂藏书志》,页1409。

二、嘉业堂藏书

刘承幹藏书最多的时候,有一万二千四百五十部、十六万册、六十万卷以上。以数目而言,是民国以来私家藏书的冠军,较之国立图书馆也无逊色。其实刘承幹有志藏书,还只是宣统二年(1910)他三十岁的事,那年他前往南京参观“南洋劝业会”,结果却流连于“状元境”一带的书市,由于大批收购而引起书市的瞩目,等他回家后,专程送书上门的书贾络绎而至。第二年辛亥革命起事,刘承幹从南浔迁居上海,许多清朝遗老也集中于此,承幹和他们结交,发起组织“淞社”,有三、四十人定期雅集,一些生活发生问题的遗老颇愿将藏书让售给他,他既心好之,又力足以应之,因此来者不拒照收,再加上踵门如市的书贾纷纷不断,刘承幹一时适逢其会,有如容纳众流的大海,其中主要来自丰顺丁日昌“持静斋”、仁和朱学勤“结一庐”、太仓缪司年“东仓书库”、平湖陆煊“奇晋斋”、江阴缪荃孙“艺风堂”等等旧藏^⑤,仅只短短六七年光阴,刘承幹藏书声势竟直追瞿氏铁琴铜剑楼等深厚长久的藏书家。

刘承幹在上海的藏书处名“求恕斋”,由于容纳不下急遽增加的古书,就在南浔故里的“小莲庄”旁,新建一栋藏书楼,民国九年(1920)动工,十三年(1924)落成,用费十三万。因为他曾在宣统中获得清帝颁赐“钦若嘉业”的匾额,便将此楼命名为“嘉业堂”,前后两进各有七楹、八十余房间,包括宋四史斋、诗萃室、希古楼、抗昔居、藜光阁等书斋,以及阅览室、工作室、刊印房,加上广达二十四亩的园林亭池,成为民国以来规模最大的私人藏书楼。

嘉业堂藏书在以数量取胜之外,还有如下的特点:

(一) 宋元古本

包括六十五部宋刊本、七十四部元刊本,以及二十一部宋元明递修的三朝本。这些主要是从缪荃孙“艺风堂”、莫友芝“影山草堂”、袁克文(寒云)、

^⑤ 黄孝纾,《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纪略》(二),《青鹤》,第二卷第十四期(1934年6月),页1-2。



刘承幹嘉业堂

孙廷翰(字问清,蒋汝藻手抄的宋魏《鹤山大全文集》原来即是孙氏旧藏)等家收得,而刘承幹最著名的四部宋刊史书:蜀大字本《史记》和大字监本《三国志》,得之于费念慈(杞怀)后人,白鹭书院本《汉书》和一经堂本《后汉书》则是郭嵩焘(筠仙)旧有,刘承幹特别在嘉业堂中专辟“宋四史斋”珍藏,又为了将四史同时流传人间,请来当时仿宋体最好的刻工陶子麟进行影刊,并且礼聘著名的版本学家叶昌炽从事校勘,有心刊出前所未有最好的四史,结果从民国三年(1914)直到十七年(1928)才告完成。

(二) 钞本

从《嘉业藏书楼钞本书目》看,刘承幹所藏抄本的主要来源,在上述缪荃孙、莫友芝外,还有卢址“抱经楼”、吴騫“拜经楼”、顾沅“艺海楼”等家。例如明代各朝皇帝实录的抄本,将近三千卷、五百册,大部分是抱经楼的旧藏,小部分为天一阁流出及零星购得,当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进行校勘《明实录》时,曾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派人到嘉业堂钞校配补一部分,结果发现与史语所校勘用的底本出入不少,甚至达到千字之多,这显示嘉业堂这部抄本的价值。于是史语所向刘承幹洽购归公,以便进一步校勘全书,此项工作历时二十余年才告完成并在台出版,嘉业堂的《明实录》也和史语所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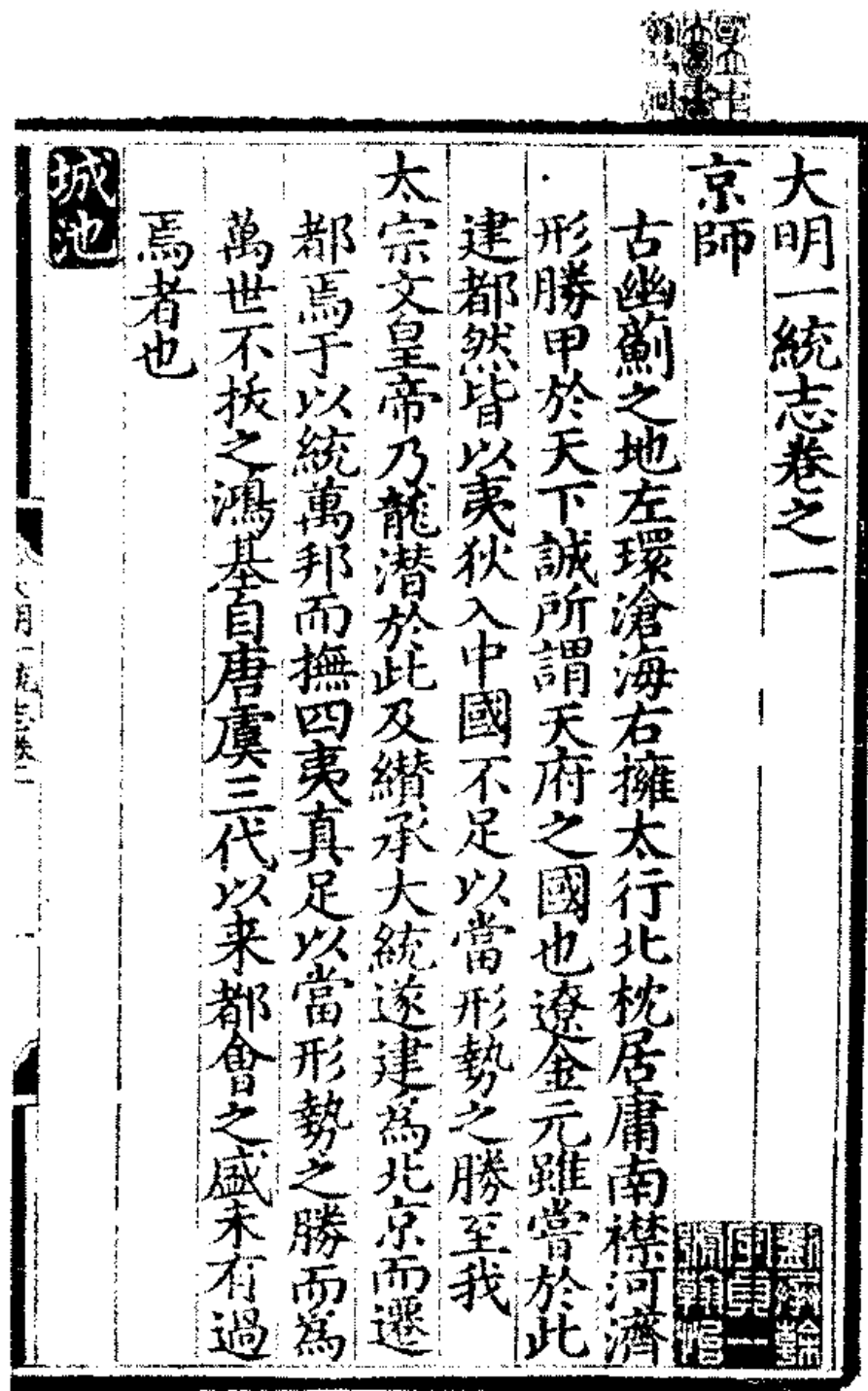
他各本千里播迁到台湾^{①⑥}。类似的情形还有一部徐松(星伯)自《永乐大典》辑抄出的《宋会要》，辗转落在刘承幹手中，再由北平图书馆洽购后整理出版。这两次个案刘承幹都算是“乐观其成”。

嘉业堂藏有八十卷、四十二册的《永乐大典》，在国内仅次于北平图书馆而已，只是这些大典不知何故竟会流落到苏联的国立列宁图书馆，一九五四年再由列宁图书馆赠回给北京图书馆^{①⑦}。

(三) 明刊本

嘉业堂的明刊本，较重要的一是史部的明代政制、经济、边防史料，一是集部内六百种以上的明人别集。这与传书堂不同的一点，是传书堂的明人集大都是卷册较少的诗集，嘉业堂则以篇幅内容较多的文集为主。

嘉业堂全数约二千部明刊本中，大约十分之六目前在“中央图书馆”的书库内，该馆所藏善本书的特色之一，原即是丰富的明代资料，而构成这项特点最重要的基础，就是刘承幹的旧藏，



刘承幹藏书(钐“刘承幹字贞一号翰怡”印，“中央图书馆”藏)

^{①⑥} 关于中研院史语所校印明实录情形，参见《明实录附校勘记》，黄彰健，《校印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红格本明实录序》长文。

^{①⑦} 据苏振申，《永乐大典聚散考》（《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新四卷第二期，页10-22）一文，引述日本方面的资料，这些《大典》由刘承幹之妾于抗战中卖与满铁大连图书馆，战后再由苏联军队劫往俄境。可是苏文所述这些《大典》为四十九册、一百一十卷，比《嘉业堂书目》所载多出七册；再据《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苏联送还的《大典》是六十四册，其中列宁图书馆送还的五十二册内，包括嘉业堂的四十册；而嘉业堂原藏还有两册（卷二一九〇—二一九一、卷七二三七）不在苏联送还之内，也许是在流落俄境之前已失去。

以明人集为例，“中央图书馆”约藏一干部左右，其中大约半数来自嘉业堂。

(四) 方志

宋代以来荟萃地方文献于一编的方志，是中国独特的一类图书，刘承幹收藏各省县方志极多，据中研院史语所藏抄本《嘉业藏书楼书目》志部所载，共是一千二百一十部，但据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民国二十四年[1935]版），则是一千零一十二部，在国内外公私收藏中居第十一位，在私人方面仅次于以收藏方志为主的任振采“天春园”（一千五百一十七部）。嘉业堂这些方志中，有二十九部是其他机构或个人所无的，例如明代成化四年的浙江《四明郡志》、嘉靖三十三年（1554）的河南《滑县志》、万历六年（1578）的湖北《郧阳县志》等等，都可以算是人间孤本。其次有五十九部是除嘉业堂以外，仅另有一个机构或个人收藏，也可见其罕见珍贵。嘉业堂所藏方志，有二十余部在抗战中卖给中央图书馆，其他的在一九四九年后，大部分归于浙江省图书馆，部分在一九五四年由复旦大学收购^⑮。

当对日抗战发生后，分在上海和南浔两地的嘉业堂藏书，开始艰于保存了。日本人对于这大批书尤其“关切”，特别命令其南浔驻军严加留意^⑯；在上海则胁迫刘承幹参加治安维持会^⑰。在日方威吓笼络并施的情况下，中央图书馆仍能透过留在上海的张寿镛、郑振铎等人，收购刘承幹的一千二百部明刊本、三十六部钞校本；其次，长沙“圣泽园”张叔平也购得嘉业堂不少藏书^⑱，但在抗战胜利后将其中五百三十部明刊本和嘉兴藏经，转售给国立浙江大学，再于一九五〇年代大学院系调整时归入杭州大学^⑲。此外，香港大学也获有近百部明刊本和钞稿本。而方志则已如前述

^⑮ 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1958年增订本），《自序》。1950年代复旦大学前后三或四次购买嘉业堂藏书，含明清刊本与抄本，见项文惠，《嘉业堂主刘承幹传》，页193-194；缪荃孙等撰，《嘉业堂藏书志》，吴格，《前言》，页4。

^⑯ 参见李性忠，《南浔沦陷时期的嘉业藏书楼》。

^⑰ 冈井慎吾，《刘氏嘉业堂の书物》，《书志学》第十卷第五期（昭和十三年五月），页185-187。

^⑱ 刘、张二人的交易导致纠纷兴讼，参见刘承幹述、吴格整理，《壬午让书纪事》。

^⑲ 周采泉，《嘉业堂藏书旧事拾零》，《图书馆研究与工作》1984年第3期，页59-60。

分售于浙江图书馆和复旦大学。至于嘉业堂的宋元本,后来又归于中央图书馆的有《唐书》等三十一部,归香港大学的有《范文正集》等十五部,另外的一百来部尚不知下落^②。差幸刘承幹早在民国十八年(1929)时,将他收藏的宋元本一百六十二部,收罗一编印成《吴兴刘氏嘉业堂善本书影》,每书各影摄一页或数页,总算雪泥鸿爪,还不致如过眼烟云,全无踪迹处。

对于嘉业堂的庞大藏书,刘承幹先后聘请缪荃孙、叶昌炽、董康三人,或鉴定版本,或校勘刻书,或撰述提要。缪荃孙撰有《嘉业堂藏书志》初稿十七册、一千二百余篇,董康则撰有《明人集部提要》六册,都未曾出版;一九五〇年代刘承幹自己就上述三人所撰略加整理后仍藏于家,他逝世后家属出售藏书志稿本,辗转归于复旦大学图书馆^③,整理后于一九九七年出版,著录一千七百七十五种善本。至于嘉业堂的藏书目录,除民国二十九年(1940)印行的《明刊本书目》四卷外,在一些图书馆中还保存着几部嘉业堂书志和书目的抄本,直到二〇〇五年才有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三种嘉业堂书目抄本出版^④。由于刘承幹在二十余年间大量收书,嘉业堂所藏一直变动不居,他也未曾出版书志或全目,而抗战以后所藏又陆续多方流散,因此要掌握这个民国以后称雄一时的私家藏书全貌与来龙去脉,是件还有待努力的事。

嘉业堂藏书数量既多,尽管有上述种种去向,鬻而未尽的事实上仍占大半。一九五一年浙江省政府着手代管嘉业堂,刘承幹旋将藏书楼、土地、藏书、书板连同各项设备全部捐献归公^⑤,浙江图书馆接管后统计,得书一万二千四百二十一部,十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八册;板片一百八十四部,三万九千

^② 关于中央图书馆收购嘉业堂部分,参见本书附录《抗战时期秘密搜购沦陷区古籍始末》;浙江大学部分,参见《浙江学报》第1卷第2期(1947年12月)所登《国立浙江大学新收刘氏嘉业堂旧藏目录》;香港大学部分,参见饶宗颐编,《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山本书录》(香港:龙门书店,1970)。

^③ 同注^①,吴格,《前言》,页3。潘继安,《嘉业堂藏书志编撰经过考》。

^④ 收在林夕编,《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近代卷,第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册。

^⑤ 浙江图书馆编,《嘉业藏书楼》,页94-95,《刘承幹致浙江图书馆函》,1951年11月19日。

五百五十九片,以及碑拓、杂志、自印书等,嘉业堂也改成浙江图书馆的书库^②,民国以来规模最大的私人藏书事业到此终告落幕,其人已往,留下数十年来在历次战乱中都幸获保全的书楼园林,并自一九八一年起列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刻书编书

刘承幹不仅是民国以后藏书最多的人,也是刻书最多的人之一,他设置工场刻书之地遍及北京、上海、南京、扬州、武昌等地,“一书之成,费或逾万,即寻常之本,亦力求精雅”^③。刘承幹刻印的丛书如下:

(一)《嘉业堂丛书》:五十七种、二百二十册,从民国二年(1913)刻到十六年(1927),是他最早刻的一部丛书。

(二)《吴兴丛书》:六十六种、二百三十八册,从民国二年(1913)刻到十七年(1928),全部是吴兴乡贤遗著。

(三)《求恕斋丛书》:三十五种、一百四十五册,以清末民初时人著述为主,内容各类都有,未注明刊刻年月。

(四)《留余草堂丛书》:十一种、十三册,从民国九年(1920)刻到十四年(1925),以理学著述为主。

(五)《希古楼金石丛书》:五种、二十二册,民国三年(1914)刊刻,包括刘承幹自己所藏所辑的《希古楼金石萃编》。

刘承幹一生刻书三千余卷,先后延请缪荃孙、叶昌炽等至少八名学者主持校勘,他自己也从事于此,不少书后都附有他的校注。刘承幹也编纂了几部书,如《明史例案》九卷、《南唐书补注》十八卷、《王文敏公遗集》八卷、《王章诗存》合刻《辽东三家诗钞》等,都收在上述丛书内。民国六年(1917),他与章棫(一山)同撰《纶旅金鉴》一书进呈溥仪,获赏“抗心希古”匾额一方,他还辑有《再续碑传集》,未刊,稿本后归中华书局。

^② 张学舒,《刘承幹及其嘉业藏书楼》;项文惠,《嘉业堂主刘承幹传》,页181-188。

^③ 同注^②,页1410。

结 语

辛亥革命改变了我国的政治体制,而传统的社会也在加速的变迁中,影响及于藏书的有两个显著的现象:一是私家藏书方面,由于聚居天津、上海两埠的前清遗老,与当地的风雅富人结合流连,向来书聚于所好的文人藏书,转变成书聚于有力的富人藏书,南浔这三家就是上海一带具有代表性的例子。第二个现象是公私藏书的兴替,如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北大、燕大、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等机构团体陆续兴起,已有取代原来私家藏书的趋势,等到抗战发生,动乱中有力者也未必能有其书,因而公私兴替的现象更为明显,结果大部分的私家藏书,在抗战中一聚于中央图书馆^②,一九四九年以后再聚于北京图书馆^③,千年来私家藏书的传统到此告一结束,而以南浔这三家为代表的富人藏书,就成为我国私家藏书史的最末一章!

^② 抗战时中央图书馆收购搜购沦陷区私家藏书,除嘉业堂和适园外,较大宗的还有邓氏“群碧楼”、宗氏“咫园”、邓氏“风雨楼”、刘氏“远碧楼”、沈氏“海日楼”,及武进费氏、杭州胡氏等等。

^③ 1949年以后,将藏书捐于北京图书馆者,较著名的如周氏“自庄严龛”、潘氏“宝礼堂”、傅氏“双鉴楼”、瞿氏“铁琴铜剑楼”、吴氏“奢摩他室”、李氏“萱荫楼”,及南宫邢氏等等。

附录

抗战时期秘密搜购沦陷区古籍始末

绪 言

我国历史上有许多次由官府大量搜藏典籍的盛举，较著的例如汉武帝广开献书之路，百年间中秘所藏书积如山丘；再如隋朝两代聚书，遂使嘉则殿藏书达三十七万册之多。不过，这些历代旧事都只能行之于天下承平的日子，而且只要一经丧乱，便告荡然无存。

在对日抗战最艰苦的民国二十九年（1940）初到三十年（1941）底之间，国立中央图书馆在教育部和中英庚款董事会的支持下，联络上海、香港两地的文人志士，冒险搜购了数万册即将散佚沦亡的善本古籍。这些古籍一部分藏匿于上海，一部分运往重庆，一部分则滞留香港。到三十年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的部分落入日军之手，被运往东京，直到胜利后才得重归故土。一九四九年时又连同其他战后获得的善本渡海迁台，形成目前“中央图书馆”内十四万册的中华古籍书藏。

这次冒险曲折的行动，是我国现代规模最大的一次搜藏图书之举，而且是在战争动乱中为之，这些古籍固然得之不易，而政府传承文化的意义亦更不凡。

古籍散佚 决定收购

江南数百年来为人文渊藪,以图书而言,乾隆所修《四库全书》分贮七阁,其中准许士民登楼传钞的南三阁:文汇(扬州)、文宗(镇江)、文澜(杭州)都在江南一带,而作为皇廷禁物的文渊等北四阁,其建筑也是仿照著名的江南藏书家——宁波范氏天一阁的形式而盖成。事实上,明清两代著名的藏书家中,除了少数的例外,大都集中在苏浙皖等江南数省境内。

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战军兴,兵燹之余,这些藏书家深觉难以继续经营存藏的古籍,有些藏书家的后代也无意于保存先人图书,于是纷纷求售维生。而日方、伪满,及尚未被战火波及的美国各大学,都派人挟款大量收购。上海与北平是我国南北两大古籍聚散市场,自二十七年(1938)江南各地相继沦陷之后,上海的书市因为上述的原因,买卖的情况反而较战前更为活跃,连北平的书贾也先后南下收购,转运北方出售,利之所在,不仅善本而已,即普通刻本亦在网罗之列,以致中华典籍一时颇有尽沦异域之虞。

一些陷留在上海的学人,对此种现象感到忧心忡忡,深恐江南典籍自此而尽,后代子孙将无书可读,或需远涉异国以求中华文化,后果堪虑。于是如国立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柏丞)、私立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咏霓)等人,纷纷写信到重庆各有关部门,建议政府设法保存。但当时战争已全面展开,军费支出浩繁,明知此事重要,而急切间难以筹得巨款。

当时刚接任中国国民党组织部长不久的朱家骅,同时也担任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董事长,他在二十六年(1937)底南京撤守的前几天,曾派人设法抢救故宫博物院最贵重的一万三千箱古物,运到安全地区。当他获悉沦陷区古籍的严重情况后,即再一次决定先以中英庚会的力量,和中央图书馆合作进行抢救,其他的以后再说,以免时日迁延而古籍散亡殆尽,这是民国二十八年(1939)底的事。

中英庚会成立于民国二十年(1931),华籍董事十人,英籍董事五人,负

责管理历年由英国退还庚款的用途。这几百万英镑的两大用处,一是以基金投资于建设生产事业,一是以息金兴办教育文化事业。后一项中包括补助中央图书馆的建筑费一百五十万元国币在内。

原来中央图书馆在南京成立时,只是筹备处的名义,负责筹备的是方由德国学成返国年仅三十五岁的蒋复璁,先是租赁民房,继而购进中央研究院在成贤街的总办事处作为馆舍。到二十六年(1937)正准备以中英庚会的补助款建筑新馆厦,发生七七事变,事情就延搁下来。以后迁到重庆,兴建一座在当地已是有数的馆舍,却只用去十万元而已,仍有百余万元未动,由此可以想见原先计划的中央图书馆规模之大。

朱家骅决定抢救古籍时,这笔经费正好可以先垫做搜购之用,这时候教育部长陈立夫出巡在外,蒋复璁先获得代理部务的顾毓琇次长同意后,开始筹划抢救盛举。

潜赴港沪 联络同志

搜购之先,必须有人到沦陷区内约定行动方式和联络方法,因此蒋复璁在二十九年(1940)元旦那天,由重庆动身进虎穴。九日抵香港,在干诺道五十五号见到叶恭绰(玉甫),他是中英庚会董事之一,两人商量后暂定全部购书经费为四十万元,以三分之二用于上海,三分之一用于香港。

和叶氏谈妥大要后,蒋复璁继续要赴上海安排,却在化名投宿的旅馆中,发觉有来路不明的人跟踪,这时他已托人买好翌日的法国船票,进退两难中决定还是勇往直前。第二天清早,他从旅馆中飞步跑上一辆的士,东弯西绕地摆脱盯梢后才开上码头。一月十四日抵达上海,通过日伪双方宪警和海关检查,随即去看商务印书馆的董事长张元济(菊生),为防意外,蒋复璁随身带着铅笔和空白名片,请门房通报时,才临时填上“蒋明叔”三个字。

见面后,由张元济转约何炳松、张寿镛、李拔可(商务经理)等人商量进行的方式,决定组成一个“文献保存同志会”,以避日伪耳目,对外即以同志

会名义行动,并推定两张一何为委员,负责上海方面的搜购。

蒋复璁在上海停留了九天。一月二十三日搭意大利船回港,上船时由两名亲戚陪同,以备万一出事可以通知有关的人员。事实上后来晓得,当日本人获得消息搜捕他化名的“蒋明叔”时,他已离沪三天了,在路上度过农历新年,二月一日回到重庆,这趟虎穴来去恰好整整一个月。

布置就绪 开始搜购

蒋复璁回到重庆后,教育部和中英庚会都正式同意了他此行所订的办法,和文献保存同志会的名义。经费方面因为牵涉到将来所购古籍的所有权应归国家,因此四十万中的三十万算是中英庚会的垫款,等将来教育部筹有的款时即应归还,另外的十万元则是中英庚会协助保存古物的补助款。

上海的文献保存同志会,后来因为张元济并未参与实际工作,而由暨南大学的文学院院长郑振铎(西谛)加入。香港方面始终由叶恭绰负责。另外,当时已迁至贵州安顺的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鸿宝(森玉),曾两度从后方跋涉至沪港两地协助工作。

张寿镛,浙江宁波人,光绪二年(1876)生,二十九年(1903)癸卯科举人,曾任财政部政务次长、光华大学校长,编纂《四明丛书》八集,收录近两百种四明人士著述。在同志会中,他主要负责版本及价格的审定,最初几次的报告也由张氏执笔,不幸在抗战胜利前一个月病逝。

何炳松,浙江金华人,光绪十六年(1890)生,留学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及普林斯顿大学,得政治学博士,曾任北大教授、暨南大学校长,并主编《教育杂志》,著有《欧洲史》等多种。他主要负责搜购经费的收付事宜,胜利后不久即以壮年而逝。

郑振铎,福建长乐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生,文学研究会创始人之一,主编《小说月报》等,曾任清华、燕京等校教授,著有《中国俗文学史》等甚多。他主要是直接与书肆或藏书家接洽,以及购得图书的保管与编目。

叶恭绰,号遐庵,广东番禺人,光绪七年(1882)生,京师大学堂仕学馆毕业,历任交通、铁道、财政部长,本身亦为藏书家。他除负责香港方面的搜购外,又主持由沪寄港精品的转运事宜,并提供上海同志会工作场所。

徐鸿宝,浙江金华人,亦为光绪七年(1882)生,中式举人,又毕业于山西大学堂,历任京师图书馆主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长、北平图书馆采访部主任,及故宫古物馆长。

以上五人,加上坐镇重庆运筹帷幄的蒋复璁,都是此次史无前例的搜购行动主要工作人员。

二十九年(1940)二月中旬,沪港两地都收到了重庆的汇款,开始搜购行动。上海方面最先购到的是刘世珩“玉海堂”一批善本书。刘氏字聚卿,号葱石,安徽贵池人,为清末广东巡抚、曾出使英俄的刘瑞棻之子,是民国后优游沪上的清朝遗老之一,珍藏甚多,最著名的有宋代王应麟撰《玉海》两部,与唐代名为大、小“忽雷”的两具琵琶,因此玉海堂有对联“古今双玉海,大小两忽雷”。刘氏死后,所藏陆续为其子有满清遗少之称的公鲁典卖,而同志会以一万七千元所得的第一批书中,就有一部元刊本《玉海》和一部宋刊本《魏书》,都是玉海堂的镇堂之宝。

香港方面第一个月的收获中,包括从广东第一藏书家莫氏“五十万卷楼”散出的古籍。莫伯骥,号天一,广东东莞人,业医药致富,尽以收罗南北藏家之书,数十年积储五十万余卷,因以名楼。民国二十五年(1936)其藏书目录刊成,两年后广州陷于日军,楼藏善本历经劫掠与水灾而告荡然,却充斥在香港的旧书摊上,叶恭绰尽量为之收归国有。

搜购范围 遍及南北

战时趁机搜购古籍者颇不乏人。哈佛大学以六万美金托其姊妹校燕京大学代购方志,且悬有征访书目照单全收,然后又扩大目标至各类善本。日伪方也参与角逐,先以四十万获得北方大藏家李盛铎(木斋)遗书,既又想染

指庐江刘氏“远碧楼”七、八万册藏书。再加上北平、上海两地旧书贾的推波助澜，搜购竞争更为激烈。

北平的书肆如修文堂、邃雅斋等，原都以山东、山西为主要来源地，战争起后陆路交通不便，因而都集中在上海争购，其中胃口最大的是文禄堂的王文进。王氏字晋卿，原只略识之无，因在其兄所开之德友堂帮忙炊事，耳濡目染，久之亦成行家，民国十四年（1925）起别立门户为文禄堂，甚而提笔撰成《文禄堂访书记》一书，记其所见古本秘籍七百余种，可谓民国书业传奇人物。他屡次在竞争中以高价斩获，然后以更高价钱和同志会诸人谈判，有些真是善本而又有沦亡异国之虞者，同志会也只有忍痛购留。

在此种情况下，同志会为减少书贾居间牟利，只有另筹对策，决定凡零星小藏家继续透过书肆搜购，而质量均高的大藏家则采取直接洽商的方式，于是原定只在沪港两地的工作，因而扩大至沦陷区各地。同志会对于藏书家动之以大义、劝之以私交，双管齐下，例如著名的常熟“铁琴铜剑楼”瞿氏，同志会即与相约，出售时优先考虑归公，同志会亦当尽量收购；结果瞿氏昆仲先后几次零星售书，确实遵守君子之约，将宋刊《毛诗注疏》等善本售归国家。

同志会直接和藏书家买卖的方式奏效，在购得的私家藏书中，较著名的如江宁邓氏“群碧楼”、嘉兴沈氏“海日楼”、庐江刘氏“远碧楼”、顺德李氏“泰华楼”、顺德邓氏“风雨楼”，及吴兴刘氏“嘉业堂”与张氏“适园”等。

藏书家所以宁愿售予中央图书馆，一方面可能是光绪末陆氏“皕宋楼”以十万金售于日本，为国人訾骂痛惜的殷鉴不远，另一方面也是国人素以典卖先人遗产为耻，卖诸书肆难免被目为败家子，售予图书馆则可名为归公，两者在评价上自是大为不同。

刘氏嘉业 张氏适园

同志会代中央图书馆购得的私家藏书中，最著名的要算是同属吴兴的

刘氏“嘉业堂”和张氏“适园”，这两家藏书精华部分的收获，可说是全部搜购行动中的高潮。

在清末藏书家中，聊城杨氏“海源阁”、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归安陆氏“皕宋楼”，以及杭州丁氏“八千卷楼”，向被公认为四大巨擘，足以睥睨一世。到了光绪之末，皕宋楼售于日本，八千卷楼归于江南图书馆，海源阁先遭捻乱，再逢民国十八年（1929）两次匪劫，四大之中唯有铁琴铜剑楼硕果仅存，于是嘉业堂与适园力争上游，大有与瞿氏相颉颃的局面。

刘承幹，字翰怡，因于光绪皇帝奉安时，捐巨资以助种树，得御赐“钦若嘉业”之匾，便以之为藏书楼名。他在南浔镇的鹁鸪溪上建造的这座嘉业堂，占地广达二十亩，四周环水，有楼七楹，分别名为四史斋、诗萃斋、希古楼等，藏书多达六十万卷，均为名家故物，美不胜收，民初后因局势不靖，将其中善本移往上海。

刘氏书有一万二千四百余部、十六万多册，单是书目就有三十册，但并不以量多取胜而已，其珍贵尤在明代史料之丰富完整，单是明刊本即有一千九百余部，约占全部所藏六分之一，不但是嘉业堂的精华所在，也独占所有藏书家的鳌头。

先是二十九年（1940）五、六月间，传出刘氏有售书之意，但索价高至八十万元，这个数字是中央图书馆全部搜购经费的两倍，根本无法问津。八月间，忽有日人委托书贾出面洽购，而刘氏虽尚明大义，不愿步皕宋楼后尘，但应付极为困难，日伪甚至从四十万自行抬价至六十万，大有非得不可之势。同志会诸人只有与刘氏恳商两全之计，如日伪必欲购买，即将全部藏书析分为三：上品售归国家、下品应付日人、中品则向重庆请求增拨经费续购。

二十九年底，刘氏书目备妥后，又增加一些识货的竞争者，书贾们固然蠢蠢欲动，美方也想染指这批古籍，以致情势大为紧张。幸而此时行政院适时通过增拨六十万元购书费，于是得以和刘氏谈妥购其精华，再经一番讨价还价与挑精汰芜，到三十年（1941）四月终于大功告成，以二十五万五千元选取明刊本一千二百余部、钞校本三十余部。时至数十年后的今日，中央图书

馆藏书中空前也可能是绝后的特色之一,就是以嘉业堂这批独步古今的善本所形成的明代史料。当年同志会诸人宁取明刊本而舍其宋元本,不能不令人钦佩他们独到的眼光与果断的决定。

完成嘉业堂的购存,紧接着是三十年五月间进行另一家各擅胜场的藏书——张氏适园。

张钧衡,字石铭,号适园,光绪二十年(1894)举人,嗜好藏书,尤好宋元刊本,曾请缪荃孙校订所藏,共得宋本四十五部、元本五十七部,著名的黄蕘圃跋本二十六部,这已是难得的佳藏。张氏死后,诸子析产,长子乃熊(字芹伯、芹圃)得其善本之半,而又比其父精于鉴别,搜求更勤,因此所藏更富。一般藏书家总是普通本多于善本,而张氏反是,二十九年(1940)八月求售时,所编《蕘圃藏书目录》中,普通本约六百种,而善本竟加倍达一千二百种之多,内有宋本八十八部、元本七十四部、明本四百零七部、黄蕘圃跋本一百零一部,这些珍贵的版本是适园藏书最大的特点,因此在数量上虽远不及嘉业堂,其价值则毫无逊色,各有千秋。

张氏最初开价美金三万或法币五十七万,同志会诸人还以三十万,因相差过巨而搁置,事实上搜购经费亦已不足问津。到三十年中,因物价上涨,张氏改索至七十五万,甚至有北平书贾估计可转售至百万之数。蕘圃有一弟(乃骥)在美,一度曾欲代表美方购运出国。九月间,张氏不知何故亟欲脱手换现,且一度减价至六十二万五千,旋又变卦为七十万,同志会与坐镇重庆的蒋复璁一再函电交驰,往复商量,当时虽已呈请教育部转报行政院拨款,但尚未核准,在此急不及待之刻,为免古籍流散,蒋复璁终于决定收购,并商请中英庚会先垫拨七十万,再由朱家骅特地致电张氏劝勉,以防又有变卦。为万全计,在七十万汇到前,由同志会即以“希古堂”名义与张氏先定合约,交付定洋十万,当时所余搜购经费已不足此数,还是由庚会副董事长马锡尔氏(Sir Robert Caldecott-Marshall)在上海先垫,至三十年十二月初,总算全部书款两讫。

当二十九年六月前后,嘉业堂与适园传出待沽消息后,同志会便以之为

最大目标,在搜购时均先与两家书目对照,凡书目中已有者即尽量不买,以免重复,期以有限经费搜获更多古籍。更有意义的是当时外国都想获得这两家藏书,而刘、张两人虽已表示愿售诸国家,但情势变化难以预料,结果在国家多难中,政府仍能不忘右文,卒使中朝典籍不致尽沦异域,这就不是仅仅“佳话”一词所能形容道尽的了。

书囊无底 辗转汇拨

中央图书馆在沦陷区搜购开始以后,即有欲罢不能的情势。香港方面广东流出的古籍数量还算有限,上海方面则江南数百年所藏堪称源源不绝,文献保存同志会预定的二十多万元购书费,不到三个月已经用去半数,而流出的私家藏书却正络绎不绝涌到,所幸教育部及中英庚会都支持蒋复璁继续行动,教育部并提出行政院院会通过分批拨款支应,但是这些款项如何到达同志会手中却是个问题。

最初的四十万元汇划时,沪渝、沪港之间尚可直接来往,因此中英庚会由重庆汇给在上海的马锡尔,马氏再分转同志会与在港的叶恭绰。第二笔的八十万元就大费周折了。重庆的四联总处只能通汇到香港,以后必须自行设法,于是蒋复璁将款分成两部分:三十万汇给叶恭绰,再分批转汇上海;五十万转托当时在港的王云五设法,由王氏在已迁到香港的中央银行广州分行中,开立一个“图记”名义的存户,另通知何炳松在上海商业银行亦开立一样的户头,然后由王氏化整为零,分批将款汇沪,以免引人注目。从三十年(1941)三月至六月间,汇了四次共四十余万元,还有六万多适逢港府下令冻结国币,因而未及汇出。

第三笔购买适园藏书的七十万元,则是从重庆直接汇给何炳松,幸亏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到达,否则收购结果如何就难说了。

何去何从 煞费安排

战前叶恭绰在上海赫德路风景甚佳的“南园”中，捐资兴建一座“法宝馆”，供僧人居住并储藏佛教文物。同志会为避人耳目，借得馆中二楼半间为办事处，因搜购虽由张寿镛等人主持，仍须雇人抄写书目、编目装箱等整理工作，即在法宝馆中为之，再运出皮藏，最初只用一名人手，随着购书越多而增添越多，最多时共雇用六人分任其事。

装箱时分为三类：甲类善本，包括宋元刊本、明刊精本、明清人重要稿本、精钞精校本等，均装入旅行大箱中，存放于外商银行保管库。乙类善本，包括明刊本、清刊精本及罕见本、清人及近人稿本与钞校本等；其他均列为丙类普通本。乙丙两类装入大木箱中，存于外商银行堆栈。每箱内放置樟脑以辟虫物，又用油纸包裹以防浸湿，甲乙两类每书更以透明纸及半牛皮纸包扎，以示慎重。香港方面购得之书，装入铁箱后，由叶恭绰以“庚记”名义暂时寄存于金城银行库内。

由于购得图书数量越来越多，到二十九年（1940）底时，单是甲乙两类善本即有三千余部、二万九千多册，普通书和香港所得还不算在内。因此保管发生困难，不仅所费不赀，此时远东局势愈趋险恶，太平洋战争随时都可能一触即发，上海和香港两孤岛中的古籍何去何从，着实煞费安排。

第一个方案是全部内运，第二是运美暂存。两个方案都是困难重重，内运则道路阻隔且旷日时久，安全可虑；运美则虽已电请驻美大使转商，但如何出口却大有问题，一度欲趁之江大学美籍女秘书返美之便，假托行李带往旧金山。三十年（1941）上半年，渝港沪三地为此兹事体大的运藏问题一再考虑之后，终以香港转运较为方便，决定先运港再说。

三十年七月间，在沪协助的徐鸿宝道经香港返黔，即随带两大箱最精本抵港，另以邮包寄出二千三百九十部，包括刚成交的嘉业堂书在内。全部经叶恭绰安排存放冯平山图书馆，由港大教授许地山、马鉴（季明）派人协助

保管。

徐鸿宝携港的两箱最精品,共八十二种都可称为国宝的古籍,如宋刊本《五臣注文选》、《后汉书》、《礼记》、《中兴馆阁录》等,共五百零二册,分装八包,内衬油纸,外用白布缝裹,译写英文目录后,经港府检查许可出口,于七月三十一日送交欧亚航空公司运输,因重庆连日轰炸,在桂林滞留至九月十日方才抵达。其间四十日港沪渝三地有关人员无不牵肠挂肚,提心吊胆。抵达重庆后,由早在机场等候的中央图书馆和中英庚会代表屈万里、朱其仁两人会同点交,一刻也不敢停留直运到江津白沙乡下的图书馆,以免空袭时发生意外。

其他邮寄到港的二千余部(约二万三千册),抵达冯平山图书馆后,一面等候教育部和中英庚会商洽,一面即觅人整理装箱,同时托王云五代制一百多个内衬铅皮、外围铁带的木箱。当时在冯平山的工作人员分成两组:叶恭绰找自己的族妹和堂弟为甲组,另请陈援庵长媳及一位郭君为乙组,分别将上海寄来邮包拆开、核对、登录,再装入箱内,在陈君葆馆长协助照料下,忙了一个多月,共装一百一十一箱。

三十年十月初,教育部和中英庚会终于放弃绕道仰光转运重庆的念头,一致同意将这批古籍连同在港所购共三万多册运美,请胡适大使转存国会图书馆,但为将来辨识起见,必须在每册之上加盖中央图书馆藏章和中英庚会印记。工作人员只好将木箱打开,全部从头做起,十一月底盖完印记,又订妥十二月六日美船格兰总统号,不料太平洋战争于八日爆发,香港随即沦陷,这一大批古籍也告下落不明,存亡莫卜。

陷港转日 胜利归来

香港陷落时,因变起仓促,情况极为混乱,渝港间联络不易,足有半年之久毫无这批古籍的音讯。然后才有两条线索传来,先是驻美大使馆告以格兰总统号自马尼拉开出后,突然改变航程未停靠香港,可见并未运往美国。

接着由港脱险抵达桂林的港大教授陈寅恪,写信给中英庚会,谓古籍已由日军“波部队”运走,且已发现运送时的目录。此后数年中,对这批古籍的下落所知仅此而已。

直到胜利后才晓得,香港被占不久,即有一名叫竹藤峰治的日人,带引日军调查人员至冯平山图书馆,扣留馆长陈君葆加以盘查,最后强行运走这些装箱的古籍,涂掉箱面上写就的驻美大使馆胡适大使收等字样,改为东京参谋本部。于是在胜利后从民国三十四年(1945)底到三十五年(1946)初,教育部、外交部、军令部等单位在港、台、日等地展开连串追查,当时听说运输古籍的船只故障停靠台湾,所以追查单位曾函请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在可能藏存的港口仓库、台大图书馆等处详细调查。

到三十五年(1946)二月中,古籍的行踪终于出现端倪,有人在东京上野公园内的帝国图书馆内,看到该馆所藏《永乐大典》上,有国立中央图书馆的藏印,接着又陆续在其他书上发现同样的印记,以及嘉业堂的藏书印等,经过我驻日代表团深入查证,终于在帝国图书馆的地下室搜获二万五千册古籍,另外在伊势原乡下又起出约一万册,真相遂告大白。原来战争中这些书运抵东京后,辗转交给帝国图书馆,由该馆委托版本目录学者长泽规矩也整理;战争结束时,为避免美军将图书馆连同这些书一并接收,于是挑选出较珍贵的部分,送到乡下一位村长家的土窖中隐匿起来。

驻日代表团查悉真相,限令日方编造目录全数归还,共是三千二百八十六部、三万四千九百七十册,在民国三十五年(1946)八月十八日交还,翌年二月全部安返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

中枢玄览 蔚为大观

当初寄到香港被夺走的这批古籍,只是三十年(1941)六月以前上海所得较精品的甲类善本,至于乙类善本、普通书,以及六月以后购得的张氏适园善本等等,都留在上海等待前批的进一步消息后再定行止。自太平洋战

争发生,日军侵入上海租界,不仅搜购行动停顿,同志会诸人也被迫蛰居暂避凶焰,并尽力维护藏匿的古籍无恙。

胜利后,从三十五年(1946)起,这些藏匿上海的古籍陆续从法宝馆等处起运入京,连同先前空运重庆的、自日本归还的、以及从香港寻回的一并计算,单是甲乙两类的善本古籍就有四千八百六十四部,共是四万八千多册,普通本线装书更多,有一万一千多部,这些都是蒋复璁主持下,沪港两地文人志士冒险抢救古籍的成果。

复原后的中央图书馆,包括从重庆运回的部分、接收泽存书库等日伪图书,以及这批善本古籍,全部的馆藏达到一百万册之数,这真是我国历来搜藏图书文献的大观。一九四九年自大陆撤退时,经当时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向先总统蒋公晋言,尽量派军舰将绝大部分的善本渡海迁台,妥藏至今,琳琅万卷,纸润墨香,每见读者摩挲钻研,乐而不疲,不禁令人感念数十年前此段经过,而中央图书馆从创立之初仅有一部《徐皇后劝善书》明刊本开始,到如今拥有世界最美富之一的中华古籍书藏,正亦斯文之幸!

原载《传记文学》第三十五卷第五期(1979年11月)

参考书目

一般部分

《大清穆宗毅(同治)皇帝实录》，台北：华文书局影印，1964。

《大清德宗景(光绪)皇帝实录》，台北：华文书局影印，1964。

《大清宣统政纪》，台北：华文书局影印，1964。

台湾“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光绪朝奏折》，台北：编者，1975。

宪政编查馆编，《政治官报》(光绪三十三年九月至宣统三年十二月)，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65。

印铸局编，《政府公报》(民国元年五月至十五年四月)，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71。

赵尔巽等纂，《清史稿》，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1981。

郭廷以编，《近代中国史事日志(清季)》，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4。

刘绍唐编，《民国大事日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

钱实甫编，《清季新设职官年表》，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79。

刘寿林编，《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74。

王德毅编，《中国历代名人年谱总目》，台北：华世出版社，1979。

杜连喆、房兆楹编，《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台北：鼎文书局影印，1973。

- 杜连喆、房兆楹编,《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1966。
- 陈乃乾编,《清代碑传文通检》,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77。
- 杨家骆编,《清人别集千种碑传文引得及碑传主年里谱》,台北:中国学术史研究所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处,1965。
- 缪荃孙辑,《续碑传集》,江楚编译局,1910。
- 闵尔昌辑,《碑传集补》,北平: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1923。
- 汪兆镛辑,《碑传集三编》,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80。
- 桥川时雄编,《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北平:中华法令编印馆,1940。
- Boorman, Howard, L., e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New York &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1979.
- 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1978。
- “中央图书馆”编,《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台北:编者,1967。
-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善本书目》,台北:编者,1968。
- “中央图书馆”编,《台湾公藏善本书目书名索引》,台北:编者,1971。
- “中央图书馆”编,《台湾公藏善本书目人名索引》,台北:编者,1972。
-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编,《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东京:汲古书院,1973—1975。
-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目录》,东京:同朋舍,1981。
-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普通本线装书目》,台北:编者,1970。
- “中央图书馆”、台湾师范大学、东海大学编,《中央图书馆、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私立东海大学普通本线装书目》,台北:编者,1971。
- 台湾大学图书馆编,《台湾大学普通线装书目》,台北:编者,1971。

- “国防研究院”、台湾省立台北图书馆编,《国防研究院台湾省立台北图书馆普通本线装书目》,台北:编者,1972。
- “中央图书馆”编,《台湾公藏普通本线装书目人名索引》,台北:编者,1980。
- “中央图书馆”特藏组编,《台湾公藏方志联合目录(增订本)》,台北:“中央图书馆”,1981。
- 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台北:世界书局,1965。
- 伦 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一一八),《正风》半月刊,第二十期至第二卷第五期(1935年9月—1936年3月)。
- 蔡金重编,《藏书纪事诗引得》,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1966。
- 杨立诚、金步瀛,《中国藏书家考略》,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1978。
- 汪 闾,《明清蟬林集传》,《图书馆学季刊》,第七卷第一期(1933年3月),页1-58;第八卷第四期(1934年12月),页547-688。
- 洪有丰,《清代藏书家考》,《图书馆学季刊》,第一卷第一期至第二卷第一期(1926年1月—1927年12月)。
- 徐绍荣撰、徐汤殷补校,《广东藏书纪事诗》,台北:大华印书馆影印,1968。
- 吴 晗,《江浙藏书家史略》,北京:中华书局,1981。
- 项士元,《浙江藏书家考略》,《文澜学报》,第三卷第一期(1937年3月),页1-32。
- 蒋镜寰辑,《吴中先哲藏书考略》,吴县: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1930。
- 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 恽如莘,《书林掌故》,香港九龙:中山图书公司影印,1972。
- 恽如莘,《书林掌故续编》,香港九龙:中山图书公司影印,1973。
- 阿部隆一,《中国访书志》,东京:汲古书院,1976。
- 小竹文夫,《江南の文献》,《支那研究》,第五十号(1928),页1-30。
- 杨家骆,《丛书大辞典附丛书总目类编》,台北:中国学典馆复馆筹备处影印,1977。
- 叶昌炽撰、王季烈等节抄,《缘督庐日记抄》,台北:学生书局影印,1964。

缪荃孙,《艺风堂文漫存》,台北:文史哲出版社影印,1973。

潘景郑,《著砚楼书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2006。

叶景葵撰、顾廷龙编,《卷龠书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2006。

郑振铎,《劫中得书记》、《续记》,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1978。

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二编》,上海:群联出版社,1954。

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乙编丙编丁编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4—1959。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第一卷第一期至第二十一卷第四期(1925年6月—1948年5月)。

《图书馆学季刊》,第一卷第一期至第十一卷第二期(1926年1月—1937年6月)台北:学生书局影印,1969。

《图书季刊》,第一卷第一期至第三卷第四期(1934年3月—1936年12月);新第一卷第一期至第九卷第二期(1939年3月—1948年6月)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71。

【新增】

《馆史史料选辑:古籍搜购与集藏》,《中央图书馆馆刊》新十六卷第一期(1983年4月),页73-102。

谢国桢,《江浙访书记》,北京:三联书店,1985。

周子美,《近百年来江南著名藏书家概述》(上、下),《图书馆杂志》第一期(1982年1月),页71-72,63;第二期(1982年4月),页71-72。

徐雁,《8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藏书的研讨成果概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4期,页10-18。

徐雁,《世治藏于国——五十年代初私家藏书捐赠实录》,《书屋》2001年第11期,页72-75。

李雪梅,《中国近代藏书文化》,北京:现代出版社,1999。

黄建国、高跃新编,《中国古代藏书楼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9。

任继愈编,《中国藏书楼》,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

傅璇琮、谢灼华编,《中国藏书通史》,宁波:宁波出版社,2001。

国家图书馆编,《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

徐蜀、朱安莉编,《中国近代古籍出版发行史料丛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林夕编,《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刘家平、苏晓君编,《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北京:线装书局,2003。

藏书家,第一辑等,济南:齐鲁书社,1999—

各家部分

盛宣怀

盛宣怀,《盛尚书愚斋存稿》,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75。

盛宣怀撰、北京大学历史系近代史教研室整理,《盛宣怀未刊信稿》,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75。

盛宣怀等撰、顾廷龙等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盛宣怀辑,《常州先哲遗书》,武进盛氏刊本,1894—1897。

盛 康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72。

严 衍,《资治通鉴补》,毗陵盛氏思补楼刊本,1876。

董似谷等修、汤成烈等纂,《武进阳湖合志》,台北:学生书局影印,1968。

【新增】

缪荃孙等编,《愚斋图书馆藏书书目》,上海:盛氏愚斋图书馆,1932。(《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近代卷,第十一—十三册)

《国立交通大学图书馆图书目录》第一辑《善本书目》,上海,1933。

周子美,《周子美学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吴 平,《盛宣怀与愚斋藏书》,《图书馆杂志》2001年第3期,页56—57。

王 宏整理,《盛宣怀戊申在日购书清单》,《历史文献》第五辑(2001年8月),页339-349。

郑 麦,《盛宣怀与愚斋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三四卷第四期(2002年7月),页62-67。

叶昌炽

叶昌炽撰、王季烈等节抄,《缘督庐日记抄》,台北:学生书局影印,1964。

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台北:世界书局,1965。

叶昌炽,《奇觚闻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影印,1973。

叶昌炽,《语石》,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叶昌炽,《邠州石室录》,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1915。

叶昌炽,《寒山寺志》,吴县潘氏刊本,1922。

吴秀之等修、曹允源等纂,《吴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1970。

谢孝莘,《记叶氏治廨室藏书》,《中央日报》,1946年12月8日,第十一版。

费海玘,《缘督庐日记的史料价值》,《书目季刊》第一卷第二期(1966年12月),页47-52。

【新增】

叶昌炽,《藏书纪事诗(附补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王立民,《叶昌炽生卒年辩证》,《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五期(2005年9月),页86-88。

卢 靖

卢 靖辑,《湖北先正遗书提要》,沔阳卢氏慎始基斋刊本,1922。

卢 靖辑,《湖北先正遗书》,沔阳卢氏慎始基斋影印,1923。

卢 靖辑,《慎始基斋丛书》,沔阳卢氏慎始基斋重印,1923。

卢 靖辑,《沔阳丛书》,沔阳卢氏慎始基斋刊本,1931。

卢 靖等译,《日本教育法规》,直隶提学使署刊本,1906。

甘鹏云,《潜庐类稿》,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76。

甘鹏云,《潜庐续稿》,台北:大华印书馆影印,1968。

陆华深,《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概况》,《图书馆学季刊》,第三卷第一、二期合刊(1929年6),页267-270。

袁涌进,《北平木斋图书馆计划大纲草案》,《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第十二卷第二期(1936年10月),页3-5。

木斋图书馆编,《木斋图书馆季刊》,第一—二期(1937年2-5月)。

【新增】

刘行宜,《卢木斋、卢慎之兄弟》,《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1981年10月),页97-135。

李盛铎

李盛铎藏、赵万里等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氏书目》,北京:北京大学图书馆,1956。

李盛铎辑,《木犀轩丛书》,德化李氏刊本,1884—1890。

张玉范,《李盛铎及其藏书》,《文献》1980年第三辑,页241-248。

陈肅等修、黄凤楼等纂,《德化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1970。

王国维,《王观堂先生全集》,台北:文华出版公司影印,1968。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甲编至戊编》,台北:维新书局影印,1972。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895)》,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79。

李光涛,《明清史论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71。

黄浚撰、许晏骈、苏同炳编,《花随人圣俞摭忆全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9。

【新增】

李盛铎,《木犀轩收藏旧本书目》(《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近代卷,第十

九一二十册)。

李盛铎,《木犀轩藏宋本书目》、《木犀轩藏元本书目》(《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近代卷,第二十册)。

李盛铎,《德化李大中丞行状》,1877。

沈焱,《木犀轩李氏藏书特点考略》,《四川图书馆学报》1994年第8期,页13-17。

荣新江,《李盛铎写卷的真与伪》,《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2期,页1-18。

梁鼎芬

梁鼎芬撰、杨履瑞辑抄,《梁文忠公文钞》,抄本。

梁鼎芬撰、杨敬安辑,《节庵先生遗稿》香港,1962。

梁鼎芬撰、杨敬安辑,《梁节庵贻稿》,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71。

梁鼎芬撰、汪宗衍等辑,《节庵先生遗诗》,台北:广文书局影印,1972。

梁友衡等修,《广东省梁氏族谱捕属梁鼎芬一支》,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藏本。

吴天任,《梁节庵先生年谱》,台北:艺文印书馆,1979。

焦山书藏委员汇编,《焦山书藏书目》,编者,1934。

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1958。

丁仁长等纂,《番禺县志》,台北:学生书局影印,1968。

陶菊隐,《督军团传》,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71。

【新增】

王新田,《焦山书藏述略》,《图书馆论坛》1998年第4期,页76-77。

叶德辉

叶德辉,《观古堂藏书目》长沙:叶氏观古堂,1915。

叶德辉,《郎园读书志》,长沙:叶氏澹园,1928。

叶德辉,《郎园全书》,长沙:中国古书刊行社,1935。

叶德辉,《书林清话》、《余话》,台北:世界书局影印,1974。

叶德辉辑,《观古堂书目丛刻》长沙:叶氏重刊本,1919。

叶德辉等纂,《吴中叶氏族谱》,1911。

叶启勋,《拾经楼袖书录》,台北:广文书局影印,1967。

塩谷温,《叶郎园先生追悼录附郎园学行记》,1927。

【新增】

叶德辉,《郎园六十自序》,1922。(《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七十八册,页139-147。)

刘肇隅,《郎园四部书叙录》,观古堂,1927。(《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第二十六册,页290-347。)

周越然,《书书书》,香港:汉学图书供应社,1966。

周越然,《言言斋藏书目》(《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近代卷,第三十六册,页407-601。)

王逸明等编,《叶德辉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

王晋卿,《叶德辉的藏书思想与方法》,《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页112-118。

王晋卿,《叶德辉的刻书思想及其实践》,《图书馆》1997年第4期,页70-74。

沈俊平,《从书林清话看叶德辉对古代印书缘起与发展的认识》,《国家图书馆馆刊》1990年第2期(2001年12月),页181-194。

沈俊平,《叶德辉所刻丛书研究》,《图书与情报》2001年第2期,页47-51。

袁庆述,《叶德辉和他的观古堂藏书目》,《船山学刊》2003年第1期,页59-61、67。

袁庆述,《叶德辉和他的书林清话》,《中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1期,页83-86。

张晶萍,《叶德辉研究之我见》,《船山学刊》2004年第3期,页26-28。

章 钰

章 钰藏、顾廷龙编,《章氏四当斋藏书目》,北平:燕京大学图书馆,1938。

章 钰,《四当斋集》,台北:文华出版公司影印,1966。

章 钰,《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校证》,长洲章氏,1926。

吴秀之等修、曹允源等纂,《吴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1970。

蒋光煦,《东湖丛记》,台北:广文书局影印,1967。

洪亮吉,《北江诗话》,台北:广文书局影印,1971。

【新增】

胡海帆,《章氏四当斋李氏太华楼旧藏与燕京大学图书馆》,《收藏家》第 118 期(2006 年 8 月),页 58-62;第 119 期(2006 年 9 月),页 24。

宗舜年

谭 献,《二品衔浙江候补道署温处兵备道宗公墓志铭》,缪荃孙辑,《续碑传集》,卷三九,叶 20-21。

叶昌炽,《奇觚廌文集》,卷下,叶 34-37,《国史循吏宗源瀚传》。

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初集》,台北:广文书局影印,1967。

叶景葵撰、顾廷龙编,《卷盒书跋》,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2006。

宗惟恭,《癖泉书室所藏泉币书目》,上元宗氏,1934。

【新增】

端木艺,《古籍丛书整理三则》,《南通师专学报》第 11 卷第 4 期(1995 年 12 月),页 102-103。

秦宝珉,《温处兵备道上元宗公行状》,(《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八十四册,页 113-122)。

张元济

张元济藏、合众图书馆编,《海盐张氏涉园藏书目录》上海:编者,1946。

张元济,《张元济日记》,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 张元济,《涵芬楼烬余书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51。
- 张元济,《校史随笔》,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1967。
- 张元济编,《海盐张氏涉园丛刻》,海盐张氏,1911,1928。
- 庄俞、贺圣鼐编,《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
- 何炳松,《商务印书馆被毁纪略》,《东方杂志》第二十九卷第四期(1932年10月),页3-9。
- 王云五,《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1973。
- 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76。
- 顾廷龙,《回忆张菊生先生二三事》,《中国出版年鉴(1980)》,页298-300。
- Boorman, Howard, L., e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New York &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vol. 1, pp. 138-140, 'Chang Yuan-chi'.
- 【新增】**
- 张元济,《张元济书札》,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 张元济,《张元济诗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 张元济,《张元济全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 张元济、傅增湘,《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 张树年等编,《张元济年谱》,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 张人凤编着,《张元济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95。
- 张人凤,《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海盐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张元济图书馆编,《出版大家张元济——张元济研究论文集》,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
- 顾廷龙,《顾廷龙文集》,(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页547-554,《回忆张菊生先生二三事》;页555-574,《张元济与合众图书馆》。
- 郭立暄,《涉园图咏》,《历史文献》第十一辑(2007年4月),页11-23。
- 杜泽逊,《张元济与宝礼堂宋本书录》,《文献》1995年第3期,页234-245。

董 康

董 康,《书舶庸谭》,诵芬室,1939。

董 康,《嘉业堂藏明人集部提要》,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抄本。

董 康辑,《广川词录》,董氏刊本,1941。

董 康辑,《读曲丛刊》,武进董氏诵芬室,1917。

董 康校订,《曲海总目提要》,台北:新兴书局影印,1967。

黄颀士,《诵芬室主人传》,《司法公报特刊》第一号(1938),游艺第三,页1-2。

伪司法委员会秘书处法规审议处编,《司法公报》,第1-24号、《特刊》第1-2号,北平:伪司法委员会,1938-1939。

岛田翰,《皕宋楼藏书源流考》,武进董康,1907。

【新增】

江庆柏,《董康诵芬室藏书与日本的关系》,《北京图书馆馆刊》1999年第4期,页119-122、102。

李春光,《略论董康日本访书》,《日本研究》2003年3期,页77-81。

邓邦述

邓邦述,《群碧楼书目初编》,江宁邓氏,1911。

邓邦述,《群碧楼善本书录、寒瘦山房鬻存善本书目》,台北:广文书局影印,1967。

陈作霖纂,《金陵通传》(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1970),叶16-19,邓氏传。

马其昶,《清封光禄大夫奉天巡警道邓君墓志铭》,《抱润轩文集》(1923),文十九,墓志铭,叶1-3。

【新增】

江庆柏,《邓邦述与群碧楼藏书》,《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年第1期,页50-55。

苏 迅,《从新发现的邓邦述手稿看邓制军禁烟防海奏议的成书》,《新世纪

图书馆》2004年第3期,页76-80。

徐乃昌

余谊密修、徐乃昌等纂,《南陵县志》,1924。

端 方,《端忠敏公奏稿》,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69。

梁子涵,《中国历代书目总录》,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3。

王国维,《王观堂先生全集》,台北:文华出版公司影印,1968。

【新增】

《积学斋藏书目》,(《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近代卷,第二十五—二十六册)。

李弘毅,《稿本徐乃昌日记的文献价值》,《文献》2003年第4期,页226-240。

李弘毅,《从徐乃昌日记考论随庵甲骨收藏》,《文献》2005年第2期,页209-219。

杨成凯,《南陵徐乃昌的墓表和墓志铭》,《文献》2006年第3期,页127-132。

杨成凯,《徐乃昌卒年补说》,《文献》2004年第1期,页16。

陈福康,《徐乃昌卒年再补说》,《文献》2004年第3期,页228。

张敏慧,《徐乃昌刻书的文化价值和意义》,《图书与情报》2006年第2期,页123-126。

张敏慧,《徐乃昌刻书文化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

王学雷,《姚孟起与南陵徐氏交游史料考》,《文献》2007年第3期,页87-92。

周退密、宋路霞,《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丁祖荫

丁祖荫,《黄尧圃题跋续记》,《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第三卷第四期,页479-488。

丁祖荫辑,《虞山丛刻》,常熟丁氏,1915—1919。

丁祖荫辑,《虞阳说苑》,虞山丁氏初园,1917。

郑振铎,《劫中得书记》、《续记》,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1978。

【新增】

丁祖荫,《常昭中西学社叙》,《万国公报》第十卷第六期(1898年8月),叶24-25。

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编,《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80。

江澄波,《丁祖荫的访书藏书和刻书》,《藏书家》第六辑(2002年6月),页66-75。

曹培根,《论丁祖荫及其重修常昭合志艺文志》,《常熟高专学报》第五期(2000年9月),页121-124。

曹培根,《常熟小藏家》,《藏书家》第五辑(2005年6月),页65-73。

陶 湘

陶 湘,《涉园藏书第一编》(一一八),《青鹤》第五卷第一一八期(1936年11月—1937年3月)。

陶 湘,《景印宋金元明本词叙录》,武进陶氏涉园,1922。

陶 湘,《涉园所见善本书影》,陶氏涉园影印,1937。

陶 湘,《故宫殿本现存目》,台北:台联国风出版社影印,1970。

陶 湘,《武进陶氏书目丛刊》,武进陶氏,1933。

汪 东,《故河南政务厅长武进陶君家传》,《制言》半月刊第三十六期(1937年3月),页1-3。

张惟骧纂,《毗陵名人小传稿》,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75。

【新增】

陶 湘,《涉园年略》,武进陶氏涉园,1939。

陶 湘,《陶涉园藏明板书分类总目》(《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近代卷,第二十七册)。

雷梦水,《书林琐记》,《学林漫录》第九辑(1984年3月),页99-117。

王清原,《武进陶氏藏闵凌刻套板书源流考》,《历史文献》第十辑(2006年4月),页294-316。

郑伟章,《陶氏涉园藏书刻书记略》,《文献》1990年第1期,页215-222。

傅增湘

傅增湘,《双鉴楼善本书目》,台北:广文书局影印,1969。

傅增湘,《双鉴楼藏书续记》,台北:广文书局影印,1969。

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初集》,台北:广文书局影印,1967。

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续集》,台北:广文书局影印,1967。

傅增湘撰、韩敏修辑,《藏园老人遗稿》,1962。

傅增湘辑,《宋代蜀文辑存》,江安傅氏,1943。

吴汝纶,《江安傅君墓表》,《桐城吴先生全书》(吴氏,1902),文集,卷三,叶42-45。

王式通,《志龠文稿、诗稿》(1938),文稿,卷三,叶19-22,《吏部文选司主事傅君墓志铭》;叶25,《清故资政大夫直隶怀安县知县江安傅公墓志铭》。

严希慎等修、陈天赐等纂,《江安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1976。

王国维撰、陈乃乾编,《观堂遗墨》,1930。

郑 騫,《宋刊施顾注苏东坡诗提要》,台北:艺文印书馆,1970。

《国闻周报》,第二卷第一期至第十四卷第二十五期(1925年10月—1936年12月)。

【新增】

傅增湘,《藏园居士六十自述》,1931。(《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八十二册,页309-319。)

傅增湘,《藏园居士七十自述》,江安傅氏,1941。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

傅增湘,《双鉴楼珍藏秘笈目录》(《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近代卷,第二

十八册)。

张元济、傅增湘,《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傅熹年,《记先祖藏园老人与北京图书馆的渊源》,《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年第3期,页49-52。

梁启超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上海:中华书局,1936。

梁启超,《饮冰室全集》,台北:文光图书公司,1959。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世界书局,1958。

北平图书馆,《梁氏饮冰室藏书目录》,北平:编者,1933。

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9。

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台北:食货出版社,1978。

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台北:成文出版社,1978。

松坡图书馆编,《松坡图书馆概况》,北平:编者,1936。

王克敏

王兆杏等,《仁和王氏知悔斋藏书目序》,《浙江月刊》第十一卷第六期(1979年6月),页37-38。

东亚问题调查会编,《最新支那要人传》(东京:朝日新闻社,1941),页11-13,王克敏。

《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第二卷第四期(1933年8月)。

【新增】

王春南,《汉奸王克敏生平纪析》,《学海》1995年第2期,页82-86。

丁福保

丁福保,《畴隐居士六十自述》,《青鹤》第二卷第十三期(1934年5月),《文荟》,页1-11。

丁福保,《畴隐居士自传》,上海:诂林精舍,1948。

丁福保,《畴隐居士学术史》,上海:诂林精舍,1949。

丁福保编,《佛学大辞典》,台北:华严莲舍影印,1956。

丁福保编,《说文解字诂林》、《补遗》,上海:医学书局,1928—1932。

丁福保编,《古钱大辞典》,台北:世界书局影印,1962。

景培元,《丁福保先生捐书震旦图书馆经过》,《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第十四卷第一期(1939年7月),页5-7。

《泉币杂志》,第一—三十二期(1940年7月—1945年9月)香港:龙门书店影印,1968。

【新增】

丁福保,《畴隐居士自订年谱》,上海:医学书局,1935。

《纪念丁福保逝世四十周年专辑》,《无锡文史资料》第二十七辑(1993年5月),页1-64。

江庆柏,《丁福保的藏书观念及藏书实践》,《图书馆学研究》2000年第2期,页96-100。

叶景葵

叶景葵撰、顾廷龙编,《卷盒书跋》,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2006。

叶景葵藏、顾廷龙撰,《卷盒藏书记略》,《图书季刊》新第二卷第二期(1940年9月),页338-346。

经世文社编,《民国经世文编》,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70。

张惠言,《谐声谱》,武林叶景葵,1934。

合众图书馆编,《合众图书馆丛书》,上海:编者,1942—1948。

大清银行总清理处编,《大清银行始末记》,台北:中国国际商业银行影印,1981。

徐寄庠,《最近上海金融史》,台北:学海出版社影印,1970。

姚崧龄,《中国银行二十四年发展史(2、3)》,《传记文学》第二十五卷第四、

五期(1974年10—11月)。

《民立报》，第272号至第358号(1911年6月21日—8月19日)。

【新增】

叶景葵藏、顾廷龙编，《杭州叶氏卷盒藏书目录》，上海：合众图书馆，1953。

叶景葵撰、顾廷龙编，《卷盒贻稿》，1962。

叶景葵，《叶景葵杂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室历史组，《叶揆初》，《工商经济史料丛刊》1983年第三辑，页69—75。

王世伟、许全胜，《顾廷龙致叶景葵论书尺牍》，《历史文献》第二辑(1999年11月)，页45—64。

王煦华，《合众图书馆董事会议事录跋》，《历史文献》第七辑(2004年7月)，页41—47。

王世伟，《上海市私立合众图书馆发展史料二则》，《历史文献》第十一辑(2006年1月)，页18—21。

顾廷龙，《顾廷龙文集》(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页542—546，《叶公揆初行状》；页604—609，《创办合众图书馆意见书》；页736—755，《致叶景葵》。

顾廷龙笔录、顾燕整理，《合众图书馆董事会议事录》，《历史文献》第七辑(2004年7月)，页3—40。

伦 明

伦 明，《续书楼藏书记》，《辅仁学志》第一卷第二期(1928年9月)，页61—65。

伦 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1—9)，《正风》半月刊第二十期至第二卷第五期(1935年9月—1936年3月)。

伦 明，《续修四库全书刍议》，《国学月刊》，第一卷第四期(1927年1月)，页1—8；《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第三卷第一期(1927年8月)，页3—6。

伦 明,《拟印四库全书之管见》,《国闻周报》,第十五卷第三十五期(1933年9月),页1-7。

何 朋,《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简介》,《崇基学报》,第五卷第二期(1966年5月),页235-245。

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1967。

广东文物展览会编,《广东文物》,香港:中华文化协进会,1941。

孙殿起,《琉璃厂小志》,北京:北京出版社,1962。

陈伯陶纂修,《东莞县志》,台北:学生书局影印,1968。

房兆楹编,《清末民初洋学学生题名录初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影印,1969。

【新增】

伦 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附校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孙殿起口述、雷梦水整理,《藏书家伦哲如》,《随笔》第九期(1980年7月),页94-97。

赵明奇,《贩书偶记的作者孙殿起》,《文献》第十九辑(1984年3月),页157-167。

张寿镛

张寿镛,《约园杂著》,约园,1936。

张寿镛,《约园杂著续编》,约园,1942。

张寿镛,《约园杂著三编》,约园,1945。

张寿镛辑,《四明丛书》,张氏约园,1933—1940。

张康源等撰,《张公约园逝世周年纪念册》,1946。

金天羽,《兵科掌印给事中张公家传》,《天放楼文言》(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70),卷八,叶25-27。

贾士毅,《民国财政史正编》、《续编》,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1962。

《国民政府财政部财政公报》,第一—五十七期(1927年8月—1932年12月)。

教育部,《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影印,1971。

教育部,《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1948。

【新增】

张寿镛等,《光华大学十周年纪念册》,1935。

张寿镛撰、张芝联编,《约园著作选辑》,北京:中华书局,1995。

俞信芳,《张寿镛先生传》,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徐小燕,《张寿镛四明丛书之文献价值》,《国家图书馆馆刊》1994年第1期(2005年6月),页135-162。

莫伯骥

莫伯骥,《五十万卷楼藏书目录初编》,台北:广文书局影印,1967。

莫伯骥,《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68。

陈伯陶纂修,《东莞县志》,台北:学生书局影印,1968。

阮元,《擘经室集续集》,台北:世界书局,1964。

朱希祖,《邨亭粤行日记》,《朱希祖先生文集》(台北:九思出版社影印,1979),第六册,页209-576。

何多源,《广东藏书家考》(2),《广州大学图书馆季刊》第一卷第三期(1934年6月),页398-399,《莫天一》。

【新增】

罗焕好,《我国近代著名藏书家莫伯骥及其五十万卷楼藏书》,《图书馆论坛》第二十六卷第三期(2006年6月),页266-269。

朱希祖

朱希祖,《朱希祖先生文集》,台北:九思出版社影印,1979。

朱希祖,《明季史籍题跋》,台北:大华印书馆影印,1968。

朱 偁,《先君朱邇先先生年谱》,《朱希祖先生文集》,第六册,页4199-4367。

罗香林,《朱邇先先生行状》,《朱希祖先生文集》,第二册,页1247-1275。

罗香林,《朱希祖先生传》,《书和人》第32期(1966年5月),页1-4。

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北平:北平图书馆,1932。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香港:龙门书店影印,1964。

【新增】

朱希祖着、周文玖编,《朱希祖文存》,上海:上海世纪出版公司,2006。

朱希祖撰、王翠兰整理,《朱希祖致张元济书札》,《历史文献》第七辑(2004年7月),页226-242;第八辑(2004年12月),页175-201;第九辑(2005年11月),页198-224。

《朱邇先先生讣告》,1944(《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八十四册,页783-789)。

朱元曙,《邨亭藏书的艰辛与悲凉》,《传记文学》第八十六卷第四期(2005年4月),页101-108。

朱元曙,《朱希祖的邨亭藏书》,《藏书家》第十三辑(2008年1月),页45-61。

吴 梅

吴 梅,《奢摩他室曲丛自序附草目》,《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二集第二十一期(1928年3月20日),页628-634。

徐调孚,《吴梅著述考略》,《文学集林》第一辑(1939),页109-114。

郑振铎,《记吴瞿安先生》,《国文月刊》第四十二期(1946年4月),页28-30。

徐益藩辑,《述吴瞿安先生的民族思想》,《国文月刊》第六十一期(1946年11月),页29-32。

卢元骏,《忆长洲》,《畅流》第五十卷第四期(1974年10月),页21-26。

《戏曲》,第三辑(1942年3月),《吴霜崖先生三周年祭特辑》。

【新增】

吴 梅,《吴梅戏曲题跋(上、下)》,《文献》第十二辑(1982年6月),页6-21;第十四辑(1982年12月),页77-95。

王卫民,《吴梅和他的世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王卫民,《吴梅评传》,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王卫民编,《吴梅戏曲论文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

陈 群

《中央图书馆待编馆史旧档(1949年以前)》,关于接收泽存书库部分。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商务印书馆,1966。

东亚问题调查会编,《最新支那要人传》(东京:朝日新闻社,1941),页139,
《陈群》。

汪精卫,《重刊随山馆诗简编后序》,《古今》半月刊第27、28期合刊(1943年
8月),页1。

【新增】

陈思丰,《漫话泽存书库》,《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年第3期,页46-47。

周叔弢

《自庄严龛善本书目》,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

李国庆,《弢翁藏书年谱》,合肥:黄山书社,2000。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系编,《启新洋灰公司史料》,北京:三联
书店,1963。

周叔弢,《弢翁藏书题识》,《文献》第三辑(1980),页230-239;第四辑
(1981),页220-230。

周叔弢、李勉之,《启新洋灰公司的初期资本和资方的派系矛盾》,《文史资料
选辑》第五十三辑(1964年3月),页1-31。

王芝兰、刘国展,《为珍品找到了理想的主人——访文物图书收藏家周叔
弢》,《文物天地》1981年第5期,页33-35。

吕十朋,《试论周叔弢先生藏书特点——捐赠给天津市人民图书馆部分》,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982年第1期,页42-44。

周珏良,《我父亲和书》,《文献》第二十一期(1984年6月),页161-175。

周珏良,《两份遗嘱一片心》,《文物天地》1984年第3期,页10-11。

周珏良,《自庄严龕藏书综述——纪念先父叔弢先生逝世五周年》,《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988年第3期,页1-8。

周绍良,《记宋刊本金刚经感应传——兼怀先伯父叔弢先生》,《文献》第二十一期(1984年6月),页176-178。

周绍良,《周叔弢传略》,《晋阳学刊》1985年第1期,页68-69、67。

谢刚主,《雨窗谈书》,《古今》半月刊第四十九期(1944年6月15日),页5-9。

冀淑英,《深切悼念周叔弢先生》,《文献》第二十一期(1984年6月),页184-190。

郑振铎

郑振铎,《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郑振铎手写影印,1937。

郑振铎,《西谛所藏散曲目录》,郑振铎手写影印,1937。

郑振铎藏、北京图书馆编,《西谛题跋》,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1978。

郑振铎,《劫中得书记》、《续记》,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1978。

郑振铎,《佻倭集》,上海:生活书店,1934。

郑振铎,《欧行日记》,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4。

郑振铎,《中国文学论集》,上海:开明书店,1934。

郑振铎,《短剑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

郑振铎,《困学集》,长沙:商务印书馆,1941。

郑振铎,《蛰居散记》,上海:上海出版公司,1951。

郑振铎,《郑振铎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1963。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1967。

吴晓铃,《郑振铎先生传略》,《文学研究》1958年第3期,页2-3。

吴晓铃,《郑振铎先生撰着编译目录初稿》,《文学研究》1958年第3期,页11-16。

考古学报社,《郑振铎同志传略附郑振铎同志有关历史、考古、文物等方面的重要著作目录》,《考古学报》1958年第4期,页1-6。

朱家濂、王树伟,《西谛藏书概述》,《图书馆季刊》1961年第3期,页10-12。

赵万里,《谈谈振铎同志搜集和收藏的戏曲书》,《图书馆季刊》1961年第3期,页13-15。

刘 烜,《郑振铎日记手稿》,《文献》1980年第4期,页138-151。

《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一期至第二十二卷第十二期(1921年1月—1931年12月),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80。

【新增】

郑振铎,《西谛书话》,北京:三联书店,1983。

陈福康,《郑振铎年谱》,北京:书目文献社,1988。

陈福康编,《回忆郑振铎》,上海:学林出版社,1988。

陈福康,《郑振铎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刘哲民、陈政文编,《抢救祖国文献的珍贵记录——郑振铎先生书信集》,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

郑振铎撰、陈福康编,《郑振铎日记全编》,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

郑振铎,《纫秋山馆行篋书目跋》,《文物》1983年第10期,页40-42。

《郑振铎先生遗札(1955—1956)》,《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1期,页339-343。

林清芬,《国立中央图书馆与文献保存同志会》,《国家图书馆馆刊》1987年第1期(1998年6月),页1-22。

林清芬,《抗战前后郑振铎的整理国故与刊印古籍工作》,《国家图书馆馆刊》1988年第1期(1999年6月),页77-110。

潘承厚 潘承弼

潘承厚辑,《明清藏书家尺牍》,1942。

潘承厚辑,《明清两朝画苑尺牍》,1943。

- 潘承弼(景郑),《著砚楼书跋》,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2006。
- 潘承弼、顾廷龙纂,《明代版本图录》,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71。
- 潘承弼辑,《元明诗翰》,1944。
- 潘奕隽,《三松堂集》,1870—1872。
- 潘奕隽,《潘氏三松堂书画记》,上海:合众图书馆,1943。
- 潘遵祁,《西圃集》,1873。
- 潘遵祁,《须静斋云烟过眼录》,1911。
- 潘祖荫藏、叶昌炽撰,《滂喜斋藏书记》,台北:广文书局影印,1967。
- 潘祖荫藏、叶昌炽撰,《滂喜斋藏书记》,吴县潘氏,1928。
- 潘祖年编,《潘祖荫年谱》,台北:广文书局影印,1971。
- 潘成谋等修,《大阜潘氏支谱》,1908年石印、1927年重修。
- 缪荃孙辑,《续碑传集》(江楚编译局,1910),卷三,叶1-14,冯桂芬,《太傅武英殿大学士文恭潘公墓志铭》;卷一一,叶6,吴汝纶,《前工部侍郎潘公神道碑》。
- 闵尔昌辑,《碑传集补》(北平: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1923),卷四,叶10-15,李慈铭,《潘文勤公墓志铭》;卷一一,叶11-14,冯桂芬,《功甫潘先生墓志铭》。
- 【新增】**
- 潘承弼(景郑),《著砚楼读书记》,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
- 潘承弼(景郑),《寄沔贻稿》,济南:齐鲁书社,1985。
- 叶景葵,《吴县潘君博山传》,《卷龠贻稿》(1962),札记,页46-47。
- 张元济,《潘君博山墓志铭》,《张元济诗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页378-279。
- 徐小蛮,《陈后山集版本源流考》,《文献》第十九辑(1984年3月),页168-178。
- 郑伟章,《稿本香雪草堂书目、西圃藏书目著者极其世系考》,《津图学刊》1985年第4期,页139-147;1986年第1期,页143-151。

王世伟,《潘景郑先生之读书与校书生涯》,《图书馆杂志》2004年第2期,页66-74;王世伟,《历史文献论丛》(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页87-97。

王世伟,《版本目录学家潘景郑先生藏书聚书考略》,王世伟,《历史文献论丛》(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页98-127。

张钧衡

张钧衡藏、缪荃孙撰,《适园藏书志》,台北:广文书局影印,1968。

张钧衡辑,《适园丛书》,乌程张氏,1913—1917。

张钧衡辑,《择是居丛书》,1926。

张乃熊编,《芹圃善本书目》,台北:广文书局影印,1969。

周庆云纂,《南浔志》,1920。

封思毅,《士礼居黄氏学》,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

【新增】

张懿德堂编,《张适园先生哀挽录》,1928。

柳和城,《适园藏书的聚与散》,《藏书家》第十三辑(2008年1月),页34-44。

蒋汝藻

蒋汝藻藏、王国维编,《传书堂藏书志》,台北:艺文印书馆影印,1974。

蒋汝藻编,《传书堂善本书目》,钞本。

蒋祖诒辑,《思适斋集外书跋辑存》,吴县:邹氏百拥楼,1935。

王国维撰、陈乃乾编,《观堂遗墨》,1930。

周庆云纂,《浔溪诗征》,梦坡室,1917。

周庆云纂,《浔溪文征》,梦坡室,1925。

【新增】

熊融,《关于南浔藏书家蒋梦莘先生》,《图书馆杂志》1985年第2期,页46-49。

姚淦铭,《王国维与藏书家蒋汝藻交游考论》,《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三卷第一期(2004年2月),页44-48。

刘承幹

刘承幹,《嘉业堂藏书楼记》,《图书馆学季刊》第一卷第三期(1926年9月),页549-550。

刘承幹辑,《吴兴刘氏嘉业堂善本书影》,吴兴刘氏嘉业堂影印,1929。

《嘉业堂藏书楼钞本书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委托该堂代抄本。

《嘉业藏书楼书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委托该堂代抄本。

《嘉业堂善本书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委托该堂代抄本。

黄孝纾,《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纪略》(1-5),《青鹤》第二卷第十二期至第二十三期(1934年5月—10月)。

张 崧,《南浔刘氏嘉业堂观书记》,《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三期(1935年6月),页1-43。

夏定域,《求恕斋善本瞥记》,《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三期(1935年6月),页1-8。

刘锦藻编,《皇朝续文献通考》,台北:新兴书局影印,1959。

吴郁生,《刘澄如学士行状》,汪兆镛编,《碑传集三编》(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80),卷四〇,文苑五。

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1975。

黄彰健,《校印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红格本明实录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明实录附校勘记》(台北:校印者,1965—1968),第一册。

饶宗颐编,《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善本书录》,香港:龙门书店,1970。

苏振申,《永乐大典聚散考》,《中央图书馆馆刊》新四卷第二期(1971年8月),页10-22。

【新增】

《嘉业堂明善本书目》四卷,1940。

缪荃孙等撰,《嘉业堂藏书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李性忠,《刘承幹与嘉业堂》,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

浙江图书馆编,《嘉业藏书楼》,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

项文惠,《嘉业堂主刘承幹传》,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张学舒,《刘承幹及其嘉业藏书楼》,《书林》1981年第5期(1981年10月),
页28-29。

许寅,《傻公子作出的傻贡献——嘉业堂藏书楼的过去和现在》,《学林漫
录》第八辑(1983年4月),页1-18。

潘继安,《嘉业堂藏书志编撰经过考》,《图书馆杂志》1986年第3期,页
64-66。

李性忠,《南浔沦陷时期的嘉业藏书楼》,《天一阁文丛》第四辑(2006),页
244-249。

李性忠,《论嘉业堂的藏书书目》,《四川图书馆学报》2000年第5期,页
74-76。

吴格,《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聚散考略》,《书目季刊》第三十七卷第四期
(2004年3月),页17-44。

《历史文献》第八辑(2004年12月),页202-215,王茜整理,《刘承幹致许汝
棻函稿》;页241-271,刘承幹述、吴格整理,《壬午让书纪事》;第九辑
(2005年11月),页225-247,王茜整理,《刘承幹致王季烈函稿》;页
248-265,梁颖整理,《嘉业堂售书事友朋书札》。

后 记

苏精先生所著《近代藏书三十家》开近代藏书史研究之先河，史料丰富，别择确当，议论精辟，眼光独到，文字简洁雅致，迥出同类著作之上，盛誉播在人口。所收诸篇最初连载于台湾《传记文学》杂志，后由传记文学出版社结集、成书，出版虽已经二三十年，但海内外皆尊为藏书史领域的必读经典。可惜原书梓行于台湾，大陆读者求索不便，只得辗转复制，以备披览。苏精先生慨然授权北京中华书局出版《近代藏书三十家》简体字版，以慰大陆读者渴念，真是读书界之幸事。

苏精先生本意以为此系旧作，不欲再版。然而窃以为大陆近年虽于书籍史、藏书史领域的研究稍有进展，但资料收集与研究仍处于肇始期，尚无《近代藏书三十家》这样系统、完备的著述。本书不仅具有学术史的价值，更可为后来者昭示近代书籍史研究之前途与路向。经再三考虑，苏精先生终于俯允修订再版，除订补原书之外，仍加《周叔弢自庄严龛》一篇（亦刊于《传记文学》），书名仍称三十家不变。不过一月有余，我们就奉到苏精先生寄来的修订稿本。之所以能够如此高效地完成修订，端在于先生长期关注藏书史研究的进展，时时积累相关资料，并做整体的考究和判研，我们读后深感钦佩。先生此稿不但修正了以往的疏误，而且根据最新的藏书史研究成果加以增补。例如《董康诵芬室》一篇，书其卒年，原作“抗战胜利后被捕，民国三十六年（1947）病死北平狱中，年八十一岁”，此后我们访于董康之子董申保先生，得知董康卒于1948年5月，苏精先生由此线索进一步查阅1948年5月5日上海《新闻报》、天津《大公报》、天津《益世报》等报章，修订为“抗战胜利后被捕入狱，因病保外就医，民国三十七年（1948）五月四日病死北平家中，

年八十二岁。”

自得到苏精先生的允诺,并接到先生寄来的修订稿,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为了不辜负先生的信任和托付,我们倾尽全力做好编辑事务。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是原书所附图片和书影不够清晰,而苏精先生当年所用的图片和书影均已随岁月黯淡,不能再次用于出版。于是我们多方查阅古籍旧刊,走访前辈哲嗣,调查藏家故居,借拍题跋墨迹,凡先生原书不具藏家肖像照片或题跋手迹者尽力补充,皆求其真确,不敢伪滥。北京著名藏书家孟宪钧先生熟知近代藏书、刻书掌故,致力于搜求近代名家旧藏古籍及墨迹,曾撰有《民国以来藏书家刻书举隅》等论著。我们登门求教,并以摄取近代名家题跋墨迹、补充本书插图为请,孟先生乐观其成,尽出所藏以助所需,热心相助,高谊可感。董康之子董申保先生抗战期间随北京大学内迁,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以地质学名家,后任北大地质学系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如今年近期颐,身笔俱健。董先生不仅接受我们的访问,也为本书提供董氏照片,以补不逮。友人王亮,王国维先生之曾孙,近来整理《传书堂善本书志》,我们因以访寻蒋汝藻手迹相托。王亮前年远赴美国访学,仍挂于怀,于伯克莱大学图书馆获见蒋汝藻先生影宋手抄《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并将此珍贵书影举以相赠,令人感佩。又,近代藏书家旧居及藏书楼屡经沧桑,大多已经不存,承天津、苏州等各地友人代为查访,拍摄陶湘、邓邦述故居照片,使读者有幸凭吊。苏精先生又提供台湾公藏善本书影多幅,令我们得以解决难题。

今天,《近代藏书三十家》得以出版,我们谨记录此书编辑过程,以附骥尾,幸何如之。

史睿 王楠
二〇〇九年三月

索引

一画

一·二八事变(淞沪事变) 93
151 189 222

二画

丁氏文库 125
丁氏图书馆 125 125
丁祖荫 86—90 206 259 260
丁福保 6 81 122 123 125—
128 262 263
八千卷楼 34 54 240

三画

三李龢 75
三松堂书目 204
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又见合众
图书馆) 16 135 209
广东省立图书馆 35 139
广东藏书纪事诗 17 31 139
140 156 249
广雅书局 10
广雅书院 34
也是园 49 87 88

小说 66 71 189 193—196
小说月报 168 173 189 191
193 194 196 237 270

小檀栾室 82—84

马鉴 243

乡贤文献 20 107 207 208

四画

丰湖书藏 34 35
王丰镐 150 151
王云五 57 59 61 143 242
244
王文进 164 239
王存善 2 118—121
王兆杏 119 121
王克敏 118—121 262
王体仁(九峰旧庐) 103 131
王伯元(一贯轩) 172
王国维 29 60 66 67 69 82
84 101 162 165 172
191 212 217 221—225
253 259 261 272 273

- 王季烈 18 249 252 274
244—246 248—250 270
- 王颂蔚 4 9 10 15
273
- 王斯恩 118 120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29
- 开花纸 92 94
161 228 248 258 273
- 天一阁 41 163 221 222 228
235 274
中华图书馆协会 113—116
- 无锡丁氏藏书志 123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 110 114
- 艺风堂 5 33 53 59 81 218
中英庚款董事会 198 234 235
- 227 250
长泽规矩也 245
- 六一词社 79 168
六宜阁 214
- 木斋图书馆 20—24 253
文苑英华 104 105 121 133
- 木犀轩 25—30 183 253 254
文学研究会 189 190 237
- 五十万卷楼 40 155—157 238
文渊阁 143
- 266
文集 明代 27 222 229
- 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 40 157—
清代 32 39 81 140
- 159 266
文献保存同志会 236 237 242
- 五十万卷楼藏书目录初编 139
文溯阁 142
- 156 158 159 266
文澜阁 5 152
- 五百经幢馆 15—17 209
方志 4 12 32 34 59 60
- 太平御览 152
131 141 162 163 220
- 历书 162 218
230 238
- 中央图书馆 53 58 66 67 77
尺牍 4 209 210
- 78 82 95 143 153 157
邓邦述 49 —79 102 134
- 164 169 176 177 191
168 171 206 208 258
- 193 198 200 204 208
邓实 161
- 215 217 218 229—231
双云阁 16
- 233—236 239 240 242
双泓居藏书目初编 74
- 双鉴楼 52 98 100—103 183

- 221 233
- 双鉴楼善本书目 101 106 261
- 双鉴楼藏书续记 42 106 261
- 双照楼(吴昌绶) 68 96
- 双照楼(汪精卫) 176
- 孔广陶(岳雪楼、三十三万卷书堂)
139 156
- 孔继涵(微波榭) 221
- 书目答问 23 39 40
- 书林清话 5 17 39 41 42
255
- 书舶庸谭 67 68 70 71 94
258
- 书棚本 75
- 水经注 162 221
- 五画
- 玉山草堂 32
- 玉海堂 238
- 古今杂剧 87 88 198
- 古今图书集成 62 94
- 古本戏曲丛刊 88 192
- 古钱大辞典 123 126 128 263
- 石印 16 30 79 123 135 271
- 石德芬(石室) 33
- 龙凤龕(知服斋) 33
- 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 138 141
143 233
- 东方图书馆 59—61
- 北平图书馆(又见京师图书馆、北
京图书馆) 23 28 60 66
67 88 101 102 103 109
110 114 115 140 141
152 164 182 192 193
222 229 233 238 262
267
-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氏书目 28
29 253
- 北京图书馆(又见京师图书馆、北
平图书馆) 48 53 61 81
103 105 114 117 123
125 157 164 171 172
184 186 191 208 209
217 221 229 233 251
266 269
- 卢弼 20 21 23 92
- 卢靖 19—24
- 叶启勋 41 255
- 叶启倬 38 41
- 叶昌炽 5 8—18 27 41 45
48 54 57 66 85 93
101 120 144 145 201
205 209 217 220 228
231 232 249 252 271
- 叶恭绰 36 143 236 237 238

- 242—244
- 叶景葵 53 58 77 129—136
204 250 263 264 271
- 叶德辉 5 17 42—44 55
102 156 254 255
- 四史 15 228
- 四当斋 45—48 50
- 四库全书 24 62 114 137
138 140—143 145 235
248
- 四明丛书 153 154 237 265
- 四经四史斋 27
- 四部丛刊 42 50 56 58 61
62 106
- 丛书 丁氏医学丛书 126 小檀
栾室汇刻闺秀词百家 82 83
木犀轩丛书 30 253 古今
名剧选 169 古本戏曲丛刊
88 192 四明丛书 153
154 237 265 四部丛刊
42 50 56 58 61 62
106 玄览堂丛书 200 百川
书屋丛书 96 百川学海 94
96 百衲本二十四史 106
百部丛书集成 219 沔阳丛
书 23 24 252 宋元科举
三录 83 宋金元明本词 96
- 求恕斋丛书 232 希古楼金
石丛书 232 拓跋廛丛书
96 吴兴丛书 23 232 咫
园丛书 54 南陵先哲遗书
83 昭代丛书 110 郎园全
书 44 254 涉园墨萃 96
海陵丛书 90 陟冈楼丛刊
206 211 留余草堂丛书
232 清人杂剧 192 密韵楼
丛书 225 陶氏书目丛刊
96 奢摩他室曲丛 169—171
常州先哲遗书 5 251 湖北
先正遗书 21 23 24 36
252 道藏精华录 127 喜咏
轩丛书 96 张氏适园丛书初
集 218 慎始基斋丛书 23
252 群碧楼丛刻 79 汇刻
传奇 192 适园丛书 218
219 272 端溪丛书 36 诵
芬室丛刊 67 嘉业堂丛书
232 虞山丛刻 90 259 虞
阳说苑 90 259 随庵所著
书 83 随庵丛书 83 鄒斋
丛书 83 择是居丛书 53
218 219 272 积学斋丛书
83 儒学警悟 94 96 卫生
丛书 5 6 双梅景閣阁丛书

- 44 怀幽杂俎 83 丽廛丛书
42 续古逸丛书 58 61 观
古堂所刊书 42 44 观古堂
汇刻书 42 观古堂书目丛刻
44 255
- 玄览堂 188 191 197
玄览堂丛书 200
冯平山图书馆 157 243—245
254
冯桂芬 9 12 204 271
永乐大典 61 62 106 186
221 222 229 245
圣泽园 230
- 六画
- 西谛书目 81 193—196
西谛所藏弹词目录 196
西谛所藏散曲目录 269
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 192 269
百宋一廛赋 53 74
百衲本 50 61 62 100
百靖斋 76 171
百嘉室 170 171
百嘉斋 92 171
朱士嘉 230 273
朱希祖 92 156 160—166 176
207 217 266
朱家骅 235 236 241 246
传书堂(又见密韵楼) 60 66
220
传书堂善本书目 224 272
传书堂藏书志 222—224 272
传奇 169 170 172 191 239
任振采(天春园) 131 230
伦明 17 28 33 42 77
137—145 156 162
合众图书馆(又见上海市历史文献
图书馆) 18 209
杂剧 87 88 169 172 191
198
刘公鲁 16
刘世珩(聚学轩) 16 209
刘承幹 15 16 24 67 69 96
156 214 217 218 225—
232 240 273 274
刘履芬 48
江南图书馆 54 240
江标 2 10 15 17 85
汲古阁 87 92—94 96
许地山 189 243
许博明(怀辛斋) 206
阮元 34 152 156 159 266
戏剧 66 67 95 131 164
169 170 172—196 198
200

观古堂 37—40 156 254 255
观古堂藏书目录 40—42
观海堂 113
约园 146 152 265
约园元明刊本编年书目 152
约园善本藏书志 154
孙廷翰 228
孙楷第 193 194
孙殿起 140 265
孙毓修(小绿天) 206
七画
远碧楼 233 239
劫中得书记续记 3
严复 148
苏老泉先生全集 220
苏诗 102 183
杨守敬 12 39 71 75 100
101 113 205 210 216
杨敬安 33 36 254
李少微 28
李文田(泰华楼) 161
李拔可 236
李宗侗 221
李盛铎 25—30 62 79 181
183 238 253 254
医学书局 122 126 263
批校本 74 81 132 133 135

抄书 35 162
抄本(写本) 水经注 162 221
中兴纲目 13 古今杂剧 87
88 198 北梦琐言 104 目
莲救母生离地狱升天宝卷
196 宋元人小集 66 宋太
宗实录 58 宋会要 229
明史钞略 207 明实录 228
金石昆虫草木状 208 洽园
诗稿13 皇元通雅词 123
酒边词 123 唐诗偶钞 204
国寿录 207 闺秀词钞 82
旧五代史 62 77 鹤山先生
大全文集 225
求是斋 220
求恕斋 227
吴云(两墨轩) 220
吴昌绶 68 96 102 131
吴梅 66 69 75 76 79 131
167—173 191 203 211
何炳松 153 198—200 235—
237 242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堂 16
佛学大辞典 126 263
余绍宋 36 109
希古堂 241
饮冰室 47 108—110 117

- 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 17 28 42
 77 144 145 162 249
 264
 怀幽园 83
 汪宗衍 36 254
 沈梧(古华山馆) 209
 沈曾植 66 100 134 214 220
 沈韵初 16
 宋本 山谷琴趣 58 毛诗注疏
 239 北山小集 215 白氏六
 帖事类集 101 古尊宿语录
 208 百川学海 94 96 竹
 友集 12 205 宋太宗实录
 58 李文公集 157 李贺歌
 诗编 215 223 李群玉集
 74 75 东都事略 67 214
 215 东坡诗集 102 尚书孔
 传附释文 162 164 217
 吴郡志 67 吴郡图经续记
 220 周易本义 101 金石录
 205 南岳总胜集 39 40
 42 春秋经传集解 58 176
 181 唐女郎鱼玄机诗 123
 唐李推官披沙集 75 韦苏州
 集 38—40 217 224 孙可
 之集 157 通鉴记事本末
 102 草窗韵语 66 220
 225 淮海居士长短句 205
 湘山野录 52 53 新刊诸儒
 批点古文集成 100 陈后山
 集 208 271 资治通鉴 30
 49 52 100 224 广韵 12
 68 205 碧云集 74 75
 醉翁琴趣 58 鹤山先生大全
 文集 225 权载之文集 58
 宋四史斋 227 228
 宋代蜀文辑存 107 261
 宋炳经(一览楼) 152
 译书公会 64 122
 译书院 6 55
 张乃熊 213—217 219 272
 张之洞 7 32 33 39 101
 118
 张元济 6 24 37 42 52
 55—63 66 75 99 102
 103 105 106 129 131
 134 135 143 183 203
 236 237 256 257
 张寿镛 84 85 146—154
 198—200 208 217 230
 235—237 243 265 266
 张宗松(清绮斋) 57
 张钧衡 53 67 212—219 241
 272

- 张珩 164 213 217 218
张睿 56 99 213 219 226
陆心源(皕宋楼) 221
陆润庠 9 10 13 46
陈田(听诗斋) 222
陈如升 48
陈君葆 244 245
陈陶遗 134
陈寅恪 245
陈辉德 130 148
陈群 174—178
陈澧(东塾书楼) 32 33
陈骥德(吉云居) 209
陈鱣(向山阁) 47
诂林精舍 122 123 125 128
263
- 八画
- 范钦 41 22
版权 6 215
版画 194—196 200 201
松社 112 113
松坡图书馆 112—114 116 262
奇觚廌文集 9 14 18 252
256
择是居 219
明代版本图录 210 271
明季史籍题跋 165 266
明实录 228
罗振玉 29 50 67 95 96
222 223
知止楼 19—21
知悔斋 118—121
金石 2 4 14 15 16 45 47
52 53 74 84 89 110
120 205 209 213
金碧钞本 196
周密 66 220 225
周越然(言言斋) 39 40 93
京师图书馆(又见北平图书馆、北
京图书馆) 114
郑孝胥 214
郑振铎 3 77 81 82 88 95
153 170 188—200 208
217 230 237 250 270
卷盒 129 131—132
卷盒书跋 54 77 131 133—
135 204 250 256 263
洗玉清 139 141
法宝馆 200 243 246
泽存书库 174—177 246 268
治庸室 8 12 13 15
治庸室善本书目 13
宝山楼 202 206—209
宗惟恭 53 54 256

- 宗舜年 2 49 51—54 102
206 256
- 宗源瀚 51 52 54
- 郎园 37
- 郎园读书志 39 41 42 254
- 屈万里 177 244
- 孟东野诗集 77
- 九画
- 赵万里 28 92 195 253
- 赵尔巽 12 20 73 130 247
- 赵宗建(旧山楼) 87
- 赵琦美(脉望馆) 87
- 故宫博物院 29 67 73 92 96
99 118 130 182 185
209 233 235 237 247
- 胡注资治通鉴 49
- 胡钧 23
- 胡适 28 67 71 188 193
244 245
- 茹古精舍 220
- 南菁书院 86 122 123
- 邨亭 160—165
- 邨亭藏书题跋记 165
- 拾经楼 41
- 适园 67 169 212—219 233
239—242 245
- 适园藏书志 214 217 272
- 复社 190
- 俚簾馆
- 泉币 53 128 213
- 洪业 145
- 活字 39 68 186 210
- 冠冕楼 34
- 语石 16—18 252
- 说文解字诂林 126 127 263
- 诵芬室 64—68 95 131 170
258
- 郡邑丛书(又见丛书) 5 23
153
- 咫园 51—54 134 206 233
- 费念慈 228
- 十画
- 袁同礼 26 28 114 116 142
- 袁芳瑛(卧雪庐) 38 220
- 袁克文 76 123 128 227
- 莲圃善本书目 214 217 272
- 莫友芝(影山草堂) 227
- 莫伯骥 40 139 155—159 238
266
- 莫棠(铜井文房) 87 206
- 档案 29 161 164 175 177
- 桥川时雄 143
- 校书 12 30 46 49 50 59
103 104 133

- 校史随笔 63 257
260
- 贾浪仙长江集 77 133
- 套印本 92 93 196
- 顾廷龙 48 50 57 61 132
133 135 182 203 210
250 251 256 263 264
271
- 钱曾 49 78 87
- 钱谦益 77 87 90 211
- 铁琴铜剑楼 11 12 14 15 54
83 89 90 102 227 233
239 240
- 积学斋 80—83
- 积学斋藏书志 84
- 徐乃昌 80—85 96 259
- 徐中舒 29
- 徐世昌 73 113 130
- 徐信符(南州书楼) 156
- 徐鸿宝 141 237 238 243
244
- 翁方纲 16
- 翁同龢 2 5 169
- 高君箴 191
- 梅余庵 60
- 浙江省立图书馆 121 219
- 涉园(张元济) 57 58 60
- 涉园(陶湘) 68 91—96 131
260
- 涉园藏书第一编 260
- 海盐张氏涉园藏书目录 58 256
- 海源阁 27 157 181 183 216
240
- 读书敏求记 49 78 79 141
- 读史方輿纪要 132
- 读有用书斋 216 217
- 腴闻斋 59
- 陶子麟 5 228
- 陶洙 94
- 陶湘 2 68 75 76 91—97
131 171
- 通学斋 33 140
- 十一画
- 著砚楼书跋 16 39 53 74 88
204 206 207 210 250
271
- 黄节 161
- 黄丕烈(士礼居) 74 87 221
- 黄跋本 216 217
- 梅兰芳(缀玉轩) 192
- 怀幽杂俎 83
- 曹元忠(笈经室) 134 206
- 奢摩他室 131 169—172 233
- 盛昱(意园、郁华阁) 33 59
101

- 盛宣怀 1—7 51 91 92 119
122 251
- 敝牛斋 35
- 野录轩 53
- 祭书 102
- 康有为(万木草堂) 109 111
- 章王丹芬 48
- 章太炎 161 162 203 207
210
- 章氏四当斋藏书目 48 50 256
- 章钰 45—50 79 95
- 章梈 232
- 商务印书馆 55—57 59 60 63
88 89 93 105 143 144
158 159 168 169 170
173 187 189 197 221
222 236 249 251 252
253 256 257 262 265
266 268—272
- 清史馆 12 46 73 226
- 淞社 227
- 梁氏饮冰室藏书目录 109 110
262
- 梁启超 47 64 65 108—117
262
- 梁思孝 33 35
- 梁鼎芬 31—36 118 254
- 涵芬楼 50 59—61 221 222
- 密韵楼(又见传书堂) 60 66
220
- 续书楼 137 139 141—143
156
- 续书楼书目 140
- 十二画
- 董康 64—71 94 95 122 131
143 170 191 215 225
231 258
- 蒋凤藻 14
- 蒋汝藻 60 66 68 214 216
219—225 228 272
- 蒋复璁 143 236—238 241
242 246
- 蒋祖诒 53 164 219 222 224
272
- 蒋维培 220
- 蒋维基 219 220
- 葵霜阁 31—33
- 蛰居散记 197 199 200 269
- 景廉(半亩园) 101
- 程砚秋(玉霜簪) 192
- 傅忠谟 103 105
- 傅斯年 29
- 傅增湘 24 27 28 41 42 49
50 52 56 58 62 63 66

68 73 75 77 92 94 96
98—107 120 121 181—
184 187 206 221 257
261 262

焦山书藏 33—35 254

鲁迅 188 195

敦煌写卷 29 114

曾习经(湖楼) 139

湘素楼 86—88 206

寒瘦山房 77

寒瘦山房鬻存善本书目 74 77

谢国桢 162 166 183 207

250 267

强学书局 111

缘督庐 8

十三画

韞辉斋 213 217

颐情馆 52 53

碑拓 15—17 161

愚斋 1—4

愚斋图书馆 3 4

滂喜园 140

滂喜斋 14 15 17 205

滂喜斋书目 205

福功书堂 156

群碧楼 72 74 75 77 79

134 206 208 233 239

群碧楼书目初编 74 75 258

群碧楼善本书录 75 77 258

殿本 92 94 96 97 120

十四画

嘉业堂 14—16 67 152 156

212 214 218 225 227—

231 233 239—241 243

245 252 273

嘉业堂明人集部提要

嘉业堂明刊本书目

嘉业堂藏书志 226 230 231

274

嘉业藏书楼书目 230

嘉业藏书楼钞本书目 228

嘉靖本 93 171

蔡元培 29 55 59 70 77

143

蔡金重 17 145 249

蜚英馆 30

端方 2 11 15 32 39 46

51 54 59 72 73 74 81

100 101 122

端溪书库 34

缪荃孙 2 3 5 15 16 33

53 59 67 81 85 93

100—102 123 205 214

217 218 226—228 230—

- 232 241 248 250 256
272 274
- 十五画
- 影宋抄本 225
- 谿经铸史斋 59 60
- 稿本 24 48 69 89 131 132
135 135 141 162 171
176 207—209 215 219
230—232 243
- 潘介祉(渊古楼、桐西书屋) 204
- 潘明训(宝礼堂) 131
- 潘承厚 18 202—204 206 208
209 270
- 潘承弼 16 18 39 53 54 88
132 202 203 206—211
270 271
- 潘奕隽(三松堂) 204 271
- 潘祖同(竹山堂) 205
- 潘祖年 14 205 211 271
- 潘祖荫 14 15 17 205 211
- 271
- 潘祖颐 205
- 潘曾莹(小鸥波馆) 205
- 潘遵祁(香雪草堂) 204 271
- 澄心堂纸 39
- 十六画
- 镜影楼 84
- 十七画以上
- 藏书十约 41 42
- 藏书纪事诗 12 13 14 16—18
41 45 57 93 201 249
252
- 藏书纪事诗补续 159
- 藏书纪事诗索引 17
- 藏书偈 13
- 藏园 27 49 100—103 105—
107 120 183
- 藏园群书题记 106
- 瞿安书目 171
- 癖泉书室 53

ISBN 978-7-101-06548-0



9 787101 065480

定价：38.00元